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主编/高介华

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

academy culture and buildings of china

杨慎初/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ISBN 7-5351-3337-1

9 787535 133373 >

定价：85.00元

TU-862
9

主　编/高介华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

Academy culture and Buildings of China

杨慎初/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TP)数据

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杨慎初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高介华主编)
ISBN 7-5351-3337-1

Ⅰ.中… Ⅱ.杨… Ⅲ.书院-建筑艺术-中国-古代-图集
Ⅳ.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3117号

责任编辑
杨唐轩
整体设计
夏金中
责任印制
张遇春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电话 027-83619605
邮编 430015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经销 新 华 书 店
印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3013号

开本：889mm × 1230mm 1/16
字数：201 千字
印张：9.5 印张 7 插页
版次：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ISBN 7-5351-3337-1/T.7
定价：85.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编纂委员会

顾问：吴良镛　齐　康

名誉主任顾问：杨鸿勋

主任委员：刘先觉　郭湖生　娄齐贵

副主任委员：吴庆洲　巫纪光　李先逵　袁定坤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志武　王　铎　王　冬　王鲁民　刘先觉

刘　塨　吴庆洲　巫纪光　余卓群　李先逵

张十庆　张先进　张万立　张敏龙　杨唐轩

杨秉德　杨慎初　沈福煦　郑振纮　姜传宗

柳　肃　娄齐贵　施维琳　袁定坤　郭湖生

顾孟潮　常　青　喻学才　戴志中　戴　俭

主编：高介华



1.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外景



2. 湖南湘乡东山书院鸟瞰



3. 贵州镇远紫阳书院全景



4. 辽宁铁岭银冈书院大门



5. 山东曲阜洙泗书院牌坊



6. 福建建阳考亭书院牌坊



7. 云南石屏玉屏书院内院



8.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载酒亭



9. 山西平定冠山书院内院



10. 江苏泰州安定书院内院

11.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





12.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史迹



13. 河南嵩山嵩阳书院"二将军"古树

14. 河北保定莲池书院园林



总序(一)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1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1 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1.2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1.3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1]。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2]。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3]，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2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2.1 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4]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5]，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6]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7]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2.2 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8]，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9]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10]

3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11]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12]、地域文化[13]、地区建筑学[14]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15]。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16]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7]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18]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4 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一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总序。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文两方面的结合；写这篇文章时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思考还远不成熟，但结稿时间在即，匆匆提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2002 年 8 月 25 日

---

[1] 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第三世界——前景忧虑与赶超希望之间的文化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 据美国百人会在 1995 年做过的一次调查，"美国人在不少方面对中国持有否定态度，但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却有强烈的肯定和崇敬的态度与浓厚的兴趣。"见：Shirley Young. *Cultural as an engine for Shanghai's development*（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 年 7 月 25 日

[4] Mumford, L.*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5]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 宋峻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 Hall, P.*Cities of Tomorrow.*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8

[7] Hall, P.*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2001

[8] 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 杨雪兰.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上海.2002 年 7 月 25 日

[10] 吴良镛.基本理念·地域文化·时代模式——对中国建筑发展道路的探索.建筑学报，2002(2)；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文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1] 刘秀峰同志，共和国第一任建设部长，可以被看作建筑界行政官员学习专业的代表，对建筑学专业他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在 1950 年代批判所谓"复古主义"后的 1958 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建筑理论座谈，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二是在 1960 年代后期，他组织了古建筑研究老中青的代表人物参加、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他也亲自筹划、组织并伏案编写，终能在文革前夕得以完成，实功不可没。

[12] 1985 年在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城市文化"，中国重庆；文章修改稿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13] 吴良镛.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1997年9月现代乡土建筑国际会议大会主旨报告人之一,中国北京

[14] 吴良镛.面向新的中国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8(3);吴良镛.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1995—1996,见: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1)

[15] 皮特斯.作为杂合的全球化.见: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6] 吴良镛.关于古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学报,1999(4)

[17] 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

[18]吴良镛.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的学术报告——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设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建筑学报,2000(7)

总 序(二)

齐　康

泱泱中华，方圆九州，五千年古国，星移物换。西起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东至太平洋的东海岸，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中，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所有这些大自然的赐予，滋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由汉、回、壮、藏、蒙等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丰富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她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积累、融合和创新，虽经无数次纷争离合，但始终凝聚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精神——民族魂。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她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颂扬着自己的文明，荣耀着自己的文化，不断抗击着外来者的入侵。古代四大文明中，有的消失了，有的残缺了，有的转化了，惟有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不断继承、发扬和创新，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亮。虽然经过了屈辱的年代，终能坚强地站起来，为世人刮目。近百年来，她屡遭列强的侵略、蹂躏，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经过了短短的五十年，焕发出青春。人民需要历史的记载，人民需要历史的回忆、历史的总结，更需要历史的开创，让存在和延续了五千年的文化具有新的魅力和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伟大民族存在的基础，是启迪我们未来的信念和信仰的基石。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忘却和割断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广博，不论是在音乐歌舞、诗文书画中，还是在典章文物、礼俗制度中都蕴涵铭记着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艺术的表现最具有综合性，表现方式独树一帜，表现效果遒劲有力。建筑是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载体，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是文明形成、发展的物化体现。

原始人群聚集生活开始后，尝试用树枝、泥土、石头等原始材料来构筑生存空间，建筑活动开始了。在进一步的演化发展中产生了城市，城市是人类高效的聚集形态。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形制，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显明的东方特征，是世界城市史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城市，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中国古代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级性。王城之内，宫城居中，前朝后市，早在周代，已有都城“营国制度”。中央政权统治和管辖着地方行政，控制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以行政体系为主的城镇体系。在汉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城镇仍然保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依托区域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且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丰富的城市形态遍布于全中国，并不断地延续其生命力。虽然它们有的被战争破坏，被自然灾害所湮灭，但对于它们的发掘和研究仍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生命力延续的象征。中国的城市选址注重依托水系，水系依托大江大湖，江湖依托自然生灵，自然生灵的生存离不开古代的自然生态。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但中国城市始终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历史形态和形象特点，始终得以保持，那些壮丽的城墙、城门、城楼、护城河等构成了城市的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形象。

山地的城市与建筑，为适应自然地貌的特性，沿着蜿蜒的山麓，利用易于建筑的地段，与山形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都城的选址，意在“象天法地”。北京城选址在华北平原，历经千年修葺，特别是明代的大规模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的瑰宝，保留了最为完整的城垣。西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朝代的更替，依然保留了城墙和城市结构的特点。南京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明代建设的城墙，宽达 9m，高 13m 左右，至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过它的。它顺应自然形态，蜿蜒于钟山之下，北起长江，南至秦淮河，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是适应自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城池典范。东海之滨，历史上有许多海防城市，如惠安崇武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在抗击外敌入侵中起过很大作用。中国最宏伟的城墙是长城，从战国时始筑，至明清一直修筑不止，成为人造卫星上可见的中华长龙。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从风光绮丽的北国到绿林茂盛的南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绝，影响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区的城镇和建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历史的丰富资源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布达拉宫，没有长城，没有故宫、天坛，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各地民居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等，又怎么能够让人们完整地理解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它们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生

活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中国各地的民居绮丽多彩,由于各地的气候、地理、人文、生活习俗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仍统一在相对固定的院落模式中。从冰封千里的东北看厚大石墙的四合院,从云、贵、黔山地看山寨的吊脚楼,从闽江、珠江流域看飘逸通透的闽粤民宅,真是缤纷多彩。又如皖南民居依山面水,一簇簇、一群群,展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除黄河、长江外,我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人们利用黄土夯筑墙垣、城墙,城楼建筑十分壮丽。窑洞民居,浑然天成,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山林一般都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如泰山、华山、衡山、峨眉山、武当山、武夷山、雁荡山等等,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深含文化根基。中国的山水是文化的山水,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有血有肉的山水。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曾经达到了世界建筑文化的顶峰。建筑以"间"为单元,形成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形成一种特有的组合体,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的朴素自然观,曾创造了宜人的人居环境,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选址依托大自然,城市周围或有绿色的山林,或有优美的水面;城市中的水网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水系,沿主要水系形成绿色地带。都城中按方位的不同建有皇家坛、庙,皆有大片绿地林木环抱。城中官衙、民居的合院以至私家园林也均有绿化,更不用说皇家园林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园林一体化,组成了适合人们游憩栖居的良好人居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虽以"间"为单位组成四合院,但相互组织的单位是"群","群"是中国建筑的基础。"间"和"群"是体现和谐之美的所在。这些"间"、"群"又与自然山形、水面结合,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内涵。在城市中,"间"和"群"又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城市群落有机的组织是中国城市美的主要特点。这些山水城市注重宅第的选址、排水,及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街坊、里弄成为组织、管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间"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体,再由单体围合组织成建筑群体。群体的组织,反映了社会层次的高低,也反映出贫富的等级性。故此,我们便能看到故宫壮丽、天坛均衡、孔庙庄严、民居活泼的各类建筑群体。木构架的使用和形制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重要特点。举架、开间作为形制的基本标准,既可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等级层次的要求,也能适应不同建筑功能的需要。四合院空间的穿透组织,不论是连续的建筑群,还是独立的一颗印民居合院组合,都具有内向封闭的空间特点。由于防御和气候的需要,也多采用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强调围合。院落式的围合布局形成了建筑和宅居的群体。由于南北气候的不同,乡村和城

市对地形环境适应的不同，贫富差别反映在群体规模上的不同，防御性强弱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到群体组合形态的特征。

重人伦，强调空间秩序。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群体往往以轴线的方式组织空间，空间结构往往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相对应，分别轻、重、主、次，使空间组织秩序井然。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结构，在建筑、聚落和城市中也有空间表现，大量的坛庙、祠堂、厅堂，是祖先祭祀的空间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进入封建社会中期后，木结构建筑，特别是官式大木结构，具有大体一致的形制和模式。这一木结构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综合解决了不同使用功能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充分体现出它的"通用"特征。而民间匠人和建筑的使用者，有些为文人墨客，参与了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他们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配合砖石，有的地方用夯土墙围护木结构，就地取材，丰富了建筑的空间和形式表现力。中国建筑以自己独特的优美线形成为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的美丽建筑形体，那飘浮流畅的屋顶，黄色、绿色、蓝色的琉璃，出挑深远的檐口，层层叠叠的斗栱，都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木构技术的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形式也是多样的，虽然木构建筑是一条发展的主线，有完善的形制，但用于墓葬、军事防御、天象观测及桥梁等用途的建筑，却以砖石为基本材料，砖、石拱结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各种类型的塔，在高层结构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木构建筑的坡屋顶，在形式上很有表现力。木构架有一定的可变性、弹性，对抗震有好处。然而，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也有不足之处：1.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上无重大的、跃进式的突破。2.木构建筑围护体系的保温、隔热、防视线干扰的物理性能较差。3.垂直交通系统不够发达，建筑多为单层，超过二层的建筑比较少，且多为塔、阁等特殊类型的建筑。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群体大都朝水平的横向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地区差异较大。中国古代建筑的地方性特征明显。地方的风土民俗、建筑材料、装饰细部等等，反映在建筑上，形成了浓郁的地方建筑风格。建材的地方化，木材、砖石、竹子、陶瓷、琉璃制品，即使是同一种材料，如土坯墙，各地的具体做法亦有所不同，形式上亦各有特色。不同的地方材料也丰富了建筑的外观造型。各地区都有结合自然环境的建筑群体，结合地形，利用山水，适应地方气候和地理环境，使群体形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地区性特征明显，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建筑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曾广泛影响过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产生过合璧的新的建筑类型、新的建筑空间和形式。

使用功能要求、建筑材料、构造、结构，结合度较高。在构造上结合并发挥木材的特性，创造了斗栱这一空间结构，寓美观于其中，材料和形式美达到高度统一。在木材的连接，木材与其他辅材的连接上，构造的功能作用与形式美也是统一的，是建筑材料和构造的真实反映和美的组织。为保护梁柱，雕梁画栋，装饰、材料与功能结合一体。构架组合一般都分为三段：屋顶、墙身、基座，在整体上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感。

中国古代建筑集中了多种装饰手法及艺术表现方式，主要有圆雕、浮雕、砖雕、彩画、壁画、编织物、书画、金属饰件等等。装饰纹样的题材多样，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丰富。装饰的部位有梁柱、屋脊、马头山墙、檐口等等。建筑的用色大胆、丰富、醒目，强调与环境的配合协调。中国的东南部建筑有多种色彩的配合，适应山清水秀的环境。寺庙建筑多用黄色墙体，掩映在绿水青山中，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氛。青藏高原的寺庙、宫殿建筑色彩尤为鲜艳明亮，在茫茫荒漠的景色中，突出了建筑对环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过程中技术分工明确，高等级建筑的营造，分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作、石作、彩画作等等。后期，发展到30多个匠作种类，形成了繁复的内、外檐装修体系。建筑施工工序计划极为周密。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在组织机构上有完善的工官制度，国家设立了专司管营造的将作监(将作少府或工部)。在建筑设计上，很早就采用了模型审定的方式。为了准确地估算工程量、征集材料与加强施工管理的需要，制订了各种法式或作法则例，最著名的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在施工中则运用了图纸放样的方法。严密的施工组织管理制度加上以木构件的标准断面为设计模数的方法，简化并系统化了材料的加工程序，使大大地提高了设计、施工效率，加快了营建速度，大量的民间匠人是建筑设计，营造的主力军。

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予。在建筑中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在黄土高原，窑洞建筑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防风效果；在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不仅运用开窗大小和布幔来控制通风采光，而且采用芦草做外墙，以提高墙体的保温性能；运用对景、借景的园林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建筑中人的审美结合起来。聚落和城市的选址具有防灾观，濒水筑城，城内的水系有利于防火。防火山墙及建筑群内的水井、水池等也有利于防火，但建筑的用材及建筑密集程度往往又构成了防火的不利条件。

中国具有5000多年深厚的建筑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百年来，封建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工业化的滞后加上外敌入侵和军阀割据混战，使国力衰弱。在外来文化面前，古老的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在整体上变成了弱势文化。在社会的激烈变迁中，中国建筑缺乏功能的提升，技术的飞跃和空

间形象的大突破。即便如此，中国近代也出现了一批有作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吸取国外的经验，奠定了开业建筑师制度和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基础，探索了一条吸收、传承和转换的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的道路。所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很自然的形成了近代五种建筑形态的特征：

1.帝国主义列强带来的早期现代建筑和殖民样式建筑。

2.出自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尊重和崇敬，外国建筑师探索、设计的中式建筑，以及大量的中国建筑师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作。

3.学成归来和本土的中国建筑师，运用所学而创作的早期现代建筑。

4.由于文化的交融，为适合业主的兴趣与当地建筑杂交而产生的一批地方的加洋式的或中国古代传统样式加洋式的，变异多类的民国建筑。

5.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封闭性，一方面保存了大量传统的地方建筑；另一方面，民间的乡土建筑不断更新，清末、民初的地方乡土建筑没有停止过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上述五种子建筑文化的类型的混杂所体现出的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性弱势，在中国不太可能在传统的地区建筑文化中产生新的地域主义。所以，从近代开始，在对外开埠的城市，在传统建筑文化整体弱势的形势下，具有了与西方交流的特征。这个分化分离的过程，强势外来建筑文化必然对这些地区和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冲击和破坏，从而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发生了一次无序的新陈代谢过程。从近代的民国时期一直到今天，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没有很好地完成“传承—转换—创新”的过程，没能在整体上将传统的建筑文化转化推进成强势建筑文化。同时也缺少对建筑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在建筑学上难以形成完善的体系，只能从国外生硬地搬来，消化、转化、进化得不够。

近 50 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中国建筑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更需要树立国人的建筑意识观，有必要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知识。应当看到，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创造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1.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有时阻碍了建筑师聪明才智的发挥。

2.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落到实处。

3.人们还没有从大量的建设中，理解城市和建筑的本体。

4.缺乏对城市和建筑的整体研究。

5.缺乏对地域主义的理解和研究，缺乏对传统和地域建筑文化的现代表现及其他与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和建造体系结合的整体研究。

6.对建造过程与地区建筑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对地区建筑的材料、构造、结构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待系统地深入。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有传统和地区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体系的工作需要大力推进。

7.建筑师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在外来强势建筑文化的冲击下，缺少自己的主张和创新意识，因此要加快建立自我的建筑文化价值体系。在建筑的创作过程中，离不开合作、协作，因此要强调团队精神。

8.对现代建筑技术缺乏整体、深入的研究，在传统和地区建筑文化背景下，转化运用现代建筑技术的途径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9.现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式和途径在深索之中，适应时代发展和国情的完善和建筑教育体系，还在改进和建立完善之中。

10.对城市和建筑中人的行为、活动、交往缺乏整体、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在人和社会的需要与建筑功能的转化之间也缺少系统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出版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的新时代，我们要研究如何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精髓，同时要克服、摒弃人们的屈从思想。要有更新、创造的主体意识，探索出一条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发展道路。文库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振兴传统建筑文化之举，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的振兴和创新意识。

我们还应发挥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促使中国整体建筑设计水平和建筑建造质量的提高；②统一和提高建筑设计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好的城市环境，什么是好的建筑；③促进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④促进建筑设计手法的丰富和建筑空间构成艺术的提高；⑤让社会更关注城市的环境和建筑，促进全社会建筑意识的提高，培养大众的建筑鉴赏兴趣，提高大众的建筑素养，以便他们在参与设计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对于古代建筑历史和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建筑评论和建筑批评的基础之一。《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在这方面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希望中国的建筑文化，像一条巨龙，又腾飞起来，建立新的价值观。继承吸取祖先创造的建筑文化的精粹，积累发展的力量，创造发展的条件，奠定发展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库》的出版增强了人们的自信，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寻求地区自身的优秀建筑文化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深入地剖析和深层次的思考的同时，还要看到世界现代建筑的

发展，在兼容并蓄的同时也在追求地区文化的保护、再生和创造。实际上，保护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一样，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创造合理的机制，寻求完善的体制，更要培养大量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以及城市和建筑的管理者。

学传统、研究传统不是造反，也不是自大狂妄。完善的建筑意识观的形成，不可能完全脱离民族和地区的传统，不要把传统当成前进的负担，要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胸怀和气概。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这在国内还属首次，必将促进我国建筑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对完善全社会的建筑意识产生积极作用，发挥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在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重视对传统建筑技术和建造过程的整体研究，鼓励用新的方法，新的视点来重新诠释古代传统建筑文化，所以文库要不断地充实。中国建筑需要建构适应时代新发展的"传承—转换—创新"机制。建筑是大地的印记，优秀的建筑师的创作一定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就像茫茫大海与天相接处出现的一片建筑文化的船帆，正向我们驶来，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2001 年 11 月于南京

编纂"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缘起

高介华

如果说在英国的建筑史学家弗列治次所编绘的"建筑之树"这棵大树上,"中国及日本的建筑"还能凑合成一小小的枝丫得到存在,那么英国建筑师法古孙(James Fergusson)就干脆把中国的文化也一股脑儿压入了地下。因为"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此种工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似儿戏。"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某些老奶奶在跟自己的小孙子"儿戏"时会开开玩笑说:"你是从你妈的腋窝里生出来的"一样地有意思,因为小孙子毕竟对自己的怎样出世还茫然无知。

新派建筑人有一句口头语:建筑是要用心去"读"的。看来是有点道理。

西方人多热爱"茶花女",却少有知道《桃花扇》和李香君的;不少中国人也爱奥赛罗和朱丽叶,却少有知道窦娥和杜丽娘的,大概也就是少"读"的缘故吧!

名著《红楼梦》用上的汉字可能不足四千个,一般读者大体上不会将字读白。如果读了半天,还只知道贾宝玉爱林妹妹,焦大却不喜欢,恐怕会使地下的曹雪芹感到悲哀。所以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学家在不倦地精读。

对于法古孙和弗列治次的断语,好在有他们的老乡李约瑟博士在生前作了回答,原因是博士用了60多年的时间来攻"读"中国文化。

用心读中国建筑的西方人并非没有。曾任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使节的刚恒毅枢机主教就是一例。他确立的北京辅仁大学校舍的建设方针是:"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1]辅仁大学的总建筑师、比利时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在他的

Chinese Architecture 著述中饱蘸浓墨，激动地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2]

我们知道，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对楚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谓的"南方之强也"就是指的楚国，他怀着恐惧而又欣慰的心情感叹："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还认为南方文化比周文化更文雅，更有文采。可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人谈论过楚文化呢？由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哲学、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以至于城市、建筑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楚文化的奇谲瑰丽才展现于世界。如今，楚文化已被公认为"光彩神州，丰润中华"，"宛如太极之两仪""与西方希腊文化竞辉齐光"的灿烂文化，不就是能让世人瞩目多"读"的缘故吗？"楚学文库"面世后，中外学术界更惊奇地发现，原来楚学是一片值得研究的学术沃土。

自 1989 年始，中国建筑学术界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VNESCO World Decade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1988–1997")紧扣国际建筑师协会提出的"建筑与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建筑与文化"研究学术活动。与此同时，自然要广涉中国文化与建筑的再发掘和研究。在"建筑与文化 1996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一系列专题研究中，不少是属于中国建筑文化的范畴。又经过一年来的努力，而有编纂"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之举。

中国建筑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熔铸的亦属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无论是文献、实物，皆有深厚的底蕴。近现代的老一辈建筑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形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文化高度切入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研究尚在开创阶段

就本"文库"的系列而言，从建筑文化学到建筑思想的渊源、流变，从建筑的词源到典章制度的考录，从墓葬建筑到园林，从史前的聚落形态到历代城市的演变，从创作理论到形制的源流，从装饰艺术到小品的文化观，从建筑的外部空间构成到环境生态观，从历代名作、名匠到军事、桥梁建筑艺术莫不包罗并列、几乎各专著本身即具有新创性。

诚然，我们的心情也像 20 世纪初侨居中国的刚恒毅主教一样，"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中的某些绝世珍品)倒塌"了。毕竟，刚恒毅惋惜的只是某些建筑实体的毁弃，而中国建筑所铸成的历史文化丰碑是不会倒塌的。"文库"的奉献就在于提供

一些"读"本。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且形成了多个亚文化圈内的特色。至于是否博大精深，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精心品味，作出客观的评判吧！须得申明的是，"文库"的主旨重在催动中国新建筑文化的开拓与发展。就研究中国建筑文化而言，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放眼观之，则此路方长，绝非终结。

1997 年 5 月 31 日于武昌

---

[1][2] 参见董黎．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5.3。

绪　言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自古有官学与私学两大体系。书院是我国古代后期的一种重要教育机构，是悠久传统教育发展变革的历史产物。它既非官学，不属官府体制之内，也不同于一般私塾、义学等私学，而是在继承、改造传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社会办学的独特体系制度，因此，具有较高程度，较大规模，建筑上也形成自己的特点。书院自唐代出现，经宋、元、明、清各代发展，历时千年，普及全国，曾先后开办约 7000 多所，数量远超官学。而且不同于官学，受地域、身份、学额、年龄等种种限制，它面向社会基层，开门办学，为普及文化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书院的建设，"前规后随"，传承发展，形成其讲学、藏书、供祀——"三大事业"的功能特点和学规、学田、学舍等完备的管理制度，保证了较为自主、稳定的发展。书院一般在蒙学之上，以居学为重，自学为主，读书与修养并重，多不以追求科举为目标，力纠官学之偏，着力于人才培养；较为自由地择师选生。不少书院教学与研究结合，成为学派的发展基地和地方学术文化中心。宋明理学的各学派及清代经学等学派，莫不以书院为基地而发展兴盛，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的学术和学风发展。书院重视藏书，供师生学习研究，服务社会。不少书院还进行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凡经书院出版的书具有较高质量，为世人所看重，被称为"书院本"。同时书院还举行讲会、文会，以及祭祀纪念地方历史人物等活动，成为地方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书院对于培育人才、发展学术、传播文化、促进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书院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建筑的一派斯文气息。它既不同于官学所表现的官式建筑神圣、威严，也有别于民间祠堂、庙宇之类建筑的繁琐、神秘，而是显示了朴实、典雅、清幽的格调。书院为文士聚居讲习之地，且多由文士参与筹划经营建设。尤其理学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发扬传统教育思想，并借鉴丛林经验，与佛、道既有争夺，又有融合，开创了教育的新局面。它力求满足其藏修息游，修身养性，成就人才的要求，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氛围。因此，书院

的环境选择与经营力求风景名胜之地，并使自然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体现其"天人合一"的理想。建筑的群体组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既求规整有序、区分明确，又较灵活多样。富有情趣的空间联系，表现其"礼乐相成"的精神。建筑的造型、做法、采用民间工艺，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力求切合实用，简洁朴实，较少奢华雕饰，反映其"善美同意"的思想。建筑的意境创造，力求清新典雅的斯文格调，无论是命名题额、楹联碑刻、还是庭院绿化，无不出自经典，寓意深刻，显示其"情景交融"的特色。所以书院建筑莫不反映其士文化特点，与官式建筑的官文化、民间建筑的俗文化，以及宗教建筑的神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别，可称为一种文人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价值。

书院由于历史的局限、理学的束缚，随着封建王朝的腐败没落而日益僵化衰败。特别是官府的控制，极力将其引向官学化道路，受科举制度的制约，书院终于被近代学堂、学校所取代。在"争誉学校，争毁书院"声中，书院被全盘否定，使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未能得到应有的正确对待。至20世纪20~30年代，学术界开始有所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未得到顺利开展和全面重视。80年代以来，对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对其历史、制度、教学、学术、文化以及建筑等，进行了专题性、地区性、综合性多方面的探讨；同时，各级政府也确立了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了书院文物的保护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丰富的书院历史文献和散布各地的众多文物史迹，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和见证，正有待我们进行深入地发掘、整理和保护、研究。这不仅为研究我国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以及建筑史所必需，更可为当今改革教育、发展学术、培育人才、发展地方文化建设、弘扬传统特色提供借鉴。特别是一些风景名胜地区和一些至今仍在办学的地方，所留存的书院史迹，更应加以认真研究和保护。这对于体现地方文化传统特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和表现地方传统建筑文化增添一种重要类型。

我自1979年主持岳麓书院的修复设计和进行书院文化的研究以来，深受书院建筑文化的吸引和感染，从中深刻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不同文化层次所反映的不同建筑类型的个性特色，从而加深了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领会保护古代建筑历史特色的深层含义。今就手头所集资料，编撰此书，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求教于同行的批评指正。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总 目 Contents

BBP 16/02



目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沿革历程　1

第一节　书院的起源(唐至五代)　2

第二节　书院的发展(北宋)　3

第三节　书院的兴盛(南宋)　9

第四节　书院的延续(元)　15

第五节　书院的普及(明)　18

第六节　书院的演变(清)　24

第二章　文化特色　39

第一节　书院与官学　40

第二节　书院与私学　47

第三节　书院与宗教　49

第四节　书院与理学　52

第三章　建筑特征　57

第一节　书院选址与布局　58

第二节　书院意境与风格　101

第三节　书院规制与传统　107

第四章　研究与保护　117

第一节　书院与地方文化　118

第二节　书院的研究　119

第三节　书院的保护　120

结　语　122

主要参考文献　125

后　记　126

第一章

沿革历程



第一节　书院的起源(唐至五代)

"书院"之名出现于唐代。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开元五年(717)，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六年，乾元院更名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又据《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课于内，岁终则考验于外"。可见，其所谓书院属于皇家藏书、修书之所，为皇帝服务的设施，是宫廷的组成部分，而非民间聚徒讲习之地。显然，这种书院建筑也应是宫殿院落形式。

但从各处的地方志，还发现民间也有30多所书院，虽记载不详，仍可反映出一些特点。其分布以湖南、江西最多，各有9所；其次，浙江7所，福建5所，四川4所，山西、河南、贵州、陕西各1所(参见《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名录》)，说明书院的建立已相当广泛。不过，这些书院大多为士人隐居读书之处，多择山林胜地，就寺观而建居室。如湖南衡阳**李宽中秀才书院**，即就石鼓山寻真观结庐读书。浙江象山的**蓬莱书院**，建于蓬莱山下栖霞观右，当属一般居室。其时，也有具纪念性质的书院。如湖南**南岳书院**，为贞元年间李繁为纪念其父李泌曾隐居南岳而建。肃宗时，邺侯李泌隐居南岳烟霞峰，建端居室，韩愈诗称："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后几经变迁，至今南岳仍留有"邺侯书院"遗迹，但为近世重建的建筑。又如湖南耒阳的杜陵书院，因大历五年(770)杜甫客死耒阳，县人建院奉祀，故又称祠堂，当属一般纪念性祠宇。《全唐诗》题咏书院的诗文中，大多称颂其松、竹、泉、石之美，反映出士人对于读书环境的重视。

另外，作为聚徒办学的书院，唐代也已出现。如四川遂宁的**张九宗书院**，是在刺史乔琳于贞元初创建的学宫基础上，由张九宗改建而成，并讲学其中，人称："遂宁文学自九宗倡。"又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永中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州书院**，也都有讲学的记载，但建设规模不详。

还有一些虽未用书院之名，却已具有书院的性质，如江西德安的**东佳书堂**，为陈氏家族所建。唐大顺元年(870)陈氏七世孙陈崇立《陈氏家法》称："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又"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日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又据《陈氏书堂记》："时有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亩，以为游学之资。"说明书堂是在蒙学之上，已有相当规模和设施、制度，不仅容纳子侄学习，且可接待外来游学之士，已具备书院的雏形。至南唐昇元元年(937)陈氏立为"义门"，因此书堂改名"义门书院"。又如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创办之前，早

在唐末五代已有僧人开始办学。据宋人欧阳守道《赠敬了序》载所见书院碑刻："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乃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也说明虽无书院之名，却已具书院之实，而成为岳麓书院"因袭增拓"的基础。

据以上所见，唐代书院的出现，已由私人藏书、隐居读书之所，发展为聚徒讲学的教育机构，开创了社会办学的新形式。唐末五代动乱，官学废弛，学者无以为学，或筑室山林，或寄寓寺观，择师而从，聚徒讲学，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更为书院藏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代书院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扩展，受到社会的重视。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为胡氏家族创建，在华林山元秀峰下，"筑室百间，广纳英豪，藏书万卷"。(《祭华林始祖御史瀛公社妣耿氏夫人二墓文》)"建学授徒，上树森森，四斋肄业，讽诵讴吟。"(《祭二祖珦公墓文》)"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植松竹，间以葩华，涌泉清池，环流于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斁，游者忘返，兰亭石室不能加也。"(徐铉《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这不仅反映书院规模之大，更具园林艺术之美，创造了优越的读书环境。江西泰和的**匡山书院**，为邑人罗韬创建于匡山之下，其"圣殿、经阁拟乎学宫，明宗嘉而赐额"。(明曾皋记)已有"圣殿""经阁"的设置，且首开皇帝赐额的先例，可与官学比美。足见书院已具相当规模，为世人所重，取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北京昌平的**窦氏书院**，为后周谏议大夫窦禹钧创建于其宅南，"屋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如此面向社会开放，资助贫寒学生，突破了官学的身份限制，体现了"有教无类"的传统。在河南登封的**太乙书院**，为周时周昉创建于太乙宫；以及河南商丘的**睢阳学舍**，为晋时杨悫所建，曾"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突破了官学的地域限制；它们也都为后世所继承，成为全国著名的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

唐代中叶以后至五代期间，可算是中国书院的开创时期。在官学之外、私人蒙学之上，民间聚徒办学的新型书院，已经创立起来，虽数量不多，规模不一，尚无定制，却已形成了书院建设的雏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二节　书院的发展(北宋)

北宋百多年间，是中国书院发展奠基时期。北宋前期，在庆历以前，官学未兴，除中央国子监之外，州县官学极少。开宝八年(975)国子监生徒仅70人，其中尚有挂名者。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许多地方如江西、安徽、江苏、广西等省州设置的县学，仅占州县数的5%多一点。因此书院受到朝廷的重视和鼓励，给予赏赐，而得以发展。所谓"由塾变庠"，不少私人读书讲学场所，扩为书院、书堂。北宋后期，朝廷在庆历、熙宁、元丰、崇宁时几次兴学，官学有所发展，甚至有将书院改为地方官学的，如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等。但地方官学仍然有限，如元丰初，全国地方官学也只有50多所，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所以书院并未因此衰落，为补官学之不足，而与官学

并行发展。

北宋创建的书院约有140余所，加上前代延续下来的，至少也有150~160所。有宋一代，偏安南方，故南方书院较为发达，最多的江西有40所，浙江约30所，湖南10多所，福建7所。其中属于庆历以后的，江西占60%、浙江占80%、湖南占70%。

北宋发展形成了一批在全国较为著名的书院，如岳麓、白鹿、嵩阳、应天（睢阳）、石鼓、茅山、徂徕，以及泰山、东佳、华林、雷塘、皇寮等书院。其中多因办学历史较早，受到朝廷褒扬赏赐，或规模较大、有名人讲学等，而为世人所关注和称颂。当时并有所谓“天下四大”、“六大”、“八大”书院之称。虽各说不一，唯岳麓、白鹿、嵩阳、睢阳、石鼓，被更多地并称为“四大”之一。

岳麓书院 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僧人智璿等办学基础上，“因袭增拓”，扩创书院，时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咸平二年（999）太守李允则加以扩建，“外敞门屋，中开讲堂”，增书楼、礼殿，“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并请得学田，由此较早奠定了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时有生徒60余人。至大中祥符五年（1012）山长周式已“教授生徒数百人”；太守刘师道又扩广居室。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但周式仍请辞归院，因此得御赐“岳麓书院”额及内府藏书，由此而闻名天下，故多称为“四大书院”之首，其完整规制，为后世书院建设提供了典范。此后虽地方官学兴起，推行“三舍法”，岳麓书院仍得保存。而且在潭州变通实行“潭州三学”时，因将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列为三等，以成绩积分最高者，升岳麓书院，自此岳麓书院遂成为湖南地方的最高学府，奠定其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地位。至今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仍留有较完整的历史遗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2-1）。



图1-2-1 岳麓书院大门清代遗构，三间硬山，南方将军门式。门额用宋真宗字迹，门联由清代师生共同创作。透过大门，可见二门、讲堂，形成主体中轴。

白鹿洞书院 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东南谷地。早在唐贞元年间，李渤、李涉兄弟曾在此隐居，因养有一只白鹿而得此名。后李渤任江州刺史时，在此引流植林，创建台榭而成名胜。南唐升元四年（940），又就此建庐山国学，置田数十顷，生徒常达数十百人。北宋开宝九年（976）宋占江州后，改为书堂（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知州周述请得国子监本《九经》，建圣经阁，生徒亦达数十百人，五年后渐废。咸平五年（1002）奉旨塑孔子及弟子像，并建圣旨楼，但无教学记载，后又废为丘墟。皇五年（1053）比部郎中孙琛在此建屋十余间，教授子弟及接待来学，并供给膳食，次年毁于兵火，以



图1-2-2 “敕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刻石。

致“鞠为茂草”。后屡有毁兴，近年多经修复，尤碑刻保存最多，也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 1－2－2～3)。

嵩阳书院　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北魏太和八年(484)曾在此创建嵩阳寺，隋大业时改为嵩阳观，唐初改为太乙观，后唐清泰中(934～936)进士庞式曾讲学于此，后周时奏准改道观为太乙书院。北宋至道二年(996)赐额“太室书院”及印本《九经》，时“生徒数百，人称最盛”，书院还刻印《九经》，供给学者。景祐二年(1035)又赐额更名“嵩阳书院”，并给田百亩。程颢、程颐曾在此讲学，传播理学。今仍存有遗迹，为地方文物保护单位(图 1－2－4～5)。

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　位于河南商丘(旧名睢阳)治东市区。五代后晋时，杨悫在此建私学南都学舍，教授生徒，戚同文曾在此就读。后杨卒，戚继其业，并得到将军赵直的支持，筑室讲学，聚徒百余人，名为“睢阳学舍”，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生徒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去世后，学舍一度中断。景德三年(1006)商丘由州升为应天府，邑民曹诚出资 300 万金，就学舍旧址建屋 150 余间，聚书 1500 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得宋真宗认可，并赐额“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曾就读于此，后于天圣四年(1026)被聘掌教书院，整顿学风，使之成为“中州一大学府”。景祐二年(1035)书院改为府学，给田四十顷，庆历间升为南京国子监，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时被毁，后废不置，未留遗迹。

石鼓书院　位于湖南衡阳石鼓山。唐元和中(806～820)李宽中(李宽)曾在寻真观结庐读书，名为李宽中秀才书院。北宋至道三年(997)李氏族人士真据此复建书院，会聚儒士讲学。景祐二年(1035)知州刘沆奏请赐额“石鼓书院”及学田，后亦改为州学。南宋复建，至明清再度兴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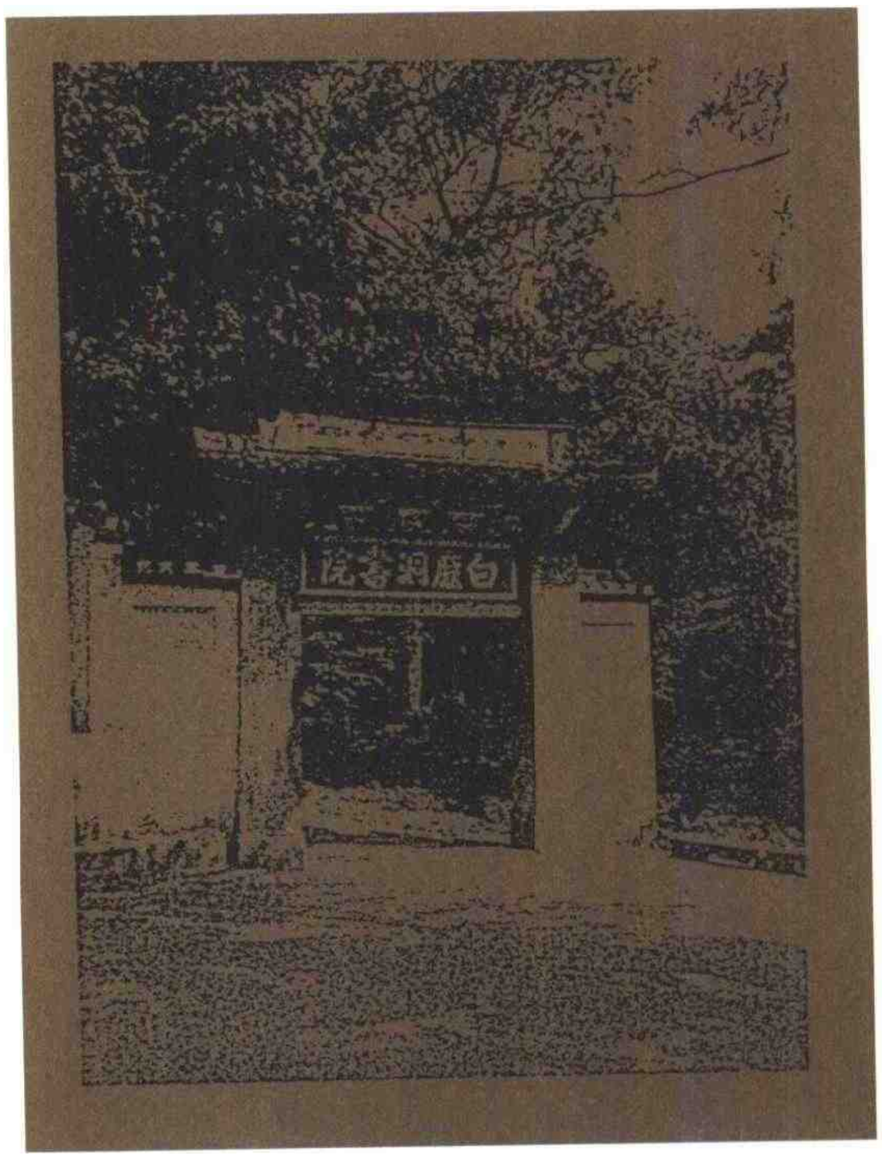


图 1－2－3　白鹿洞书院大门　近世重建，门额为明代李梦阳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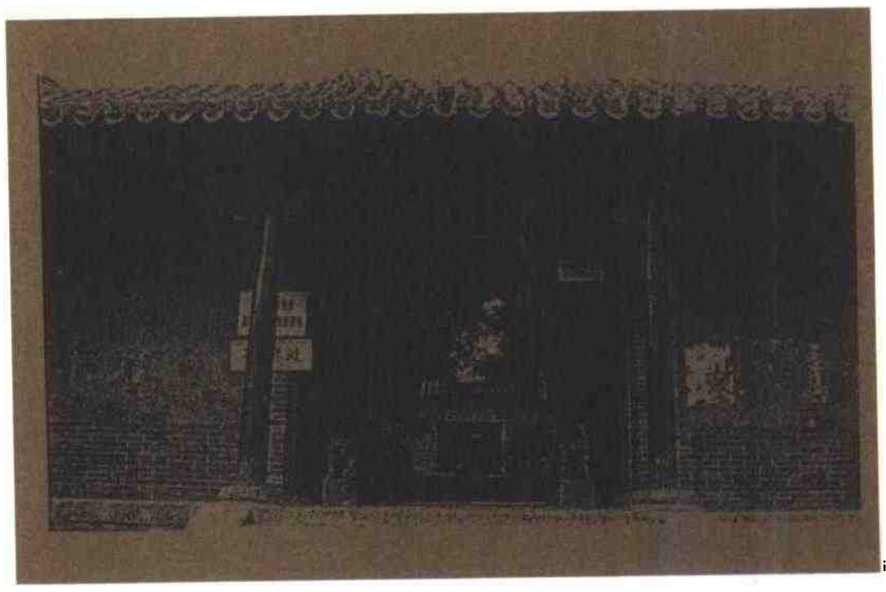


图 1－2－4　嵩阳书院大门，三间硬山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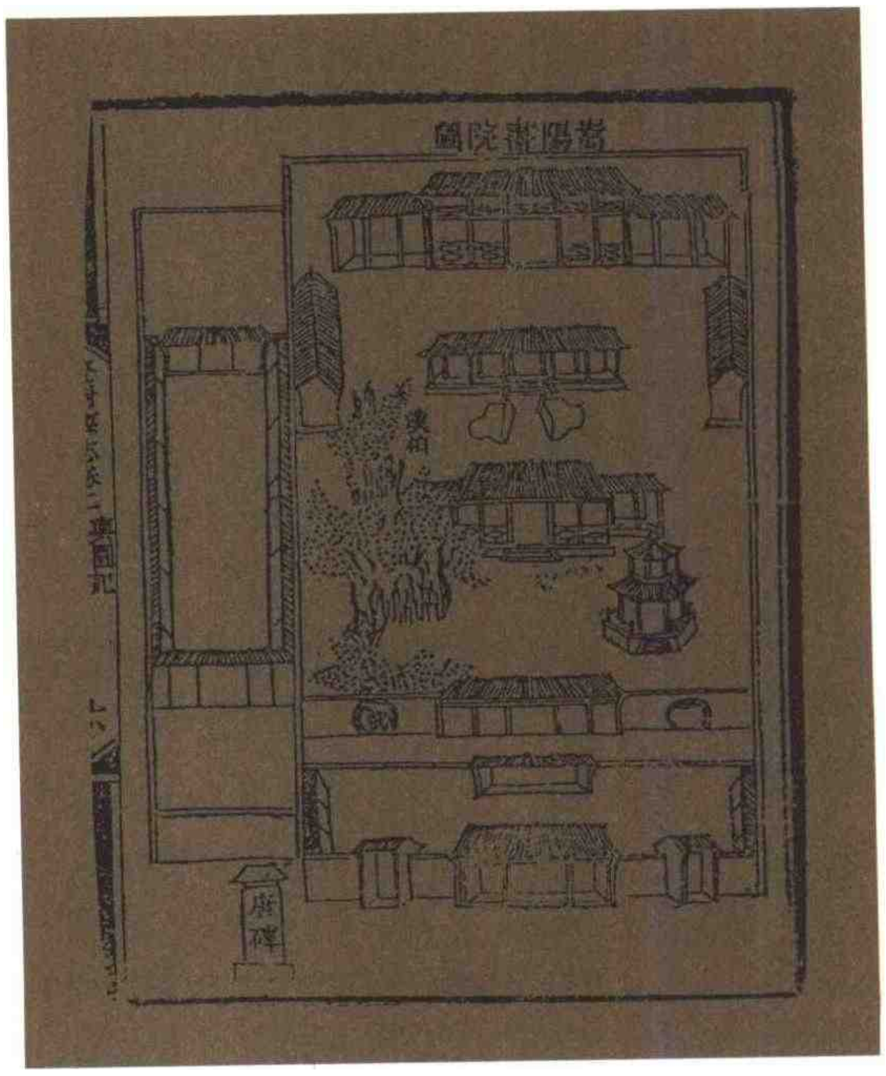


图 1－2－5　嵩阳书院图(图载清代《河南登封县志》)

1-2-6)。

四大书院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具有较早的历史渊源，且多择山林胜地，形成一定规制，受到朝廷的重视和赐予，对书院文化与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正如全祖望在《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所称："自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麓、岳麓。"尤其岳麓较早形成其完备规制，更具典范意义。



图1-2-6　石鼓书院旧照。自南宋复建书院续办学，直至抗日战争被毁，今已无存，改建公园。书院因地处两江汇合处，风景独特。



图1-2-7　道源书院（图载民国版《大庾县志》），在江西大余。宋淳祐二年（1242）建，初名周程书院，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宝祐五年（1257）改名"道源"，景定四年（1263）理宗赐额。元代继续办学，明初改为县学，景泰四年（1453）重建书院，后屡有修建。清雍正十三年（1735）书院迁建东山，后又屡修，此图为东山时建设面貌。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书院也较著名。**茅山书院**，在江苏金坛（属江宁府）三茅山后，为北宋天圣二年（1024）处士侯遗创建，教授生徒，先"自营粮食，供给膳食"，达十余年。后江宁知府王随奏请从三茅山斋粮庄田内拨给三顷，供书院赡用。先生殁，书院遂废，不久为崇禧观所据，直至南宋始迁址重建。**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原为唐代陈氏家族的东佳书堂。书院曾有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北宋初，藏书号称"天下第一"，曾多次受到朝廷旌表。嘉祐七年（1062）族人众多，分散于291庄，书堂遂迁建于德安县城河东1公里处，改名义门书院。崇宁间亦被改为德安县学。**华林书院**，在江西奉新华林山元秀峰下，原为南唐胡氏家族所创的华林书堂。书院曾"筑室百区，聚书万卷"，教授子弟及远方来学者。环境优美，游者乐而忘返。北宋雍熙二年（985）诏旌其门闾，人称其为"鼎峙江南名书院"之一。**雷塘书院**，在江西安义，有洪氏世居于此。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洪文抚就居处建书院，以训子弟，并接待各方学者，其南有"雷塘"而得名。至道间官府奏闻，太宗赐御书百轴，并命修葺书院；元祐间裔孙洪师民重建，更名"招贤"，黄庭坚曾来此讲学；后废。**泰山书院**，在山东泰安。该处原有栖真观，为道家诗人周朴居修隐之地。北宋景祐二年（1035）孙复应石介之请，来泰山讲学，四年在东岳庙建信道学舍，五年迁栖真观旧址。康定元年（1040）石介作记，始称泰山书院，而闻名于世。庆历二年（1042）石、孙先后离院，遂废，但明清时仍建祠纪念。这些书院，无论是家族或学者创建，都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为人所重。

北宋正是理学的奠基阶段，书院适应了理学发展的需要，成为理学活动的基地；理学的发展又促进了书院制度的完善成熟。两者结下不解之缘，为南宋书院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被尊为理学的创始人、开山祖。他历任地方官员时，讲学不止，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康定元年（1040），周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主簿，在分宁东门外旌阳山麓创建书院，聚徒讲学，曾建有楼台亭阁，风景优美，后以"濂溪"、"濂山"等名作为纪念；庆历四年（1044）任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时，程颢、程颐曾往受业。后人在其讲学处创建书院，后赐名道源书院（图1-2-7）。

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今江西赣州)时，亦聚徒讲学，曾与知州赵汴共同讲学于赣县。其讲学处后人建濂溪书院，以为纪念(图 1－2－8)。

因其“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意”，曾于庐山莲花峰下“筑书堂于其麓”，讲学会友，后又终老于此；又因书院前有溪水，故以其故乡“濂溪”命名，后人亦重建濂溪书院为纪念。后世各地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多达数十处，仅湖南省内就有 16 处之多(图 1－2－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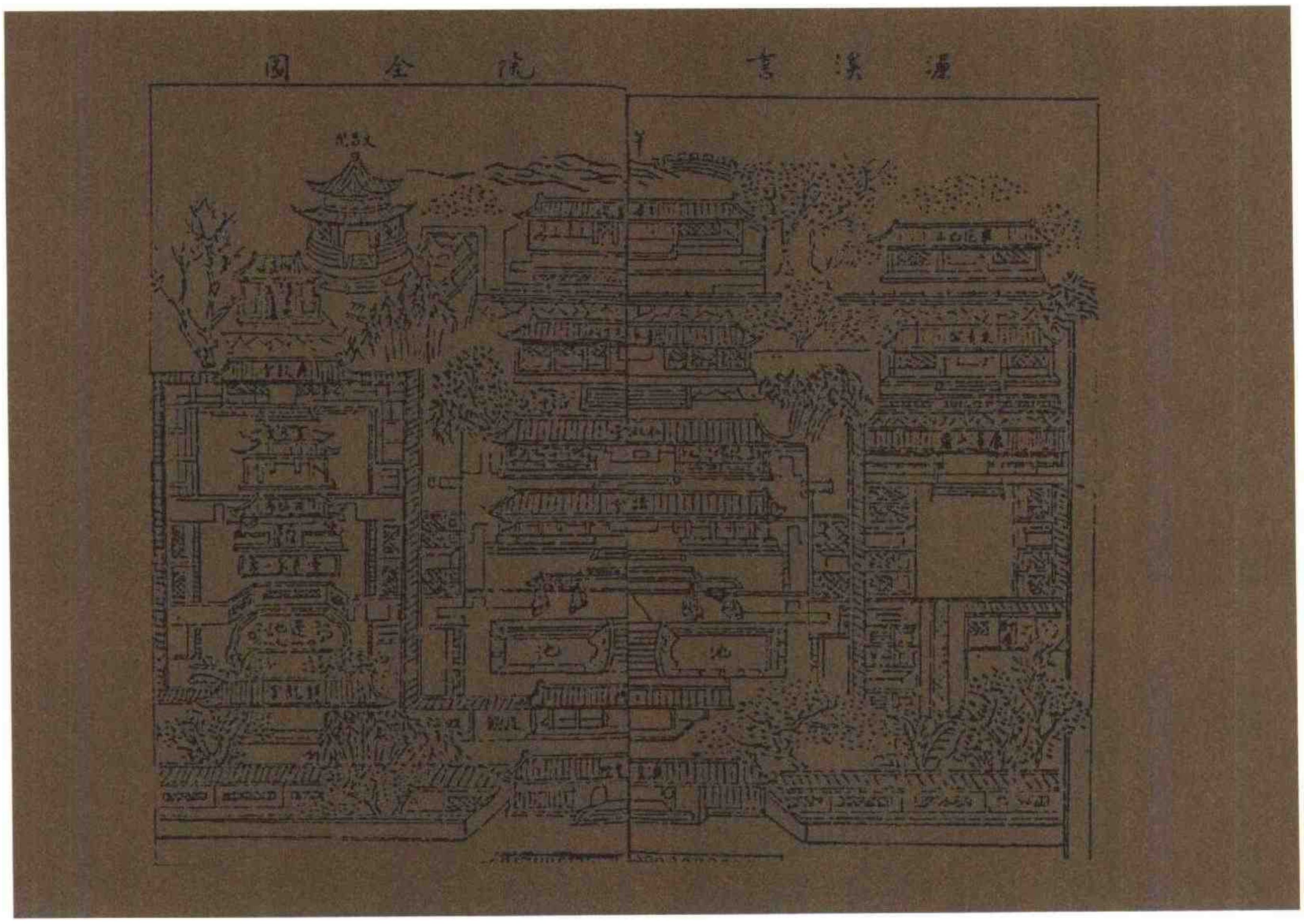


图 1－2－8　濂溪书院(图载清同治版《赣县志》)，在江西赣县。宋宝庆年间创建于周敦颐讲学处，后屡有修建，此为清代的建设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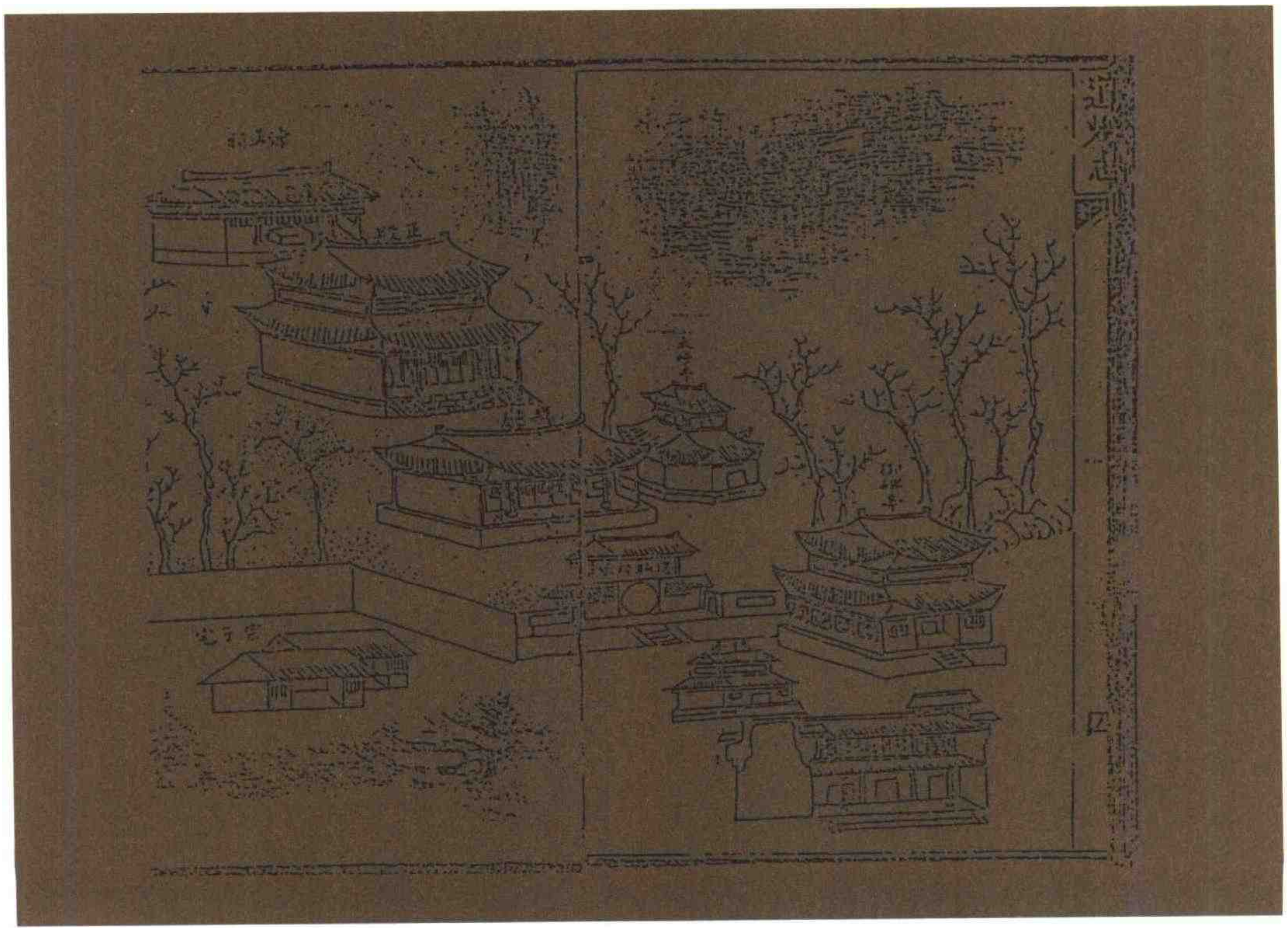


图 1－2－9　濂溪书院(图载清代《道州志》)，在湖南道州(今属道县)。道州为周敦颐故乡，后人建院于城西，取其号名为纪念。宋景定三年(1262)得理宗赐额，次年拓地扩建，聚徒兴学，旨在“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传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自后屡有修建。此反映不同时期的书院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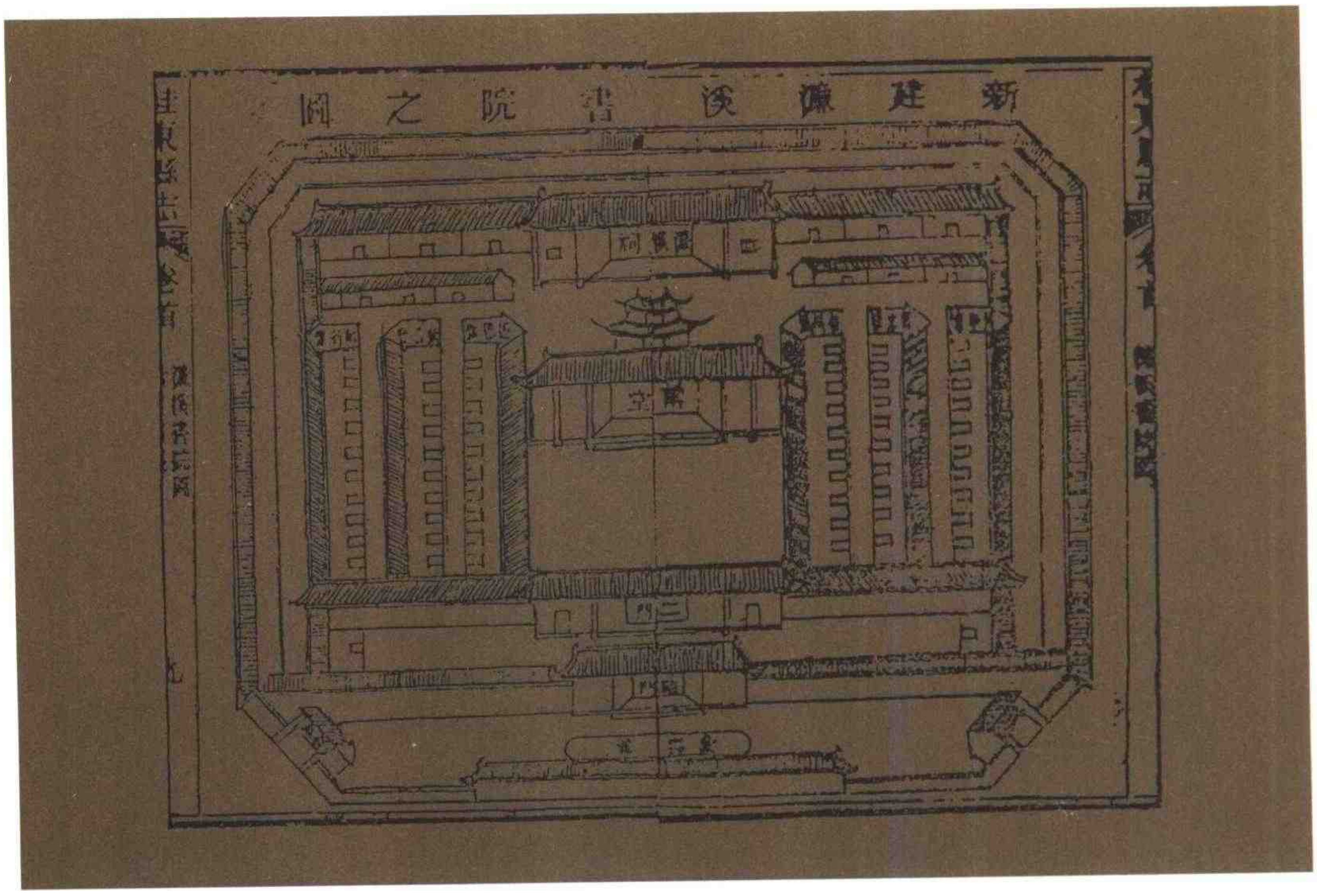


图 1-2-10 濂溪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桂东县志》），在湖南桂阳（今属汝城）。宋嘉定十五年（1222）建于桂枝岭，宋元之际废，明正德间重建，清顺治八年（1651）毁。康熙六年（1667）再建，以僧守遂被供佛，十年（1671）另建庵，迁出僧、佛，扩建办学；吴三桂乱时又被僧占用，五十八年（1720）追回继续办学，后改学堂、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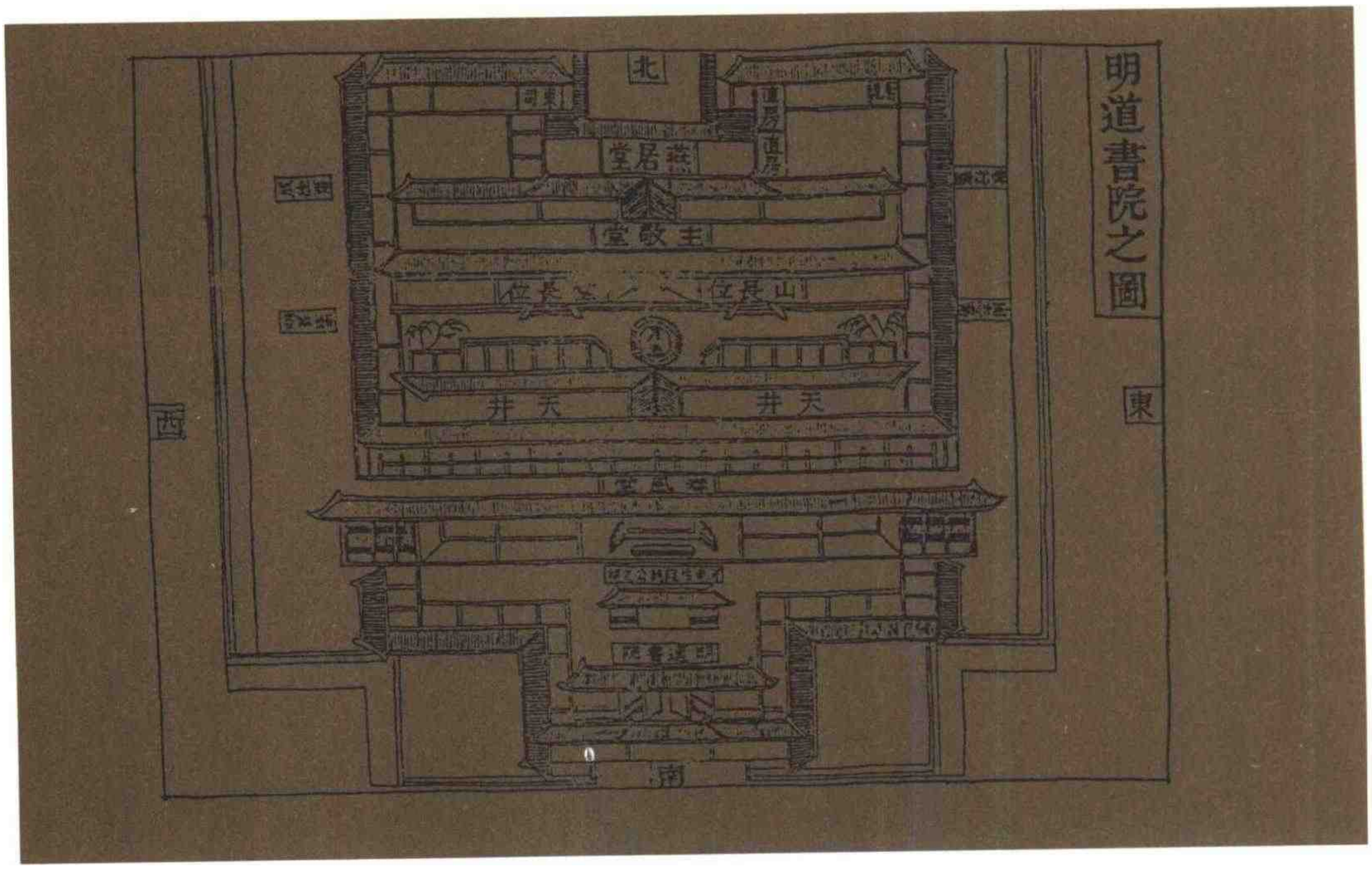


图 1-2-11 明道书院（图载清嘉庆仿宋景定版重刻《建康志》），在江苏江宁。宋淳熙初知府刘珙以程颐曾摄邑事，设祠祀于学宫，嘉定间改筑新祠设学，称明道先生书堂。淳祐间扩为书院，理宗赐额"明道书院"。元圮，明清续建。此图反映了宋代的建筑格局。

周敦颐的弟子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开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他们曾在嵩阳、扶沟等地设教讲学，论著颇丰，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体系。元丰五年（1082）程颐就文彦博所赠河南伊川鸣皋镇庄园，建成伊皋书院，以正房五间为讲堂，东西厢房为弟子居室，大门一间额"伊皋书院"，并有庄田千亩供养生徒，在此讲学、著述 20 余年。后世各地亦多立祠建院，以为纪念。

明道书院，其燕居堂奉祀先圣孔子及十四先贤神位，主敬堂为会食茶食之所，春风堂为会讲之所，中设讲座，四周设有听讲位、临陛垂帘。前筑一台，植以四桂。再前为"河南伯程纯公之祠"供祀程颐。（《景定建康志》卷二九）（图 1-2-11）

所以，北宋奠定了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及其建筑规模，也奠定了书院作为理学的发展基地的重要地位。这对后世书院的兴盛、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节　书院的兴盛(南宋)

南宋偏安南方，官学衰落，科举腐败，书院随之发展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创建的书院约700多所，其中有年代可考的，属北宋的约150所，而属南宋的近400所。如加上前代遗存的，更大大超过此数，且集中分布在南方各省，其中仍以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为最多。

书院的发展兴盛与理学的发展成熟分不开。理学吸取了老、佛思想理论和教育经验以复兴儒学，选择了书院作为阵地，培育人才、发展学术、建立基地、开创学派。南宋理学书院提倡不同学派的交流争辩，举行会讲，形成一定的“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力纠官学、科举之弊，不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标，重视道德修养，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门第、年龄等限制；采取自学为主，启发式教学，发扬尊师爱生传统，师生融洽密切，形成荟萃一时之秀的人才群体。这些都反映出南宋的书院突出的学风特色。

全祖望称，时有“南宋四大书院”，“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它们分别代表了湖湘学、闽学、婺学、象山学等理学学派的活动基地。

岳麓书院毁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战火，“什一仅存”。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有讲堂、先圣殿、藏经阁、山斋，及院外的风雩亭、濯缨池、咏归桥、船斋、浮桥等，基本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的规模特点，定额生徒20名，并聘请张栻主院。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张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随父张俊迁居潭州(长沙)，建城南书院于南门外妙高峰下，有丽泽堂、书楼、蒙轩、卷云亭、月榭、听雨舫、纳湖、琮琤谷、采菱舟、南阜等，名为“城南十景”，显然是一处风景园林式建筑。张栻曾受业于胡宏(1105～1611)，而胡宏早在建炎年间随父胡安国(1074～1138)隐居衡山，研治《春秋》，创建碧泉书堂和文定书院，开创了湖湘学派，因此张栻继承发展，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确立其“传道济民”的办学方针。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等，也因此自闽专程来访，留止两月，交流学术。两派展开激烈争辩，并首开书院会讲，来学者达“千徒”之盛。朱熹还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字迹留存至今(图1－3－1)。同时在岳麓山上，由朱熹题额，修建了道中庸亭、极高明亭、赫曦台、翠薇亭等，进一步发展了书院风景环境建设，显示其文化色彩。淳熙十五年(1188)扩建两斋，增额20名，又有陈傅良访院讲学。绍熙五年(1194)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又整顿更建书院，置田50顷，增额外生10名，并将《白鹿揭示》立为岳麓学规，由是朱张之学成为岳麓传统。嘉定十五年(1222)安抚使真德秀来院讲学并祭祀，是时已有诸先生祠，供祀建院功臣及朱、张。淳祐六年(1246)理



图1－3－1　“忠孝廉节”碑　朱熹字迹，明代曾刻石嵌于岳麓书院书楼，此为清代重刻，嵌于讲堂，更增书院典雅格调。

宗赐额，并重建湘西书院，再度振兴岳麓之教。德祐元年(1275)元军围攻潭州，岳麓生徒仍坚持学习，并参与战斗，"乘城共守，死者无算"，被誉称："南轩之教，身后不衰"。

白鹿洞书院重建于淳熙六年(1179)。因朱熹出任南康郡守时，见书院荒芜，感慨"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兴起"，而决心重建；但因"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初建"不过小屋四、五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小帖子》)，至八年又建屋20余间，生徒20余人。朱熹曾自任洞主讲学，并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书院较早学规，曾推行岳麓，并于淳祐元年(1241)由理宗御书颁行太学及各地官学、书院，影响深远；又曾邀请陆九渊来院讲学，交流学术。淳熙八年(1181)朱熹离任，继续拨款支持重建礼圣殿及两庑；开禧六年(1205)又建云章阁，诸生合祀周濂溪、二程及朱熹于讲堂。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军，继承父志，续修书院，"缺者增之，为前贤之祠，寓宾之馆，阁东之斋，趋洞之路；狭者补之，为礼殿，为直舍，为门，为墉，……弊者新之，虽庖湢之属不苟。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黄榦《重修记》)，形成白鹿建设高潮。随后又增建有号舍、会文堂(又改文会堂)、君子堂等，曾达房屋360多间，周围建亭20多个。宝庆元年(1225)理宗时曾设官治理。后又增设五经堂、摄议堂、友善堂、成德堂、射圃等，生徒曾达数百之多。

丽泽书院为吕祖谦讲学之处，原名丽泽书堂，初在浙江金华明招山(武义县境)，"假官屋以居"，"四方之士争趋之。"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世称"东南三贤"。吕为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创始人，兼收朱、张及事功、经制学派之长，形成其重视历史学，求实、爱国的学术特色。在其讲学中，常邀永嘉、永康不同学派人物来院切磋会讲。手订学规《乾道四年九月约规》早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十二年，可算最早的书院学规，后又多次补充修订。吕晚年购屋迁建书院于金华城中北隅，至去世后，其弟吕祖俭继承兄志，继续传道讲学。嘉定元年(1208)吕氏门人请求官府重建书院，"以旧居之半为堂祀先生"，"为屋十会楹，外门五间，祀室及前轩各三间，前为堂，扁以'丽泽书院'，为后来讲习之地"(光绪《金华县志》卷四)，并建有遗书阁，收藏吕氏生前著作。端平间吕氏门人又将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以吕祖俭配祀。淳祐六年(1246)知府许应龙迁建书院于双溪之畔，并奏请理宗赐额。咸淳间再迁书院于旌孝门外印光寺故址，至元初颇多著名学者主院，生徒甚众。

象山书院初名象山精舍，为陆九渊讲学之处。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也称象山先生，抚州金谿(属今江西)人，为心学学派的创始人。乾道八年(1172)，陆中进士在家候职时，曾聚徒讲学，辟槐堂书屋，因堂前有古槐而得名，东有陋室，西有高轩，又有隐室、留轩、玉渊、茅堂等，"学者辐集"，"至不能容"。淳熙十四年(1187)门生彭世昌访贵溪应天山张氏，见该地"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环境优美，乃择胜处建精舍，有讲堂、群山阁、圆庵等，以迎先生讲学。但此精舍不建斋舍，不供食宿，因此生徒自行"裹粮而来，结庐而居"，各名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储云斋、佩玉斋、封斋、愈高堂、观斋、蕙林斋、达到堂、琮芬斋、批荆堂、志道堂等，散处山林，另成景象，不同一般。陆九渊居处名为"方丈"，颇具宗教色彩，每上精舍鸣鼓，乘山轿至讲堂，先会揖而升讲座，从学者继各以一小牌书己姓名年甲，顺序进谒，约数百人，诸生俛首拱听，前后讲学五年，来者逾数千。精舍不立学规，也无定本，要求悟彻"本心"，强调为学以自我反省的"易简工夫"，主张"优游读书"，不以文字为意，据各人不同资质、性情，以不同导引点拨，"非徒讲经，启发人之本心也"。次年，因应天山形似一巨象，改名象山，因名象山精舍，陆自号象山翁。绍熙二年(1191)陆九渊赴荆门军任职，遂嘱高弟傅季鲁"居山讲学"。庆元二年(1196)贵溪知县立祠于象山方丈，以为纪念。绍定四年(1231)弟子袁甫以山间交通不便，奏迁贵溪县城南三峰山下徐岩，仍名"象山"。中为圣殿，翼以两庑；后为彝训堂，翼以居仁、由义、志道、明德

四斋；堂后为仰止亭，有池，上建濯缨、浸月二亭；堂左为储云、佩玉二精舍，右为九韶、九龄、九渊祠，较为规整对称布局。次年理宗赐额“象山书院”，学者闻风而至，不能容，又修院外废寺以处，成为南宋的陆学中心(图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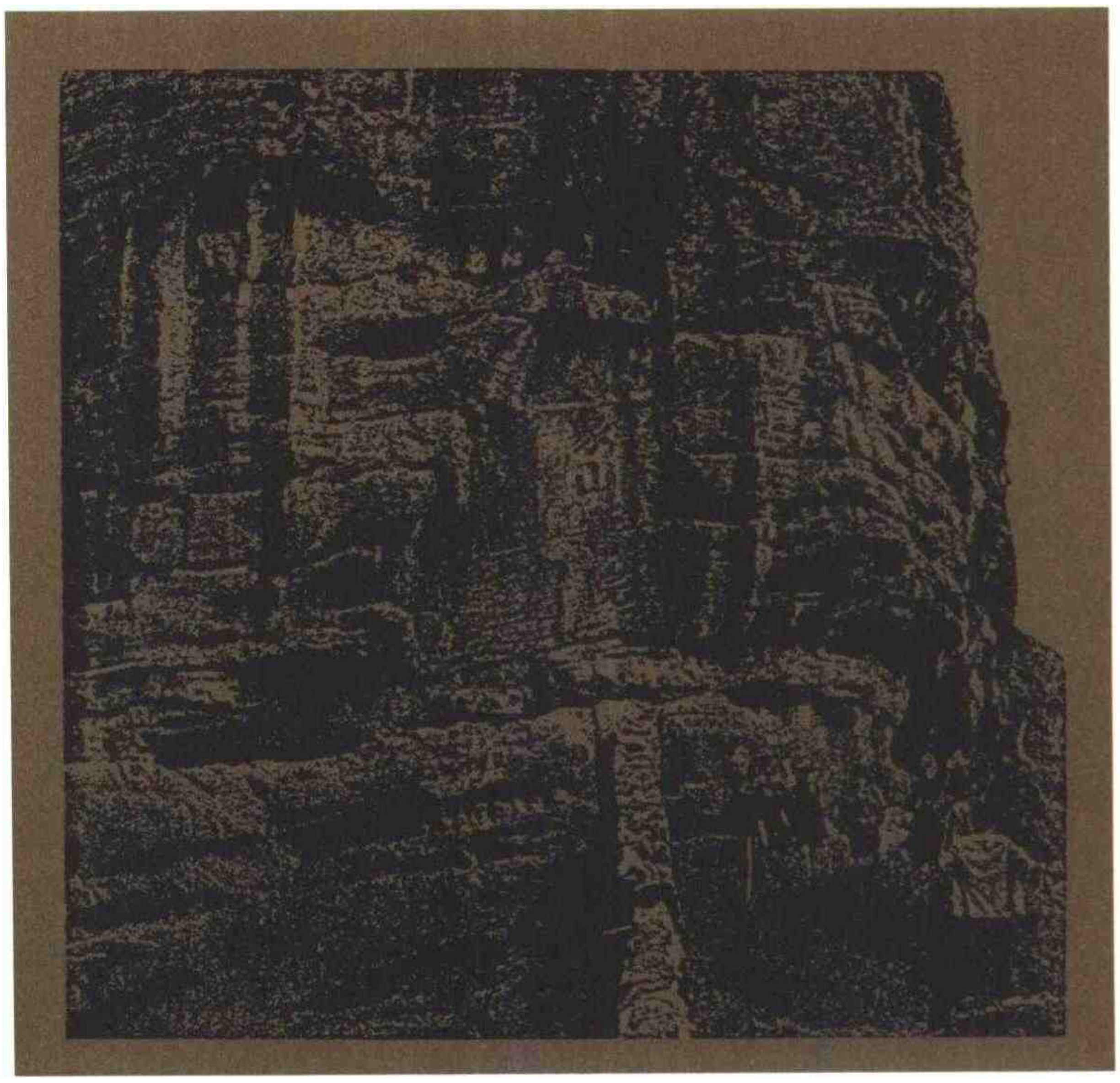


图1－3－2 “象山书院”刻石，刻于明正德年间。

理学各派代表人物致力于书院教育，开创了新局面，树立了典范。尤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在其登第五十年间，有四十年直接从事教育活动，十年从政期间，所到之处也必兴院讲学；晚年曾受到攻击，被视为“伪学”，仍坚持著述讲学不辍。乾道七年(1171)朱因母丧，在家乡福建建阳崇泰里寒泉坞筑**寒泉精舍**守墓，并从事著述讲学八年，后合为**云谷书院**；淳熙十年(1183)归里，又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建武夷精舍，讲学著述七年，为其理论成熟的重要时期。他曾记述其精舍建设：在“直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西南向，为屋三间者，仁智堂也。堂左右两室，左曰‘隐求’，以待栖息；右曰‘止宿’，以延宾友。左麓之外，复前引而右抱之中，又自为一坞，因累石以门，命曰‘石门之坞’；别为屋其中，以候学者之群居，而取《学记》相观而善之义，命之曰‘观善之斋’。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直观善前山之巅为亭，四望大隐屏最正且尽，取杜子美诗语，名以‘晚对’。其东出山背临溪水，因故基为亭，取胡公语名以‘铁笛’。说具本诗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断，两麓之口，掩以柴扉，而‘武夷精舍’之匾揭焉”。其充分利用自然风景环境，文景结合，颇具特色。后由其子孙扩建经营，淳祐四年(1244)改名书院，景定时得理宗赐额，并设山长之官。咸淳四年(1268)又增建右心堂等，改名紫阳书院，以为纪念(图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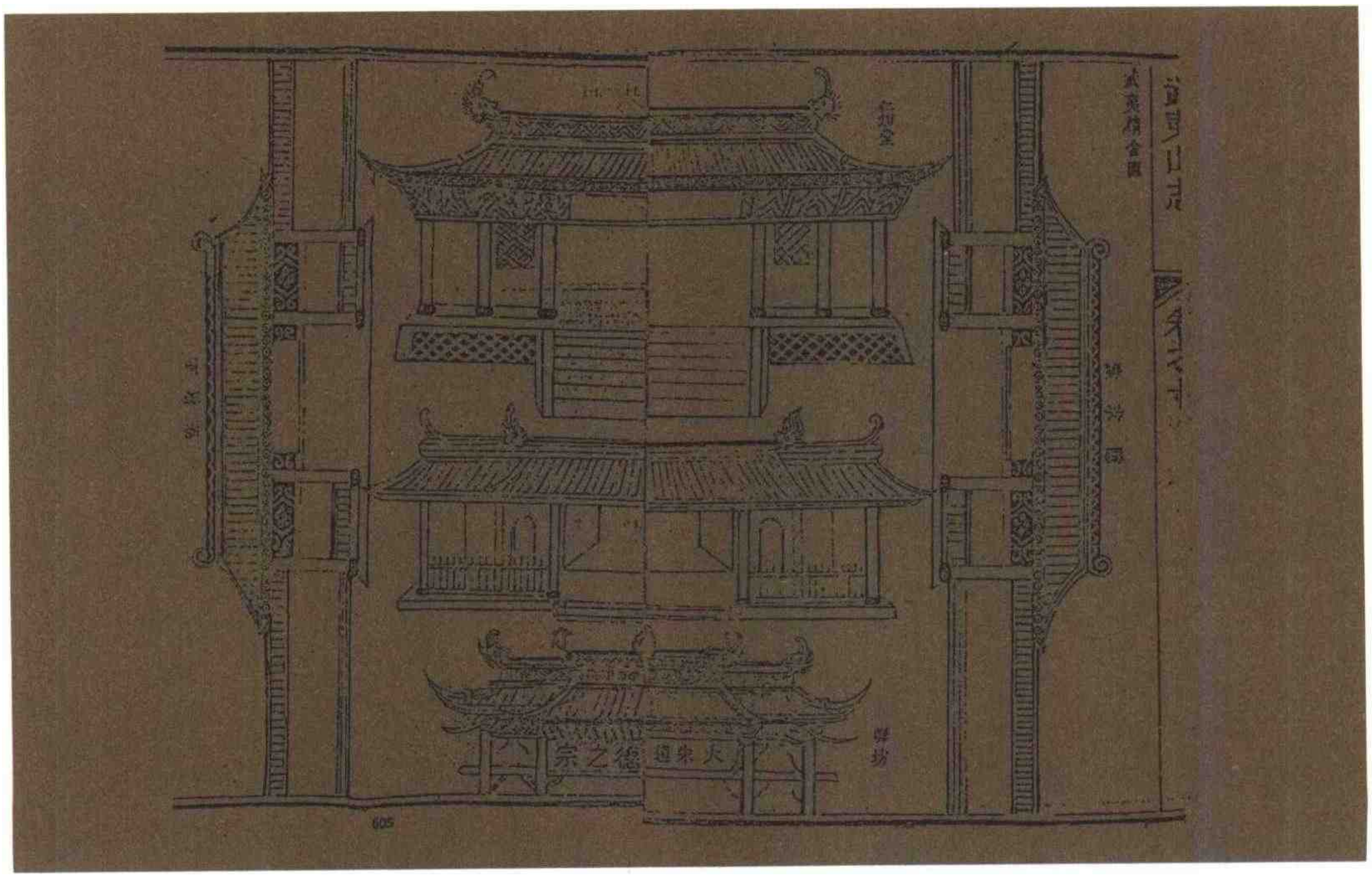


图1－3－3 武夷精舍(图载清道光版《武夷山志》)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隐屏峰下。朱熹创建后，屡修，元至正间又毁于兵火。明正统十三年(1448)朱熹八世孙朱洵澍重建为朱文公祠。正德十三年(1518)改额武夷书院，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改名紫阳书院，后续修。图为清代面貌今残存部分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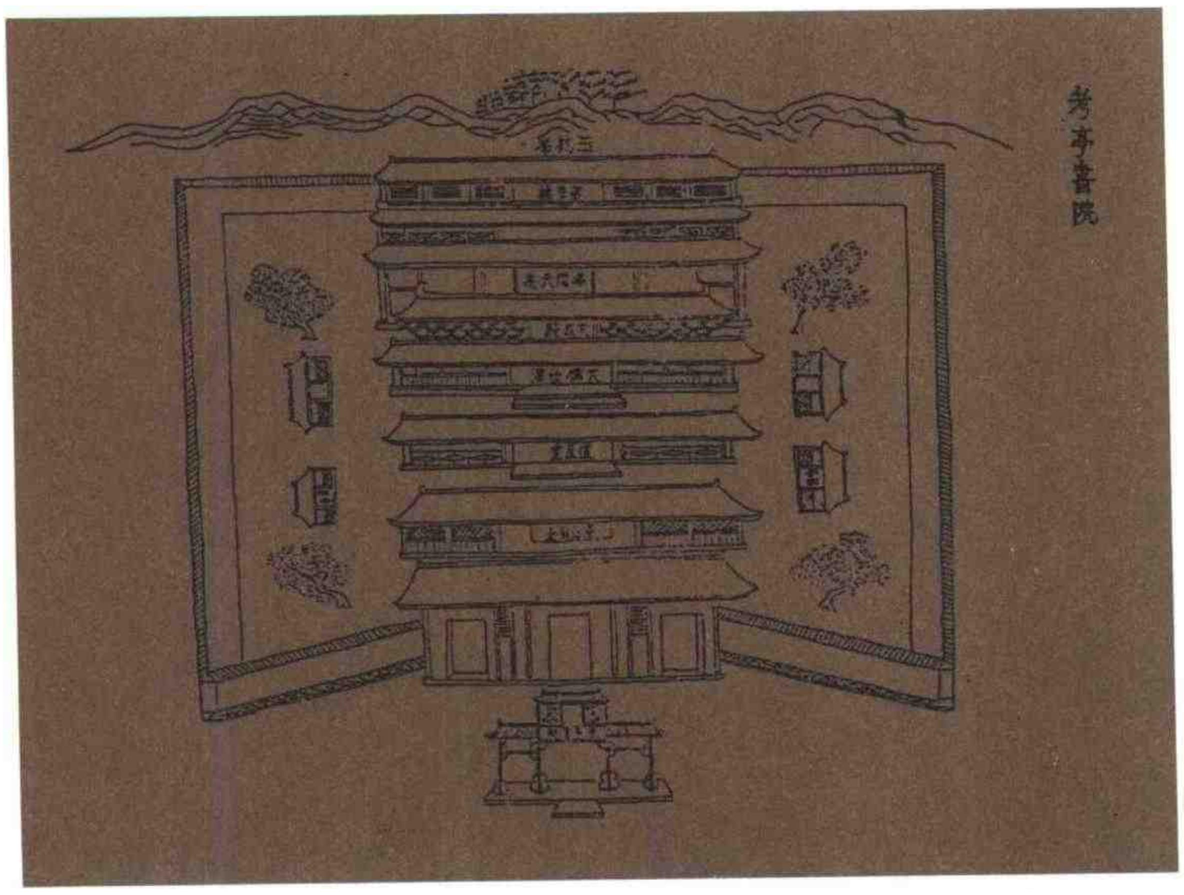


图 1－3－4　考亭书院（图载清乾隆版《福建通志》）。在福建建阳。朱熹创建，居此讲学、著述，对闽学学派发展影响极大。后理宗赐额，元大德间增置学田，至正元年（1341）作文公祠堂。清康熙赐“大儒世泽”匾。今仍存明代石坊及朱熹石刻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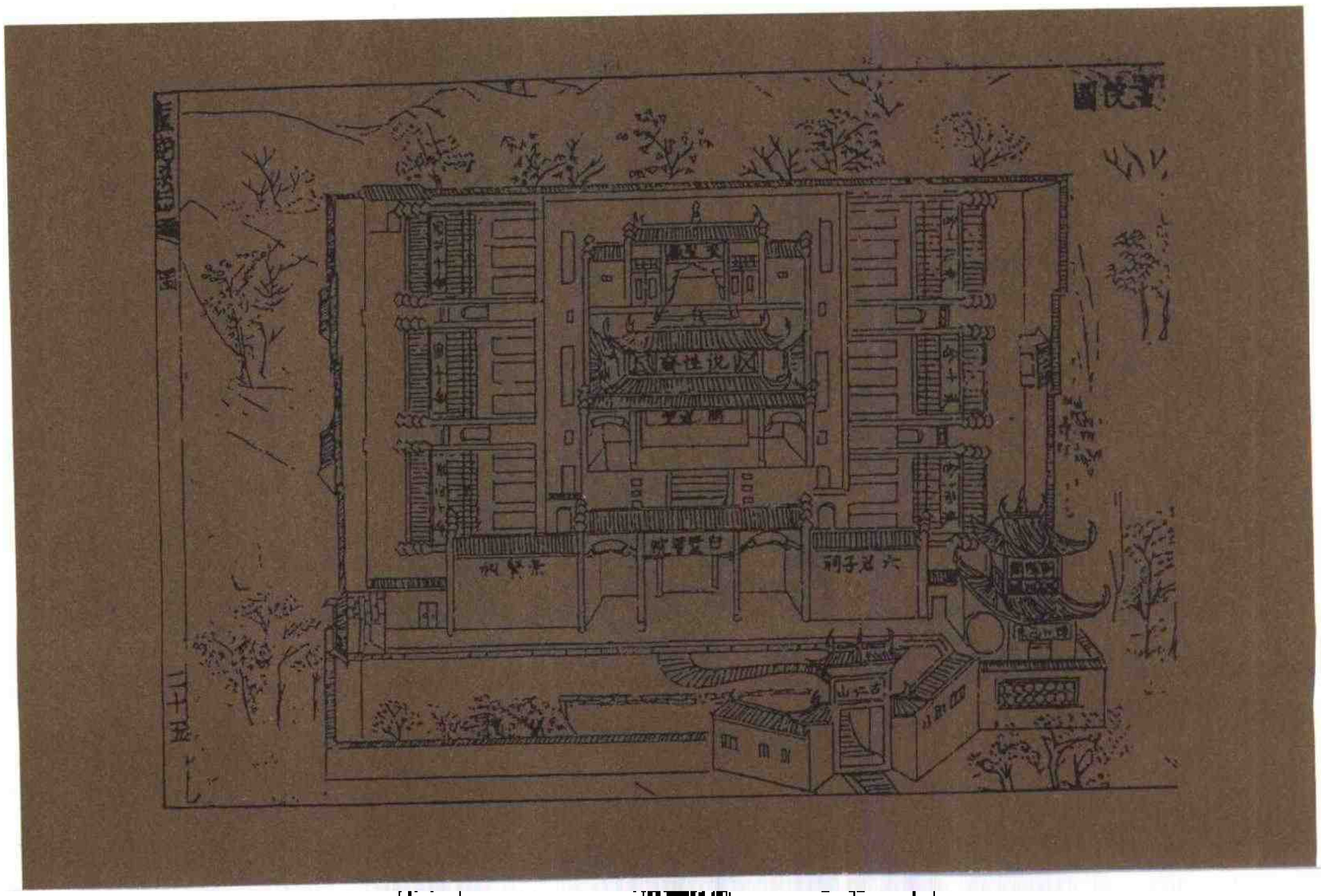
宋时有不少学者在其附近相继筑室读书、讲学，因此建有水云寮、云庄山房、南山书堂、咏归精舍、洪源书堂等，成为理学研究活动的基地，曾有“道南理窟”之称。

绍熙元年（1190），朱熹来到建阳三楼里，该处因其父朱松“爱其山水清邃，欲卜居未果”，乃继父志而定居于此，先就原有陈氏容膝斋、盖竹社、聚贵亭等改建，并于宅旁增建藏书楼。后来学者众，五年（1194）在藏书楼东加建**竹林精舍**，又称沧州精舍。书楼前有明伦堂，更前为燕居庙，供祀孔子、四配，及周、二程、张、邵、司马、李侗七人。宝庆元年（1225）后人又建专祠供祀朱熹，淳祐四年（1244）理宗赐额“考亭书院”（图 1－3－4）。

凡理学门徒莫不秉承师说，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积极支持发展书院教育。陆氏门人袁燮（1144～1224），庆元府鄞县（今属江西）人，淳熙间建城南书院，居家讲学，并联会讲；嘉定初任隆兴（今南昌）知府时，积极支持扩建**东湖书院**。沿湖建屋三十四间，使之“门庭堂宇，宏丽崇深，庖湢器用，咸备无缺”，并征集江南西路各军州图书充实其中，又奏请宁宗赐额，而成陆学基地，江西重要的学术中心。陆门弟子叶梦得，字石林，广信贵溪（今属江西）人，曾在贵溪建**石林书院**，讲学其中。其规划“视昔之岳麓、嵩阳，今之紫阳、槐堂之制，缭以周垣，荫以嘉树，聚古今图书数万卷，中列文宣、四配之像，从以周、程、张、朱、象山、琴山诸儒”。叶于讲授之暇，偕弟子“俯层栏，眺远山，瞰清流，审天理动静之机，察鸢鱼飞跃之妙，于斯时也，渣滓消融，万理昭著”，藉景物熏陶，寓教于乐，显示书院环境特色。淳祐十年（1250）叶任抚州守时，令金溪知县扩建**槐堂书院**，迁三先生祠（祀陆九韶、九龄、九渊）于槐堂前，“周以两庑，分为四斋，职舍胪列，庖库傍翼，敞门径，崇垣墙。楼曰桂栖，轩曰滋兰，各加整葺悉存”。

朱门弟子江万里（1198～1275），南康都昌（今属江西）人，曾就读白鹿洞书院。淳祐元年（1241）江兼知吉州时，在州治庐陵县（今吉安）城东白鹭洲创建**白鹭洲书院**，仿白鹿洞例，建有文宣王庙、云章阁、道心堂、风月楼、斋舍等，并建六君子祠，祀周、二程、邵、张、朱，规模完备，又奏请理宗赐额。江曾在此亲授诸生，颇受爱戴（图 1－3－5）。

图 1－3－5　白鹭洲书院（图载清道光版《庐陵县志》）在江西吉安，又称鹭洲书院。自南宋创建后，元继续办学，屡有修建，环洲均为书院所有；元末毁后荒废百多年。明嘉靖五年（1526）重建，二十一年（1542）迁建南关外慈恩寺，改名“白鹭”。隆庆六年（1572）改县学，次年复建书院于城北县学旧址，张居正废书院时改为公署，旋又复。万历二十年（1592）迁回白鹭洲，复旧名。魏忠贤废书院时又改为祠，后又复。清初重兴，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今仍为中学，存部分遗构，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后，江万里知隆兴府时，又创宗濂精舍，供祀周敦颐，聚学者讲论其中；还嘱知南安军林寿公建周程书院于大余城。朱熹高足黄榦（1152～1221），长乐（今属福建）人。庆元二年（1196）"伪学"禁起，黄仍在建阳建草堂，坚持讲学著述。嘉定八年（1215）黄又在汉阳郡治后凤栖山建书院，立周、二程、张、朱五先生祠讲学，十三年（1220）致仕不出，专事讲学。朱熹门人蔡元定（1135～1198），建阳崇泰（今属福建）人。淳熙二年（1175）在建阳崇泰建**西山精舍**；后复于武夷山二曲建**南山书院**，并协助朱子参订《四书集注》等书。朱熹在长沙的门人袭盖卿，衡州常宁（今属湖南）人，回家后与张栻弟子王居仁创建**芹东书院**于县城双蹲石前，后称双蹲书院。张栻再传弟子刘宰（1165～1239），金坛（今属江苏）人，辞官归里，隐居30年，从事讲学，毁淫祠48处。端平（1234～1236）中刘重建著名的**茅山书院**于三角山。吕学门人郭江（1157～1217），东阳（今属浙江）人，与父、兄皆宗吕学，创办**西园书院**；庆元二年（1196）禁"伪学"后，仍坚持讲学不辍。理学各派门人，莫不热衷书院教育，积极创院，传道授业，不胜枚举。



图1－3－6　南溪书院古樟　传为朱熹幼年所植，因朱熹幼名沈郎，故名沈郎樟。

同时各地因有学派宗师，或历代名贤寄寓活动之处，也多立祠、建院，以为纪念。福建同安安平镇，因绍兴初朱松在此讲学，有院名鳌头精舍；后朱熹访此论文。乾道（1165～1173）间为纪念朱氏父子，曾建朱先生祠；嘉定三年（1210）扩为**石井书院**，中建大成殿，后为尊德堂，绘朱氏父子像于堂，旁列崇文、敏行、移忠、立仪四斋，西有杏坛，东有小山丛竹亭，三门列峙，绕垣环周，檐楹层复达三百楹规模。福建南剑尤溪，为朱熹出生地。嘉熙元年（1237），曾就故址建祠三楹，合祀朱氏父子，并置学行、传心二斋，延士读书，名**南溪书院**。淳祐五年（1245），增建讲堂于祠右，宝祐元年（1253）得理宗赐额。后历代屡修，仍留有遗迹；今已修复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图1－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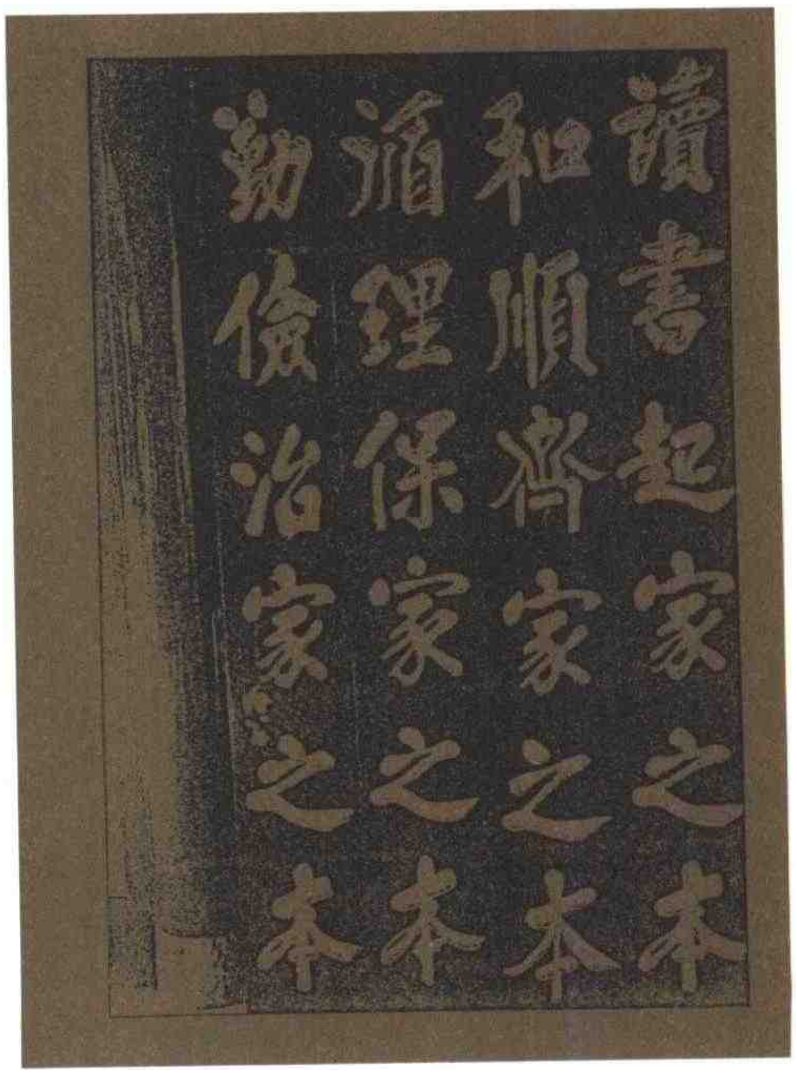


图1－3－7　南溪书院"四本"木刻　为朱熹字迹。

江西铅山因淳熙二年(1175)朱、吕、二陆曾会讲于鹅湖寺，交流学术，史称著名“鹅湖之会”。后人建四先生祠(又名四贤堂)于寺供祀，以为纪念。淳祐十年(1250)请得理宗赐额“文宗书院”，并专设官师主之，后名**鹅湖书院**(图 1－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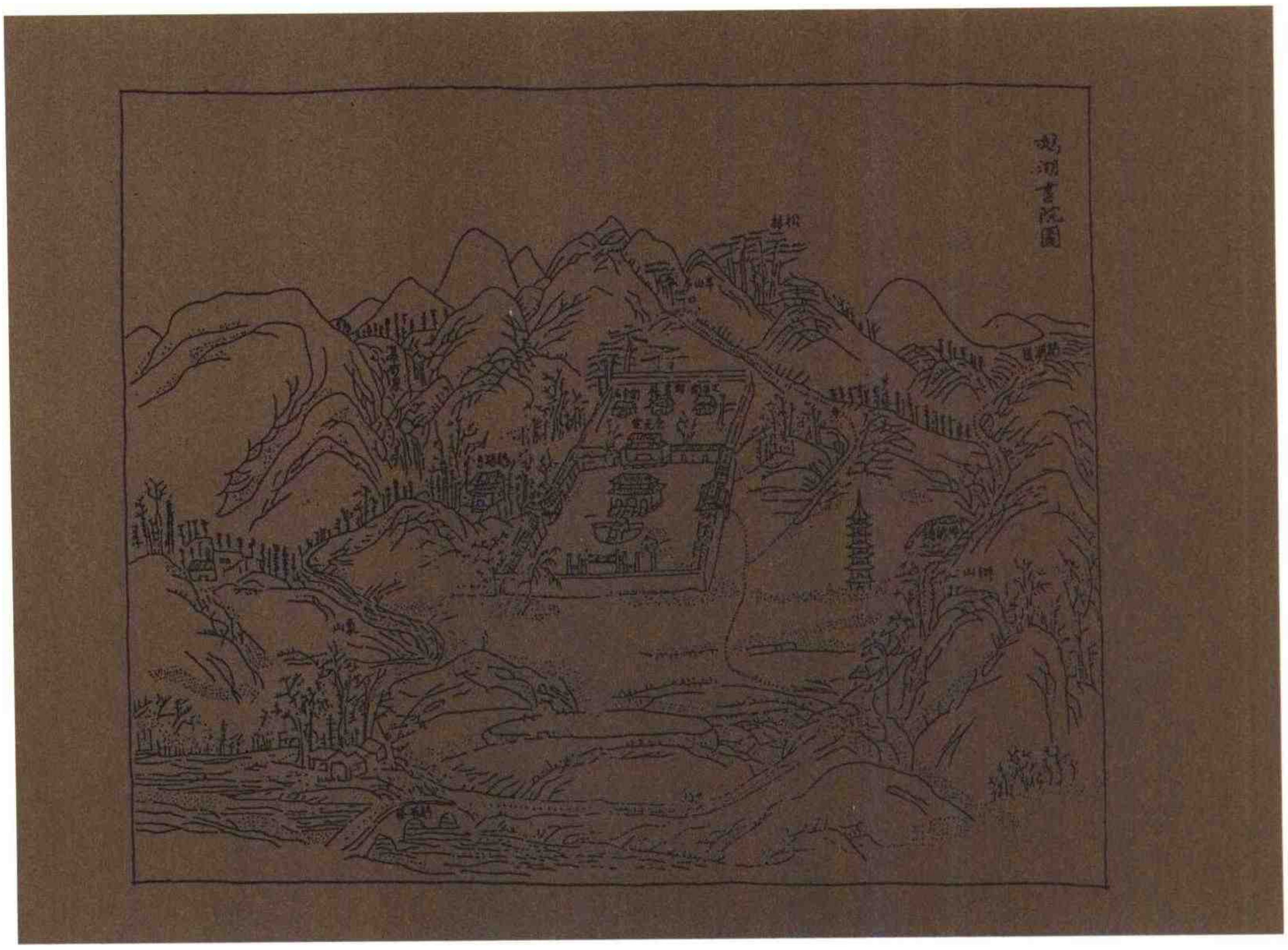


图 1－3－8　鹅湖书院(图载清康熙版《江西通志》)，在江西铅山。宋末已设师办学，元代曾迁往城内(今永平镇)，元末毁。明景泰四年(1453)复建于鹅湖寺旁，弘治(1488－1505)间一度迁往山顶，正德六年(1511)仍回旧址重建。清顺治十年(1673)再建，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康熙赐“穷理居敬”匾。今遗构完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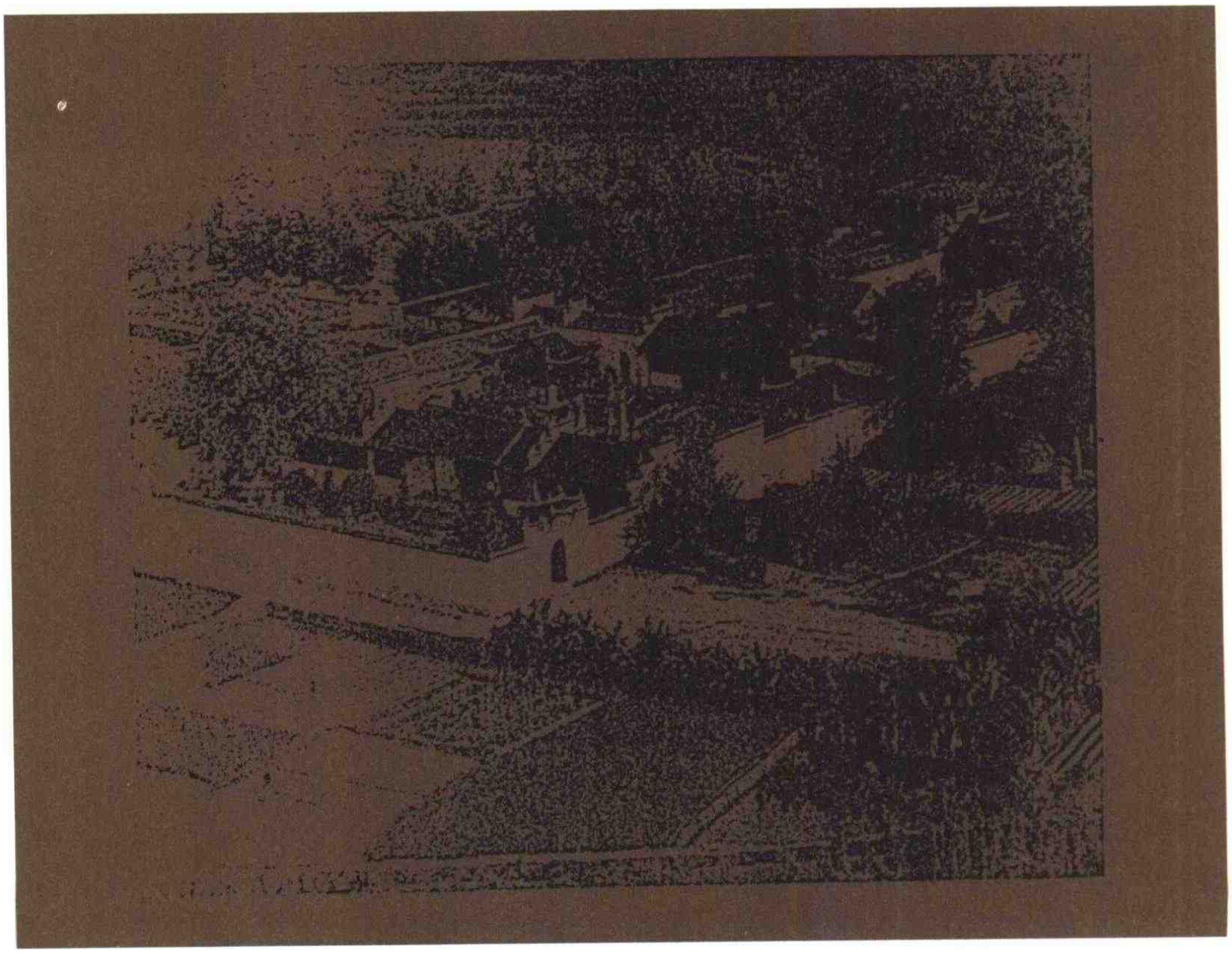


图 1－3－9　鹅湖书院鸟瞰，为其现状。

浙江浦江因淳熙八年(1181)朱熹曾过此,并会吕祖谦、陈亮于月泉,咸淳元年(1265)知县王霖龙疏浚月泉时,筑月泉亭、修澄万桥,芳润池,建房45楹为月泉书室。书室绘朱熹、吕祖谦像于堂,令学者瞻仰,并肄业其中,后名**月泉书院**。江苏江宁曾为张栻建精舍讲学,后真德秀建祠祀之,淳祐(1241～1252)、咸淳(1265～1274)间又有官员添建楼堂斋舍共90间,并拨田亩,辟为**南轩书院**。浙江湖州,知州曾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为胡安定建祠于州学右,以为纪念。南宋淳祐五年(1245)知州又于根恩坊官地,扩建房屋470间,办成宏大规模的**安定书院**,并置山100亩,供办学经费。江苏苏州城东北隅原有祭祀吴地孔门弟子言偃之所,南宋咸淳五年(1269)知府改建于武状元坊,并请得"**学道书院**"额。院内筑有燕居殿、师友渊源堂,及止巳、选贤、问礼、知本四斋,后又增建先贤祠、祀颜、曾、思、孟等,两序列周、程以下九贤。湖南澧州(今澧县)因宋范仲淹曾随继父朱氏居澧州安乡,读书于兴国观,后人筑堂祀之。庆元初直建于观侧,宝庆二年(1226)迁建于城东白沙洲,改名**溪东书院**,建有前门、大门、讲堂、通经楼、文正公祠及四斋等。湖南湘潭张栻门人钟如愚之子曾割山五百,建讲舍于朱亭市,以父号名为**主一书院**,供祀张栻,配祀其父。综上可见,各地出现颇多纪念性书院,突出发掘地方文化传统,以激励后学。

南宋书院随着学派的发展,学术交流的活跃,教学内容的充实,规制设施的完善,而兴盛繁荣。书院除满足其讲学、藏书的发展要求,还创造了生活、游息的优美环境;并且,十分注重学派宗师和地方乡贤的祭祀纪念,突出其学统源流,树立典范,成为其重要教育内容,形成地方文化中心和传统学风,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学规的制订,学田的设置,学舍的建设完善,都标志着南宋时书院制度的完备。

第四节　书院的延续(元)

元代蒙古族入主,为实行其封建化过程,采取了"汉化"的文教政策,尊孔崇儒,对书院采取保护、鼓励政策,发展书院教育。早在灭金之后,元太宗七年(南宋端平二年,1235)聚伐宋所得名儒数十人,伊洛经籍8000卷于燕京,创建**太极书院**。院内立周敦颐祠,以张载、程颢、程颐、杨时、游酢、朱熹配祀,刻《太极图》、《通书》、《西铭》于祠壁;延请赵复主讲程朱理学,从学者百余人。由此理学北传,为元建书院之始,并欲以此"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刚入主中原时,即诏令"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车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元史·世祖本纪》),对书院进行保护。全国统一之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又明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选举志·学校》),进一步促进书院的继承发展,使一批入元不愿出仕的学者,得以建院隐居讲学。

元代仅有的97年间,新建书院约200多所,如加上前代遗存的大量书院,估计约近千所之多。其分布虽仍以江南长江流域居多,但黄河流域也已增多,尤黄河以北的书院大都为元代兴建(《中国书院史》),反映"南学北渐"的特点。

书院自身发展的同时,官府加强了控制,极力促使书院走官学化道路。元代以程朱理学为宗,定为科场试士程式,《四书集注》成了官定教科书,并作为科举衡文的标准。官府委派山长,选任主讲,或由官员兼任;私人延聘,有的也由官府认可,并授以官职;同时拔

给学田，仍由官府掌握，以加强经济控制。《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书院渐失自由讲学之风，追求科考，几同官学。元时供祀文昌帝君，以祈求功名，书院亦有效仿而祈求神灵。书院选址，则不限于山林胜地，有的设于城内，以便官府的控制、管理。但一些私人书院，名儒隐居讲学，较多保留原有学风。

前代一些著名书院，此时大多修复继续办学。**岳麓书院**自南宋景炎元年(1276)元军攻陷潭州被毁。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由学政刘必大重建，次年"始复旧观"；延祐元年(1314)郡别驾刘安仁等再修，"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修复后的岳麓书院，"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重建岳麓书院记》)。"书院之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练如鹤，自西而东，趋而北，折而东，还绕而南，潴为清池，四时澄澄无发滓，万古涓涓无须臾，息屋其间，名曰百泉轩，又为书院绝佳之境"，《百泉轩记》并称，宋时朱、张讲学岳麓时，酷爱是泉，"昼而燕坐，夜而栖息，必于是也"。说明元时书院保存了宋代原建的基本规制特点和园林艺术特色，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毁于战火。**白鹿洞书院**，宋末未有战火破坏记录，元代相继办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因"斋藏不戒于火"，经地方官员修复；大德间(1297～1307)增置学田，至正十一年(1351)毁于红巾起义兵火。**丽泽书院**学者仍众，至元间郡守李嗣重建，祀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象山书院**仍承宋制，设山长主之，至元间邑人祝氏于山间精舍遗址，聚徒讲学；元末毁于战火。石鼓书院亦继续办学，元末毁于战火。**白鹭洲书院**，元置山长、直学等官，继续办学；至元十六年(1279)增建古心祠，祀江万里，以纪念创院之功；十九年因水汜重修，延祐间收购洲土，加建复古亭，自此环洲均归书院所有；至正十二年(1352)毁于战火，同年又因水汜，次年修复，元末复毁。**鹅湖书院**，元仍名文宗书院，迁入城内；皇庆三年(1313)知州增建会堂，设山长、直学等官主持，备置整套祭器，祠祀朱、陆等人；元末毁于战火。**伊皋书院**先毁于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时，元就旧址重建，有大门、中门、廊庑、讲堂等，并建稽古阁，藏书万余卷；延祐三年(1316)仁宗赐名"伊川书院"，另立《敕赐伊川书院碑》；元末毁于战火。

其他前代遗存书院，元时也多屡修扩建，继承发展。南岳**邺侯书院**始于唐，元曾三次修建，至大元年(1308)"易敝更新，百废俱举"，至顺元年(1330)"修创益备"，至正三年(1342)县郡集资重修，先是"燕居之堂、先贤之祠成"，"继成殿门、堂庑、斋舍、库庖、垣墉、屏閟，黝垩丹雘，焕然一新"。浙江余姚**高节书院**，创于南宋，元大德三年(1299)知州重建，别建大成殿于夫子祠前；至正八年(1348)知州再建，作仪门、创怀仁、辅义、尚道、著德四斋，重修夫子旧殿，复建义悦堂为讲义之所，重兴高风阁，以极游览之胜。广西全州**清湘书院**，创于南宋，曾有理宗赐额，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毁于战火；贞元元年(1295)修复，至顺二年(1331)扩建达210间。广西袁州**南轩书院**，为南宋纪念张栻所创，元初因水灾毁藏书阁，危及讲堂等；至元三年(1266)重建藏书阁，"延十有五丈，广百步，崇三丈"，凡三层，奉宣公张栻像于阁下以为祠，并作东西两庑、讲堂、咏归亭、立雪亭，又作水柜于上流以防水患。安徽歙县**紫阳书院**，为南宋纪念朱熹所创，德祐二年(1276)毁于战乱；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建于城南门内江东道院，延祐二年(1315)毁于水灾，又迁回南门外旧址左侧，旋毁于党乱；至正二十年(1360)再移建于东门，面对紫阳山，有殿3楹，两庑各3间，画朱熹像于殿中，以为纪念。湖南湘阴**汨罗书院**创于北宋以纪念屈原；元延祐五年(1318)追封屈原为忠洁清烈公，而重建书院，名为清烈书院。江苏镇江**淮海书院**，南宋创于北固山，曾得理宗赐额；元至元中被并入甘露寺；元贞元年(1295)重建于儒林里，大德间重修；延祐三年(1316)扩建先贤祠于院内西北，又建明伦堂及博文、约礼、尊老、育材、明德、达道六斋。湖南湘潭**主一书院**，南宋张栻门人钟如愚之子为纪念张栻及其父而建，宋末毁；元至

元三十一年(1294)如愚三世孙重建，有问仁堂为孔子燕居，厚德堂为讲肄，以及两庑、仪门、棂星门、藏书阁、二先生祠、斋庐等，“为屋几百间”，置田千亩。江苏苏州**学道书院**，原为祭祀吴地孔门弟子言偃之所，南宋建院赐额；元初为豪僧夺据，至元间经山长祖宗履改创，元末又为僧夺，反映当时儒佛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此反复争夺，他处亦多有发生。以上变迁也反映书院元承宋制，规模有所发展。

元代各地另有新建书院，如陕西咸宁(今西安)**鲁斋书院**，由元延祐二年(1315)御史赵世延动议，邑人王庭瑞拆其宅建成，有夫子燕居殿、讲堂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斋，供祀许衡，因此赐名鲁斋书院，并谕陕西省给田，命官管理；陕西临潼**居善书院**，为元至正间创建，有前门3间、礼殿5间、仪门、两庑及棂星门，中作讲堂，置东西两斋，后为学师居屋，并置田。又如山东曲阜**尼山书院**，因尼山为孔子诞生地，故又名尼山诞育书院；宋时孔子46世孙已即庙为学，后毁于火；元至元二年(1336)秦准创建尼山书院，“凡齐鲁之境贤卿大夫，民之好事者，出钱而劝成之”，仿国子监制，与孔庙连为一体(图1-4-1)。

山东曲阜**洙泗书院**又名洙泗讲学书院，在孔林东北泗水与洙水之间，故名；元至元四年(1338)，另说至正十年(1350)，孔子55世孙孔克钦创建于孔子讲堂旧址，仿孔庙红墙周绕，以大成殿为主体，供孔子、四配及十二哲，东西庑祀孔门弟子，殿后为学舍，成三进院落，前庙后学格局，以祭祀为主，讲学为辅，与一般书院不同(图1-4-2~3)。

江西弋阳**水南书院**为宋代进士张卿弼于宋亡不仕，隐居讲学之处，元至元十七年(1251)，门人择地为其建书院，中为宫，有庙堂祀孔，翼以两庑；有明伦堂以讲学，并立祠奉祀乡贤，建稽古、学易、约史、兴诗、立礼、成乐6斋，略仿郡县学之制。江西上高蒙山**正德书院**，元至元二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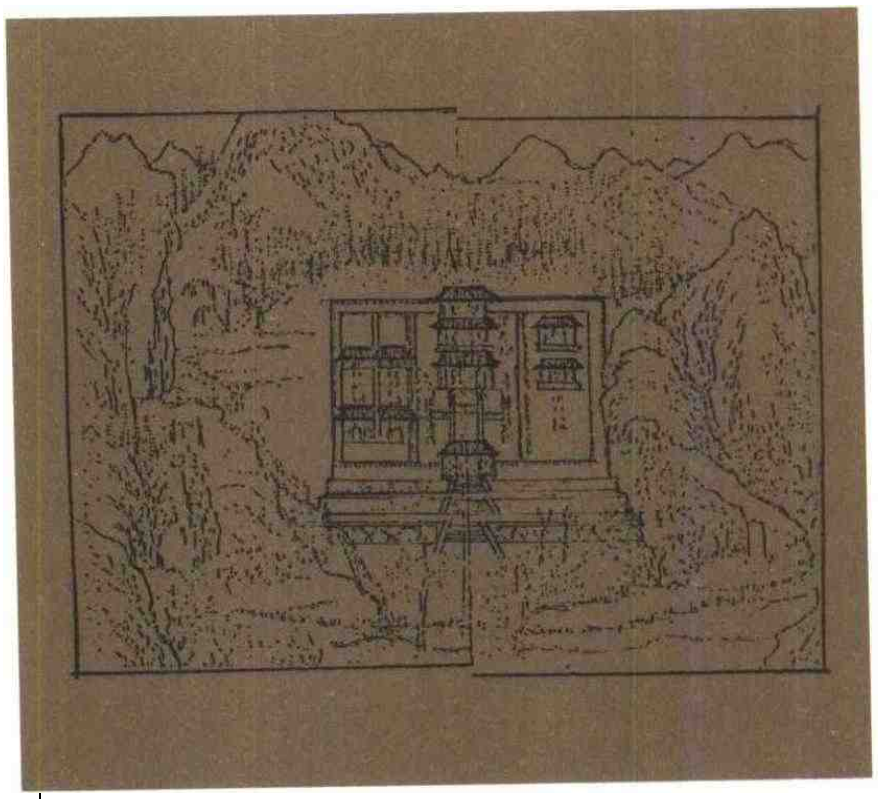


图1-4-1　尼山书院　在山东曲阜尼山。宋庆历三年(1043)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宗愿曾即庙为学，后毁于火。元至元二年(1336)秦准创建尼山书院，元末衰败。明永乐十五年(1417)重建，弘治七年(1494)重修，主要为祭祀场所，有少量讲学活动。现尼山东麓仍有尼山书院，仅存前门、正殿三间及两厢各三间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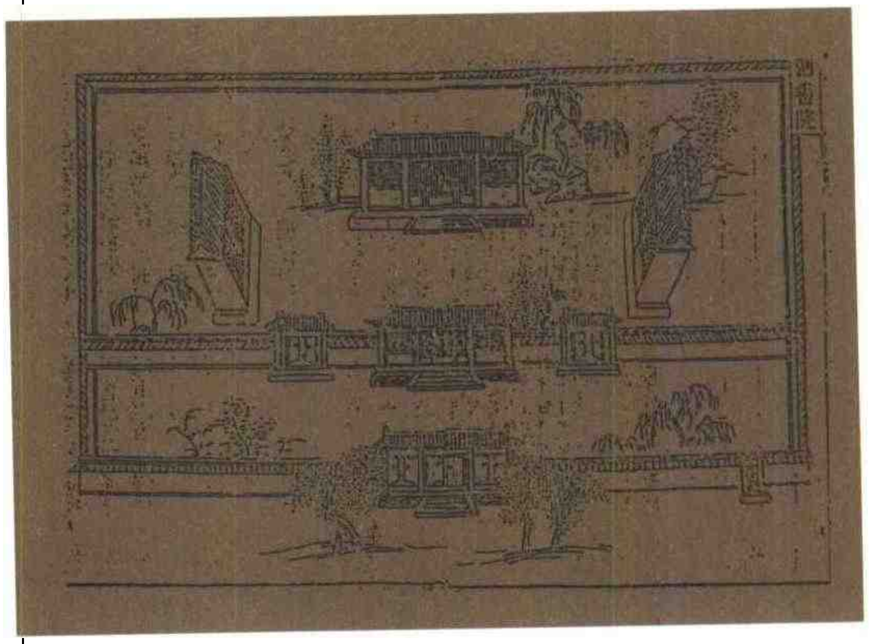


图1-4-2　洙泗书院图　在山东曲阜孔林东北。元代创建，曾设山长讲学。明正德二年(1507)改山长为学录，主持春秋仲丁祭祀，成为一祭祀场所。嘉靖三年(1524)增石坊，清屡修。雍正十二年(1734)改立“洙泗书院”石牌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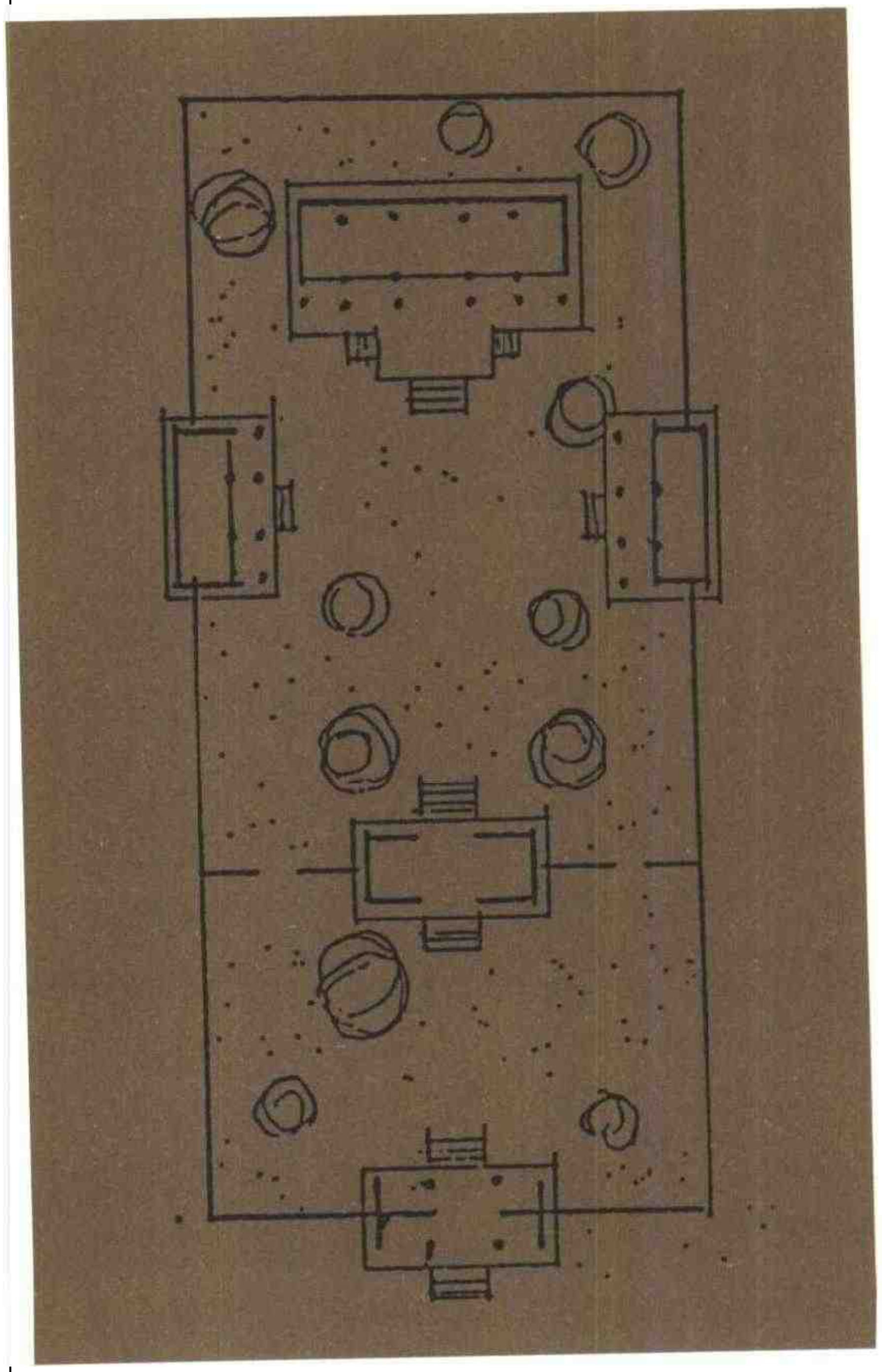


图1-4-3(左)　洙泗书院平面现状图

(1261)官办银矿所创，有大成殿、明伦堂、两庑、六斋等，招收山民子弟；延祐二年(1315)重修增建，并置田亩。浙江上虞**泳泽书院**，建于元至元间，以纪念朱熹曾讲学于此；有仪门、礼殿、祠宇、讲堂、斋舍等，并置田1100余亩。浙江慈侯**杜洲书院**为副尉童金纪念其祖童居易(杜洲)，元至大二年(1309)建于城西北杜湖之曲，初为义学；元统三年(1335)请额"杜洲书院"，并割田400亩，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及志道、尚道、复礼、守约、慎独、养浩六斋、书库等亦一一俱备。四川绵竹**紫岩书院**，因城北紫云寺有张栻读书堂遗址，元代光禄大夫行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捐建于遗址；书院有堂室、斋舍、庖湢等，另有先圣堂祀孔及四配。湖南城步**儒林书院**，元皇庆二年(1313)由绥宁苗族人物杨再成捐建于苗区儒林乡，故名；招收苗族子弟，为我国第一所苗族书院；正殿祀先师十哲，另有斋庑、厨湢等，一时"冠带如云，弦歌盈耳"。广东番禺**玉岩书院**，原为宋进士玉岩读书处，元代族人建为书院，以为纪念，设有文昌殿、天尊堂、余庆楼、漱玉台、司马石、岩玉屏、苍盖亭等；祀钟玉岩像于余庆堂，每年正月望日族人能文者参祭，祭毕命题为文赋诗，世守不变，成为族人文化活动场所，具纪念祭祀性质，亦是较早出现祭祀文昌等设施的书院。

元代书院在官府提倡和支持下，有较大发展，因"南学北渐"，扩展到北方。原有宋代书院亦多恢复，并屡加修建、扩充，继续办学。新建书院也基本继承宋代形成的讲学、藏书、供祀的规制，较为完备，其中不少还仿学宫建设，也反映出其受到官学化的影响。

第五节　书院的普及(明)

根据《中国书院辞典·书院名录》统计，有年代可考的明代所建书院，共1577所；如果再加上历代遗存的书院，当有2000所以上。其中建200所以上书院的地区有江西；建百所以上的有浙江、广东、安徽、福建、湖南、河南。书院分布范围由元代19省(市)区，扩展到24省(市)区，新扩省区包括辽宁、甘肃、青海、宁夏等。一些边远地区有突出增长，如云南由元代1所，发展到69所；海南由宋代1所，发展到19所。北方地区也有较大发展，如河北由宋元24所，增到65所；山西由宋元11所，增到40所；陕西由8所，增到30所。这些都反映到了明代，书院已大为普及。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明初大力发展官学，各府、州、县、卫、所皆立官学，还广泛设置社学，同时加强科举制度。参加科考必经学校出身，使学校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致使书院沉寂百年之久。明初官府虽重建恢复尼山、洙泗两院，但只是一种宗孔尊儒的表示，书院基本只有祭祀活动。不少书院被改为官学，或并入官学，或改做他用。多数书院荒芜废弃，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毁于兵火以后，明初仅存濯缨、枕流两桥，直到正统元年(1436)，郡守翟傅福才率属开始重建工作。岳麓书院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被毁成墟，明宣德七年(1432)有周氏父子捐修讲堂，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重建礼殿；随后又毁，"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弘治七年(1494)才开始全面重建工作。其时虽仍有少数重修或新建书院出现，传习程朱理学，但都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直到成化以后，书院才开始逐渐恢复活跃起来。尤其正德以后，王学和湛学兴起，书院再盛，学风为之一变。王阳明(1472～1528)和湛若水(1466～1560)，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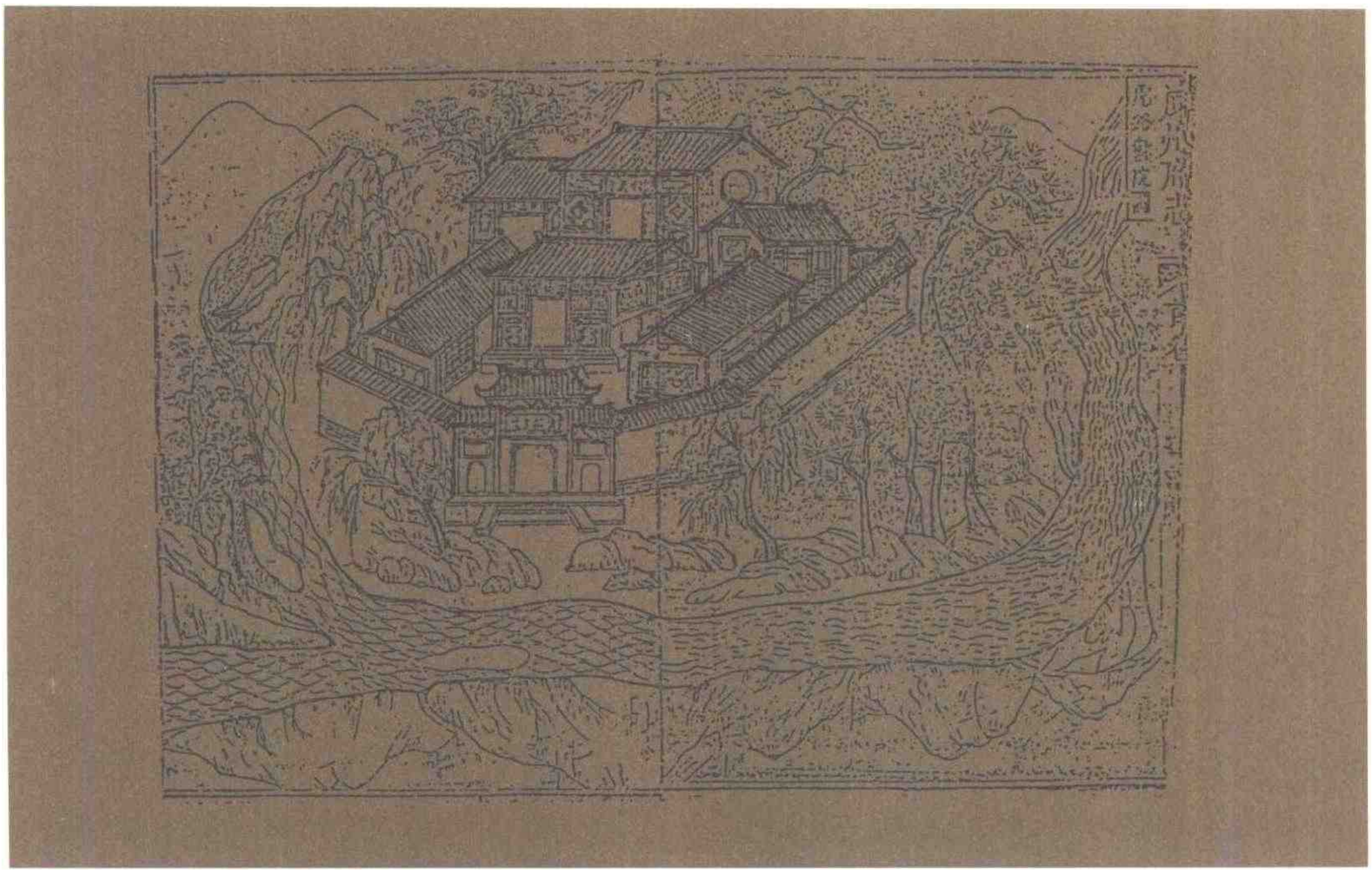


图 1－5－1　虎溪书院（图载清《辰州府志》）在湖南辰州（今沅陵）。明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离贵州回京，途经辰州，讲学虎溪白云轩，并作《与辰州诸生论收放心书》。嘉靖二十年（1541）同知徐珊访其师讲学遗址，创建精舍，有亭、轩、楼、阁及道堂等，集士倡学，并立祠祀王。后又扩建，崇祯时改名阳明书院。清雍正时改名虎溪书院，屡修办学，仍有遗迹，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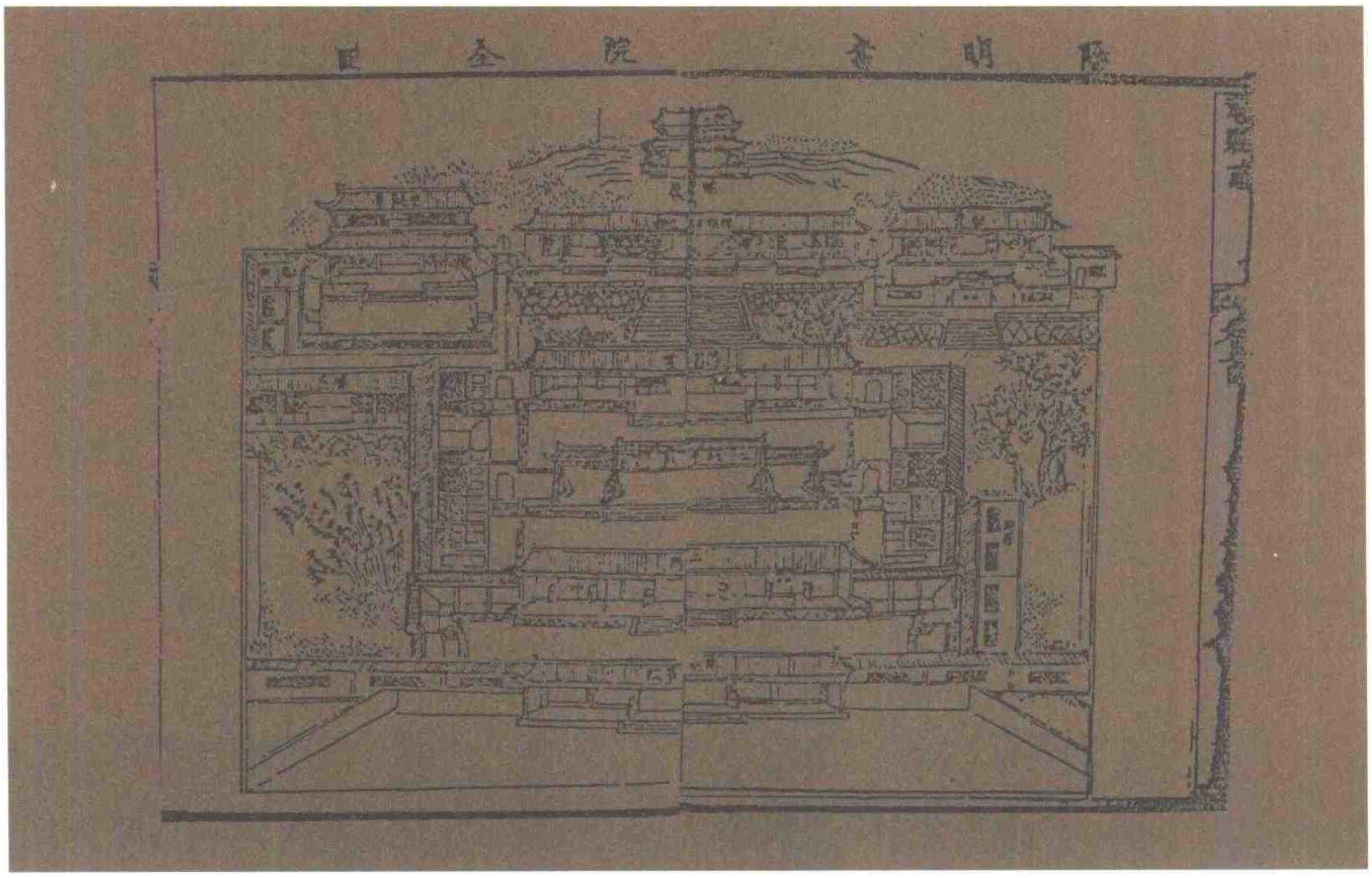


图 1－5－2　阳明书院（图载清同治版《赣县志》），在江西赣县。明正德年间王阳明曾在赣县贺兰山顶郁孤台讲学；所建书院原名濂溪。崇祯十二年（1640）迁建于光孝寺左，改名濂泉书院。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仍就原址重建，改名阳明书院。

承陆学，二人曾于正德元年（1506）定交，以昌明圣学为己任，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他们所到之处，莫不致力修建书院，进行讲学，影响甚大（图 1－5－1～2）。

尤其王门弟子，分布各地，普设书院，大开讲会，并形成一定的讲会制度，又订立会规、学约，使书院活动扩展深入社会。另外则有泰山、东林等学派兴起，力纠王学之偏。东林讲会不仅是地区性质的学术团体，更议论时政，裁量人物，参与政治斗争。正德至万历年间，形成书院发展的又一高潮，当时兴建书院的数量占明代书院的 60% 以上。嘉靖至天启年间，书院为当道所忌，朝廷曾四次令毁：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攻击湛若水"倡其邪说，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诏从其请，令毁之；十七年又有吏部尚书许讃以地方官员不修官学，另起书院，动费万金，要求查禁，亦准旨，但禁而不止；万历七年（1579）阁臣

张居正当政，要求重视官学，下令禁毁书院，影响较大，"自应天府以下，凡 64 处，尽改公廨"，使"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天启五年(1625)宦官魏忠贤加害东林，再令毁天下书院，以致"东林党人"被杀害，东林书院片瓦无存，不少书院受到严重打击，但并未禁绝，崇祯即位，阉党垮台，书院又大部恢复活动。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书院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时为适应不同条件，而出现多样化的类型特点。除保留有传统聚徒讲学式书院，还有在官府控制下，官学化影响的考课式书院和宣讲式书院；又有由于讲会制度的形式完善而形成的以讲会活动为主的讲会式书院，也有因回避当时斗争，变成有名无实的、专供纪念的祭祀式书院。另外则出现了个别专业性书院，如习武书院等。

前代一些著名书院，在明代修建频繁，又有所发展。

白鹿洞书院 元至正十一年(1351)被毁成墟 85 年后，于明正统元年(1436)由郡守翟傅福率属捐俸重建，"仍其旧基"，先作礼圣殿，改名大成殿、大成门、贯道门，次作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文会堂及燕息之所，又立三贤祠祀李宾客、周濂溪、朱熹，奠定了基本规模，但未聚徒讲学。又隔 22 年后，天顺二年(1458)再修，重建贯道桥，收"徒数人读书其中"。成化元年(1465)又修，"或仍其旧，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规制"(李贤记)，周以垣墙，并增置图书、学田、祭田，聘胡居仁主院，正式恢复办学，时隔被毁已百余年；随后又增建棂星门、希圣楼，重建五经堂等。弘治十年(1497)大修，重建大成殿，复名礼圣殿，改三贤祠为周、朱二夫子祠，迁出李宾客另立宗儒祠，并祀曾讲学于洞的十四人；后又增建独对亭于枕流桥东，建白鹿书院坊于溪口桥头；学徒曾达 500 余，借住民房以容。正德年间又先后建六合亭于回流山上，建钓台亭于仙台石上，建大意亭(观德亭)于文行忠信石东，并增置学田、图书。嘉靖年间又累有修建，曾辟洞于后山，置石鹿于洞中，以纪念李勃；又鼎新宗儒祠七间，修号舍 50 余间，并先后建高美亭于洞前山、山水辉光坊及前修遗迹坊于院前、思贤亭于白鹿洞上石台、明未亭于洞石山背、闻泉亭于左翼山，时有"洞中十四景"之称，发展了院周风景环境建设。万历年间，修建更加频繁，累增学田，曾建忠节祠于洗心桥东，祀诸葛武侯、陶靖节先生，重建鹿洞憩馆于颜家山，改大成门为礼圣门，改山水辉光坊于回流山首，匾曰高山仰止，改前修逸迹坊曰圣域贤关；摹刻吴道子所绘孔子像于礼圣殿，增祀王守仁于宗儒祠。其间万历七年(1579)，因张居正禁院，仅留祠祭，至十一年请准恢复办学。自后至崇祯初仍有修建(图 1-5-3~4)。建设之外，白鹿洞书院自宏治修《志》，正德又修《新志》，嘉靖再修《洞志》，系统地保存了史料。



图 1-5-3 白鹿洞书院(图载清康熙版《西江志》)反映明末清初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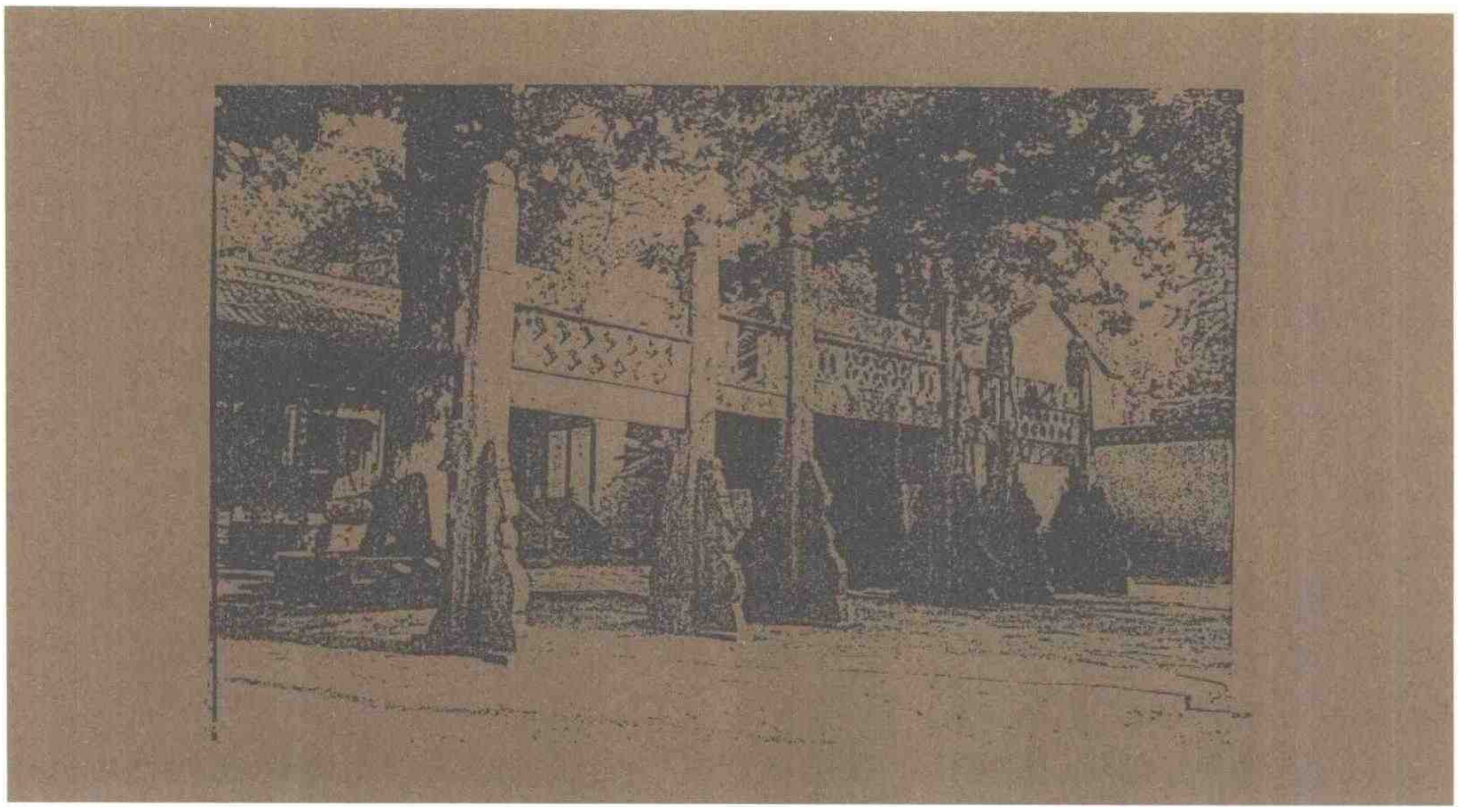


图1-5-4　白鹿洞书院棂星门　为明成化年间遗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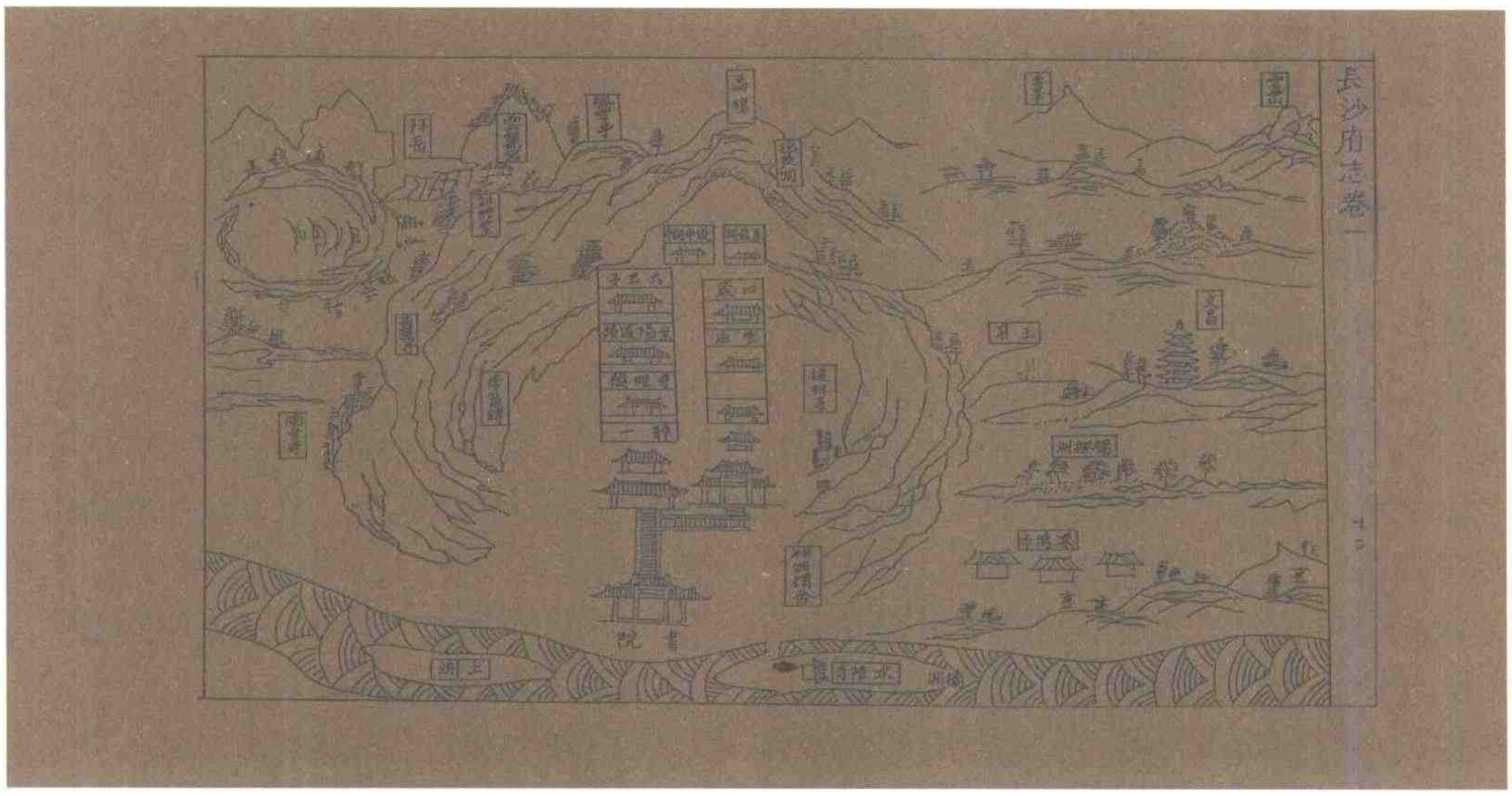


图1-5-5　岳麓书院（图载明版《长沙府志》）反映明代扩建文庙后、院庙并列状况。

岳麓书院　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战毁成墟；60多年后，宣德七年(1432)曾修讲堂，但随后又毁；成化五年(1469)再建礼殿、麓山寺碑亭，不久亦毁；以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直到弘治七年(1494)才得以全面重建，有大门、讲堂，崇道祠祀朱熹、张栻、两庑及敬义、诚明两斋。次年重建极高明亭于山上，并置田百亩。弘治九年重建尊经阁，内嵌"紫阳遗迹"，图绘朱熹在长事迹的石刻八方。弘治十八年重建礼殿，改名大成殿，基本恢复了旧有规制。正德初年，又进行一次全面规划和修建，拆毁古道林寺扩建文庙于书院左侧，将原大殿门改为书院二门，形成至今的院庙并列的格局，与官学"左庙右学"类似，并增辟射圃，建石牌坊于江岸。同时，王守仁曾访书院，其后又有王门弟子多人先后来院讲学，传播王学。自后修建频繁，嘉靖六年(1557)增建崇道祠，祀创建以来六位建院有功人物，故又名六君子堂。次年再次扩建，有东西讲堂、成德堂、延宾、集贤两馆及诚明、敬义、日新、时习四斋，天、地、人、智、仁、勇六舍，置田2000余亩。后又请得世宗御制敬一箴及注程氏四箴，因此仿官学增建敬一亭于文庙，又增建拟兰亭于院内，禹碑亭于山上。万历间仍修建不断，直至明末，又增建圣神遗迹坊于禹碑，道乡祠于山上等，以保存古迹，形成又一建设高潮(图1-5-5)。岳麓书院亦曾先后于正德、嘉靖、万历、崇祯时四修院《志》。

石鼓书院 元末毁于战火，明永乐十一年(1413)由知府史中重建，有礼殿祀孔，韩张祠祀韩愈、张栻，另有书舍6间，以待学者。天顺、弘治时续修；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一时学者翕然云从”。嘉靖时湛若水多次访院，知府蔡汝南曾扩建主静、定性两斋，并立规约。万历十年(1612)扩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访院，又加助修。明末毁于战火。

象山书院 元末毁于战火，明景泰三年(1452)知府重建，以祀陆九渊、陆九龄、陆九皋。成化二十年(1484)诏命贵溪重建。正德五年(1510)武宗诏刻“象山书院”四字，随后大修，增建门堂坊匾及象麓草堂、仰止亭、三峰亭等。嘉靖二十二年(1543)再次增修，成一繁荣时期。万历七年(1579)诏废，次年停办，改为象山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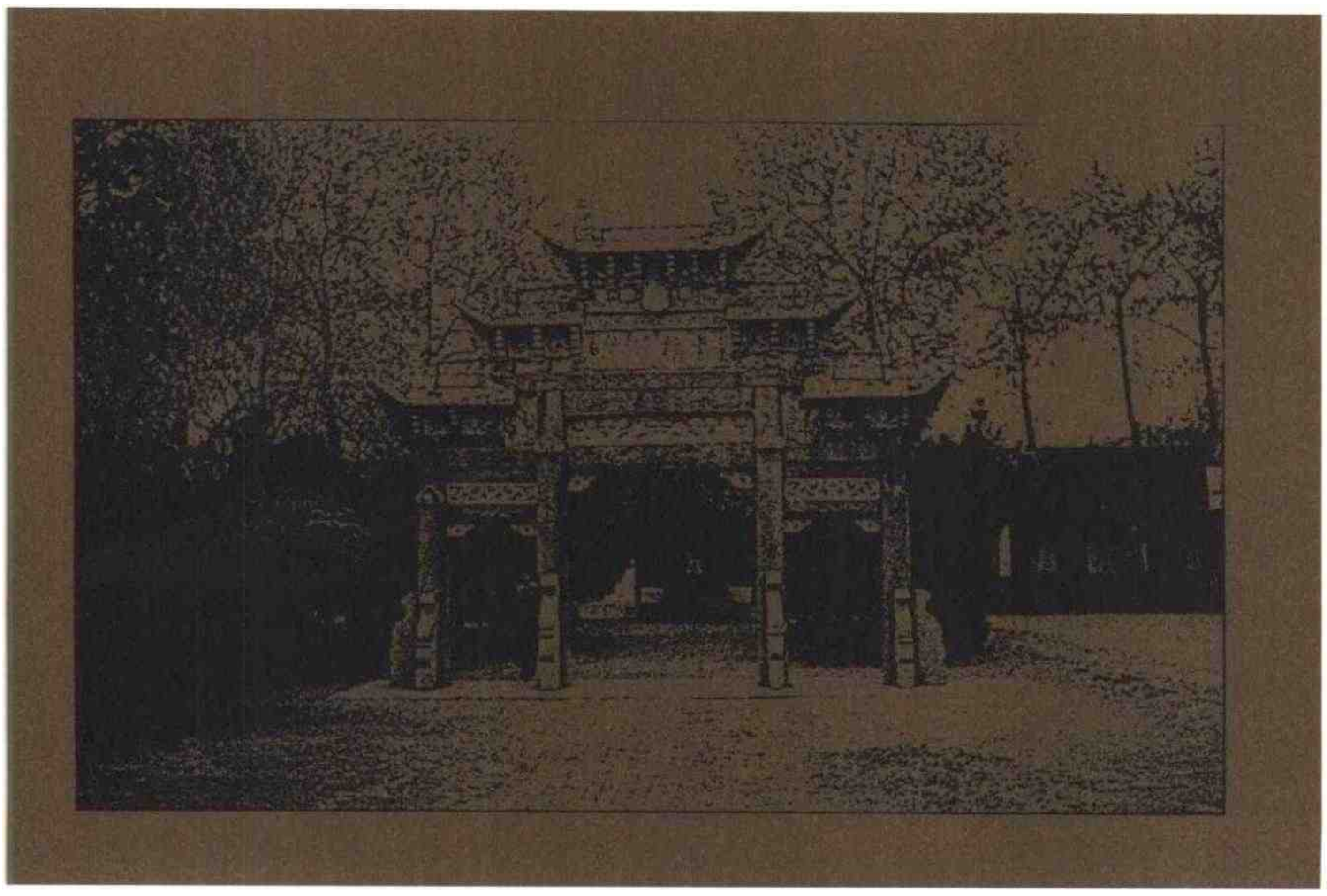
嵩阳书院 金元时已废，“烬于金，砾于元”。明嘉靖八年(1529)由知事侯泰兴复，聘师聚徒，并祠祀二程；至明末又成灰烬。**丽泽书院**亦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重建，以祀朱熹、张栻、吕祖谦，至明末毁于战火。

以上各书院虽条件、规模不一，但基本反映了明代书院兴废的历史情况，包括其祠祀活动的加强、风景环境建设的发展和官学化影响等特征。

明代东林、关中、江右、徽州诸书院，皆以讲会著称，影响甚大，曾成为被毁的主要对象。

东林书院 在江苏无锡东门内，原为北宋理学南传重要代表人物杨时的讲学之地，南宋时曾建杨时祠堂于此；元时废为僧区，建有东林庵。明成化间邵宝建东林书院于南门外保安镇附近，曾兴盛一时，邵出仕后圮废。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罢官归里，与弟允成讲学经上(今无锡张泾镇)，士子纷纷来学，盛况空前。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与高攀龙等倡复东林书院于杨时旧址，得官府及乡里支持，首建道南祠以纪念杨时，再建书院于祠右。“书院坐北朝南，西映惠山，南眺太湖，北近闹市，东临了河。在七前河与了河汇流处建有南北向木桥一座，过桥北行即书院大门，上题东林书院。进大门稍西向北有书院牌坊，额‘观海来游’，背题‘洛闽中枢’，过坊北有水池一方，上济木桥。过桥即书院仪门，入门为丽泽堂，取相互切磋研讨之意。再进为川堂，过川堂即书院讲堂依庸堂，取依乎中庸，讲学辉泽延及后世之意。堂后为燕居庙，专祀孔子。庙左右为楼屋，用以贮放典籍、祭器。依庸堂东西两边建长廊南通大门，廊外均建书舍，以接纳生徒。院内苍松翠柏，古木萧森，茂林修竹，庭花幽草，绿水环绕，岸边垂柳”(朱文杰《无锡东林书院》)。顾、高先后主盟，邀江浙一带学友聚会，并订立《东林会约》，建立了严密的讲会制度，年有大会，月有小会，远近赴会者常达数百人，在“明儒中别为一派”，史称东林学派。其学术与政治结合，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抨击阉党专制，要求改革政治，形成颇有影响的政治中心，被称为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人惨遭阉党迫害，“生者削籍，死者追本”，株连300余人；并强令限期拆毁书院，以致片瓦无存，树木砍伐一空。崇祯即位(1628)昭雪，同时下诏修复书院，次年重建丽泽堂及门墙一座，额东林精舍，但“未能一复其旧”。(图1-5-6~7)

图1-5-6 东林书院石牌坊 现存清代遗构，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中书院 在陕西西安，万历三十七年（1609）为冯从吾讲学创建。冯因遭贬归关中，原与学者周叔远等就西安城东南宝庆寺讲学。寺小不能容，在地方官员支持下，以寺东园圃另建书院。初有"讲堂六楹，匾曰允执，盖取关中"'中'字之意也。左右各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东西房各六楹。堂后假山一座，三峰耸翠，宛然小华岳也。堂前方塘半亩，览亭于中，砌石为桥。偏西南不数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并覆以亭。二门四楹，大门两楹……松风明月，鸟语花香，令人有春风舞雩之意"（《关中书院记》）。冯从吾在此讲学近20年之久，以倡明关学为己任，继承"经世致用"的学风，掀起中兴关学高潮，"四方从学者，至五千余人"，成为关学中兴的阵地；曾订有《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天启五年（1625）阉党魏忠贤毁书院时遭毁，崇祯元年（1628）复建重办，但影响已不及前。

复古书院 在江西福安，为江右王门邹守益倡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先有同门刘邦采在嘉靖五年创惜阴会，以王守仁《惜阴说》为勉。十三年邹守益归里后，先后建复古、连山及复真三书院，为该会馆址；院内建有堂阁、斋舍、庖湢，几榻、器用具备，并置田，供会馔之费；又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时称"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者江西为盛，江西盛者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隆庆六年（1572）增建尊经阁，并祀王守仁、程文德、邹守益三先生。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废书院时，改为三贤祠；随复，并增田，增建二贤祠，祀刘文敏、刘肇兖。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再毁书院，改为勋贤祠。嘉靖、万历时曾两次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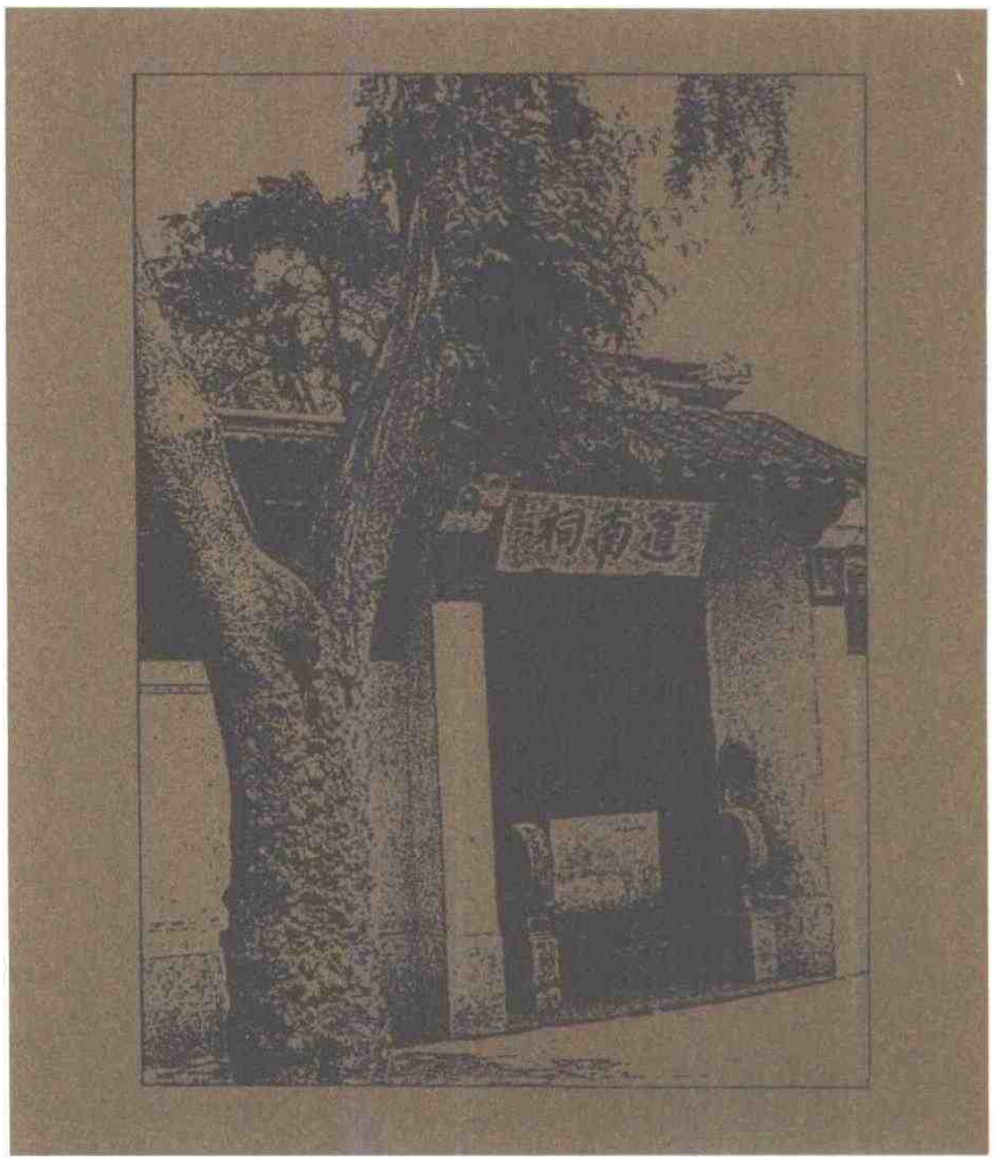


图1-5-7 东林书院道南祠

紫阳书院 在江西婺源，宋属江南东路徽州，为朱熹祖籍。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建文公书院于文庙侧，亦称晦庵书院，以纪念朱熹。至正十二年（1352）毁于战火；明代修复，改名紫阳书院。嘉靖九年（1520）移建于保安山，集多士讲艺，倡身心之学，祀朱熹，配祀蔡元定、黄榦，后以朱熹有专祀，改祀周敦颐、二程。嘉靖四十一年（1552）置田，每季一讲会，邹守益尝订会约。万历张居正废书院时，遭毁，后复，讲学日盛。天启间魏忠贤专权，其党张讷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南北主盟，互相雄长，请赐处分"，遂令将书院变价出卖，知县乞留不允，即改为三贤祠。崇祯时复，至清初毁于战火。

偏远地区书院亦有发展，可见明代书院的普及和建设情况。贵州龙场（今修文）**龙冈书院**为明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建于龙岗山东洞，有讲堂、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招诸夷子弟"就学，东洞岩壁顶曾题有"阳明先生遗爱处"。贵州贵阳**阳明书院**为嘉靖十四年（1535）纪念王守仁讲学贵阳而建。始建于城东白云庵旧址，有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中祀守仁，并置田。嘉靖二十五年改建于宣慰司右。隆庆五年（1571）又迁建于抚署左，前为享堂，祀守仁，后为讲堂，俱六楹，左右房各四楹，外为昭代真儒坊，另有大门、二门等，规模较前扩大。毁于明末战火。云南蒙化（今巍山）**崇正书院**，明弘治十四年建于城西北旧浮图地。院内有讲堂名科第，旁四斋名文学，修行、存忠、存信，堂后观文楼，置书60种，两庑设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左设射圃、启圮。嘉靖八年（1529）修复，建房56间，增武侯祠、尊经阁、八蜡祠等，崇祯间重修，明末毁。云南昆明**五华书院**为明嘉靖三年（1524）巡抚建于南府城西北，二十一年增修，共有房舍172间，为云南最大的书院。万历二年（1574）再修，记称："滇之名儒将自是辈出，而书院将与白鹿、衡岳垂名不朽。"广西桂

林桂林书院明嘉靖三年(1524)建。中为五经会讲堂,分东西两区,分别建有讲堂、号舍,共96间,可容百余人。东区为学易、礼、春秋场所;西区为学诗、书场所。有半门和大门,悬桂林书院额。门外东西各有一牌坊,一题"师圣",一题"友贤"。有湖名"西湖塘",塘东一亭名"浴沂";有水池名"宝贤池",池西一亭名"观莲"。广西南宁**敷文书院**,明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率兵至南宁,在城北县学旧址建院讲学,原有正厅、后厅、东西厢房等。万历十一年(1585)扩建,前有大门、仪门,中为讲堂,两庑各有精舍18间,后为后堂,立王守仁像。明末毁于战火。海南儋县**东坡书院**,宋大学士苏轼谪儋州时,曾与知军张中载酒访黎子云,后人集资建载酒堂于城东门外,以为纪念。明知州修葺,并于堂右建钦师堂,为诸生会文之所,题名东坡书院。甘肃临洮**超然书院**,明嘉靖三十年(1551)建于城东超然台,故名。前屋三楹名"揖见",屋后有池,东屋五楹,中为讲堂名"传习",左右有四勿、三省两斋,堂后道统祠三楹,祀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前代先儒,置田2000亩,次年又建坊三楹。记称:"性蛮而近古之地,乃得沐濂洛关闽鸿儒之事"。宁夏银川**朔方书院**,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于城中。有大门、仪门、休仁堂三楹、号房十二楹、后厅三楹、左右厢房各三楹、膳堂一楹,"春台"一座,为射圃,祠祀孔子,配祀张载及乡先生。体仁堂内东壁揭《白鹿洞教规》及《君子小人义利之说》;西壁揭张栻《西铭》及王守仁《立志》。辽宁沈阳辽左**习武书院**,又名辽阳武书院,为习武的专门书院。明嘉靖六年(1528)巡抚御史王重贤创建,有讲武堂五间、东西号房各十间、观德厅三间、箭楼一座,前有大门三间,门内武弁群英坊一座,题"武俊联辉"。取本科乡试武举习武,得以娴习骑射,精通韬略。嘉靖四十三年(1568)重修,又增建号房10间。

明代虽有官府的抑制或迫害,书院曾一度沉寂,但并未因此而衰落禁绝,相反地更加发展普及,数量远超前代,显示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发展潜力。尤其讲会式书院的发展,更加开放灵活,扩大了社会联系和影响。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建设,促进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专业性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书院教育的新拓展。同时前代书院,尤其是一些著名书院得以恢复,并屡加增修扩建,更加充实完善,建筑和环境的建设,也都有所发展和提高。一些书院开始编纂院志,重观史料的收集整理,形成可贵的传统。

第六节　书院的演变(清)

清代书院进一步普及发展,已分布到相当于今天全国31个省(市),扩展到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台湾等地。据《中国书院辞典·书院名录》统计,清代书院已近4000所,其中300所以上的省份有4个,200所以上的有3个,100所以上的有9个,这还不完全包括前代遗存的书院。同时这一期间书院正处于演变乃至消亡的过程之中,书院本身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由于官府的严格控制,官学化日益加深,以致几同官学,并取代了官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承发展书院讲学和研究传统,或引进西方新学,力图有所变革发展。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复杂政治斗争中,书院终于被近代官办学堂所取代,结束了它的千年历程。

清初朝廷对书院有所戒备，采取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上谕："不准别建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同时，官方颁布《学校禁例十八条》及《训士卧碑文》，不许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禁罚甚严。不过，顺治年间，仍有一些著名书院着手修复，如白鹿洞、岳麓；姚江、东林、紫阳、还古等书院尚保留较盛的讲会活动。顺治十四年(1657)又批准石鼓书院的修复，各地其他书院因之也有所修复，但为数不多。

清承明制，继续采取科举八股取士。仍尊崇程朱理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颁御书"大儒世泽"匾额给福建考亭书院，二十六年又颁"学达性天"匾额给宋儒周、张、二程、邵、朱诸祠及白鹿洞、岳麓两院，六十一年又颁"学宗洙泗"给苏州紫阳书院。然而，雍正元年(1723)却诏令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四年(1726)江西巡抚奏请朝廷派人主教白鹿洞书院，结果"部议不准"，说明清政府对于书院仍有所顾虑。

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书院"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实弊"，转而采取利用、扶持政策，让各省会选定一二所书院，并给银千两，作为重点，确立其全省最高学府地位，面向全省办学。当时确定的省城书院有：直隶保定**莲池书院**、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山西太原**晋阳书院**、河南开封**大梁书院**、江苏上元**钟山书院**、江苏苏州**紫阳书院**、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浙江杭州**敷文书院**、福建福州**鳌峰书院**、湖北武昌**江汉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陕西西安**关中书院**、甘肃兰州**兰山书院**、四川成都**锦江书院**、广东肇庆**端溪书院**、广东广州**粤秀书院**、广西桂林**秀峰书院**、广西桂林**宣成书院**、云南昆明**五华书院**、贵州贵阳**贵山书院**、奉天盛京**沈阳书院**、安徽安庆**敬敷书院**，后又增江苏江宁**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由此，各地书院纷纷兴起，乾嘉时又形成一个建设高潮。随着官府的控制加严，书院官学化日益加深，普遍推行考课制度，定期进行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地方官员出题、监试，课以八股时文；有的书院还增设考棚。山长由地方官员任命，定期考核成绩，有的还派地方官员担任监院，直接监督书院行政管理。而书院供祀更加庞杂，甚至有供奉神灵，请来僧道代管香火。书院选址也不全求山林胜地，风景优美之区，开始落脚城中闹市，以便官府的监督管理。种种现象，反映书院渐失原有特色，成为科举的附庸，而日益空疏腐败，以致"山长以疲癃充数，士子以侬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清续通考》)。

一时，有识之士莫不深恶痛绝，谋求变革。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强调"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教育主张，抨击科举取士和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颜元在康熙三十九年(1696)主持**漳南书院**时，提出其"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原则；并制定了颇具特色的建设规划："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榜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榜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文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皆北向。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但是，颜元也公开申明："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左处傧价，右宿来学。"建设规划中另有"门之左腋房六间，榻行宾；右腋厦六间，容车骑。习讲堂之东北隅为仓库、厨灶；西北隅积柴炭，后为厕。院前门东一斗室，曰更衣亭，凡宾至，通傧、拂洗、更衣、一茶乃入。西为步马射圃，上构小亭"。"院前壑，启土必更深广，引水植莲，中建亭，窗棂四达，吾子居之，讲习暇，元偕诸子，或履桥，或挐舟人，弦歌笑语，作山水乐"(颜元《漳南书院记》)。惜仅四月，因遭水患而颜离去，不再就任，规划亦未能实现。

明末清初，顾炎武倡导以经学代替理学，提出其考据方法，开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

实践的新学风，孕育了由经世致用演变为通经致用，以至纯学术的经学考据倾向。汉学在乾嘉时成为学术界的潮流，又得官方利用扶植而盛，称为乾嘉学派、考据学派。嘉庆五年(1800)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大力改革书院教育，确立其“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的指导思想，在杭州西湖孤山，利用旧有编纂《经籍纂诂》的房屋50间，创设**诂经精舍**，选取高材生入学，不课时文，“专肄经史词赋，一洗旧习”。道光元年(1820)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又创建学海堂于广州粤秀山上，亲自选址策划和制定章程，不设山长，改由八位学长主持，“专勉实学”。二者成为乾嘉汉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基地。它们不祀程朱，而供许慎、郑玄，以显示其尊经崇汉的特点；并大量编辑出版其教学和研究成果，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图1-6-1)。

此后各地竞相效仿，依次出现有：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1831)，后独立为校经书院、桂林的**榕湖经舍**(经古书院，1834)、南京的**惜阴书舍**(借阴书院，1838)、南昌的**经训书院**(1840)、上海的**龙门书院**(1865)、广州的**菊坡精舍**(1867)、武汉的**经心书院**(1869)、福建的**致用堂**(1871，后改书院)、上海的**诂经精舍**(1871)、成都的**尊经书院**(1874)、江阴的**南菁书院**(1882)、太原的**令德堂**(1882，后改书院)、广州的**广雅书院**(1887)、武汉的**两湖书院**(1891)等。这些书院，无论名目，一般专攻经史，讲求实学，教学有所拓展，有的则汉宋兼容，或兼及举业(图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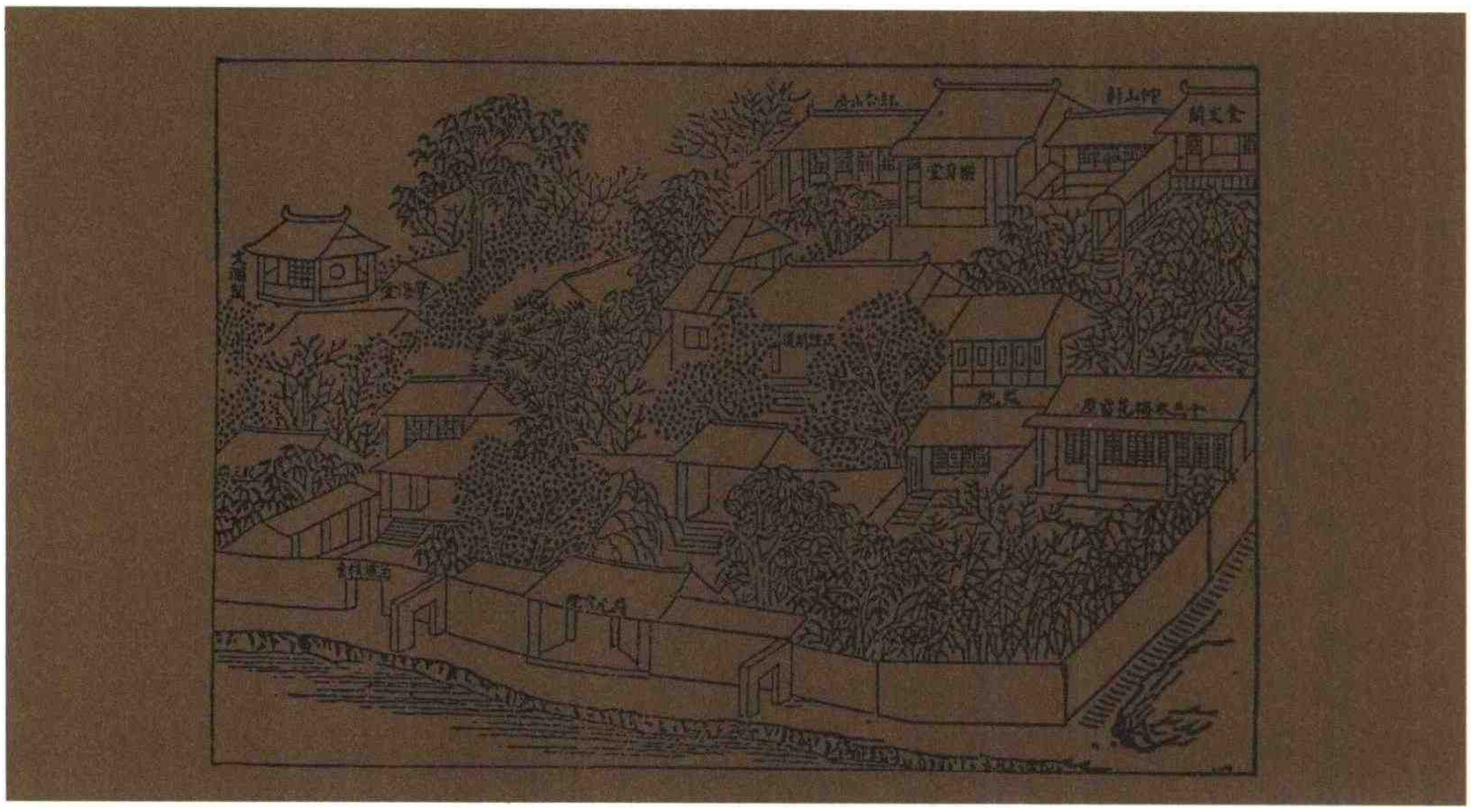


图1-6-1 学海堂·菊坡精舍·应文书院（图载《广东书院制度》）在广东广州粤秀山。学海堂 创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办学80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废，改为阮太傅祠。菊坡精舍 创于清同治六年(1867)，就长春仙观改建而成，不设斋舍，仿学海堂章程。清末停办。后与应元书院合并，办学堂、学校。应元书院 清同治八年(1869)就山麓应元宫创建。清末与菊坡合并为学堂。后改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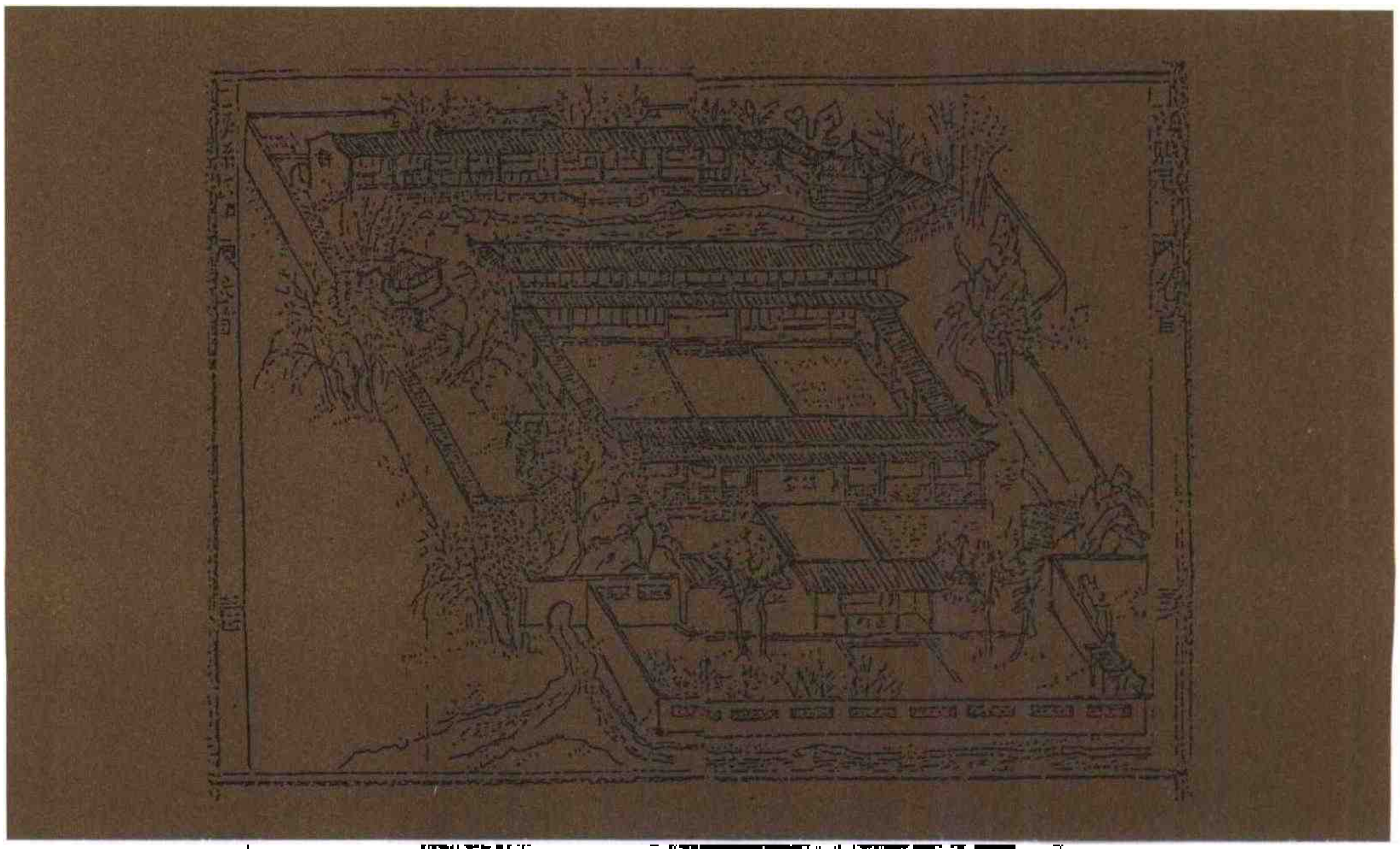


图1-6-2 龙门书院（图载清代《上海县志》）在上海。清同治四年(1865)苏松太兵备丁日昌借蕊珠书院湛华堂创建，六年(1867)就吾园废址建院，规制始备。宗旨以躬行为本，以专经为业，以先儒语录为入门之要；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旁通时务，辅以文辞，兼及举业。初院规甚严，后渐弛废。清末改师范学堂。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腐败，教育的落后。随着开埠通商、建立租界、教会办学以及西法科技文化传入，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崛起，设厂、办学，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电信学堂、武备学堂等先后建立，并派人出国留学。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出现中西合办的格致书院，讲习西方自然科学为主，以“令中国人明晓西洋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为宗旨，设讲堂、藏书楼及博物馆，收藏西方各国生产的机器、日用生活品、地图等。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面临亡国危机，更激起士人愤慨，要求变法图强，改革教育。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改革教学，“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宣传西方民权、平等思想，大造改良政治的舆论，使湘省学风为之一变，不少书院受其影响，改变章程，兼习西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接受维新变法主张，下诏定国是，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会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修改科举章程，改八股为策论试士。但，八月慈禧复出，罢一切新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一切复旧。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次年慈禧被迫变法，实行“新政”，复命各省城及所属府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随后各地书院陆续改制，建立学堂，至此书院制度终结。

省城书院的建设和演变，可见清代书院的一般情况。

长沙岳麓书院　在崇祯十六年（1643）明亡时毁于战火。清顺治九年（1652）由巡抚聘任山长，恢复办学，并立请颁《卧碑》于明伦堂，反映当时官府的控制加严。康熙七年（1665）巡抚周召南主持大修，建文庙、成德堂、静一堂、崇道祠、六君子堂、四箴亭、拟兰亭、汲泉亭等，“缭以垣，凡二里许”，基本恢复旧有规模。康熙十三年（1671）吴三桂变乱遭破坏，二十三年（1681）巡抚丁思礼率部捐修，二十六年（1684）请得“学达性天”匾及内府图书，因此重建御书楼，并增建文昌阁，随后又于院外增建自卑亭、道乡祠等。雍正十一年（1733）被列为省城书院之一，拨款重修，全省招生。乾隆二年（1737）再次给银千两重修书院，九年（1744）赐“道南正脉”匾，“来学不下数百”。此后修建更加频繁，增建斋舍，创建监院，派遣官员兼管监督。乾嘉间山长罗典，主院27年，捐其所得薪俸，致力于书院建设，曾辟院外“书院八景”，先后增建西亭（后名风雩亭）、东亭（后名吹香亭）、前亭（又名前台、后名赫曦台）、爱晚亭、魁星楼、三闾大夫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等。其后又有罗典的门人欧阳厚均，亦主院27年，继承师志，捐资修建不断；又创濂溪祠、崇圣祠、岳神庙，改建半学斋，重建杉庵、山斋、抱黄阁等古迹。道光十三年（1833）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创设湘水校经堂于书院，不课时文，专攻经史，开辟经学基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之役，院舍和藏书被毁，次年山长丁善庆率诸生捐献，陆续修复，并充实藏书。同治七年（1868），巡抚刘崑大规模重修，“因旧制而复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费钱六万缗有奇”。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维新思潮影响下，院长王先谦改革课程，增设算学、译学等新学课程，但后又反对时务学堂，成为与维新思想斗争的守旧堡垒。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实行“新政”中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东西斋舍悉改新式”办公及教学用房，其他仍旧不变。民国时先后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成立湖南大学。书院作为古迹始终保存校园之内，1956年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以来经全面整修完善，对外开放，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6-3）。



1-6-3　岳麓书院（图载清康熙版《岳麓志》）反映清代初期状况

长沙城南书院 原由张栻父子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曾有"城南十景"之胜，后为高峰寺所据。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曾复厅堂五间于寺下，万历六年（1578）又废。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倡修，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乾隆十年（1745）乃就南门内天心阁下都司旧署改建，仍名"城南"；有礼殿、讲堂和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并增建御书楼于东南隅，共84间，藏书数千卷。但因"其地近市嚣尘，且邻县治，胥狯猥杂形接影构，习染趋尚不风而靡"，道光二年（1822）遂迁返妙高峰旧址重建，以"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为"藏修息游，砥砺文行"创造条件；并就"十景举其六"，建山长居、监院署、文星楼、南轩祠、六斋等共120间，增书万余卷；亦通省招生，额同岳麓，道光帝赐"丽泽风长"匾。后屡有修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中路师范学校。民国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办学至今，尚存文庙遗构（图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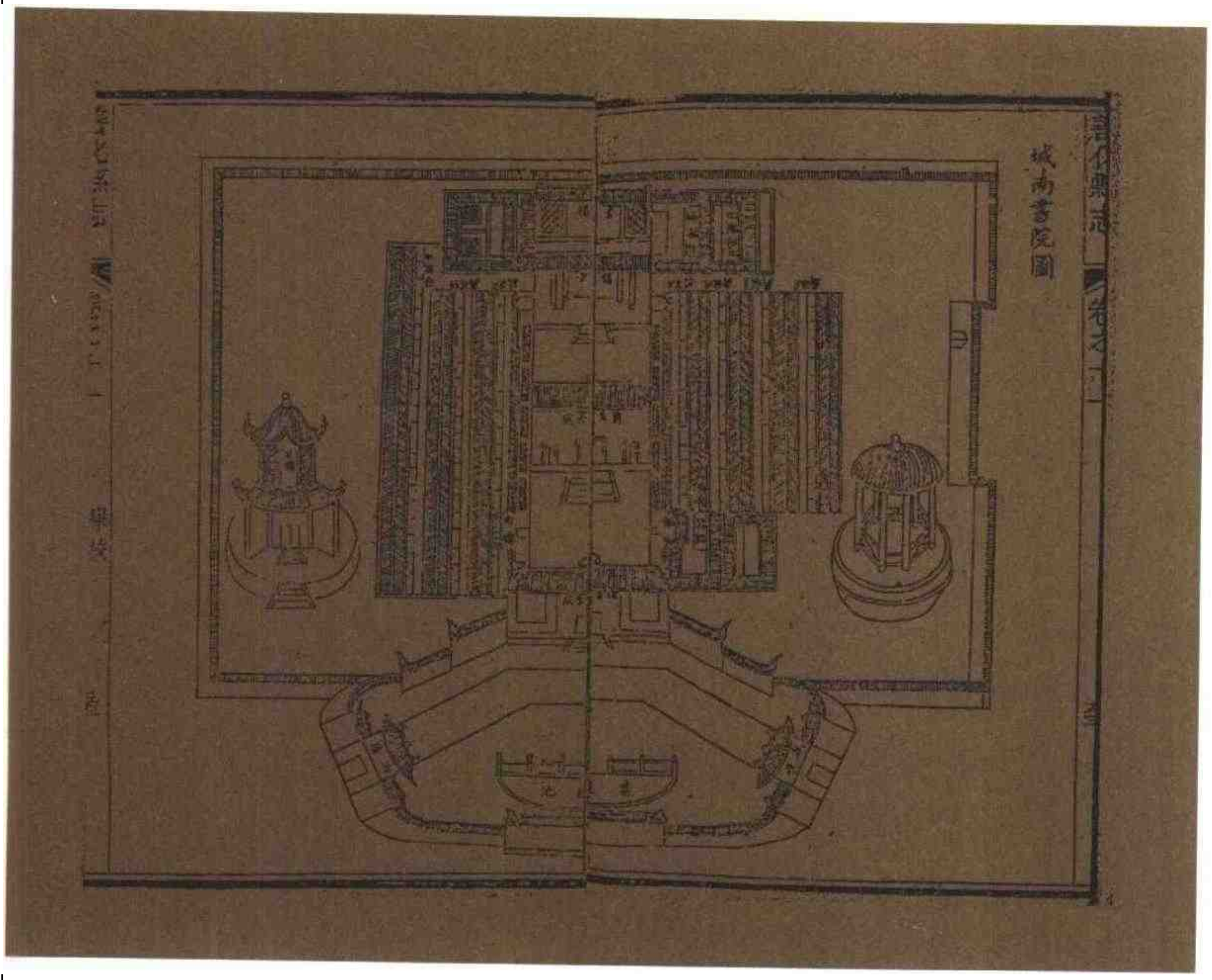


图1-6-4 城南书院（图载清《善化县志》） 反映迁回妙高峰原址重建状况

桂林宣成书院 南宋景定三年（1262）由广西经略朱禩孙建于桂林城区西南，以纪念张栻、吕祖谦，并请得理宗赐额。后毁于战火。元贞元二年（1296）重建。明初改为县学，正统五年（1444）又于县学西重建，弘治十七年（1504）再迁于府学和县学之间，曾成为桂林"四大书院"之一，生徒达二百人，曾聘有经师五名，讲论五经异同。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再迁于城西南钱伯花园故址，改名"华掌"。雍正二年（1724）复旧名，十一年扩建为省城书院，全省招生，课以时艺。同治十年（1871）重修，颁"道德陶钧"匾；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制时裁撤，三十一年（1905）改初等小学堂。民国沿办小学，后废。



图1-6-5 豫章书院（图载清康熙版《西江志》） 反映清代前期状况

南昌豫章书院 始建于南宋，但久废无考。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抚马可龙就明都督刘鍵故宅扩建书院，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生员俊秀者入学，五十八年（1719）得御赐"章水之渊"匾。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光绪八年（1882）附设孝廉书院，亦称孝廉堂，选举人入学，清末改制为江西大学堂。今仍办中学（图1-6-5）。

开封大梁书院 创于明天顺五年（1461）城南薰门内蔡河北岸，原名"丽泽"。成化二十年（1484）迁于丽景门外繁台东，祀二程，更名二程书院。天启二年（1622）重建，有讲堂、会文堂、二程堂、高明楼、号舍及坊表、门屏、石桥、八角亭、碧玉泉等。崇祯十五年（1642）毁于洪水。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佟凤彩改建于城西北隅天波楼旧址，有大门、仪门、正堂堂后书楼、左右斋舍共百余间。二十八年（1689）重修，扩大殿堂门庑，祀名臣先贤115人，"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寄迹于斯"，"皆于大梁有光"，使"缙绅知所则效，子弟知所尊崇"。其教学"以六经为根底，以程朱为绳尺"。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迁于城西南隅州桥西，五十八年（1719）得御书"两河文教"

匾，时张沐、耿介等主讲。雍正八年（1734）积水倾圮，十一年重修，定为省城书院。乾隆二年（1737）祀河南先贤二程、孙奇逢、耿介等 45 人于讲堂，刊刻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及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于课斋，提倡理学。道光初得御书“正学渊源”匾。道光十六年（1836）钱仪吉主讲义理考据之学。光绪十八年（1892）整顿书院，增设辨志斋，选优秀之士肄业。次年扩建明道书院，作为分院，略仿学海堂制，所学多为“性理经史时务之学”。书院曾建有立雪轩、讲易堂、春风堂、论学斋、性道斋、经济斋、道统祠等，藏书甚丰，并刻图书，曾存书板 12 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校士馆，三十一年（1905）改为尊经学堂。

杭州敷文书院　明弘治十一年（1498）就凤凰山万松岭报恩寺故基创建，故名“万松”。规模略如学宫，中有仰圣门、大成殿、明道堂、毓秀宫、飞跃轩，右有居仁斋、颜乐亭，左有由义斋、曾唯亭。祭田祭器齐备，为他院所不及。教学以明五伦为宗旨，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增廊房 6 间。嘉靖四年（1525）扩建斋舍为 36 楹；三十三年（1554）重建明伦堂、翼居仁、由义二斋。万历五年（1577）建继道堂、翼穷理、居敬二斋，增祀周、二程、张、朱五子。八年（1580）魏忠贤毁天下书院，奏以“祀先圣”得免。清初重建，康熙十年（1671）改名“太和”，五十五年（1726）重修，得御书“浙水敷文”匾，遂改名“敷文”，并增建存诚阁藏书。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又赐书题诗，“名盛一时”。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战火。同治五年（1866）重建，后屡修。光绪十八年（1892）以院址偏僻，迁城东葵巷沈宅改建，称“敷文讲学之庐”。原万松岭旧址作为古迹留存（图 1－6－6～7）。

昆明五华书院　明嘉靖三年（1524）巡抚王启建于南府城西北，《记》称：“滇之名儒将自是辈出，而书院将与白鹿、衡岳垂名不朽”。三十一年（1552）增建房屋达 172 间，为云南最大书院。明末毁。清雍正九年（1731）迁建五华山麓，额“西林学舍”，门内古柏森森，中一甬道，两旁斋舍，中为讲堂，后为藏书楼，置书万卷。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十三年（1735）扩建，增置书舍达百余区。嘉庆十七年（1812）增设字课。道光元年（1821）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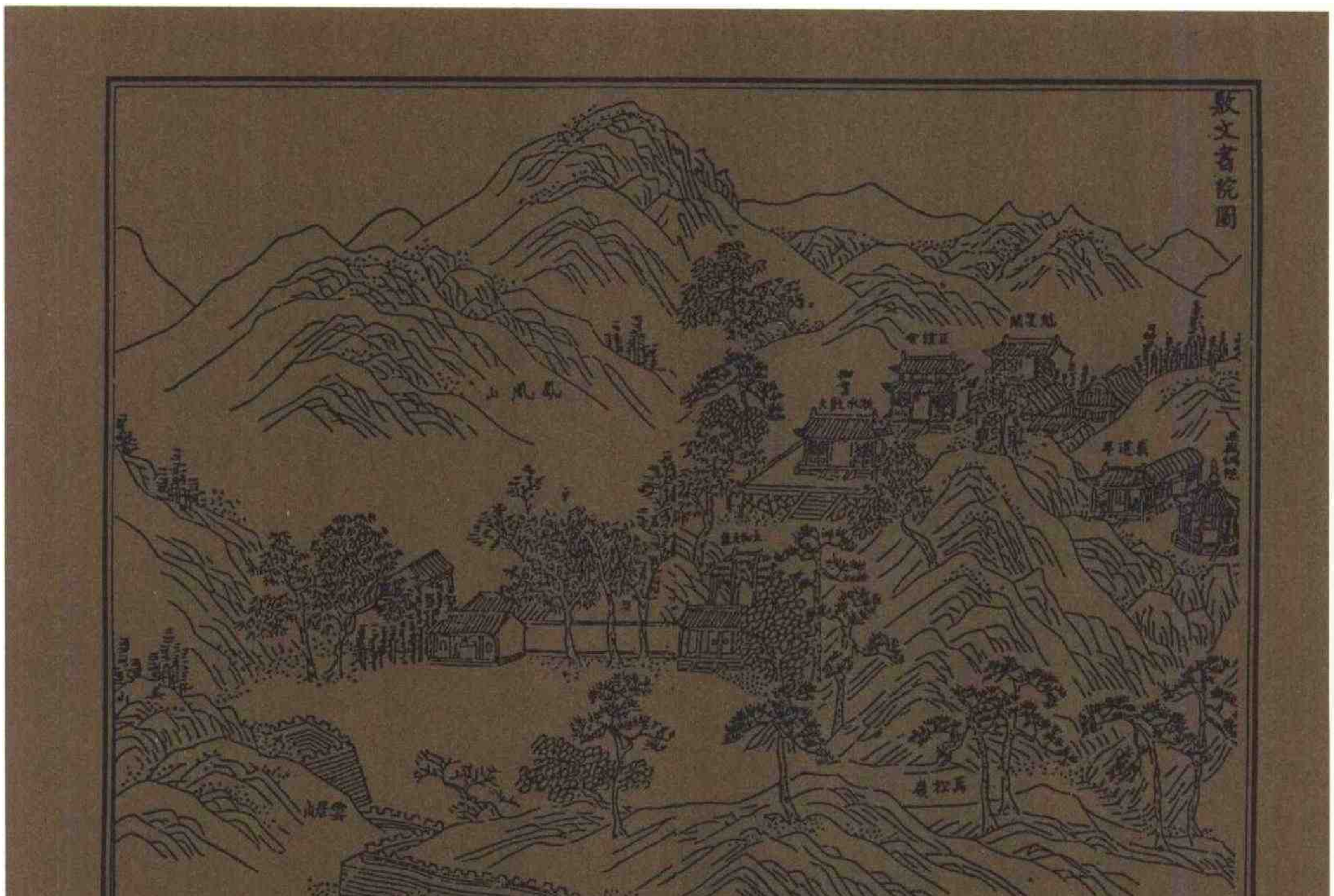


图 1－6－6　敷文书院（图载清雍正版《浙江通志》）反映清代前期状况



图1-6-7 敷文书院(图载清光绪版《杭州府志》)反映清代后期状况

书舍。咸丰六年(1856)藏书楼被毁,随后重建,恢复旧观。同治二年(1883)书楼再毁于兵火,后又重建增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云南高等学堂。

贵阳贵山书院 明嘉靖十四年(1538)王门弟子为纪念王守仁讲学贵阳,创建于城东白云庵旧址。原名"阳明书院",有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中祀阳明。二十五年(1549)改建于宣慰司学右,隆庆五年(1571)又迁建于抚署左;前有享堂祀王、后为讲堂,皆六楹,左右房各四楹,外为"昭代真儒"坊,及大门、二门等。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二年(1672)重建,置书数千卷。二十一年(1671)增修,易名山斗堂为后觉堂,置前后两庑12楹。二十八年(1678)再修,建合一亭、传习轩。三十一年(1675)增修斋舍。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增建学舍50间,改名"贵山"。乾嘉时屡有扩建,计头门三间、左书办房三间、右监院所3间;内门西"神宫"三间,内房五间、客房三间、厢房一间、二门三间、内讲堂三间、堂左五斋,额"居敬"、"尊闻"、"尝奇"、"晰疑"各十间、"聚学"五间;堂右五斋,"立诚"、"知行"各十间、"问辨"五间、"集思"、"广益"各六间,堂后山长内房、厨房、役房等;斋内有尹公祠三间,祀汉儒乡贤尹珍,阳明祠三间祀王守仁。光绪初增建奎阁,二十四年(1898)废,二十八年(1902)改贵州大学堂,宣统元年(1909)改矿业学堂,后废。

肇庆端溪书院 明万历元年(1572)建于署东,后废。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复建于县学西,名天章书院,为总督课士之所,选招两广之士肄业;前为讲堂,堂名天章阁,又名拨天阁,中为宣教堂,堂后偏东为莲池,池后为近光亭,东西为斋舍。雍正十年(1732)修,并奉旨拨银千两,发商生息供生徒膏火。乾隆初改名"端溪",列为省城书院;十七年(1753)全祖望任山长,贯彻通经致用为宗旨,订立学约,学风为之一变。二十二年(1758)添建后楼,祀先贤,并建亭池,修葺两廊斋舍,其后屡有修葺。光绪十三年(1887)总督张之洞重修,大堂名大德堂,讲堂为教忠堂,改尊经阁为景贤阁,阁下为全祖望祠,祠东为更衣所,西为祭器所,东西斋舍32间、监院1间、书库1间,藏书563部9482册;并设刻书局,发刊《端溪丛书》20种。所定课程首重群经,次及诸史、理学,而不限于科举制艺,成就人才

较多。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府中学(图 1－6－8)。

武昌江汉书院 明万历间创建于文昌门内，为武昌府书院。清顺治间移建于忠孝门内，后圮。康熙三十九年(1700)修复。雍正十一年(1733)扩建为省城书院，全省招生。乾隆九年(1744)拓地建楼房号舍数十间及十贤祠、德教堂。咸丰初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重建，自前门至道南堂后，东壁监院厅，置斋房 40 间，西园客厅后建大小住房 13 间；四年(1865)建圣殿及月池，增置斋房 40 间。八年(1869)总督李鸿章又建文昌阁、奎星楼，增修花厅大小房舍约 30 余间；教学以“勤习经学，讲明圣道”为宗旨，初额 60 名，后增为 240 名。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张之洞筹建师范学堂，分六堂，甲、乙两堂设此，书院遂废。

西安关中书院 明万历三十七年 (1609) 为冯从吾讲学创建，成为“关学中兴”阵地。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毁书院时遭毁，崇祯元年(1628)复建。清康熙三年(1664)扩建，有牌坊一座，大门一楹，东设东厢为主讲寓所，西设西厢，北竖小坊及二门、三门各三楹，中建精一堂五楹，置道统祠祀黄帝、炎帝，左右堂祀正学、理学名臣。聘李颙(二曲)主讲，订立《关中书院会约》及《关中书院课程》，倡明关学，重开绝响多年的讲会。雍正十一年 (1733) 列为省城书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 赐御书“秦川浴德”匾；三十六年 (1770) 巡抚毕沅重修，聘经师主讲。同治十二年(1873)整顿书院，订《书院课程》五则：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光绪七年(1881)设志学斋于院东；二十九年(1903)改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后改师范学校。今为西安第五中学，仍留有遗构 (图 1－6－9)。

安庆敬敷书院 清顺治九年 (1652) 巡抚李日凡 (号培源) 创建于府学东魁星楼址，初名“培原”；有正门、礼让堂(讲堂)、经正阁(书楼)、东西六斋、崇儒祠(祀宋五子)；祠后屋两楹为培原先生讲学处。后屡有修建，月有课，日有讲，择优刊印《书院会艺》。康熙四十八年(1700)重修，更名“修水”，旋复名“培原”。雍正十一年 (1733) 列为省城书院，增建碑亭、学舍，置学田。乾隆初改名“敬敷”，后增学额，又有捐修。咸丰三年 (1853) 毁于战火；同治初总督曾国藩移建于近圣街后冈。光绪元年 (1875) 扩建，可容百数十人；二十四年 (1898) 移建集贤门百子桥，改为武备学堂；二十七年 (1901) 改高等学堂。后几经变迁，改为安徽大学。今为安徽师范学院。

成都锦江书院 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就汉文翁石室旧址创建，“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客之位，为东西号舍”，以“继石室之流风”；全府招生，教学“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康熙六十年(1721)扩建，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再次扩建，添置田产。嘉庆十九年(1814)重建石室于讲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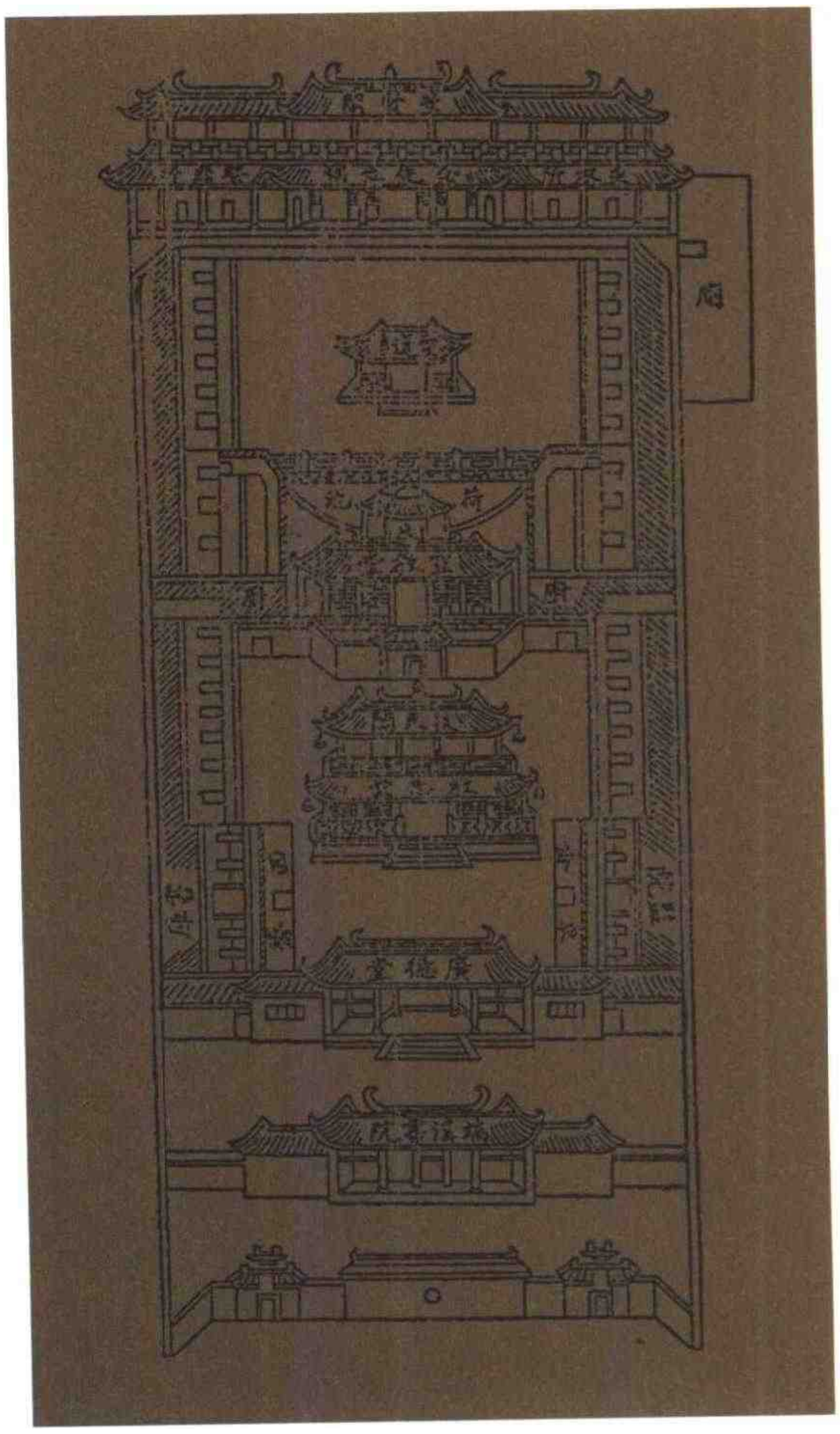


图 1－6－8 端溪书院（图载《广东书院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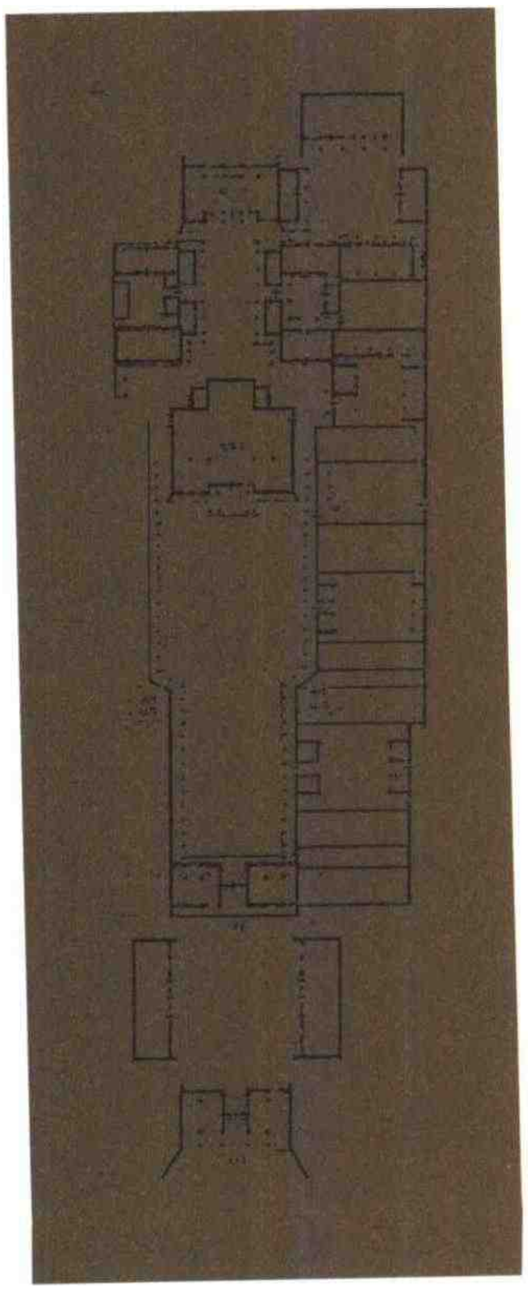


图 1－6－9 关中书院（图载《陕西古建筑》）为现存遗构平面图

以存古迹；二十四年(1819)订《锦江书院条规》，进行整顿，加强管理，随后扩大招生。咸丰时生徒已逾200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尊经书院合并。旋改为四川通省高等学堂。

福州鳌峰书院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巡抚张伯行改建九仙山(今于山)一尼庵而成。内有正谊堂等学舍120间；后院荷池数亩，上建鉴亭，池旁假山石洞、松杉梅柳；学舍在其左，有藏书楼，康熙五十五年(1716)赐"三山养秀"匾及经书。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乾隆三年(1738)赐"澜清学海"匾。后屡有修建，规制大增，增有三十三子祠、奎光祠、五子祠、三贤五先生祠、张公祠等。道光二年(1822)建考棚于崇德斋旧址，可容400人，为福州清代四大书院之一。光绪末改校士馆。后改政法学堂，再后为师范学校附小校址(图1-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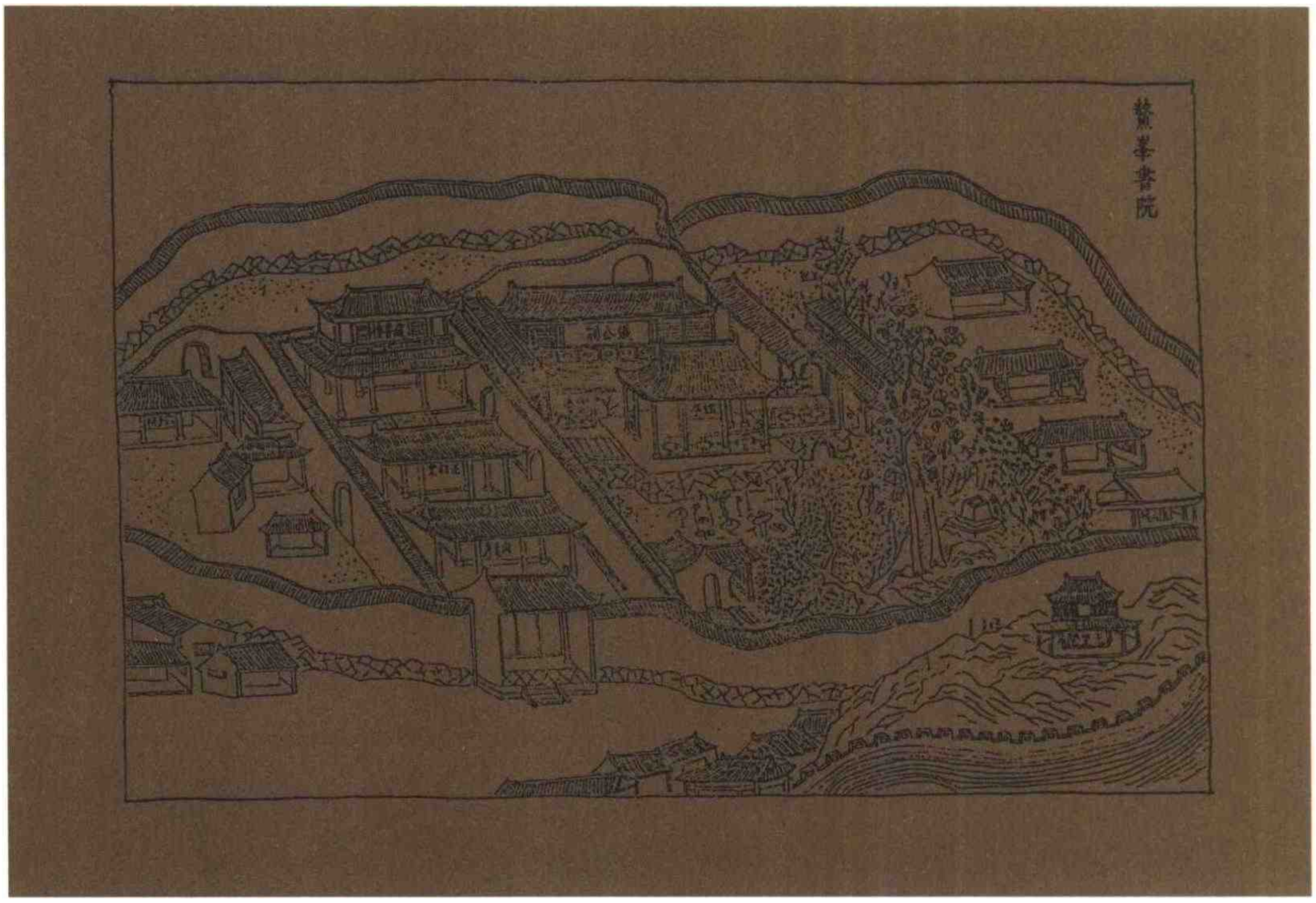


图1-6-10 鳌峰书院(图载清乾隆版《福建通志》)反映乾隆时状况

广州粤秀书院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总督赵宏灿等捐建，专课时文。有院舍四进，前大门、二进大堂、三进讲堂、后进御书楼，两厢东西斋各一间；另左侧堂室34间、正监院室1间、福德祠1间，右侧堂室41间、先贤堂1座、书楼1座、副监院室1间。雍正八年(1730)重修，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给银千两，生息供膏火，全省招生。后屡有修建，为广东省四大书院之一。嘉庆四年(1799)陈昌齐任山长，"以文道结合，义理训诂并重"，十四年(1809)督抚制订规条，"以敦实学，屏去浮华"为宗旨。道光二十七年(1847)编修《粤秀书院志》。绪二十九年(1903)改两广学务处，三十一年(1905)改两广游学预备科馆，三十三年(1907)改两广方言学堂。

苏州紫阳书院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抚都御史张伯行建于府学之内尊经阁后；崇祀朱熹，得御书"学道不淳"匾。雍正二年(1724)江苏布政使鄂尔泰扩建，建春风亭，政暇亲与倡和。"征七郡之士绘诵其中"，学风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曾汇刻《南邦黎献集》。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扩建，列为省城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十六年(1751)得御书"白鹿遗规"匾，并御制"紫阳书院诗"。道光二年(1822)重修；咸丰十年(1860)毁于战火。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奏颁御书"通经致用"匾。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课经典策论。曾多有著名学者主教，盛时生徒达千人以上。

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 清雍正元年（1723）江宁总督查弼纳倡建，选通省士子肄业，得世宗御书“敦崇实学”匾；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拨款加修、置田。乾隆元年（1736）刻石《白鹿洞规条》及《分年读书法》于讲堂，并订立书院规约，后续订《规条》、《条约》；生徒曾达数百人，无论省内外士子均可入学。钱大昕曾掌教4年，教“以通经读史为先”。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先后掌教主讲20余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终老钟山，“以古文义法教学”，门弟子知名甚众。道光九年（1829）布政使贺长龄筹款扩建斋舍，并为《书院课艺集》作序。咸丰时毁于战火；同治年间曾国藩借地重开，“堂庑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绪七年（1881）总督刘坤一“乃规旧址廓而新之”。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桂林秀峰书院 清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各省建省城书院时，创建于城东叠彩山与独秀峰之间，故名。建有讲堂五间、书厅五间、东西学舍各十五间；曾定学额正课五十名、额外正课十五名，附课不限。嘉庆五年（1780）扩建寝室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并立汉代司空南阁祭酒陈元牌位于书厅，以纪念其研究《左传春秋》之功绩。同治十年（1871）重修，奏颁“书岩津逮”匾。光绪四年（1878）增广学舍；十六年（1890）于书院西斋设桂垣书局，广征图书，“镌古善本”，分藏各地书院；十九年（1893）增设逊业堂，招选“郡邑士之异等者60人”，专治经史；二十八年（1902）改为育士馆；二十四年（1898）改广西法政学堂。现址为广西师大一部分。

太原晋阳书院 太原原有三立书院，创建年代不详。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巡抚魏允贞拓址增盖馆舍，祀晋古圣哲，改名三立祠，取立言、立德、立功之意；三十九年（1611）因建考棚移祠于深处。明末倾废。清顺治十七年（1660）巡抚白如梅移建三立祠于府治东南侯家巷，另立三立书院于太原府北门。雍正十一年（1733）改名晋阳书院，定为省城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以北门嚣杂，迁书院于三立祠；十八年（1753）就祠东北隙地构堂庑，祀前明殉节巡抚蔡懋德；二十九年（1764）辟讲堂东隙地建学舍40间，增奎星阁于中央。道光时主要建筑有大门五间、讲堂五间、堂后三立阁五间、阁东北蔡公祠、另学舍若干间。山长中多恪守朱学的理学家，因此成为程朱理学的阵地；但因官府的控制，而日益转向重考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并入山西大学堂。

济南泺源书院 清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建设省城书院，遂将都指挥使司旧址改建而成；有讲堂、斋舍、厨浴器用俱备。乾隆六年（1741）增修，十六年（1751）巡抚准泰讲学其中，制订《训课条规》；二十六年（1761）增建朱子祠。嘉庆九年（1804）巡抚铁保重修，再订训课规条。书院经费充裕，藏书丰富，斋舍宽敞，成为清代山东最大的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奏准改为山东高等学堂；二十九年（1903）改为全省师范学堂。

保定莲池书院 又名直隶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遵旨创建省城书院于古莲花池，故名。该地“清碧绝尘，林泉幽邃，楼台亭榭，云物苍然”，有“城市蓬莱”之称。书院大门、甬道折行地北，南向听事堂，后精舍便室，东西廊庑、大小庙房若干间；莲池东南红枣城一带为书院南园，建厅堂五间、精舍三间及凉亭，“小山丛树，竹篱松牖，参错其间”。经改建后共有“门三、斋四、左右庑八、魁阁一、廊五、平台一、亭二、楼一、小屋四十余区、池二、桥一”。乾隆十年（1745）将书院南园改为行宫绛堂，筑墙隔离。乾隆帝曾三次临院视察，赐“绪式濂溪”匾悬万卷楼，并赋诗勉励师生。道光初总督那彦成将家藏历代名人字迹摹刻38方，嵌书院南楼。道光十二年（1833）一度被行署所占，至咸丰末始得恢复。光绪四年（1878）扩建，奏准将莲花池及万卷楼拨归书院，并增筑慎学斋、存古堂及院舍24间，购置各省图书33719卷，并设官书局，师生参与编纂《畿辅通志》，藏书版万块。其时彭年再主院，倡经世致用，以义理、考据、辞章训士，并订立学规。光绪九至十五年间（1883～1889），张裕钊主院，以经史诗文训士，尤长书法，曾有日本留学生从其学习书法，归日传其书法，成日一流派。十五年至十九年间（1889～1894）吴汝纶主院，反对“墨守旧术”，主张废八股时文，设博

物、格致、机械学科，要求"必须精通外语"，开日语、英语课程，聘日、英教师任教。光绪三十年(1904)改校士馆，曾设英文、日文、伦理、史地、物理、化学、体育、音乐等课。不久改为文学馆，三十四年(1908)停办。后改设小学。今辟为公园。(图1－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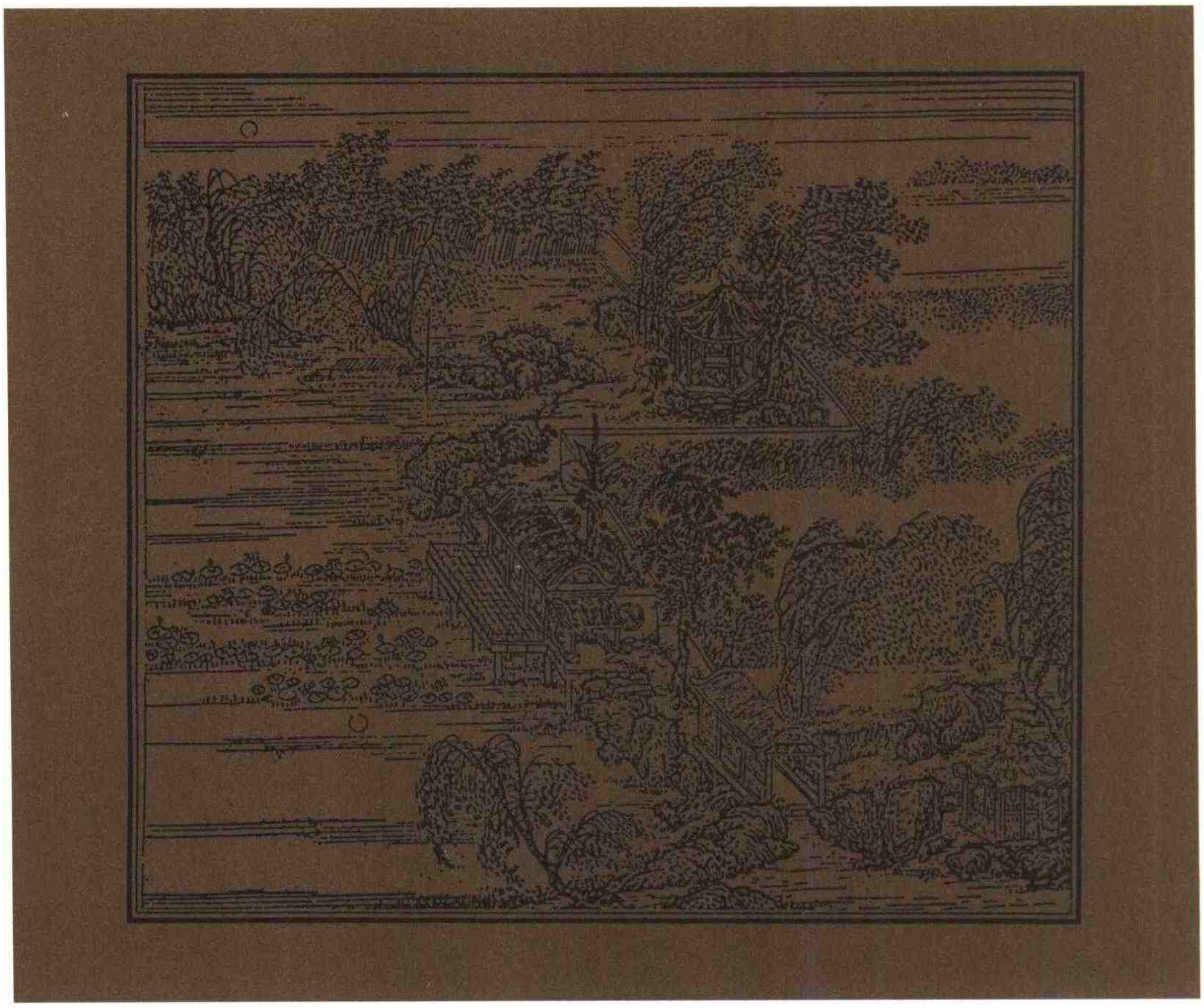


图1－6－11　莲池书院园林（图载清乾隆版《莲池书院图咏》），为园林一景。

兰州兰山书院　清雍正十三年(1735)巡抚许容始就红花园地建为省城书院，全省招生，生徒常达三四百人。自后历任总督屡有修建。道光三十年(1850)曾订条规，分正课、附课、外课生，均按成绩升降，膏火亦按成绩发给。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优级师范学堂。今为市三中校址。

沈阳沈阳书院　清乾隆元年(1736)将工部侍郎李承绍所建义学改为沈阳书院；七年(1743)拓基扩建讲堂、斋舍，定为省城书院。二十七年(1763)又将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但已废的萃升书院旧额榜于仪门，因此又称沈阳萃升书院，或萃升书院。"各州县优秀学子纷至就学"。三十一年府丞奏请借帑营息供膏火，定额二十四名。道光间邑绅捐巨资，增建文昌阁、孝子祠、节妇祠等。光绪十四年(1888)订立院章，十七年(1891)重加考定；二十四年(1898)聘尚贤主院，李维世主讲，"宏讲风流极一时之盛"；二十七年(1901)改校士馆，不久毁于沙俄侵略军。1928年张学良应学者建议，捐资重建，自任院长，于省吾任教务长。聘著名学者讲授经史之学。"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解散。

以上各书院由于历史和地方的条件不同，存在教学传统和规模、体制的差别。由于受到官方的控制和社会思潮的影响，逐渐有所变化，这些书院最终多为学堂、学校所取代，成为近代地方的主要教育基地。

清代书院在官府支持下，更加普及城乡，一些边远省份、少数民族地区，也较普遍发展。如：(图1－6－1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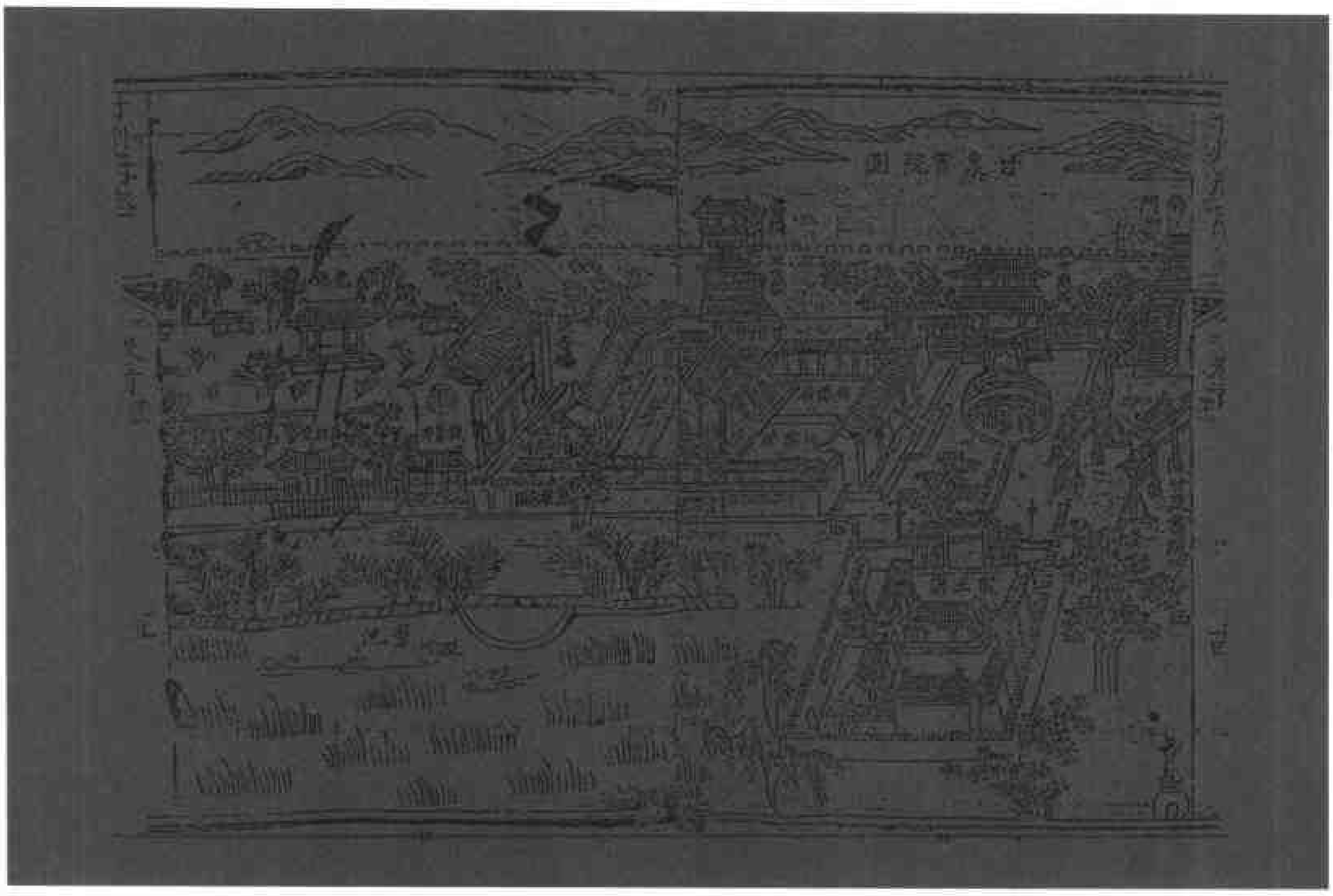


图 1-6-12　甘泉书院（图载清乾隆版《甘州府志》） 在甘肃张掖。清乾隆三十四年（1759）创建于南门内东街，临甘泉，故名。占地东西长 90 余丈，南北阔 8 丈 5 尺，规模较大。后续有扩建增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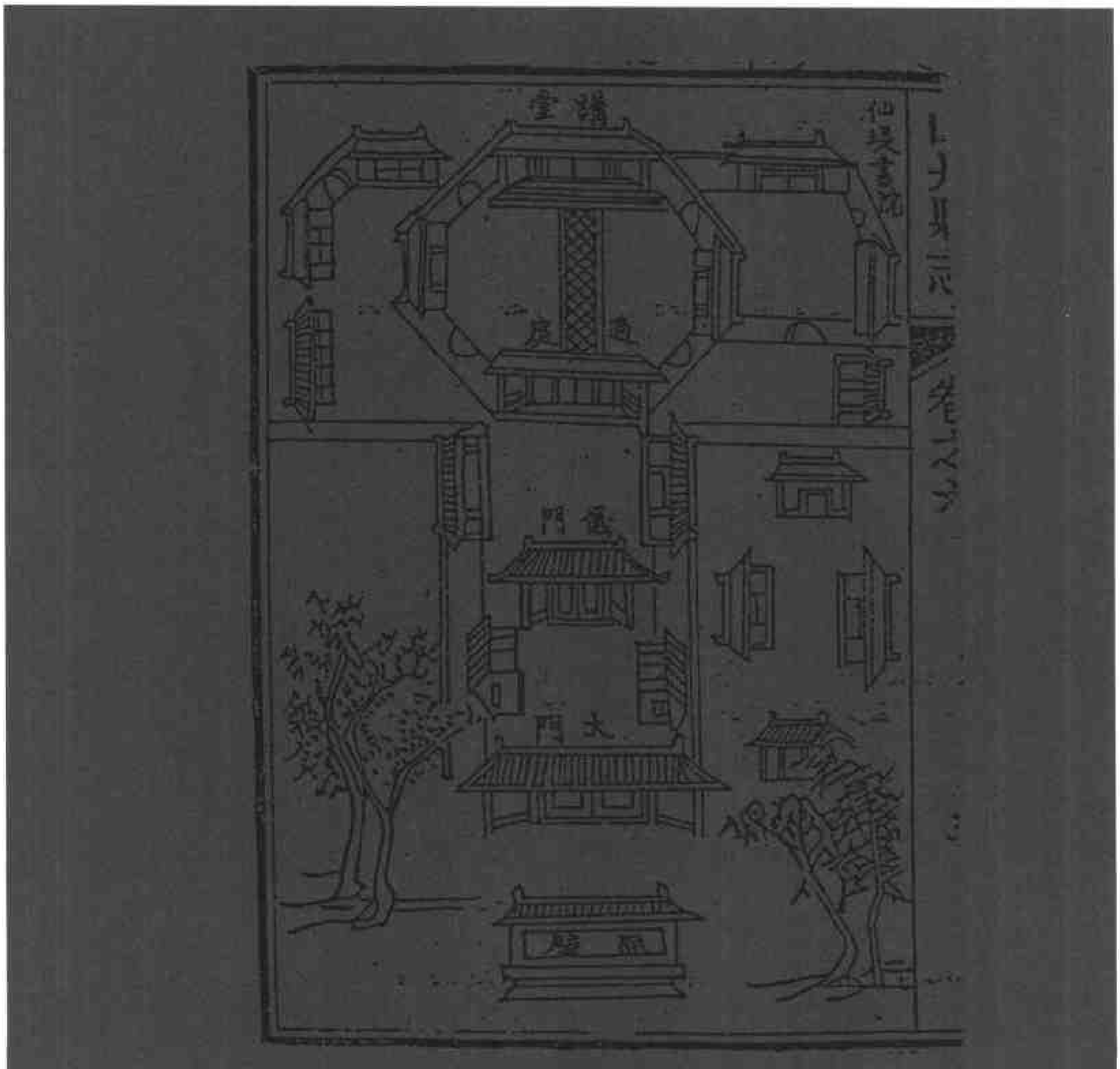


图 1-6-13　仙堤书院（图载清《山丹县志》） 在甘肃山丹。清乾隆间建，后部呈八角形庭院，较为特殊。后屡修。

图 1-6-14 崇文书院(图录自《书院教育与建筑》) 在台湾台南。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就义学改建而成，为台湾最早的书院。乾隆十年(1745)重修，十五年(1749)移建于海东书院旧址。图为移建后的状况。现仅存门额，作为文物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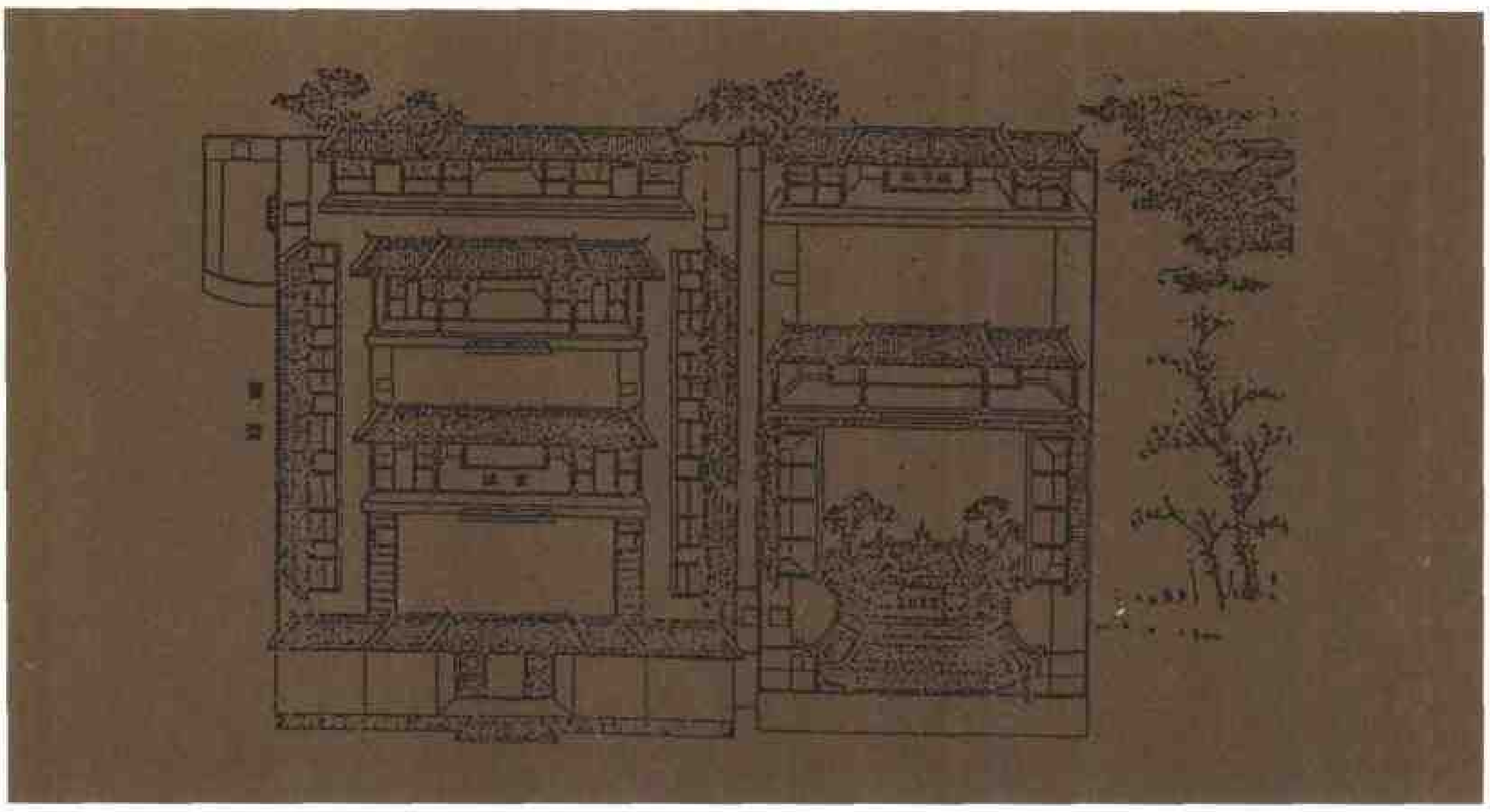


图 1-6-15 振文书院大门 在台湾漳化。清嘉庆十九年 (1814) 乡绅创建。曾供祀五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关圣、吕岩、朱衣帝君、绿衣帝君)及孔子、朱熹、仓颉等。日据时期，仍坚持宣扬祖国传统文化。今保存完整。



图 1-6-16 振文书院匾“千秋书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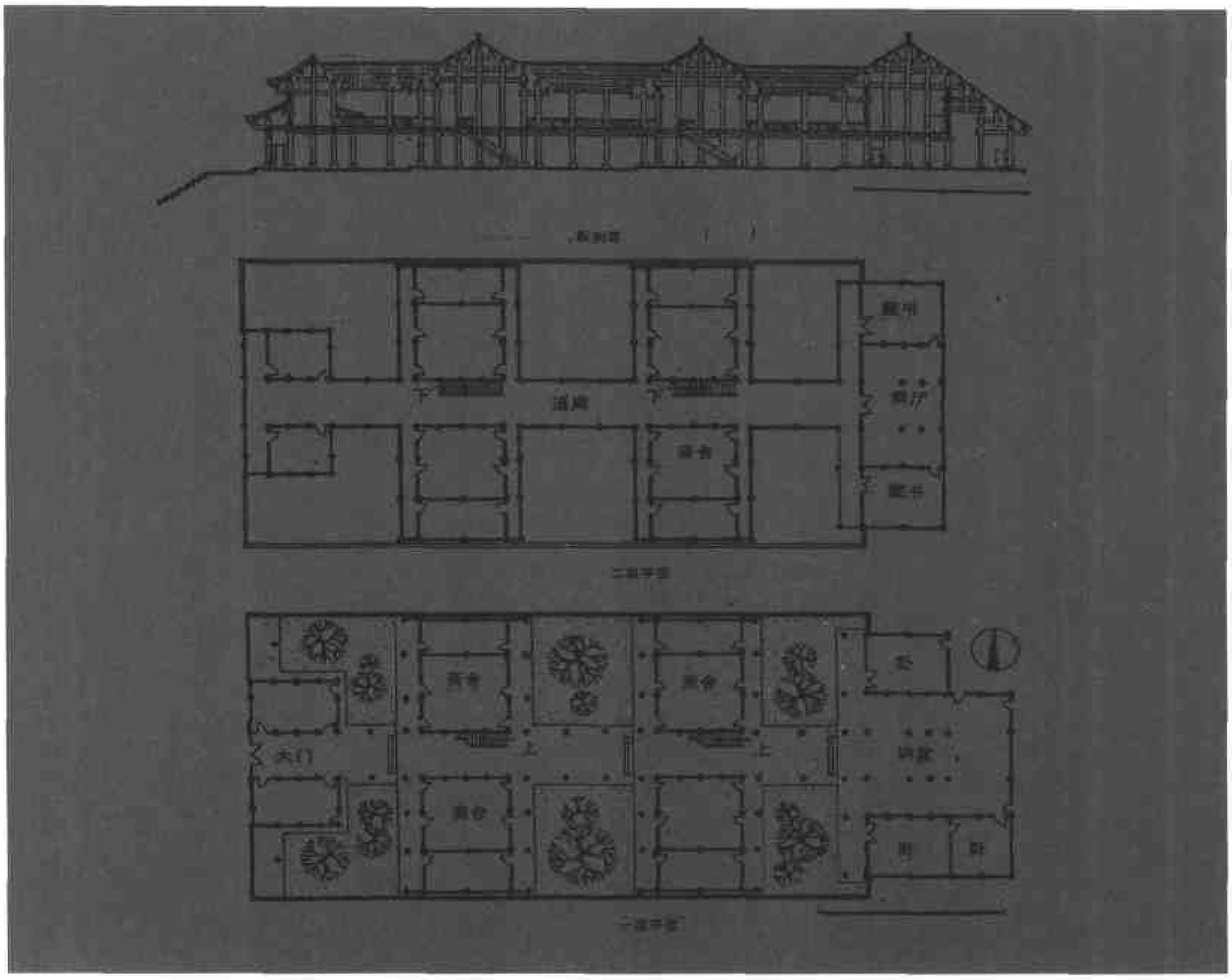


图1-6-17 恭城书院(实测图载《湖南传统建筑》) 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东。清咸丰年间建，保存完整，布置特殊，具侗族地方建筑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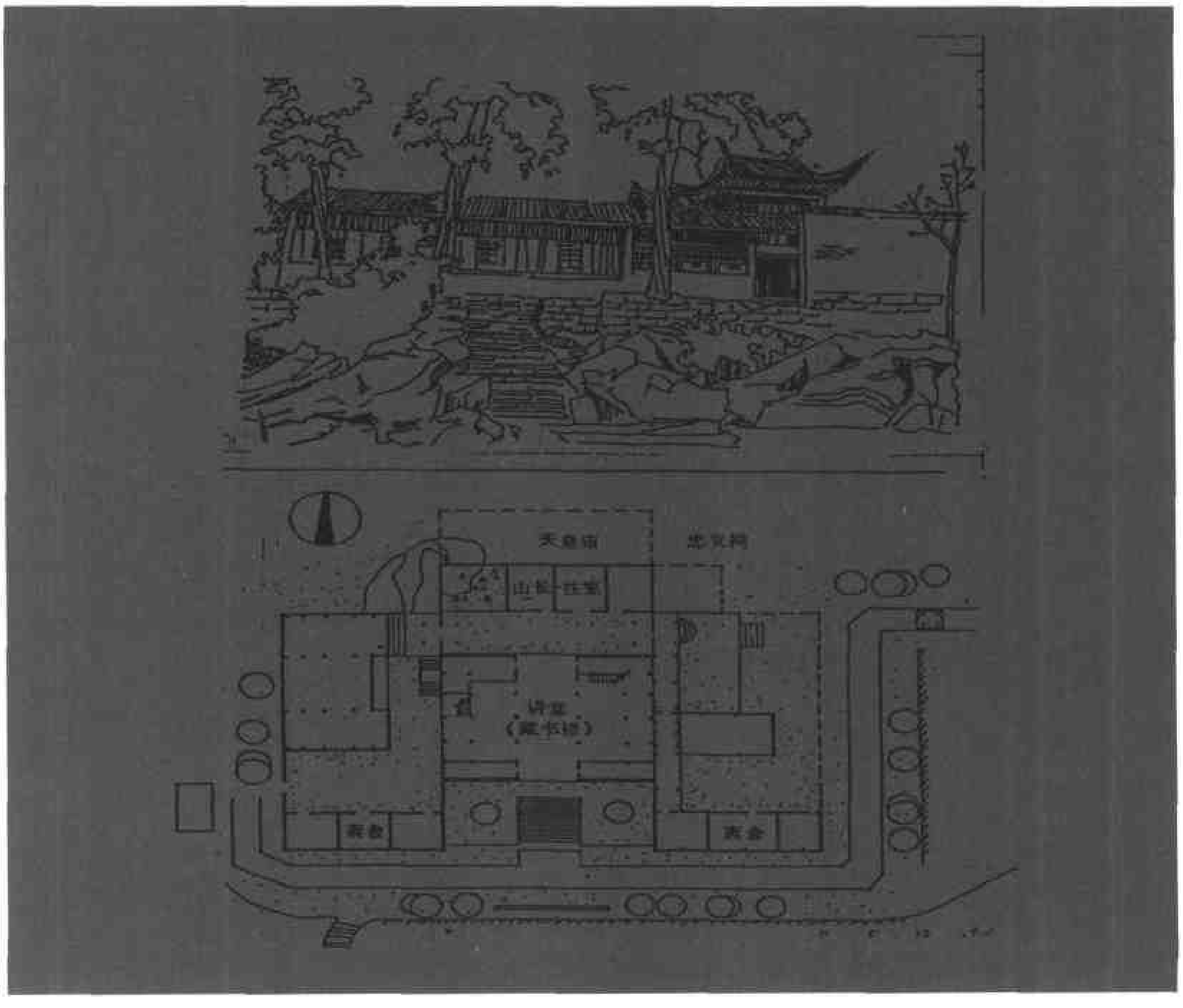


图1-6-18 三潭书院(实测图载《湖南传统建筑》) 在湖南凤凰。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苗人创建，原名新吾书院。光绪六年(1880)改名“三潭”。建筑虽小，颇具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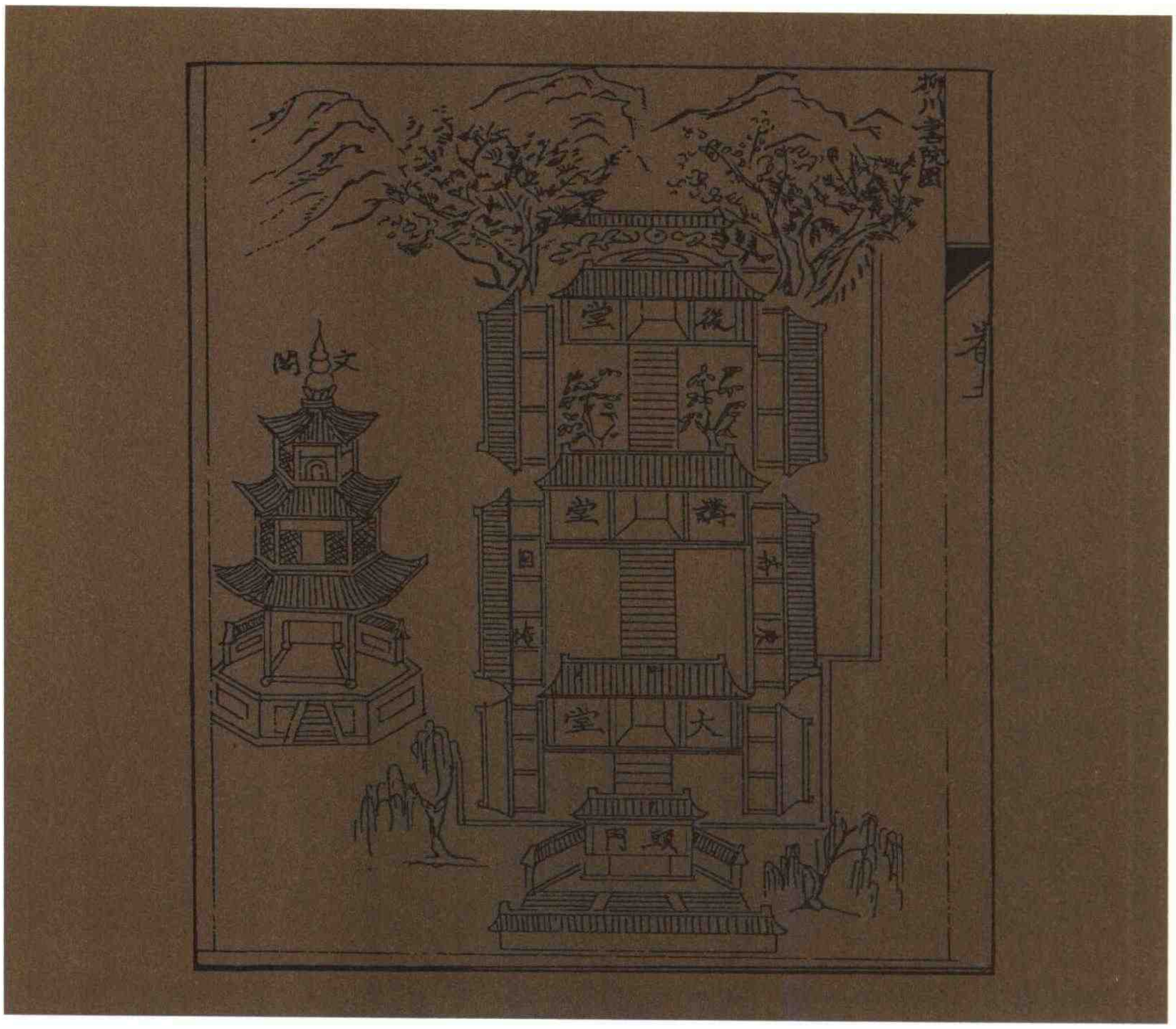


图 1－6－19　柳州书院（图载清《清江志》）　在贵州清江（今属剑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创建于城东门外，《记》称："苗疆风气蒸蒸日上矣"。

由于官府的控制加严，科举的束缚，官学化的影响加深，各书院较普遍地建立考课制度。从中发展出的考课式书院，课以时文，追求科举，几同官学，而丧失特色，陷于僵化，走向衰败。有些书院虽保留了讲学、讲会传统，但日益萎缩，未能得到发展。乾嘉经学兴起，出现一些研究性书院，讲求实学，有所成就，对书院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多局限于经史考据之学。西学传入，洋务学堂出现，中国传统书院受到了较大冲击。湖南时务学堂的建立，欲取书院与学堂两者之长，中西学结合办学，力图有所突破，但为时很短，随着维新失败而告终。同时，不少书院相继开设新学课程，但未能带来书院的根本性变化。清末改制，实行"新政"，书院为官办学堂所取代，终于宣告书院制度的终结。随后民国时改为学校，照搬西方学制，书院被全盘否定。20 世纪 20 年代初，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再次提出"取学校与书院两者之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书院教育又成为学人的研究对象。

清代书院修建频繁，一般在原有传统规制的基础上，建筑规模有所扩充发展，随着地域的扩大，呈现多样化的表现。供祀内容更为庞杂，专祠增多，反映其历史演变特点，也表现出官学化、世俗化，甚至宗教化的影响，显示多文化的渗透现象。



第二章

文化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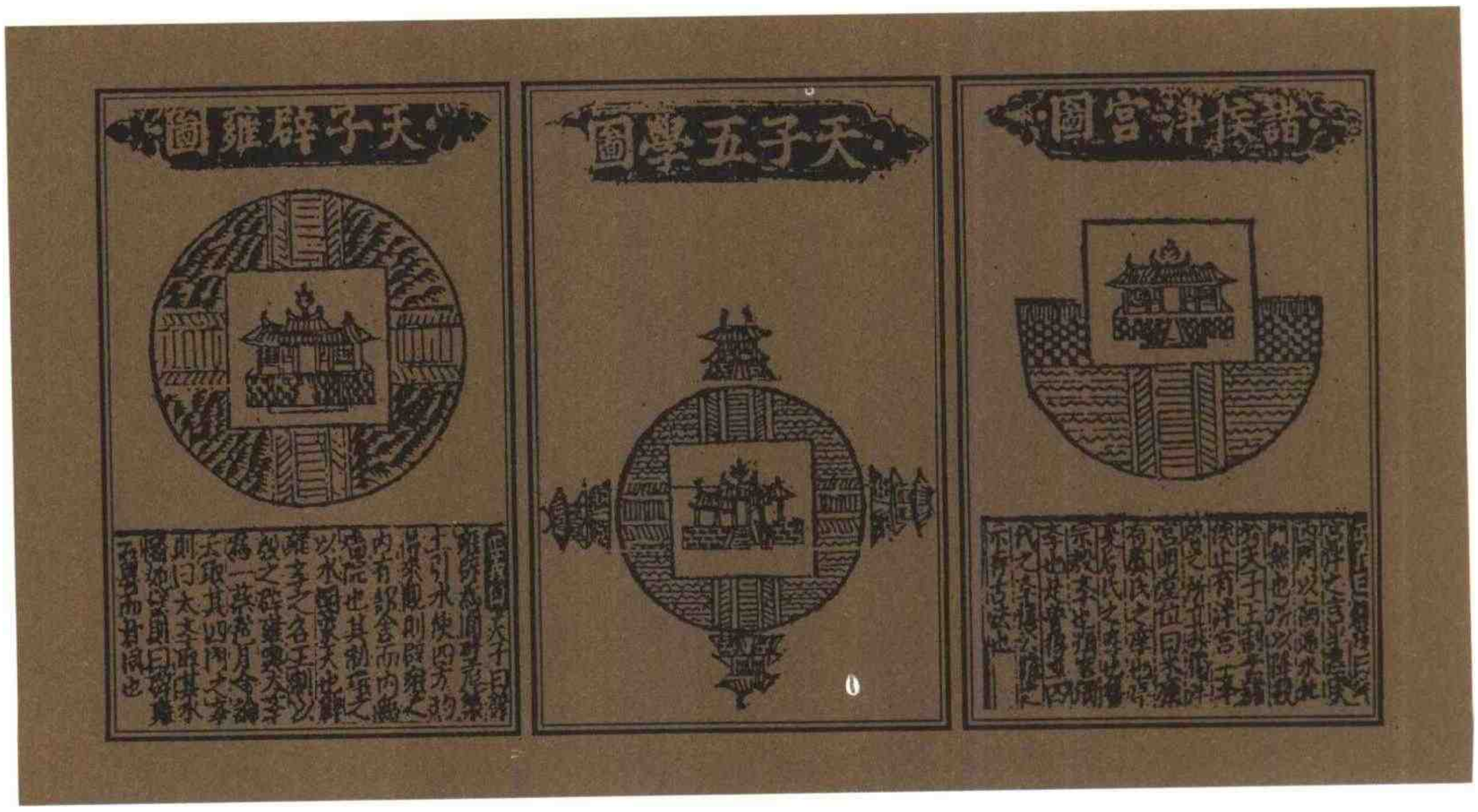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书院与官学

书院与官学，既有根本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它们属于不同体制。书院属于社会办学，具有其民间性质；而官学是官府统辖的教育体制，为官府的组成部分。但书院多有官府的支持，不少地方官员还直接参与书院建设，因此，书院在办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教学制度等方面不能不受到官学的影响。

官学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完备的制度。早在夏代官学已有中央国学和地方乡学之分，国学又分成大学性质的“东序”，和小学性质的“西序”。商代国学，则称大学性质的为“瞽宗”、“右学”、“西学”，小学性质为“左学”、“东学”；教学内容以祭祀、军事、乐舞、文学为主，教学活动与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紧密联系，成为官廷的组成部分。西周进一步发展，中央国学有大学性质的天子所设明堂辟雍、诸侯所设泮宫[1]和小学性质的虞庠、下庠，地方乡学则有乡校、州序、党庠、家塾等；主要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扩充了教学的内容。以上都是“学在官府”，教育对象限于皇家、贵族子弟，而无私学。春秋战国时，官学制度逐渐瓦解废弛，“学在四夷”，各地私学随之产生发展。孔子开其端，打破了皇家贵族的垄断，形成了“竹帛下庶人”，“百家争鸣”的局面(图2－1－1)。

秦代专制，不设官学，严禁私学，实行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汉代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最高学府——太学，生徒50人，至西汉末年达万人规模。“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门北出，立于其中为射宫，门西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肄射此中。此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此之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将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官，寺门南出……五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合，行无远近皆随檐，雨

图2－1－1　天子辟雍·天子五学·诸侯泮宫图(图载宋景定版《事林广记》)



不涂足，暑不暴首”(《太平御览》)。可见其规模庞大，布置有序。至东汉质帝时(公元146)，太学生徒已达三万人。顺帝时“更修黉宇，学宫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国学还增设四姓小侯学，招收外戚官子弟；鸿都门学，为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专习辞赋书画，主要招收无名望的豪强子弟。地方官学则自西汉景帝末年(前141)文翁主蜀郡，立学宫于成都为开端，后陆续出现。平帝时，下令天下立学官，郡设学、县设校、乡设庠、聚设序，但未真正实行。汉代自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教学儒学经典，高级阶段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主要内容。东汉刻石经于太学，作为标准。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官学时兴时废。西晋分设国子学和太学，曾规定五品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东晋孝武太安元年(385)，国子学始建庙宇祀孔，曾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最早形成“左学右庙”的建筑格局。北魏孝文帝时国子学(中书学)也建有孔庙，南梁武帝时国子监也建有孔子庙，自后南北两朝中央官学均设孔庙。北魏时增置太学博士，以教子弟，还设四门小学，程度稍低，为唐沿用。南朝宋时曾置总明观，授玄、儒、文、史四学，并增设医学，但不久又废。北齐天保元年(550)更令郡学立孔颜庙，为地方官学设庙之始。

隋设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增设书学、算学。隋开皇九年(587)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开辟庶族寒门进身做官的途径，具有其进步意义，但也对此后教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唐代教育空前发展，无论在制度、种类、质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央官学归国子监统管，由国子学收三品以上子弟，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弟，四门学收三品以上无封和四品以上有封及七品以上子弟及庶人优异者；书学、算学、律学皆收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通其学者。以上六学皆有一定名额，“广学舍千二百区，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此外唐代中央官学中还有太医署的医学、司天台的天文学、太仆寺的兽医学、太卜署的卜筮学、校书郎的校书学、尚书省的崇玄学、门下省的弘文馆、崇文馆，以上种种专科教育，也各有一定的学生名额。当时还有外国留学生入学中央官学，教学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九经》为主。同时，科举制度加密，分“常选”为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不定期举行，而名目繁多。因此，学校与科举产生了密切联系，成为学校教育的追求目标。唐代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有京都学、大、中都督府学、下都督府学、上州学、中州学、下州学、京县学，各按人口规定一定名额的经学和医学生；畿县学、上县学、中县学、中小县学、下县学则按人口规定一定的经学生。另有市镇学、里学等。自贞观四年(630)令各州县普遍建立孔庙，由此州县学校与孔庙相连，“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遂成通例，沿袭至清代。自唐代中叶，天宝以后，官学益废，生徒流散，无以为学。开元二十一年(733)允许百姓建立私学，自此私人讲学的书院开始出现。此后书院与官学并行，而成相互消长之势。

五代动乱，官学不发达，书院随之发展。宋代官学虽基本承继唐制，但自开宝八年(975)立国子监，建国子学，初无定额，仅有生徒数十人，后亦不过200人。宋初科举大量取士，而官学未兴，对书院采取鼓励政策。至道二年(996)赐额嵩阳书院，至道三年(997)赐书白鹿洞书院，咸平四年(1001)赐书岳麓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额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并颁书赐额，由此书院称盛，有所谓“四大书院”之誉。宋庆历以后，几次兴学，元丰二年(1079)太学置80斋，斋各5楹，容30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崇宁元年(1102)建外学——辟雍于城南门外，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容30人。学生初入外学，经试补入内舍、上舍，始得入太学。另外还建有四门学、算学、律学、医学、书学、画学、武学等，但不久多已停废。宋代地方官学，自庆历四年(1044)诏州县立学。“宋代州县有学，置官立师，宫室禀饩无所不备，

比汉唐且有过之”(叶适《列集·学校》)。如吉州“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欧阳修《吉州学记》)(图2-1-2)。北宋熙宁四年(1071)命诸州置学宫，并给田十顷赡士。元符二年(1099)又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官学大大发展，以致有的书院被改成官学，如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等。岳麓书院虽未改为官学，但在地方推行三舍法时，潭州变通实行“潭州三学”。岳麓书院实际处于“上舍”地位。但是书院并未因此衰退消亡，相反仍继续并行发展，较前更盛。尤其南宋偏安，官学、科举日益腐败衰落，“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义，而尝得隽一场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抑今郡县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谈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的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叶适揭露当时“贫而无食者乃肯入学，惟昏目不材，贪鄙而无节行者，乃皆聚于学；其有罪而不受罚者，乃求籍于学，故凡茂异秀术之士以不至于学为高，其有在者，则共指以为耻，而皆以为谚”。(《士学下》)“士之有材能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朱熹感叹：士子只“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答宋容之》)。所以书院力纠官学之弊，不以科考为追求目标，致力于培养人才，发展学术，形成学派，是南宋书院兴盛，有别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其讲学自由、藏书丰富亦为官学所不及；书院供祀学派宗师及建院功臣，更是其独有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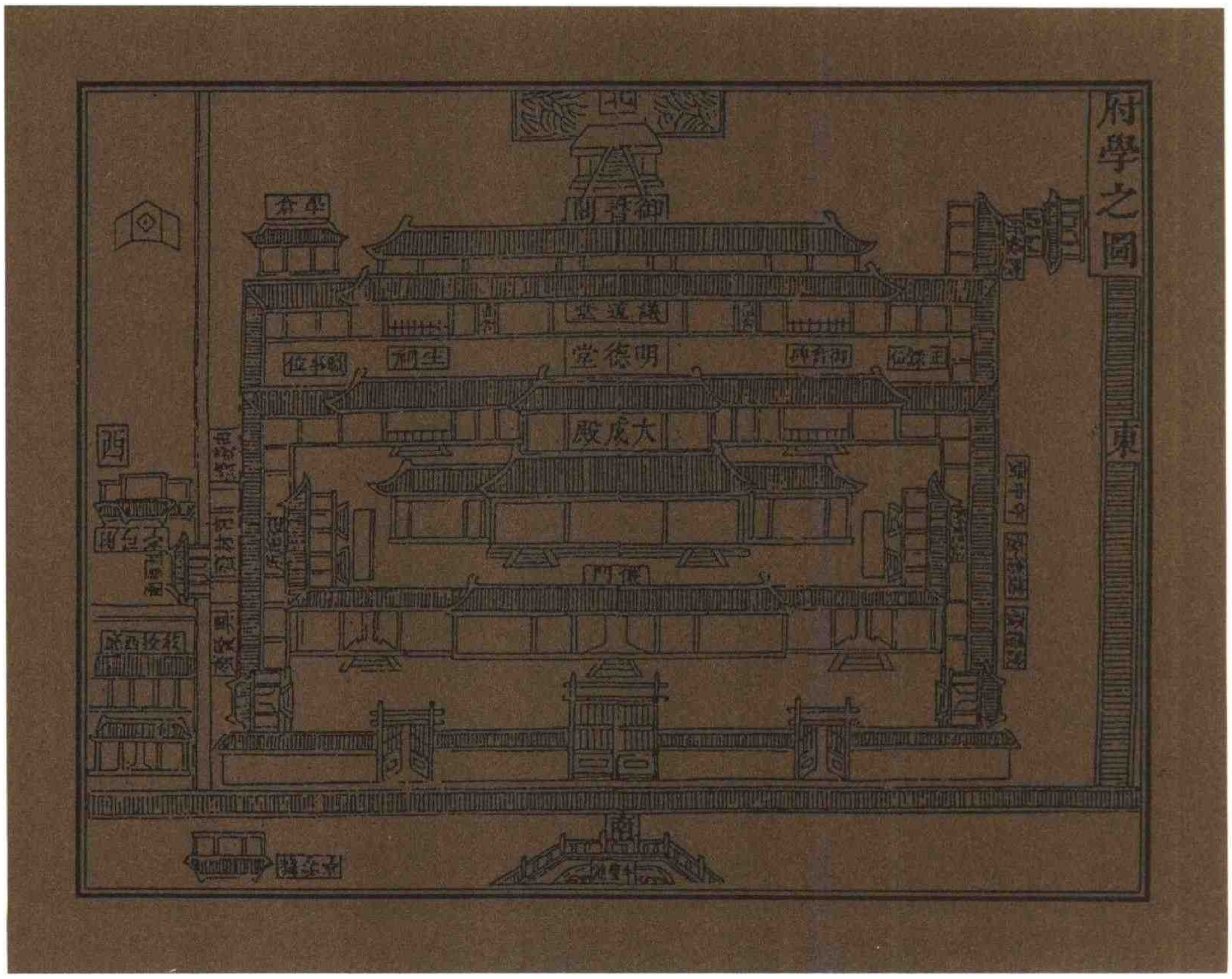


图2-1-2 府学之图(图载宋《景定建康志》)

元代以后，书院与官学并行共进。书院在其传统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在官府的控制下，又产生了官学化的趋势。元承汉制，尊崇儒学，中央官学仍设国子学，并相继增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元大都(今北京)建国子学。大德六年(1302)建文庙祀孔，并据“左庙右学”的礼制，建国子监(即太学)于庙西，分上、中、下六斋，东西相向，北建崇文阁藏书。惟生徒定额仅百多人，以月考成绩递升，教学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科举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地方官学仍按行政区划，路、府、州、县，设路学、路医学、路蒙古学、路阴阳学、府学、上中州学、下州学、县学等；并在乡村以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社学，供十五岁以下幼童入学，初有 20166 所，后增至 24400 所，已相当普及。对于书院仍采取提倡政策，将一些山长列为学官，给以待遇，并拨给学田，以加强控制。元开始供祀文昌帝君，以祈科举中式。此后，一些官学、书院出现文昌阁、魁星楼之类建筑，以供祀神灵。

明初大力发展官学，曾设南北两处国子监(即太学)。洪武十五年(1382)建国子监于金陵(今南京)鸡鸣山之阳，原六朝皇宫中心区；中有彝伦堂十五间，有博士、绳愆两厅和支堂六，每堂各十五间，中五间设师座，左右各五间设大凳桌，为弟子肄业所。“左庙右学，亭庑厅厢，肄业有所，会馔有堂，以至廪库庖湢，靡不毕备”(黄佐《南雍志》)(图 2－1－3)。国子监内供太学生住宿读书的号房千余间；还有接待朝、日、越及东南亚各国留学生的“王子书房”、“光哲堂”百多间；称为“讲院”的课堂几十间，供教师住宿的舍房几十间，以及“射圃”等场地，共占地五平方公里，“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划之备，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尝闻也”。永乐年间，最盛时有学生 9000 多人。永乐二年(1404)在元代国子监基础上，又增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1420)迁都后，即成南北两监。学生入监有所放宽，已不限高官子弟。中央官学还设有为皇家子弟的宗学、培养翻译的四译馆及卫学等。地方官学仍按行政区划，分府学、州学、县学、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都转运司儒学、宣慰司儒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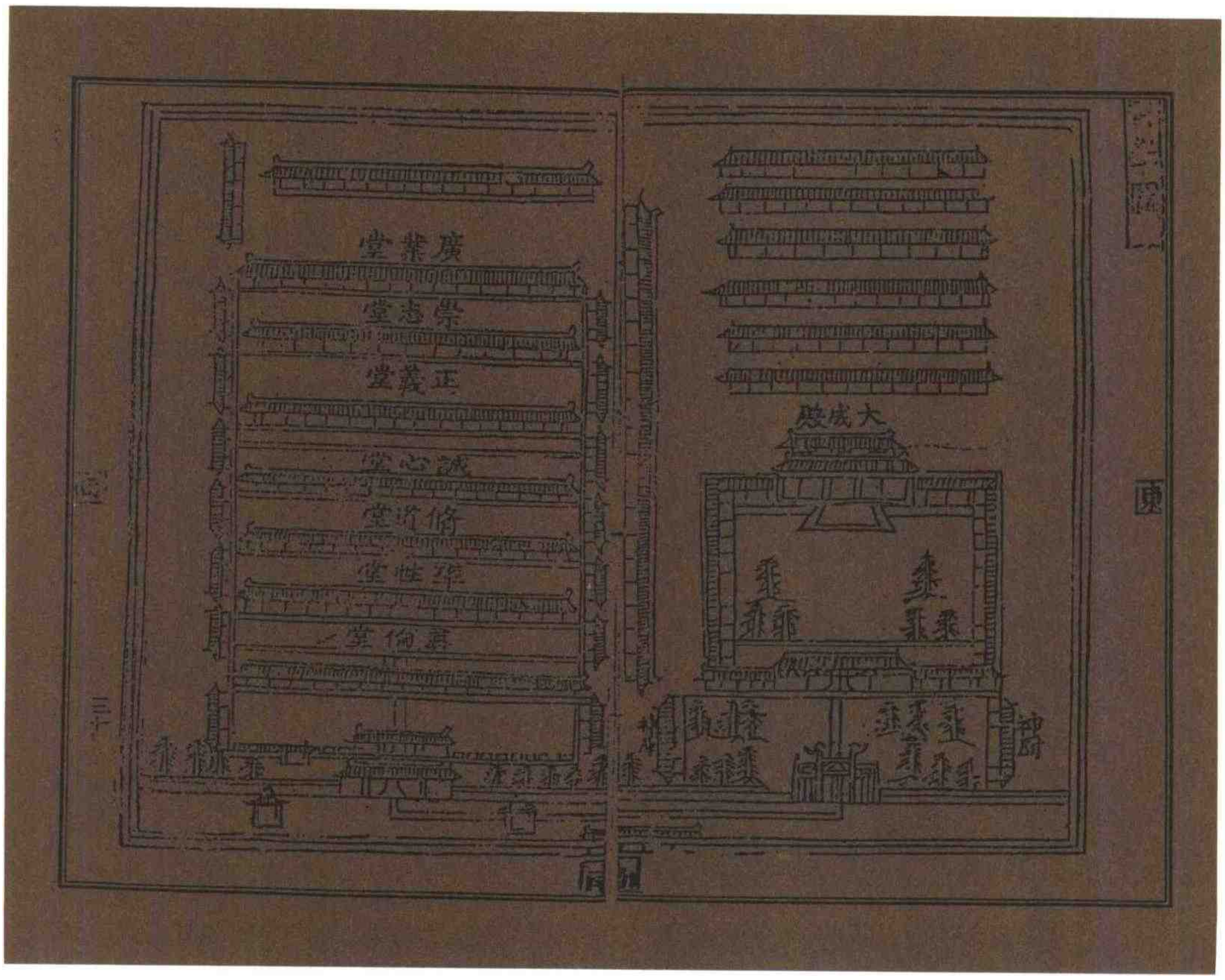


图 2－1－3　官学图(图载明《洪武京城图志》)

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以及专科性质的卫武学、律学、医学、阴阳学等，后又令府州县设立社学(图2-1-4~5)。而入明科举加严，推行八股时文，且规定非经学校出身不得应试，并诏"非科举者勿得与官"，致使明初百年，书院沉寂无闻。不少书院毁为废墟，或仅为祭祀场所，或改作他用。明成化以后，官学日渐衰落。成化二年(1466)南京大饥，甚至采取官员军民子孙纳粟送监。礼部尚书姚夔感叹："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以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帝虽以为然，然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缓经例行之，讫不能止(《明史·选举志》)。正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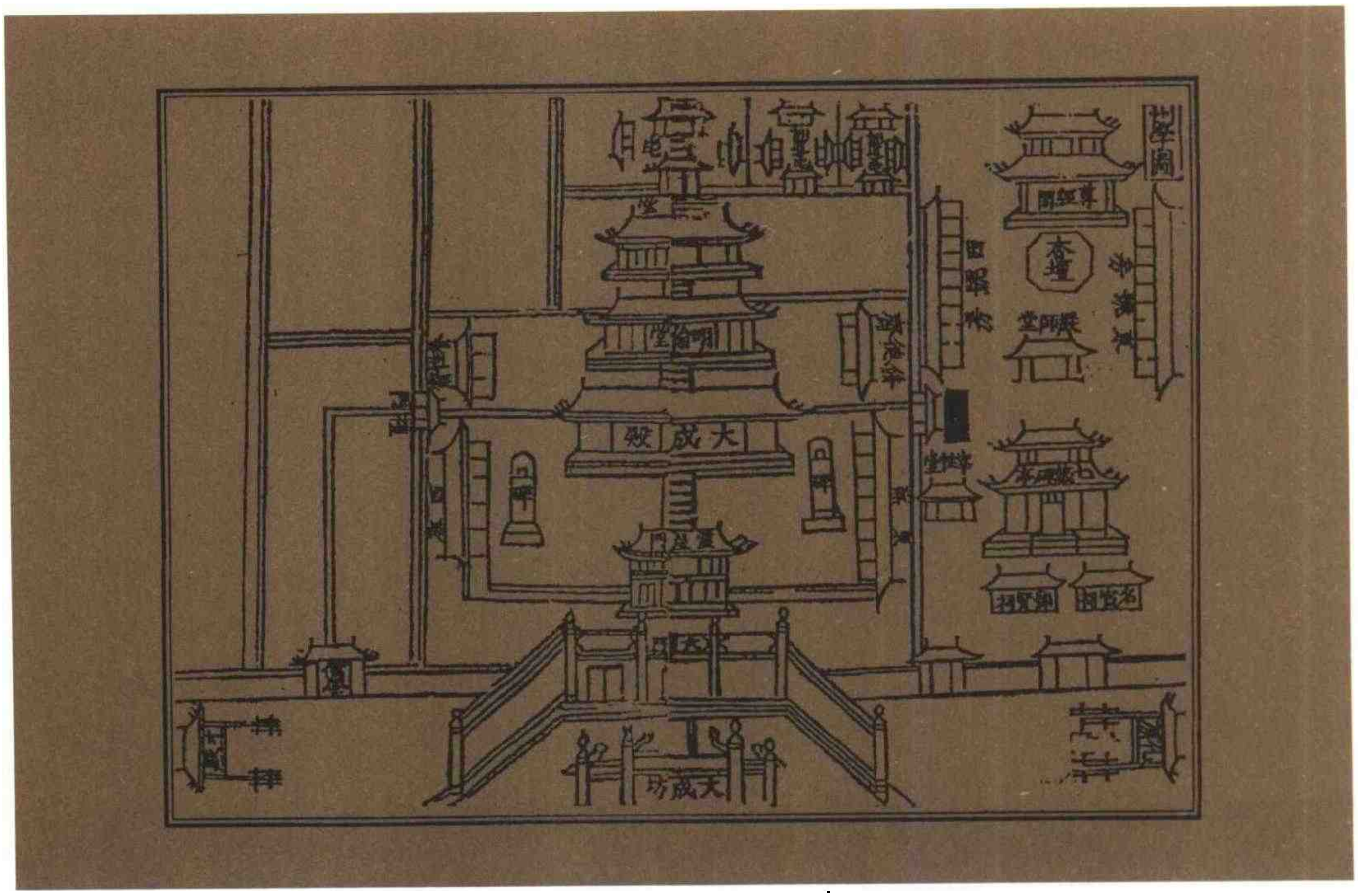


图2-1-4 州学图(图载明《嘉靖许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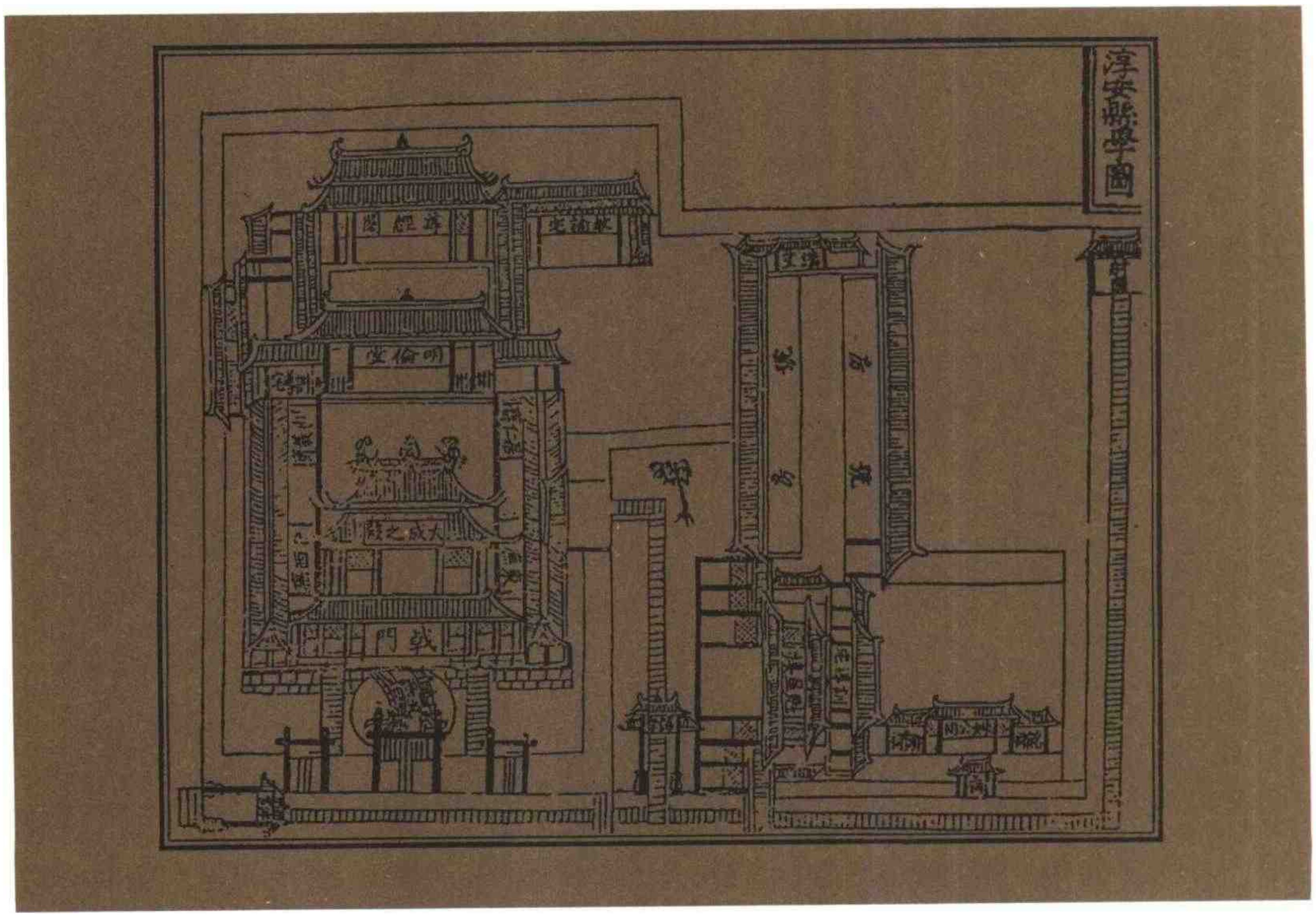


图2-1-5 县学图(图载明《嘉靖淳安县志》)

后，监生已不过千人，少至八百多人，而书院日益恢复发展。尤其是王学、湛学再度兴起，广设书院，大开讲会，形成明代书院的又一特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因此为朝廷所忌，以致多次禁毁书院。但禁而不止，随毁随兴，日益发展，势不可挡，正反映了社会的需要。然而高压之下，书院不无顾忌。有的为适应科举要求，加强考课，甚至成为考课式书院；有的加强祭祀，成为祭祀为主的书院，而渐失原有特色。这不能不说是官学化影响的结果。清承明制，初重官学。顺治元年(1644)即修明代北监为太学，仍左庙右学，六堂肄业，有号房五百余间。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仿古制增建辟雍于太学中心，彝伦堂之南。池环如璧，护以石栏，殿处池中，方宇重檐圆顶，覆黄色琉璃瓦，殿中设宝座，高宗曾临雍行讲学礼，师生观礼听讲(图 2-1-6)。

乾隆时曾谕孔庙使用最高等级的装修，黄色琉璃瓦顶，红墙黄瓦更显隆重的皇家气派，亦成地方通例。中央官学中还有旗学、宗学、觉罗学，为八旗子弟、贵胄、觉罗子弟而设，又有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专门学校，为俄罗斯学生所专设。地方官学则按省、府、州、县设学宫。清初还每乡设有社学一所(图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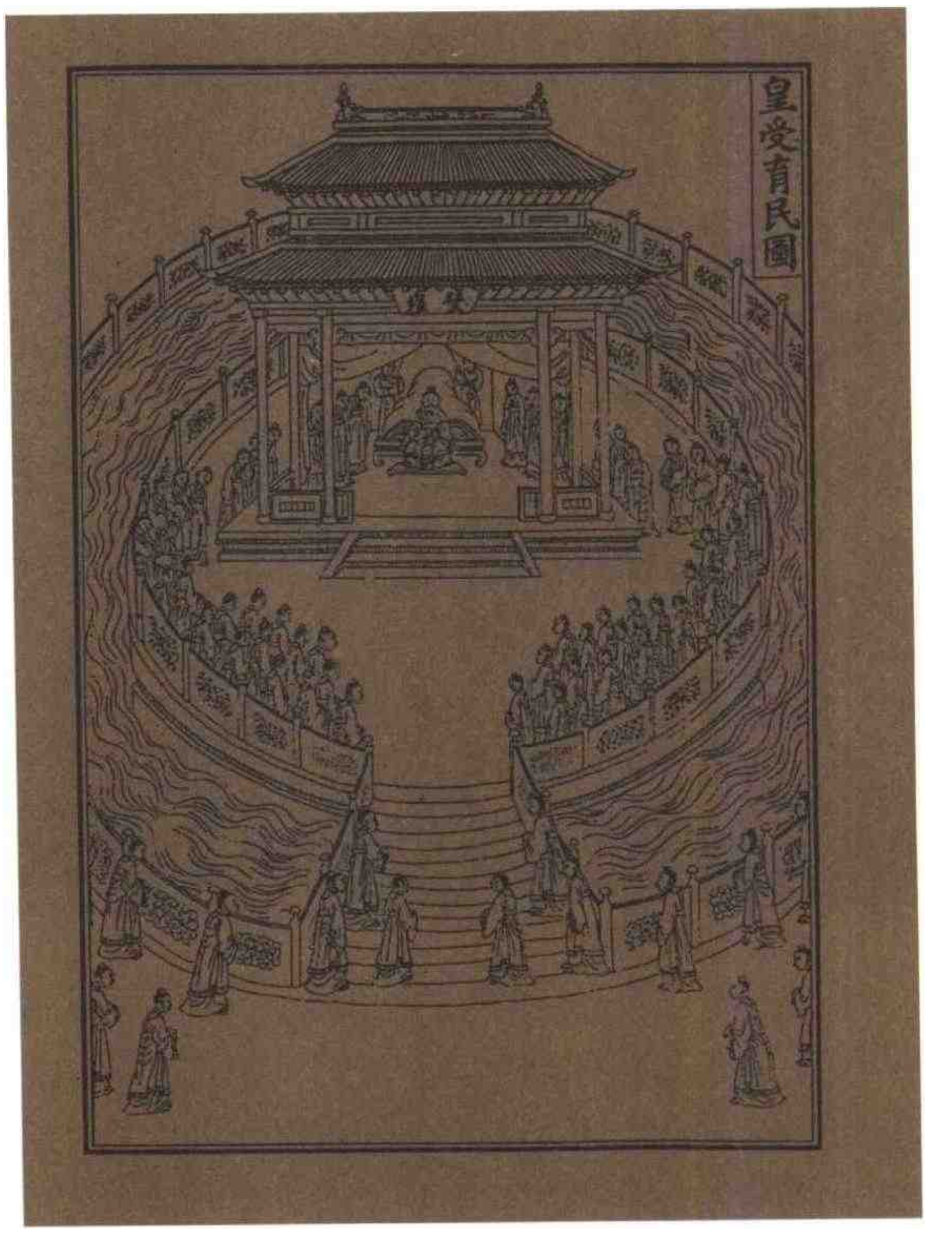


图 2-1-6　皇受育民图(图载清光绪版《钦定书经图说》) 反映皇帝临雍讲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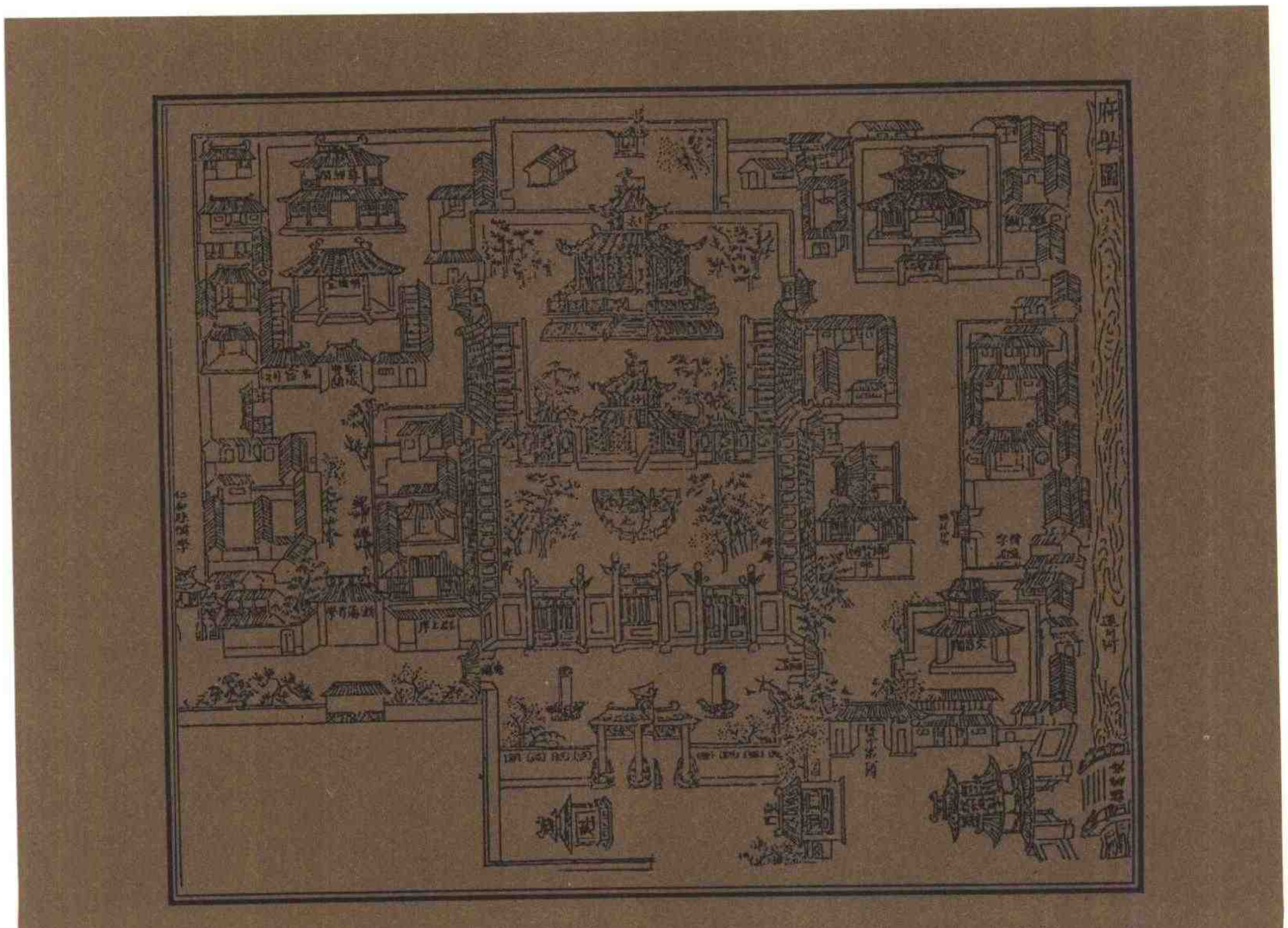


图 2-1-7　府学图(图载清光绪版《杭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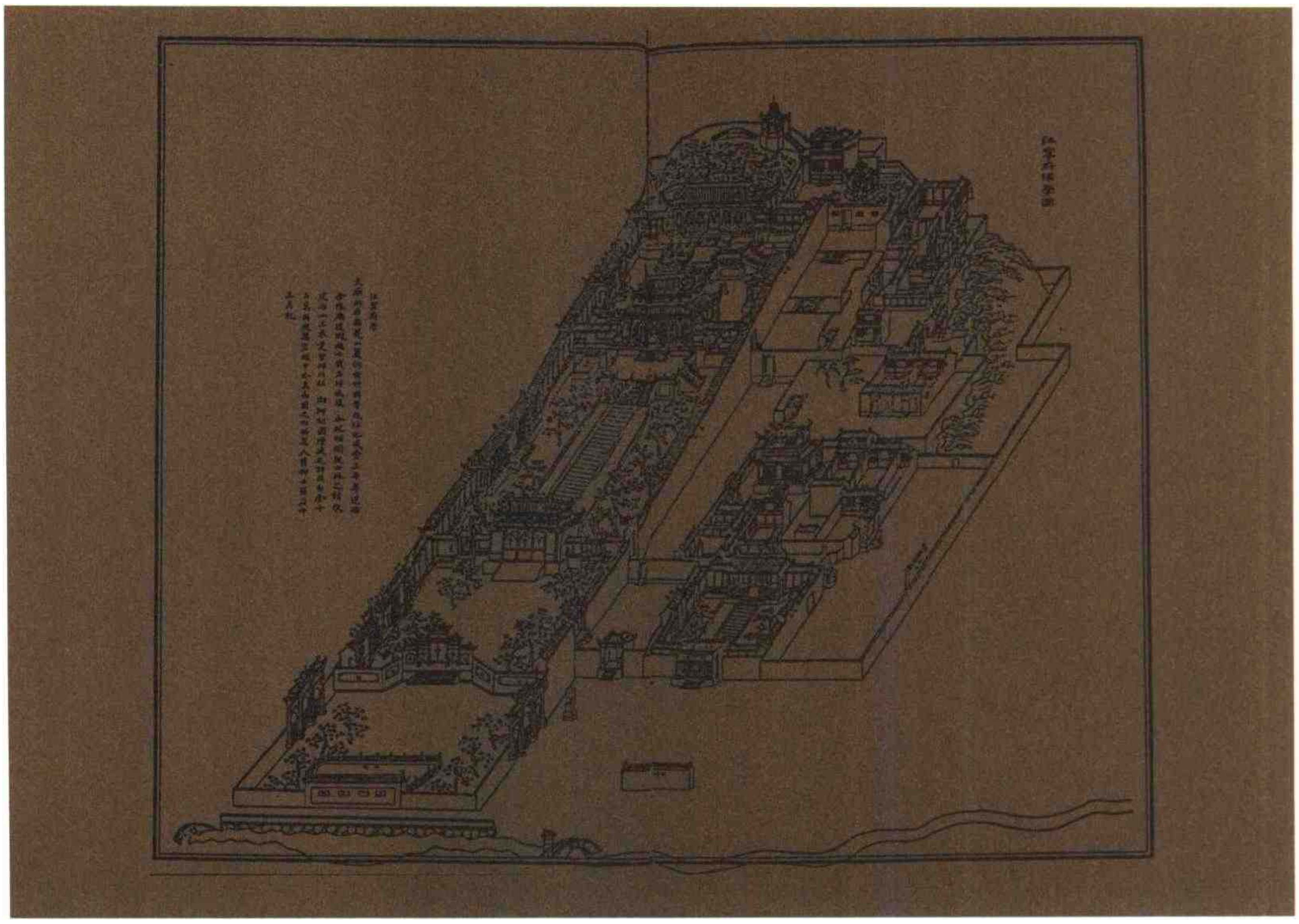


图2-1-8　江宁府儒学图（图载民国版《金陵古建图考》）

清初对书院采取由消极抑制转而积极扶植、利用的政策。设置省城书院，给予资助，作为楷模。由地方官员选聘山长，规定学额，讲习八股时文，实行官课制度；并由地方官员出题评卷，极力促使其为科举服务。虽有些书院仍重视义理、经世之学，或宋汉兼容，但多难以摆脱科举的束缚。少数经学研究性质的书院，不课时文，提倡实学，力求有所改革，也多被引向纯学术的考据。以后，清廷被迫实行“新政”，改革学制，《钦定学堂规程》，废国子监，设学部，废科举，办学堂，由此结束书院制度。书院相继改为各级学堂被纳入官学体制之中。

官学为官府所垄断，属统治阶级的特权，而必然有种种限制：为科举应试服务，作为进身之阶，甚至只课不教，师生关系淡薄；因应诏而建，往往受政局人事等种种影响，而时兴时废；限于治所一处，以官式建筑的文庙为主体，显示其惟我独尊、神圣威严的气派。书院则相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补官学之不足到纠官学之弊发展起来，面向社会，因而较少限制，具有其开放性；重视人才素质的培养，不以科举为主要目标；师生共处，言传身教，传承学术，发展学派；地方留意斯文而建，社会集资管理，前规后随，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多选择山林胜地，风景优美之区，采用民间建筑做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显示其朴实、典雅的斯文格调。以上种种皆与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书院因社会的支持和士人的奋斗而兴盛普及；但是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官府的严格控制、官员的参与、科举制度的约束又必然产生种种不利于书院发展的影响，使之不得不走向官学化道路，而渐失特色。

官学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学、庙结合的统一的学庙制度，且都限于地方官府治所所在的城区，表现出“贤关”、“圣域”威严壮丽的官式建筑的显赫气派。书院由补官学之不足，到纠官学之弊，则自立门户，扎根民间，普及城乡，选择优美环境，采取地方民间建筑形式，不拘一格，表现多样，创造其适用、朴实、典雅的环境和建筑特色，与官学形成鲜明对比。但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受到官学的影响，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

制，以及学田、学舍等制度，也可说是吸取发展了官学悠久办学的传统经验。特别是在官府的利用和控制下，官员的积极参与建设经营，更对书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书院为祭孔而设置礼殿，有的书院还增建孔庙；有的还开辟射圃、专设考棚；以及建立文昌阁、魁星楼等，莫不都是仿官学的建置。

第二节　书院与私学

书院可说是脱胎于私学，是在私人讲学的基础上新的创举。历代书院继承发展了私学培育人才、弘扬学术、传承文化的优秀传统，开创了私学发展的新阶段、新制度。

我国私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官学废弛，"文化下移"，典籍扩散民间，"竹帛下庶人"，促进了私学及其学术的发展繁荣。孔子（前551～前479）在鲁国曲阜创立了具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教以诗书礼乐，开创儒家学派，确立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曾先后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出游时，还有弟子随行。孔学中已设有教学活动的"居堂"和生徒生活的"弟子内"，为春秋末期最大的私人讲学团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又多继起讲学授徒的事业。与孔子齐名的墨子（约前468～前376），自称有学生三百人，"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发展为后期墨家。孔墨成为两大显学主流。《吕氏春秋・尊师篇》称："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影响各诸侯国私学的盛行。战国中期，诸子蜂起，呈现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后有所谓"九流十家"之说，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纵横、杂、农为"九流"，加上小说家，则称"十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各家皆设学立教，交流争辩，使私学发展更加兴盛活跃。如孟轲（约前372～前289），"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田骈（生卒不详）在齐，"资养千钟，徒数百人"。在私人讲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齐国出现的稷下学宫，招纳汇集了各派学者，给予优厚待遇，研讨交流学术，传授生徒，达到数千上万人，并建有堂室寝庖，规模庞大。直至齐亡于秦，学宫存在140多年之久，虽属官学性质，实成为私学的联合体，体现其自由讲学，自由流动的特点。

秦代"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但也未因此禁绝停辍。汉武帝兴办太学之后，私学又兴盛繁荣起来，有初级教育的蒙养教学和高级教育的经师讲学，逐渐发展完善，成为官学的补充。蒙学名为"书馆"，始由"书师"教以识字、习字，进而学习《孝经》、《论语》等经学入门教材；高级的专经阶段，则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或称"精庐、讲堂"，以古文经学讲学授徒。汉代古、今文经学两派斗争激烈。由于太学所立五经博士皆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在官学无立足之地；又由于社会复杂、官场险恶，一批名儒不愿出仕，而从事私人讲学；兼之私学既无官学的种种限制，可自由选择，又有利于探究学术，因此经师讲学之风日盛。东汉时，私学生徒远超官学，成压倒之势，不少著名大师，常有弟子数百，而著录弟子达数千以至万人。如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马融"教养诸生，常数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又如郑玄，游学乡里，"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晚年，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人"。汉代私学所称"精舍"之名，为历代

沿用；佛道也立精舍以传道；后世书院初期亦多以"精舍"名。可见其传承影响。

魏晋南北朝动乱频仍，官学时兴时废，私学虽不及前，但仍较兴盛。儒家讲学仍为主流，但有玄学、道家、佛学传播争雄、交融发展，又创造了争鸣局面和一些独特的教学方法。西晋经师杜夷曾送乡闭门教授，生徒千人。北魏经师刘兰，弟子前后数十，有成就者颇众。道家张忠，教育以形不以言，生徒但观其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而不授课。陇西人王嘉，不与世人交游，凿崖穴处；受业者数百，亦从师穴处。南朝徐孝克授徒，每日早训佛经，晚讲《礼》、《传》，其讲学综合了佛、儒、道思想特点，道俗受业者数千人。南朝还有天文、算学、医药学等科技教育的传播。如医学家王微，重视实践教育，常带领生徒上山采药，并亲尝检验。同时，妇女、家族和家庭教育也在发展。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当时家庭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隋唐私学进一步普及、发展。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许民间设立私学，大量发展了初级阶段的"私塾"。贞元三年(787)，右补阙宇文恺又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设立乡学。同时，精舍讲学发展，传播经学更加普遍。佛道亦仿儒家讲学之风，设立精舍。特别是佛教禅林精舍，遍及丛林，有讲堂、斋堂等设施；以及"法规"、"注疏"、问答讨论等教学方式。佛教宗派的教学发展，十分活跃。这种形势下，书院的出现，继承发展儒家讲学传统，并吸取禅林教学经验，也不是偶然的。

五代战乱，私学兴盛，名流学者隐居山林名胜之地，开学馆，立精舍，设书院，更多以藏书著称。及至宋代，书院迅速扩展，由此成为学者讲学的主要场所，取代了以往的精舍。书院的发展，也促进了蒙学的发展完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主要教材，也多是宋人编撰或改订的，宋元时蒙学大盛，有乡校、家塾、冬学等多种形式，以至"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蒙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书院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元初程端礼编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是书院演变史上著名的家塾教学计划。明清时蒙学更为普及定型，有地主富商聘师在家教育子弟的教馆或称坐馆；也有塾师在家收徒的家塾，或称私塾；还有地方、宗族设置的义学，或称义塾。它们为书院的普及发展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书院是在悠久的学者聚徒讲学的私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继承了民间自由讲学、培育人才、发展学术、创立学派的可贵传统，可算是一脉相承。但是，书院延续千年历史之久，发展普及全国城乡，形成较为统一、稳定、完备的制度，则是前所未有，它已不同于原有私学，而具有其独特性。

书院基本上属于社会办学性质，不同于学者的个人行为，常随人事变迁而兴废。正因它多由社会力量聚资兴建，而能拥有固定学舍、学田、图书设备，以及相应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机构，提供了稳定的办学场所和经济来源，创造了独立自主的办学条件；并可给予生徒以食宿膏火和贫寒资助，所以较之原有私学，更为稳定，更加开放，更具生命力。有的书院虽由学者个人创建，但多由其后代、生徒继承，并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得以继续发展。有的书院虽由地方官员主持兴办，但多以官员的个人身份捐助，并在社会力量支持下建成，继续发展。所以书院的社会办学性质，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是以往学者办学所无法达到的。

书院在名儒主持下，开创了办学的新局面、新成就，从而得到官府的褒扬表彰，颁额赐书，成为一批著名书院。它们被各地视为楷模，竞相效仿，形成其讲学、藏书、供祀的共同规制。特别是理学学派的发展，书院制定学规，完善制度，生徒参与管理，前规后随，继承发展，形成其传统学风，为原有私学所不及。在理学取得官方哲学地位后，更促使书院的普及发展。又由于官府的控制利用，也带来了官学化的影响，更形成书院的多层次文化

因素的渗透交融，多类型教育的综合发展，这些也都是与原有私学不同的历史面貌特点。

书院建筑，虽也具民间地方特点，但其完整规制、严谨布局，以及悠美环境建设，和前规后随，相沿继承发展，形成规模特色，是一般私学无法达到的。

书院与私学都源于民间，有其直接的继承关系。书院可说是由传统私学高级阶段发展的结果，但也有其显著差别。书院多由社会集资建设，建有学舍、学田，创立了稳定的办学条件，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的特点；而私学属一般个人行为，多利用家宅或祠宇等收徒办学，因人因时而易，难以稳定发展。尤其书院成为理学学派的发展基地，制定学规学约，形成和完善了书院的基本规制；学派生徒又都热心书院教育，前规后随，相承发展，纪念宗师，形成传统，更是一般私学所不及的；书院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各地竞相效仿建设，日益普及拓展，因此开创了古代教育的新阶段，教育建筑的新类型。

第三节　书院与宗教

书院与宗教存在着治学与信仰、重人与尊神的根本对立。但两者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和影响，因而在观念、势力与地盘上既争夺又融合，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色。

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神信仰的国家。其中尤以佛（释）、道两教传播最广，影响最深，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与西方社会有着显著的不同。我国较早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统治地位，因此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兼收并蓄的传统文化历史特色。儒释道由于存在入世与出世的根本对立，以及外来与本土文化的差别，从而长期处于既争夺又融合的复杂斗争状态，相互吸取、彼此消长。历史上就曾出现过礼仪之争、次序之辩、夷夏之辩、老子化胡之辩，以及三武一宗灭法等激烈斗争。同时，斗争中各家相互吸取、补充、融合发展，因而又产生了佛教的禅宗，道教的全真派；并有所谓"儒以治世，佛以修心，道以养身"的主张，提倡所谓"三教合一"之说。书院作为儒家阵地，理学发展据点，也可说是其既与佛道相抗争，又与其相融合的结果。

外来的佛教，早在公元前后已传入我国，东汉明帝十年（67）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在洛阳兴建，标志着佛教的正式传入。土生土长的道教也自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后名天师道，开始正式形成，它继承传统的神仙方术、纤纬神学和老庄思想。道士早期，采山居修道，栖息茅舍山洞，不拜偶象，并不出家。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之中，在统治阶级支持之下，佛道得到极大发展。佛经的陆续翻译和研究传播，形成不同宗派，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结合，走向中国化发展道路；又由于捨宅为寺之风，更促使佛寺由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制，逐渐转变为中国传统院落布局的建筑形式。道教因受佛教的刺激和影响，亦开始实行立像礼拜，诵经斋戒仪范，并构立神仙谱系，建造道观建筑。唐代佛、道达到鼎盛，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普及发展。大庙常达十数院，乃至数十院规模；由高僧主持，常住僧人上千，或至数千人；形成丛林制度，制订清规戒律，拟如一大学校。后来道教全真派亦仿佛教，建立十方丛林，实行严格出家修道制度。天下名山多为佛、道所据，出

现所谓佛教的十大名山、道教的洞天福地，人们感叹"天下名山僧占多"。所有这些对儒家必然产生莫大的刺激和启示，激励士人为复兴儒学而奋斗。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官学衰败，士病无所学，多隐居山林、寄寓寺观，读书讲学，并与僧道交往，更增加了文化交流影响。因此，书院最早多出现于山林胜地，也决非偶然。唐代李宽就是在衡阳石鼓山寻真观读书，创建了李秀才书院。岳麓书院的前身更是唐末五代时岳麓山僧人"因思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购置经籍，为供士人读书而创办起来的。嵩山嵩阳书院前身太乙书院也是由太乙观改建而成的。南岳有所谓"名山到处属僧家，南楚名山此更甚"（《南岳志》）。这里为佛道的重要基地，曾有书院四十多处，宫观二十多所，南禅兴起，影响海内外；书院也自唐代在此出现，后发展达二十多所，著名的湖湘学派即发端于此，亦非偶然现象。

书院的出现，与佛道又形成复杂矛盾，以至产生反复争夺的局面。茅山书院北宋创建于江宁三茅山，至天圣后就为崇禧观所据。南宋时又就故址重建书院，后又被崇禧观占有；咸淳七年(1271)书院迁往顾龙山再建，后又改为圆通庵。安徽舒城龙眠书院，创建于宋，元初废为东禅寺，天历七年(1329)经知县撤寺复院，但至正末年复为东禅寺所并；明弘治十二年(1499)再由知县令僧退去，重建书院。江苏苏州学道书院，建于宋代，元初也被豪僧占有；至元间再建书院，元末复为僧夺。屡废屡兴反映了宋元时期，书院在开创发展过程中，与佛道争夺的激烈；尤其战乱期间，书院往往被僧道所据，或毁败无闻。所以，当年朱熹察看白鹿洞书院遗址时，不尽感慨："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而吾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致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白鹿一废累年，不知兴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元人虞集在《天门书院记》中更惊叹："呜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为浮屠老佛之宫，既祸害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术又坏于其说，千数百年以来，习熟无闻，以为当然，而莫之怪也"。

明清时期，书院在社会和官府支持下，日益普及发展，佛道则日见衰微，各地毁庙兴院也多有发生，争夺势力互相消长。唐代马燧曾建道林精舍于岳麓山，但后为道林寺所据，至明正德初年，湖南太守竟将道林寺拆毁，取其材扩建岳麓书院。云南禄丰松岩书院是因该城原有文殊寺，"以轮回果报说煽诱百姓，趋附如市，莫之禁者数年，时刘鹤年临政，毅然毁佛擒僧遂绝"，于明嘉靖元年(1522)改寺创院而成。福建晋江一峰书院，明成化五年(1469)名士罗伦(一峰)曾在净真观讲学，后罗弃官还乡，讲学至卒；嘉靖八年(1529)遂改观为院祀之，名"一峰"，以为纪念。湖南郴州白莲书院，清乾隆十九年(1764)该地名胜白莲池的白莲庵改为书院，将庵田并改为学山；《记》称："天下名山僧占多矣！而吾儒鲜得高秀者，诚咄咄怪事……若得天下名山为吾儒藏修游息之所，岂不大称快"。安徽六合广城书院，清同治四年(1865)改广济庵而建，其《广城书院规则十八条》中称："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之训也"，并将庵产划归书院，以奉士膏火之用。

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宗教各派系相互渗透、并存，形成儒释道共处一体的局面。南岳文定书院，明崇祯五年(1632)将其院东的长寿庵迁建于院后，并称："离则两伤，合则双美"，"后以事西方之圣人，前以事吾师之弟子，藩篱不设，吾道又宽一法界矣"（何仕篆《重修湖文定公书院并长寿庵记》）。贵州镇远的紫阳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建于"黔南第一洞天"的东岩中和洞，有朝天阁、朱文公祠等，后有增建、渐废；清乾隆间在旧址又陆续建成万寿宫、大佛堂、观音殿、玉皇殿、吕祖殿、老君殿等佛道殿堂；至光绪初年，书院部分恢复，并树立"紫阳洞"牌坊，遂成儒释道的联合体。山东淄博槐荫书院，明代建于董水庙内，该庙占地106万平方米，分三路院落布局，中路有董水殿、天仙阁、关帝庙、佛爷殿；东路有玉皇殿、阎罗殿、碧霞元君宫；西路则为书院所在，亦成书院与神庙共处的局面。

明清书院比较普遍的是增建文昌阁、魁星楼之类建筑，塑造神像，烧香膜拜，以祈求功名，甚至招僧道代管祠祀香火。岳麓书院在清代不仅先后增建有文昌阁、魁星楼，还建

有岳神庙，并招僧管理娘子祠、道乡祠等处香火。南岳曾有八所书院设于寺庙旁，其中也多有守僧安排。台湾彰化振文书院，曾供祀文昌、关帝、吕岩、朱衣帝君、绿衣帝君等。湖南宁乡云山书院，也曾供有十八罗汉。有的书院则移置了一些带宗教性的建筑。如湖南沅江琼湖书院，曾建有磬堂、祭堂、钟鼓楼；湖南祁阳文昌书院和双峰的双峰书院曾建有宝塔等，都反映出佛道的渗透影响。

儒家不甘佛道的发展兴盛而衰微的儒学，同时又从佛道兴盛中得到启发。尤其是，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继承早期佛教的探索精神，参究人生，为儒家所吸取，以复兴儒学，与佛道相抗衡。结果充实了儒学的哲学理论，产生了新儒学——理学，并形成了儒家不同学派的争辩、切磋、交流。书院正是适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成为理学的诞生摇篮和发展基地

书院的发展，儒与佛道的争夺与融合贯穿始终，它既与佛道抗衡，争夺阵地，又吸取了丛林经验以发展儒学。书院选择山林胜地，以满足其藏修息游的需要，借山光景色，陶冶心性，凭人文古迹以启迪人生；也因不甘佛老所据，欲以重人取代重神。所以，岳麓山自岳麓书院创建以后，诚如吴澄所称"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山以人重也"，认为是其历史性转变。南岳在明代建有集贤书院，以纪念曾到过南岳的历史名人，记称："登其山想见其人，人与山交相重也，祀山因以祀人也"（曾凤仪《集贤书院修复记》）。所以，书院之特别重视纪念其学派宗师、建院功臣、地方名人，莫不体现其"人重"的特点。书院借鉴寺观的建设经验，发展地方名胜风景，更增添了文化内涵，显示其传统特色。岳麓书院的建设，就借用了上山的香道，改建为入院的通道；并先后增加修建了沿路的梅柳堤、牌楼门、咏归桥和院后山上的道中庸亭、极高明亭、禹王碑亭等，使之形成以书院为中心、贯穿麓山的一条轴线，以此突出了书院的主体地位。在其周围，陆续增建亭阁祠宇，遥相呼应，构成其文化景区，以取代原来"邻居尽金碧，一一梵王家"寺庵林立、宫观相望的景象。庐山白鹿洞书院，亦先后在其院周，建亭20多处，修桥建坊，刻石题词，营造其文化氛围，构筑其景观特色。

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既是传统教育文化的继承发展，也吸取有丛林的说法、藏经和祭祀祖师的经验。书院采取山长主教，颇类禅林的住持。陆九渊在主象山书院时，甚至命名其居处为"方丈"；书院曾设置监院，亦类寺庙的职事；采用的升堂讲说的集体教学、质疑问难的个别请教，以及静坐、读书和学规、语录、学案等，也与禅林的禅师主讲、入室请益，以及"定慧双修"和清规、语录、公案等，莫不相类。这显然也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历史文化交融的辩证发展的必然反映。在书院发展的后期，佛道对书院的渗透以至共处一体的现象，则是书院的衰落，书院的世俗化、宗教化的表现。

综上所述，书院建筑群体布局与寺庙颇多类似，也都采取地方民间做法，但格调完全不同。书院适应文士的学习、生活需求，体现一派斯文气氛，与寺庙突出神的威严反映出的神秘色彩，形成鲜明对比。

书院与宗教有着"重人"与"尊神"的根本对立，因此建筑上表现出不同的格调，又有典雅与神秘的雅俗之别。但两者由于长期文化斗争中的渗透和交融，又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影响。外来的佛教走向了中国化，和本土的道教，都采取了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布局的寺观形式，和地方做法特点，因此书院与寺观又具有建筑共性特征，以至可以相互争夺利用，历史上寺观改院，或院改寺观，也曾反复出现。书院选择山林胜地、宗教活动据点，形成其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既反映与佛道争夺阵地，也吸取了丛林传法的教学经验，以图复兴儒学，扩大影响，极力体现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特色。书院后期，也曾有书院建立神殿、钟鼓楼，或风水塔之类，尊奉神像，甚至招僧道代管香火，以至有的书院形成儒

释道共处的局面，则反映佛道的渗透，书院的衰落现象。

第四节　书院与理学

书院与理学结有不解之缘。理学选择了书院作为传播的基地，得以迅速发展；书院则因理学而充实完善，更具特色，不断扩展。北宋理学先驱者胡瑗、孙复、石介、陈襄等，在庆历前后的讲学活动，已开创风气；特别是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推动，使庆历以后的书院活动，更加广泛深入。

周敦颐（1017～1073）宋代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终身致力于书院教育活动。周早在康定元年（1040）任分宁（今江西修水）主簿时，常与学者往来，讲学于所创书院，后人称之为景濂书院；次年监税萍乡芦溪镇，又"立书院以教授"，后人称宗濂书院；庆历四年（1044）任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时，程颢、程颐从其学；庆历六年（1046）任郴州知县时，曾建书堂讲学；嘉祐六年（1061）因"爱庐山之胜"，筑书堂于其麓，曾与虔州（今江西赣州）赵抃讲学；晚年归居书堂，读书讲学终老，后人名为清溪书院。周仕宦过程，办院讲学不断，继承孔孟，开创了儒学的理学新阶段，被尊为理学开山祖。后人建院纪念，命名濂溪，或宗濂、景濂、爱莲、太极等书院，先后遍及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广东，以及北京等地，达数十所之多；而各地书院立祠供祀者，更不可胜数。理学经程颢、程颐，再传杨时、罗从彦、李侗，至朱熹发展成熟，而书院亦随之达到完善兴盛。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兄弟同受业于周敦颐，深受影响，"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而"以恢复孔孟之道为己任"，共同创立洛学。洛学为北宋理学的最大学派，因他们的讲学活动，多在伊川、洛阳一带，故又称伊洛学派。二程曾多次在嵩阳书院讲学，传其学说，后人建二程祠于书院，以为纪念。北宋元丰五年（1082）河南洛阳伊川县鸣皋镇创建伊皋书院，程颐在此讲学，先后达20年，其著作也大都完成于此。伊皋书院的讲学、著作活动为最终形成二程理学思想体系，起了重要作用。崇宁元年（1102）程颐贬为元祐党人，门徒尽逐，程被迫迁居龙门山南耙楼山下（今嵩阳程村），但仍坚持收徒讲学，直至逝世。此后伊皋书院屡有兴修扩建，元仁宗赐名"伊川书院"，后又建有二程祠，并将二程弟子90余人，立名录碑于祠东西庑。

南宋理学的发展成熟，不同学派的相互争辩、交流，莫不以书院为基地。理学名家纷纷利用书院研讨学术、发展学派，培育坚实的人才群体。其中影响最大者，有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浙东金华学派。他们分别以考亭、象山、岳麓、丽泽等书院为主要基地，开展学术活动，而各具特色，共同促进书院建设的兴盛发展，对书院与理学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朱熹（1130～1200）为理学集大成者，继承发展了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学说，讲求明心养性、讲明义理的理学体系框架，使理学进入了成熟阶段。他终身致力于书院教育，较早制定学规，促进书院制度的完善，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的经典。朱

熹曾亲自创建三所著名精舍(书院)。乾道五年(1169)朱熹为母守墓,建寒泉精舍于福建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著述讲学,前后八年,培养了首批高徒,且成为其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寒泉精舍后名云谷书院,历代均有修建。淳熙九年(1182)朱熹又亲自规划,与弟子共建武夷精舍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武夷山五曲大隐屏峰下;在此著述讲学约7年之久,继重建白鹿洞书院之后,又一次发展书院教育事业,并成为其理学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时期;朱去世后,其子孙相继扩建,后改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该地成为理学家的活动胜地,人称"道南理窟",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绍熙五年(1194)朱熹承先父之志定居考亭,兴建竹林精舍于福建建阳三桂里(今福建南平地区),为其晚年居家讲学之所,内设燕居庙,供祀孔子、四配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竹林"精舍后更名"沧洲",对南方书院发展曾有重大影响;朱晚年虽处逆境,但坚持著书、讲学不辍,去世后舍内曾辟专祠祀之;南宋淳祐四年(1244)理宗赐额"考亭书院",后历代均有修建。朱熹一生执著书院教育,所到之处,莫不关心书院建设,进行讲学活动,因此与南方不少书院有过直接联系,尤对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建设发展关系密切,影响深远。淳熙六年(1179)朱知南康军时,即着手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主持规划筹措,制定规章,开辟了白鹿洞书院发展的新时期;其所订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全国书院的学规典范,曾影响全国,以至海外;后虽淳熙八年(1181)离任,仍关注和筹措支持白鹿的建设发展。朱熹曾先后两次访问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专程自闽赴湘访院,与张栻论学,首开书院会讲之风,形成"岳麓千徒"之盛,并留下了诸多遗迹;绍熙五年(1194)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再度访院讲学,并亲自整顿书院,筹划扩建,将《白鹿洞书院揭示》立为岳麓学规,由此朱张之学成为岳麓传统。元代岳麓书院曾供祀朱张于诸贤祠,明代又建崇道祠专祀朱张,故又名朱张祠。朱熹门人可考者有数百之多,他们又承师志,致力书院教育,传播朱学;再传弟子相继奋起,亦莫不重视书院教育和理学发展;至理宗时,有真德秀、魏了翁等一批朱学门人,为确立理学的统治地位,使书院教育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也是与书院分不开的。理学家胡安国(1074~1138)、胡宏(1105~1161)父子于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因避战乱来到湖南湘潭碧泉定居,创建碧泉书堂,从事研究和讲学,传播理学;后又于南岳紫云峰下创建文定书堂。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继承父业,潜心研究学术20余年;书堂扩建为书院,"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成为湖南最早的理学基地,湖湘学派的摇篮。张栻(1133~1180)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从学于胡宏,曾与乃师创建道山书院于湖南宁乡,后又以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其教学阵地,发展湖湘之学。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达七年之久,确立其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使之成为湖湘学的主要基地,而闻名于世。书院因此更加兴盛,湖湘之学得此发扬光大,所树学风影响深远;所育人才颇有建树,不少继承发展书院教育。张栻被尊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东南三贤"之一。

象山学派,"其宗传亦最广",宗师陆九渊(1139~1193)创理学的心学学派,独具特色。其书院教育,少读书,多讲论,无学规,着重自我修养,躬行实践。陆早年讲学于槐堂书屋,因从学者众,致不能容;淳熙十四年(1187)门人建象山精舍于贵溪应天山,迎往讲学,先后五年,著录者达数千人之多。陆离去后,精舍由门人主持,后改书院,并建象山先生祠以为纪念;绍定四年(1231)迁建于贵溪三峰山之徐岩,继续办院,宣扬陆学;并供祀陆氏兄弟及其弟子杨简、袁燮,又请得理宗赐额,继续成为陆学中心,被视为陆氏后学的"祖坛";后一直办学,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发展繁荣,清代屡有迁建。陆门徒众,又多建院讲学,谨守师说,极力构筑陆派门户,促进了江西、浙江等地书院的发展。尤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对于书院教育,学派发展,更多贡献。

金华学派又称婺学、吕学,宗师吕祖谦(1137~1181)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吕在明招山（今浙江武义境内）讲学，建丽泽堂为会友传道之所，“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光绪《金华县志》）；订立《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为书院最早学规。后丽泽堂迁建金华城中，改名丽泽书院；吕去世后，后人立祠纪念，扩建书院，有吕祖谦祀室，及收藏吕氏生前著作的遗书阁；同时书院刻书出版，成为宋代书院本的珍品。淳祐六年（1246）书院迁建双溪之畔，得理宗赐额；后又有迁建，直至明末毁于兵火。丽泽历时四百余年，继承发展，形成其“兼收并包”、“兼习文史”、“培育实才”的传统学风特色；“称霸东南”，对南宋以至后世学术文化，以及书院教育，都有重要影响。

元代书院仍与理学发展密切相关。元代推进其封建化实行“尊孔崇儒”的“汉化”政策，“尊崇理学”，保护提倡书院教育。元初在燕京首建太极书院，立为楷模，欲“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使南学北移。赵复（宋元之际理学家，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主院，传播程朱理学，其门人又创院讲学，皆以程朱理学为本。元代已确立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的法定地位，以朱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惑”（《道园学古录·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唯一的国家统编教材，作为科举取士的统一标准，“设科取士，非朱子之学者不用”（《上饶县志·儒林》）。理学家程端礼（1271～1345）推崇朱学，所编著《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将朱熹读书法精神，具体贯彻于实际教学，成为元代书院以至官学通行的教学指导纲要，对元代以及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反映了中国教学课程计划特点，以及书院教学的程朱理学化、书院与官学教学趋同的倾向。元代中后期的理学发展，产生了“和合朱陆”的趋势，以纠朱学支离和陆学禅化之偏，取长避短，对书院教学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吴澄（1249～1333）奋力于书院教育，在朱陆合流的潮流中最具影响。他从事教学著述六十年，自“草庐”讲学，及应邀赴各地书院和官学执教主讲，帮助他人建院讲学，并资助贫寒学生学习，培养了大批学生，弟子遍布各地。“学者之及其门，南北常数千人”（《道园合集·送李伯宗序》），其中尤以江西为最，更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明代仍崇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大力发展官学，加强科举，且皆以朱学为标准，并推行八股文；致使朱学日益僵化，失去活力，而书院沉寂百年无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专制政治腐败，官学科举衰落，士人力图突破朱学的僵化、禁锢，不同学派再度兴起，促进了书院的恢复发展。新书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远超前代，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尤以王守仁为宗，阳明心学兴起发展，“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成为学术主流，并开一代风气，把理学发展推向顶峰。

王守仁（1472～1529）初潜心于程朱理学和佛学，后转为陆九渊心学，开创阳明学派。他自明正德元年（1506）被贬贵州龙岗后，创办龙岗书院，开始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提出怀疑，改而倡导“良知”之说。一时“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阳明全集》卷六）。主又讲学贵阳文明书院，曾讲“知行合一”理论；随后在江西、浙江、两广等地任职，都热衷于书院的修建和讲学。如是王学风靡全国，盛极一时，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王门弟子遍及全国，形成一个思想活跃、体系庞杂的流派；其中派系甚多，据《明儒学案》，分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大系统；各派均致力于书院教育，继承发展王学。虽王守仁去世后，王学被禁为“伪学”，但王门各派仍不弃师说，坚持发展，并编印遗书，广为传播，影响扩大。此外，明代还有甘泉、东林、蕺山等学派的兴起发展，亦皆以书院为基地，致力于书院教育。

书院讲会自王守仁倡导成风，形成明代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作为当时较为普遍的教学形式，都要建立一定的制度，订立会约、会规，并有一定宗旨、组织、会期、仪式等。其活动突破书院范围，深入民间社会，更为开放，深得人心，以致屡禁不止。

宋明理学的发展，带来书院的兴盛，使之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科举制度的严格约束影响下，理学日益僵化、空疏，渐失活力，书院也随之渐失特色。

尤其清代的直接利用控制，更促使书院向官学化、科举化发展，多成科举的附庸。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书院最终也必然走向衰败消亡。

理学的礼乐思想、传统教育、学派宗师的纪念，以及超脱世俗，修养心性，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等等，对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的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理学既是一个哲学学派，又是一个教育学派，书院适应了理学的发展需要，理学以书院为基地，更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兴盛，从而奠定和完善了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随着理学学派的发展，理学家们都热衷于书院的建设，纪念宗师，传道授业，前规后随，发展学术，世代相传，延续不断，从而保持了书院很强的传承性。理学家们对于选择和经营书院的优美环境，严谨规整的建筑布局、朴实典雅的做法风格，莫不体现其理想追求，创造其“天人合一”，修养心性的理想境界，从而形成了书院建筑艺术的传统思想基础和文化特色。

[1] 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分为五学。中间叫“辟雍”，又称大学，周围环水，为天子举行飨射及承师问道的地方。另四学分设四周，水南叫“成均”，是大司乐教乐德、乐语、乐舞的地方；水北叫“上庠”，典书、诏书者在此；水东叫“东胶”，又称“东序”，为学习干戈习龠的地方；水西叫“西雍”，又称“瞽宗”，学礼者在此。五学中以辟雍为尊，所以大学统称为辟雍。诸侯的大学，规模较小，仅有一学，半环以水，所以又称“頖宫”、“泮宫”（参见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



第三章

建筑特征

有书院，必有书院建筑。书院建筑的选址、形制、造型、装修以及环境小品一定是书院文化特征、功能属性，甚至空间观念（包括世界观）的象征或符号。

第一节　书院选址与布局

书院建设，历来重视环境的选择。早期书院，常因人而设：或为乡儒读书、讲学之所，或因名贤过往之处，或为纪念学派、宗师而建；大多择山林胜地，既避战乱，又免市俗干扰，以利隐居读书，潜心治学。以后书院发展普及，多由地方官员和乡绅集资兴建；选址则多就城镇郊区或边缘，既考虑地域交通条件，便于学者往来，又远离市中心而不喧闹、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后期也有因受官府影响，便于其监督管理和考课方便，或因利用旧有房屋，而设于闹市之中；但往往因此产生环境干扰问题，又屡有搬迁。书院的选址，特别看重环境本身所产生的教育作用：既重自然山水景观，之陶冶心性；又重人文历史环境，之启迪思想。因此，风景名胜区，多有书院建设。或山上台地，或山谷坡地，或山麓平地，都可成为书院建设的场所。尤其南方景色优美，山清水秀，若依山傍水，山环水绕，更是书院的理想境界。不少书院还刻意借山水命名，以显示其环境特色。

从以下图例，也可了解书院对环境选择、利用的特点。（图 3－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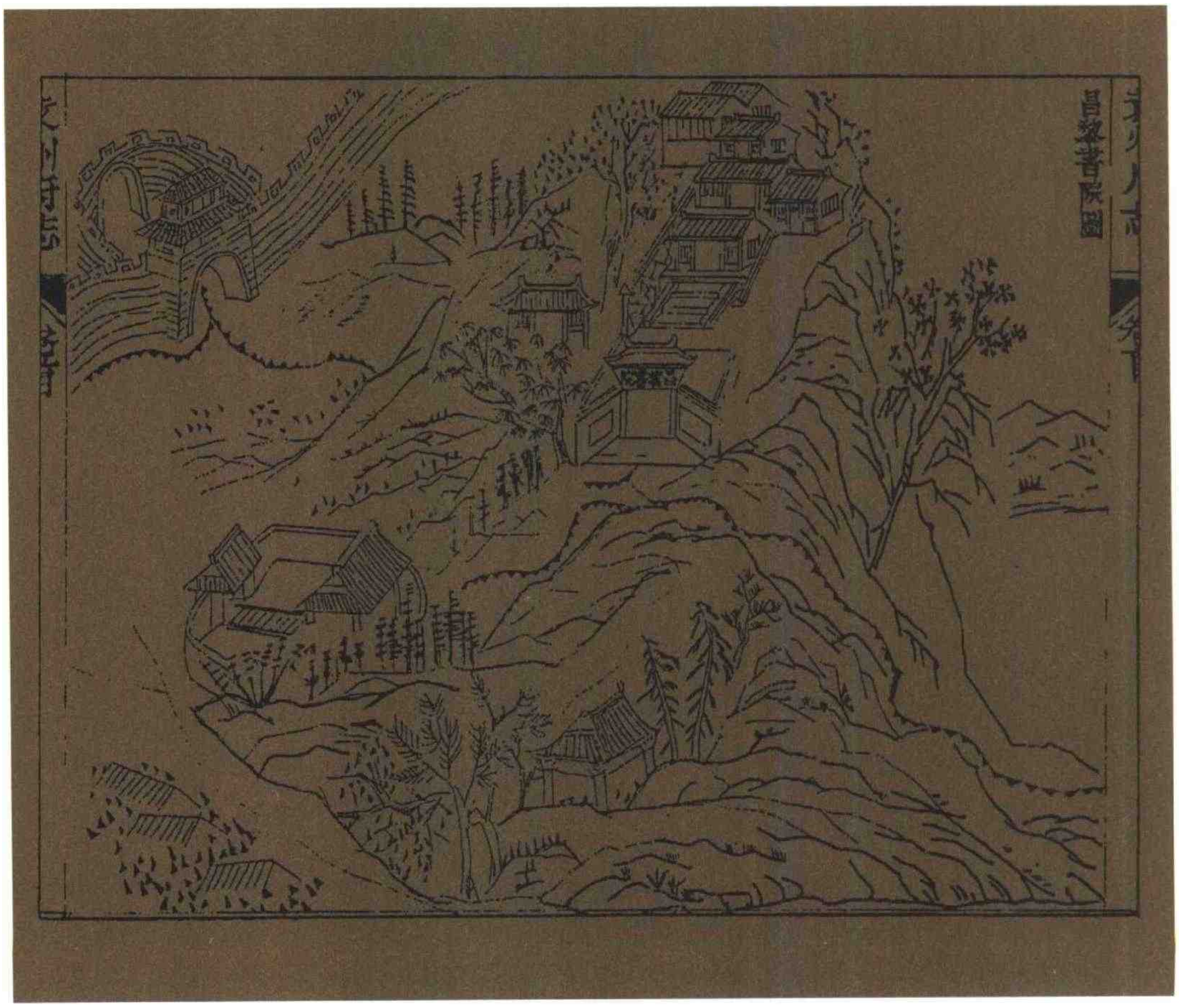


图 3－1－1　昌黎书院（图载清同治版《袁州府志》）在江西宜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将春台山韩文公祠改建而成，设有讲学、藏书、供祀之所，以纪念韩愈，故名。经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增修，“堂庑巍然，楼阁翼翼，斋舍鹿浯”，一应俱全。清末改学堂。尚存部分遗构。该建筑建于山上，因地制宜，布局灵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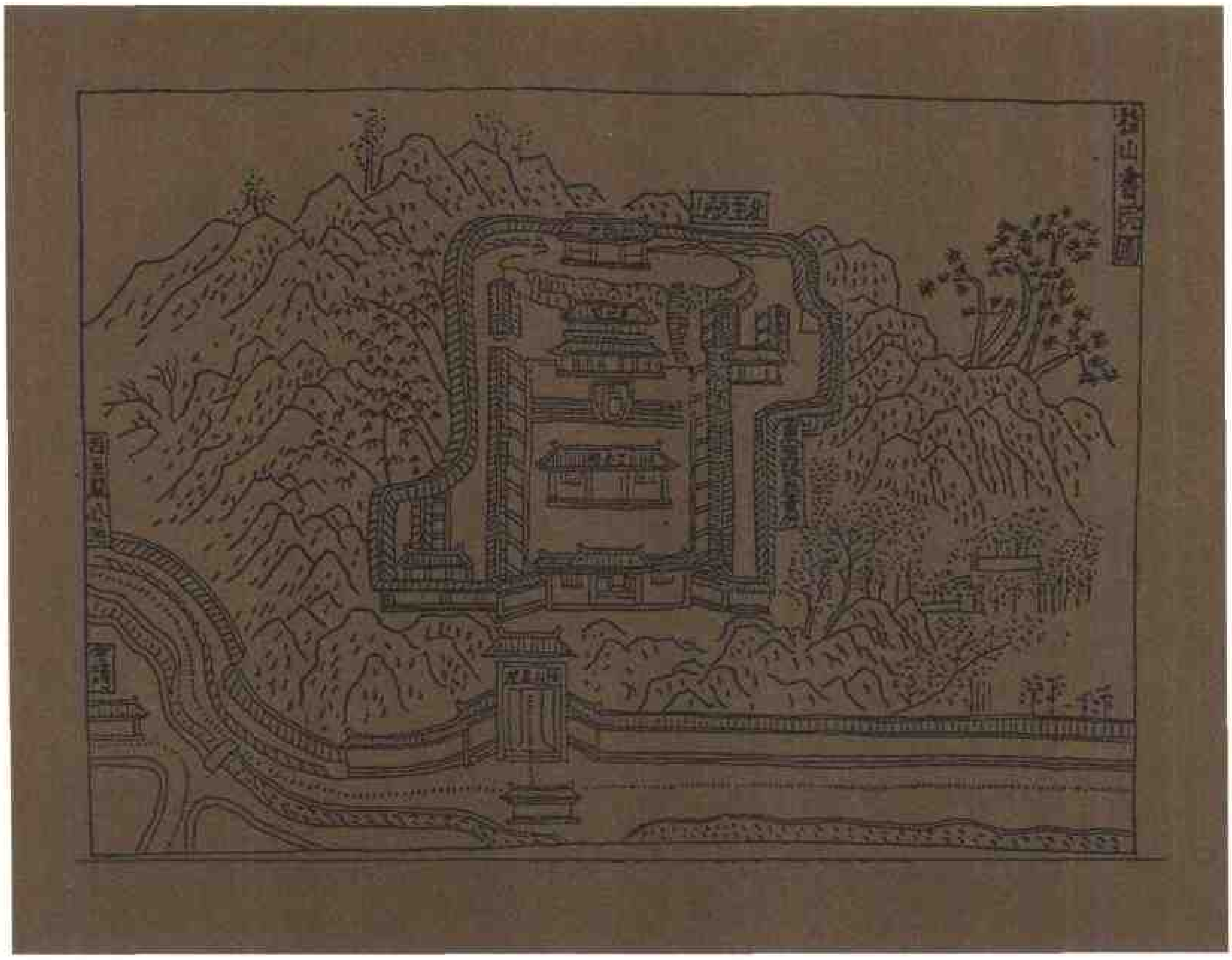


图 3-1-2　稽山书院(图载清康熙版《绍兴府志》)　在浙江山阴。朱熹曾讲学于卧龙山西岗处，后建祠纪念，复建为书院。元至正间增修，后废。明正德间重建于故址西麓，嘉靖三年(1524)扩建，增明德堂、尊经阁。万历七年(1579)奉例被毁，后改朱文公祠。清康熙十年(1671)重建。建筑处于山中，形成较规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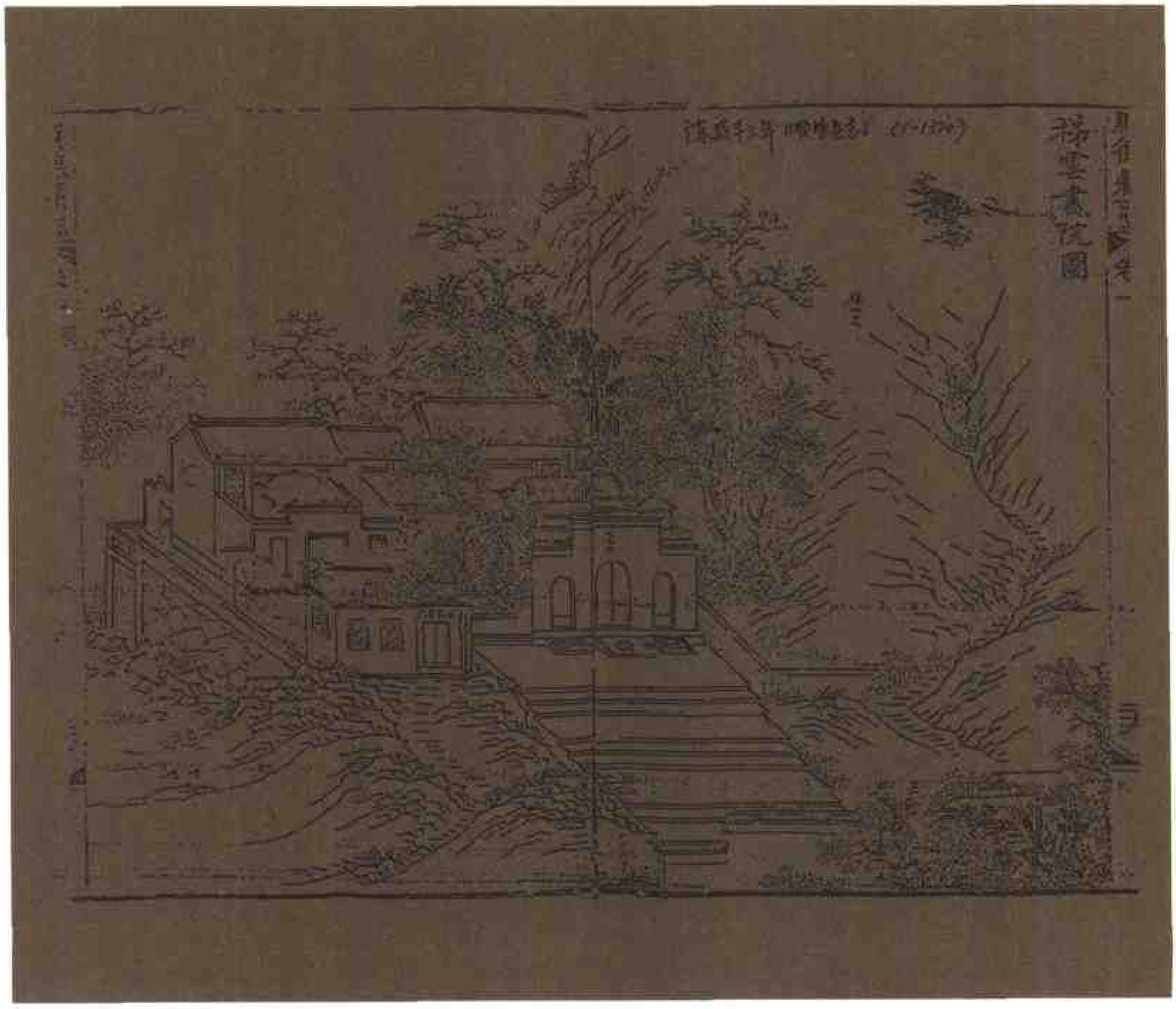


图 3-1-3　梯云书院(图载清咸丰版《顺德县志》)　在广东顺德。清乾隆十四年(1749)创建于梯云山麓，有大门、讲堂、斋舍及寝堂，左有文昌宫，供祀文昌帝君，成官院并列格局，生徒30余人。后屡有修建，并成为顺德文会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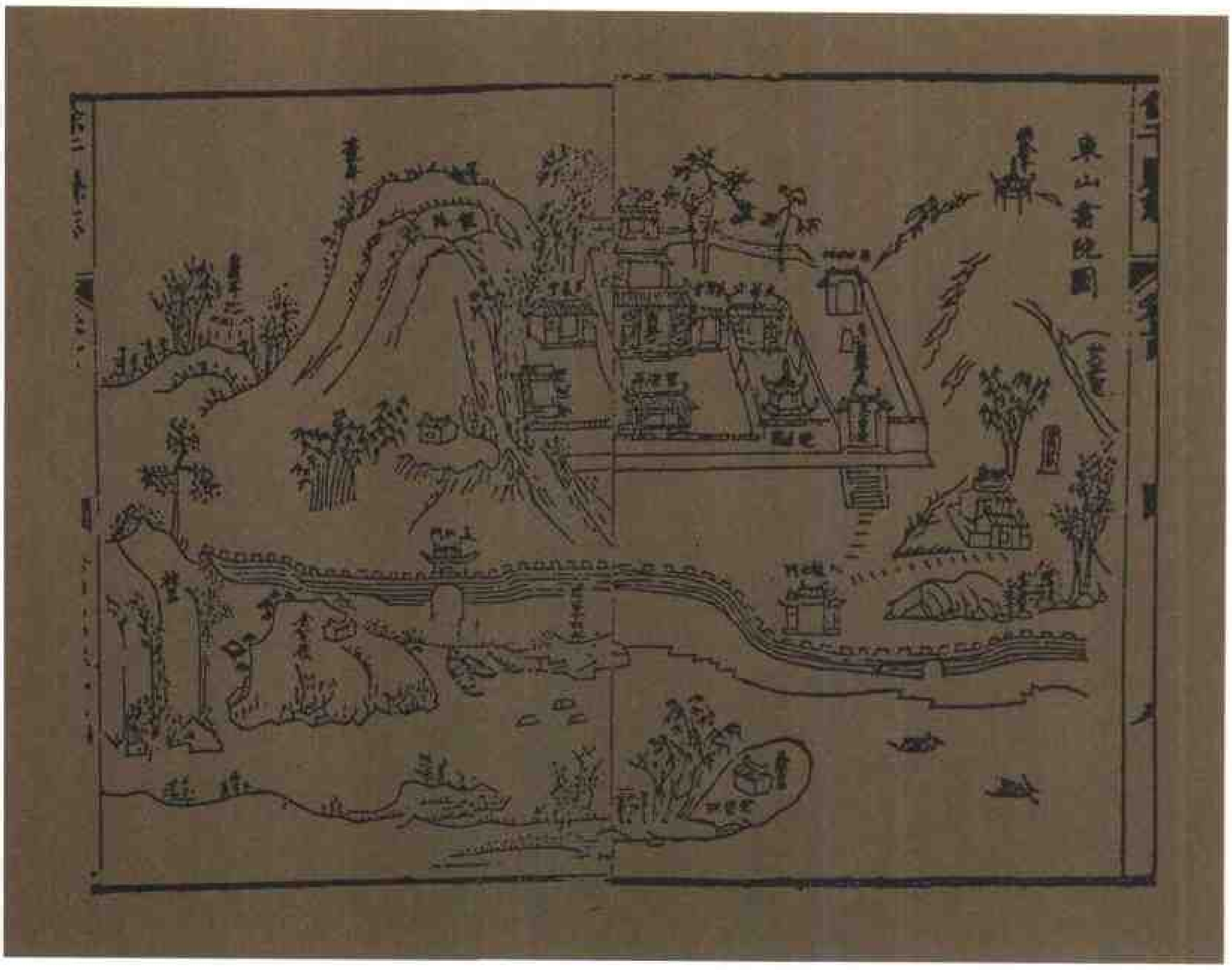


图3－1－4　东山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余干县志》)在江西余干。宋淳熙间建于冠山东峰，延请朱熹讲学，朱题堂名"云风堂"。后毁入寺。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于绝顶，后又毁。正德六年(1511)迁建于冠山中峰，中构堂五间，南有祠，堂东仍构云风堂，西筑讲堂、东西斋号房。万历八年(1580)复废，后重建，明末圮。清顺治十一年(1654)重修，后屡修建扩建，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时有云风堂、千越亭、集义堂、慎独堂、丽泽堂、文昌宫、魁星阁，后又在门外建入院门坊，建筑横向拓展，以适应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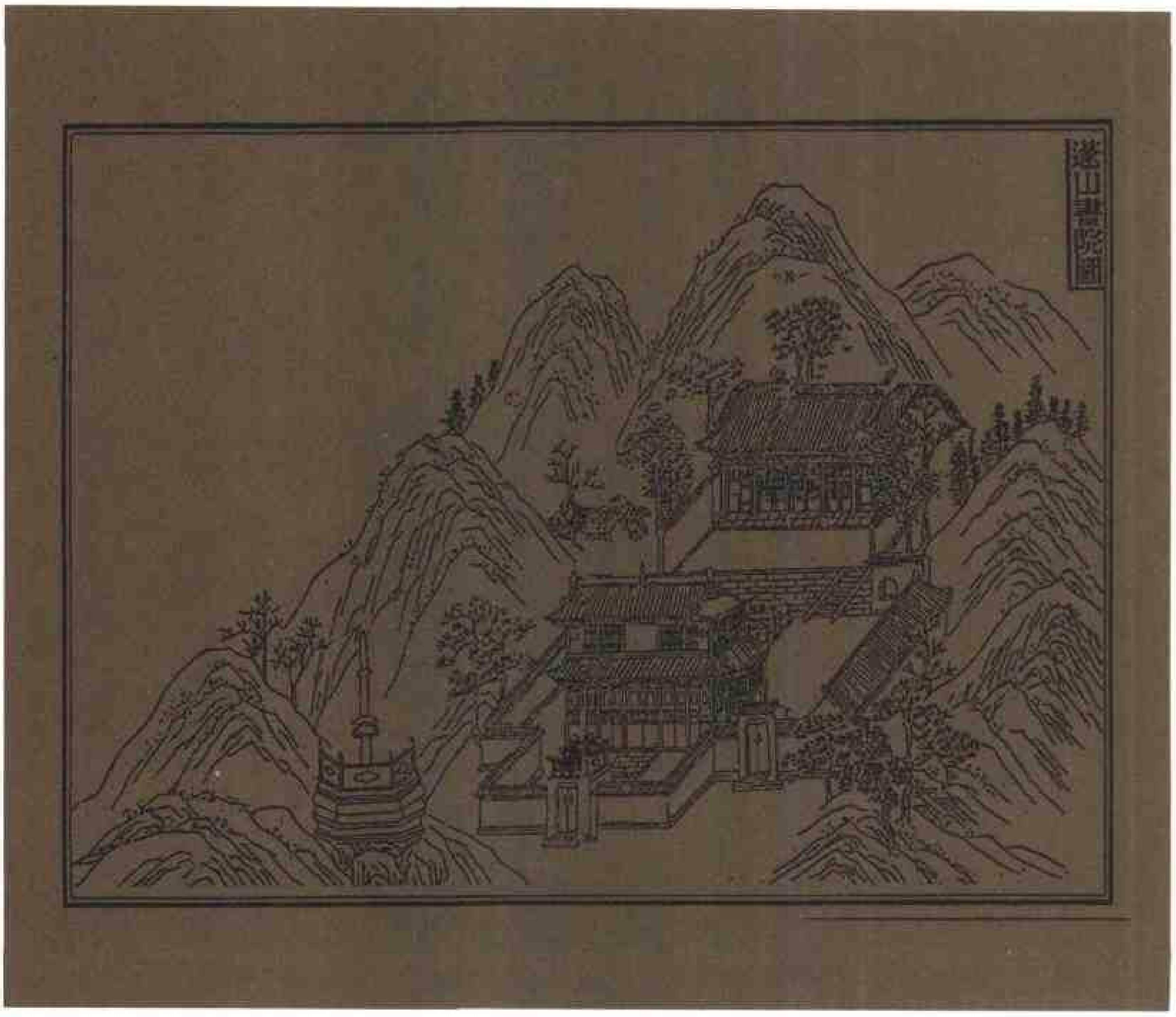


图3－1－5　蓬山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定海厅志》)在浙江定海。清同治元年(1862)乡人创建于房山麓，初名劝善仙馆，后以为不雅，遂改名蓬山书院，以劝善为宗旨，兼课文艺。光绪十一年(1885)增设同文塾。后改高等小学。



图 3-1-6 问津书院(图载清光绪版《黄冈县志》) 在湖北黄冈。该地传为孔子自陈蔡去楚过此，后人掘得"子路问津处"石刻，故名。元初曾建孔子庙讲学，元末毁。明正德时建亭、立碑纪念，隆庆初重建讲学，万历时移建于500步外，题额"问津书院"，曾盛极一时，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六年(1667)先后修建讲堂，中奉先师像，西为仲子祠，东为先儒祠。乾隆八年(1743)改东西祠为两庑，东祀仲子及沮溺，西祀朱子及先儒，建学舍、藏书馆、从先堂、文昌阁、魁星楼等。后屡有修建，形成较为密聚的建筑群。曾编有《问津书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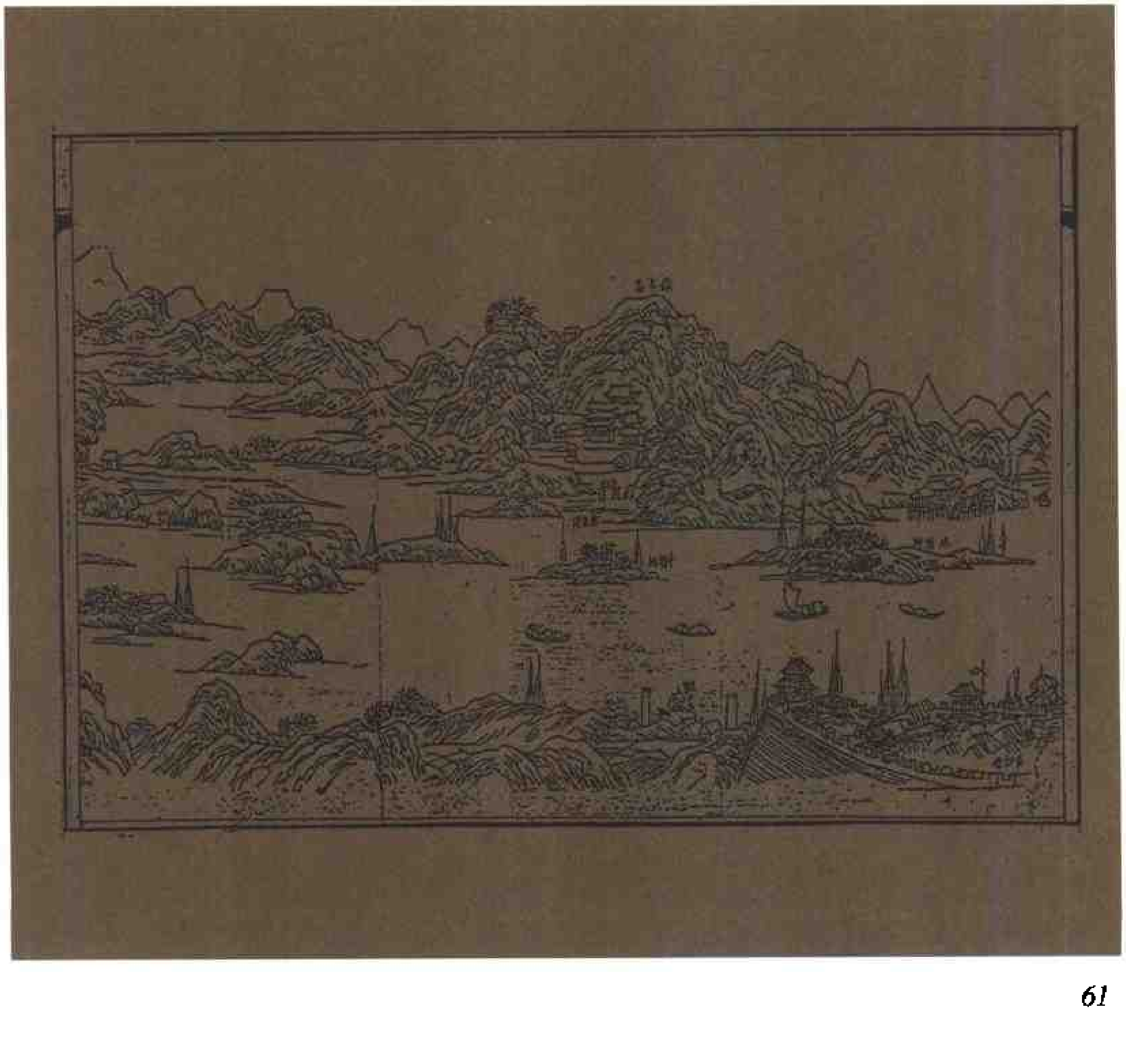


图 3-1-7 岳麓书院(图载民国版《南岳志》) 该图为《岳山图》长卷中的岳麓山的一段，反映岳麓书院处于岳麓峰下山麓，前有湘江，成为麓山中心的特点。



图3－1－8　龙河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万载县志》)在江西万载。清乾隆九年(1744)知县创建于龙山，原名龙山书院，二十年(1755)移建于城北龙河东岸马脑山侧，改名“崇文”，二十四年(1759)又改名“龙河”。道光二年(1822)重建。后改中学堂、中学校，仍有部分遗存。建筑处于平坦地段，布局规整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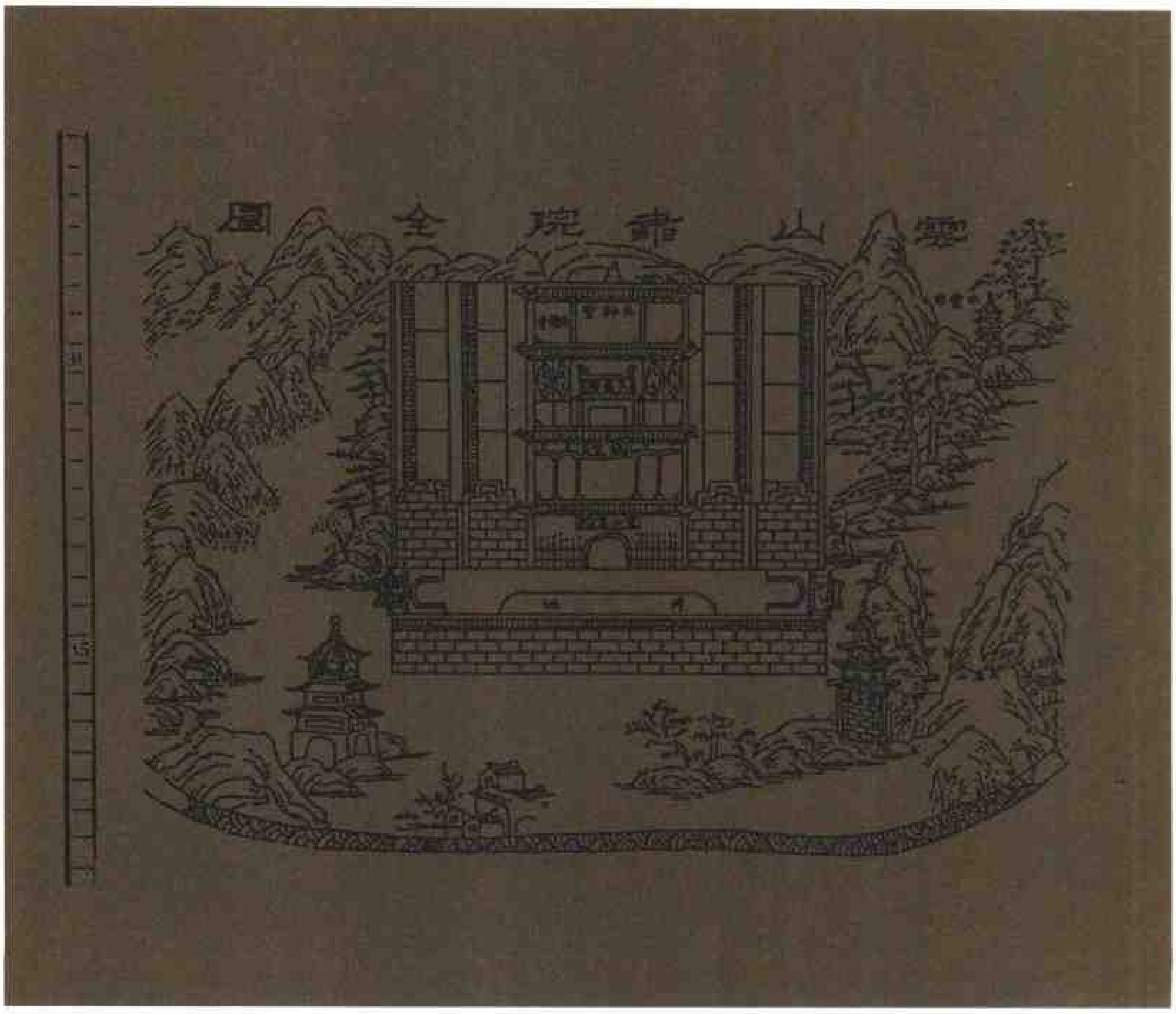


图3－1－9　云山书院(图载清《宁乡云山书院志》)在湖南宁乡。清同治四年(1865)建于水云山下，有步云桥、总会门、东西云门、讲堂、崇道堂、希贤堂、先贤堂、仰极台、凌云亭、奎光阁、文昌阁、藏书楼、东西八斋等，可容生徒160人，并辟有书院“十景”。清末改高等小学堂。后改云山学校，何叔衡、谢觉哉等曾先后就读、任教于此。今继续办学。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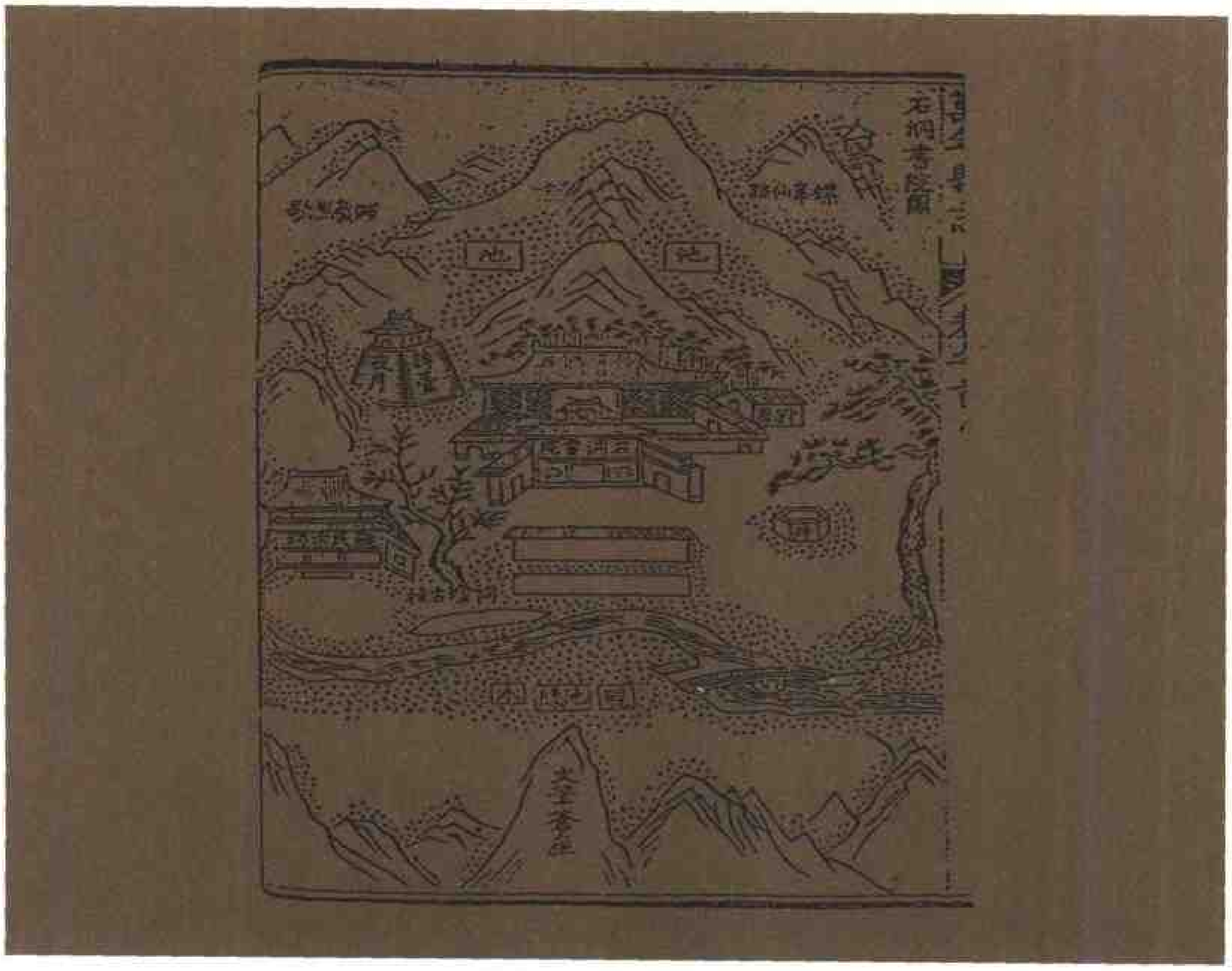


图 3-1-10　石洞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万年县志》)　在江西万年。宋儒饶鲁建于双峰山前，又名双峰书院，仿白鹿洞规制，中祀孔，配四哲及周、二程、张、朱五贤等。明正德八年(1513)曾迁建县治东坞永安街。清康熙四十年(1701)重建原址，后续有修建。



图 3-1-11　正谊书院(图载清道光版《武宁县志》)　在江西武宁。清乾隆十八年(1753)知县建于古艾镇东门朝元宫，中为敬业堂三间，后有掌教厅三间，东斋九间，客房四间，西斋九间，厨房二间，头门三间，东西门房各三间。原名豫宁书院，道光三年(1833)改名“正谊”，曾订规40条。清末改高等小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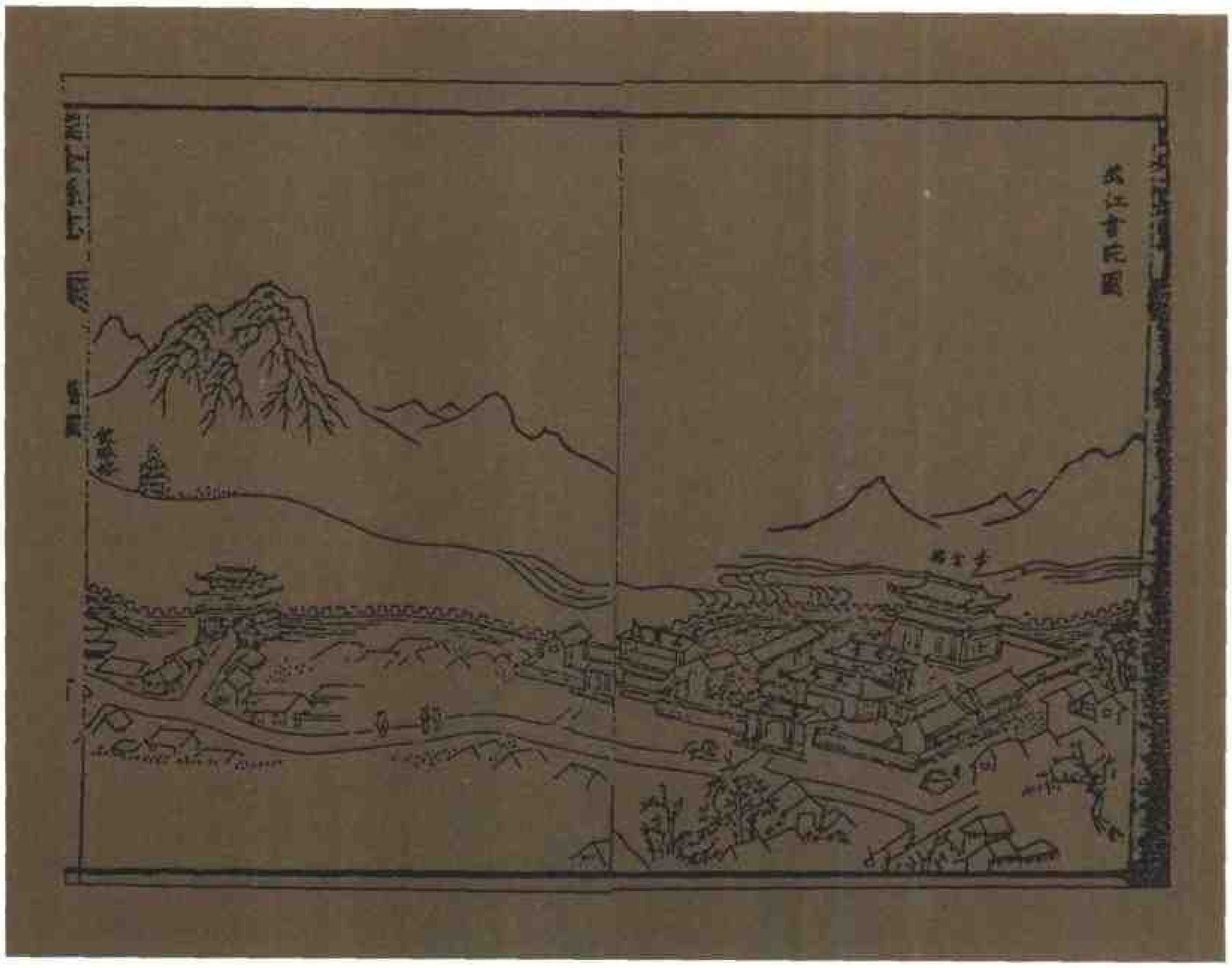


图 3－1－12 锦江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瑞金县志》）在江西瑞金。明嘉靖十七年(1538)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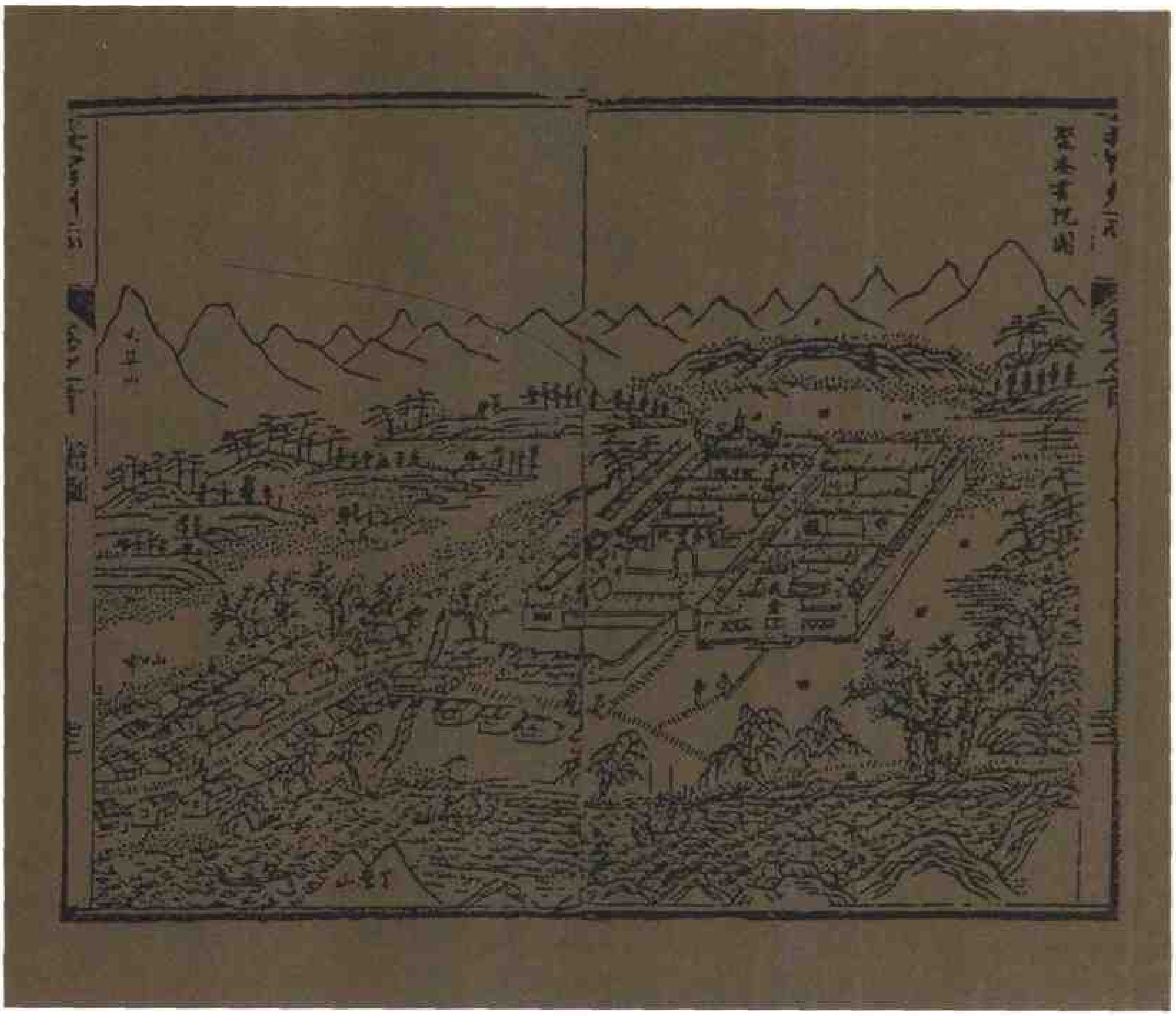


图 3－1－13 聚奎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义宁县志》）在江西修水。清咸丰十年(1860)建，成背山面水之势。



图 3-1-14 奎光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義宁县志》）在江西铜鼓。清道光十七年(1837)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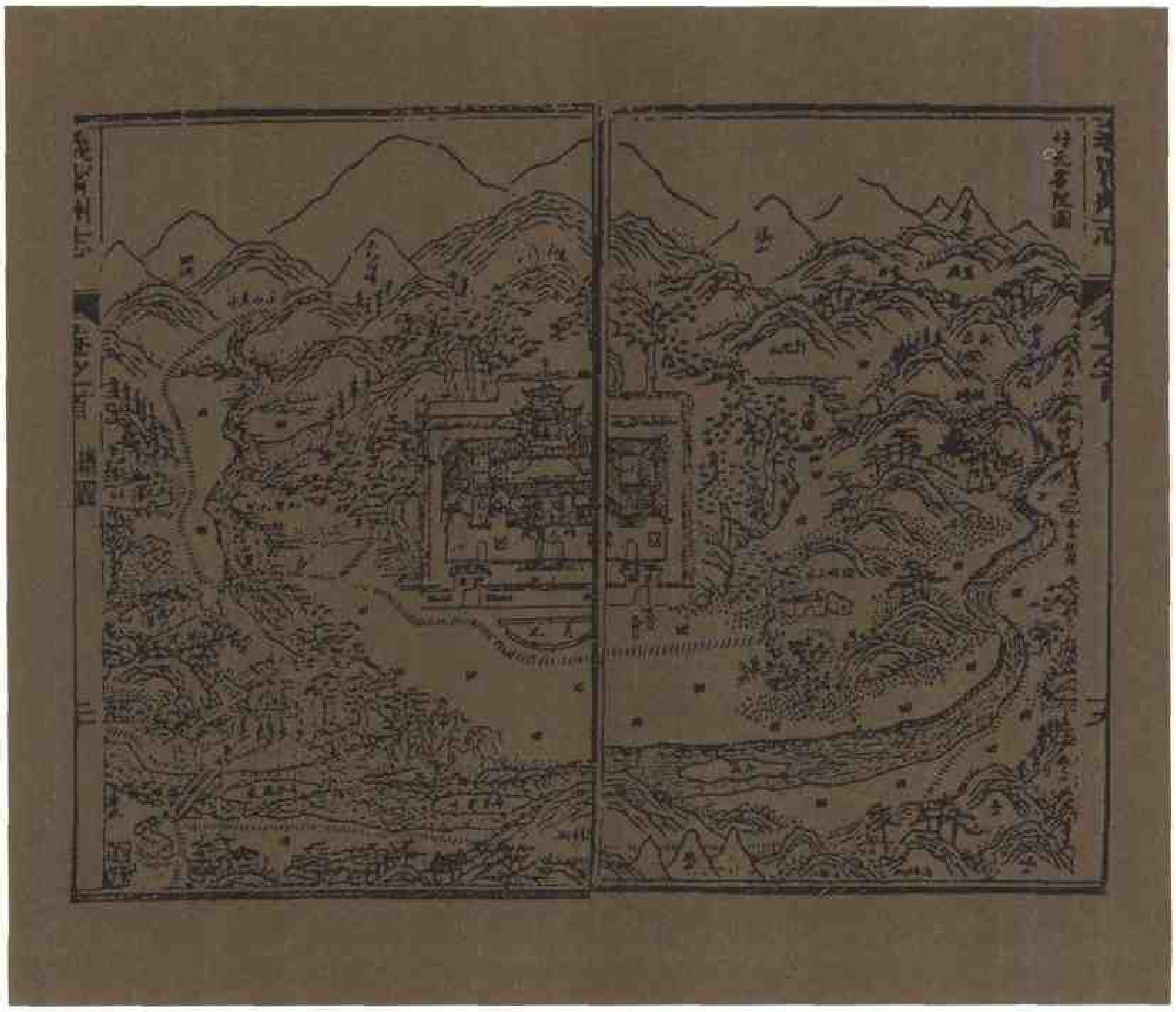


图 3-1-15 培元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義宁县志》）在江西永修。清同治五年(1864)建，成山环水绕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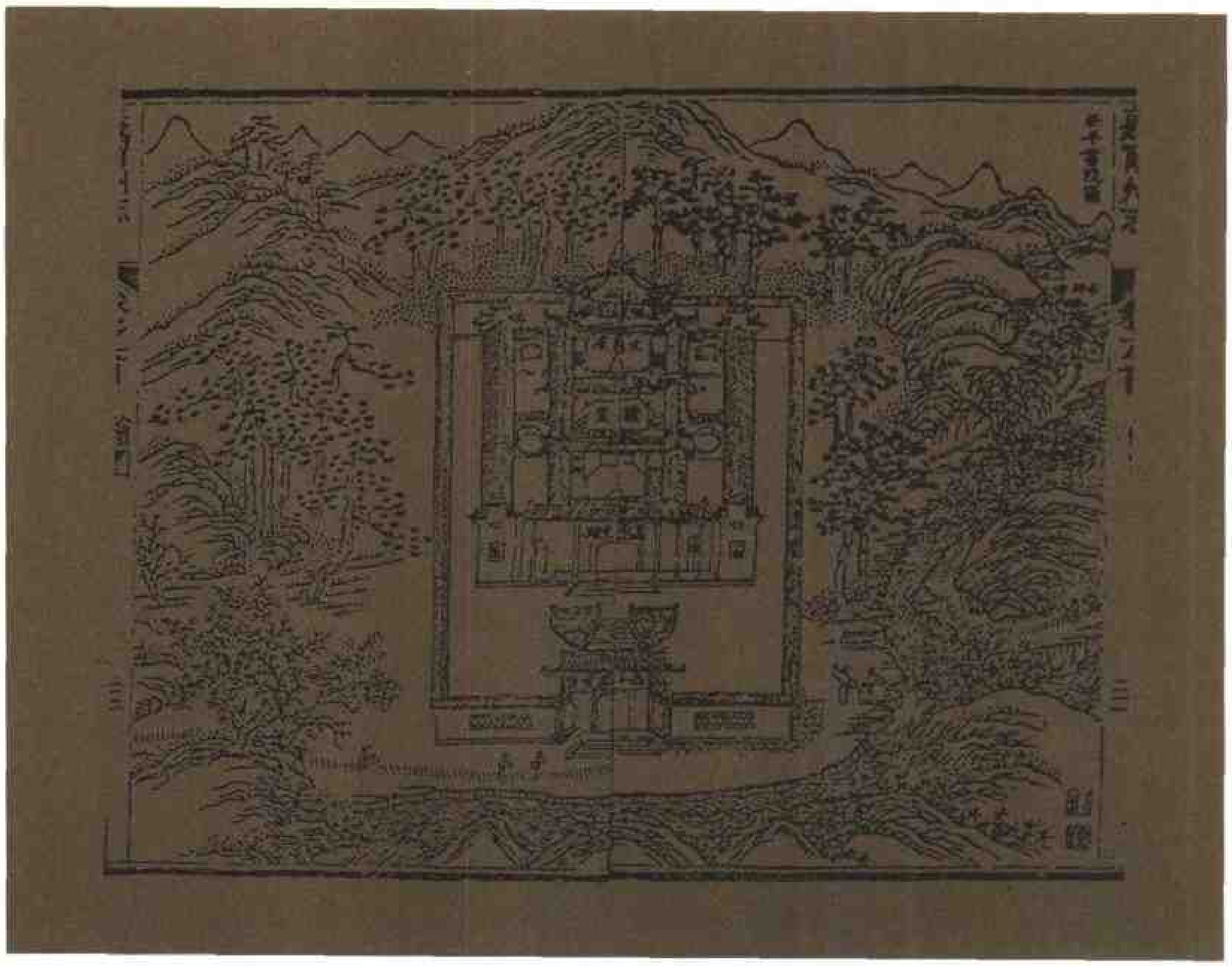


图 3-1-16 西平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義宁县志》) 在江西修水。清道光二十年(1840)建。



图 3-1-17 仁义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義宁县志》) 在江西修水。清道光三十年(1850)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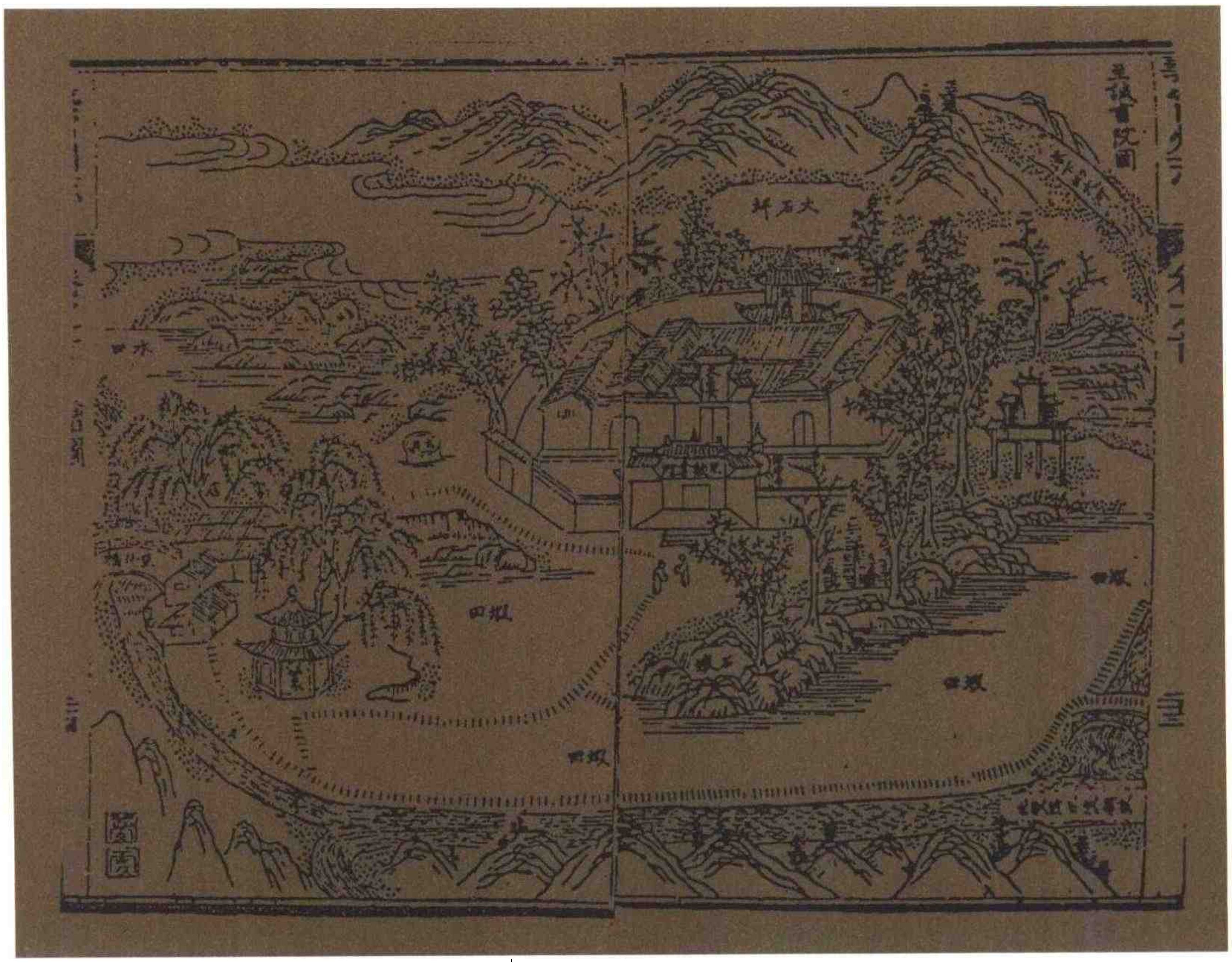


图 3－1－18 至诚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义宁县志》） 在江西铜鼓。清同治元年(1867)建。

书院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条件，因地制宜，依山就势，或纵深布局，或横向展开，灵活多样，尤重背山面水，山环水绕之势；建筑以院落或天井组合有序，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与自然环境、庭院绿化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书院呈现出朴实、典雅的地方风貌，构成当地特有的一处重要文化景观。

书院较早产生了其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以及学习、生活、游息相应的场所，一直相沿发展，固定为书院建筑功能的基本组成内容。用于讲学的讲堂，是书院教学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一般处于书院建筑群的中心位置。讲堂除供讲课之外，还可举行会讲、讲会、文会等学术聚会活动，并可容纳院外学者参加。一般为三至五间规模，个别也有七间的；堂前多有较开敞的庭院，必要时也可作为临时扩大、灵活使用的室外空间，以增加讲堂容量。在小书院讲堂也有兼作祭祀之用的，有的大书院还另设小讲堂，以适应多种教学活动的需要。用于藏书的书楼，大都是书院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书院无不重视图书的收藏，常常会得到社会和师生的捐献，一些著名书院还受到朝廷赏赐，有的书院也自行刻印图书，珍藏之外，服务社会。书楼一般三至五间规模，高二至三层楼阁，成为书院最高的建筑；多处于书院后部，较为幽静的环境。小书院也有书楼与祭堂或讲堂结合安排的。用于供祀的殿堂或专祠，其布置与活动，为书院重要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也是书院重要特色之一。一般由学者创建的书院，多供祀本师为主，如朱熹之祀李侗、湛若水之祀陈献章等；地方为纪念先贤而建的，则各有专祀，如濂溪书院之祀周敦颐、紫阳之祀朱熹、东坡之祀苏轼等。在理学取得正统地位之后，书院较普遍地供祀"宋儒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清代经学书院，则不祀宋儒，而专供汉儒许慎、郑玄等，反映其学术思想的不同。在一些由地方官员主持创建或重建增修的书院，则多设礼殿供祀孔子，特别是有些未建孔庙的地方，书院几乎就成为地方祭孔的场所。殿堂或专祠，规模一般三至五

间，大多处于讲堂前后，或另成侧院。少数书院有的还专设孔庙，自成院落；其中大者径仿州县官学之制，如岳麓书院形成院庙并列的局面，这显然是受到官学的影响。随着建设的发展，书院对于地方乡贤名宦、建院功臣，以及著名山长，也多有供祀，院内往往设有各类专祠，以树立地方楷模，加强地方历史传统教育。书院后期，祭祀内容日益庞杂，多增祀文昌、魁星，而修建文昌阁、魁星楼等建筑，少数书院甚至还供祀山神、土地、菩萨，以及修建风水塔等，以祈求功名利禄，形成儒释道共处现象。这显然是受到世俗宗教观念的影响，已非书院原有特色。

书院以居学为重，自学为主，故大都建有学生住宿学习的斋舍：一般一院数斋，每斋数舍。因规模不等，小院两厢斋舍数间，大院数十百间，一般多为单层廊房形成；后期亦有两层者，并相应配置厨厕等辅助设施。山长亦住院教学，专设居处，多在书院后部，另成小院。由此师生朝夕相处，切磋学术，言传身教，感情融洽，为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及。

书院因重视环境给人的影响，讲求景观庭院建设，大都利用院内外自然条件，构筑亭池园林景物，自成佳境，提供息游场所；闲暇时师生共游观赏，随感而发，交流思想，探讨学术，成为书院的第二课堂，更是书院突出的传统特色，也是官学和一般私塾所不及的。下列图例，可反映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图 3－1－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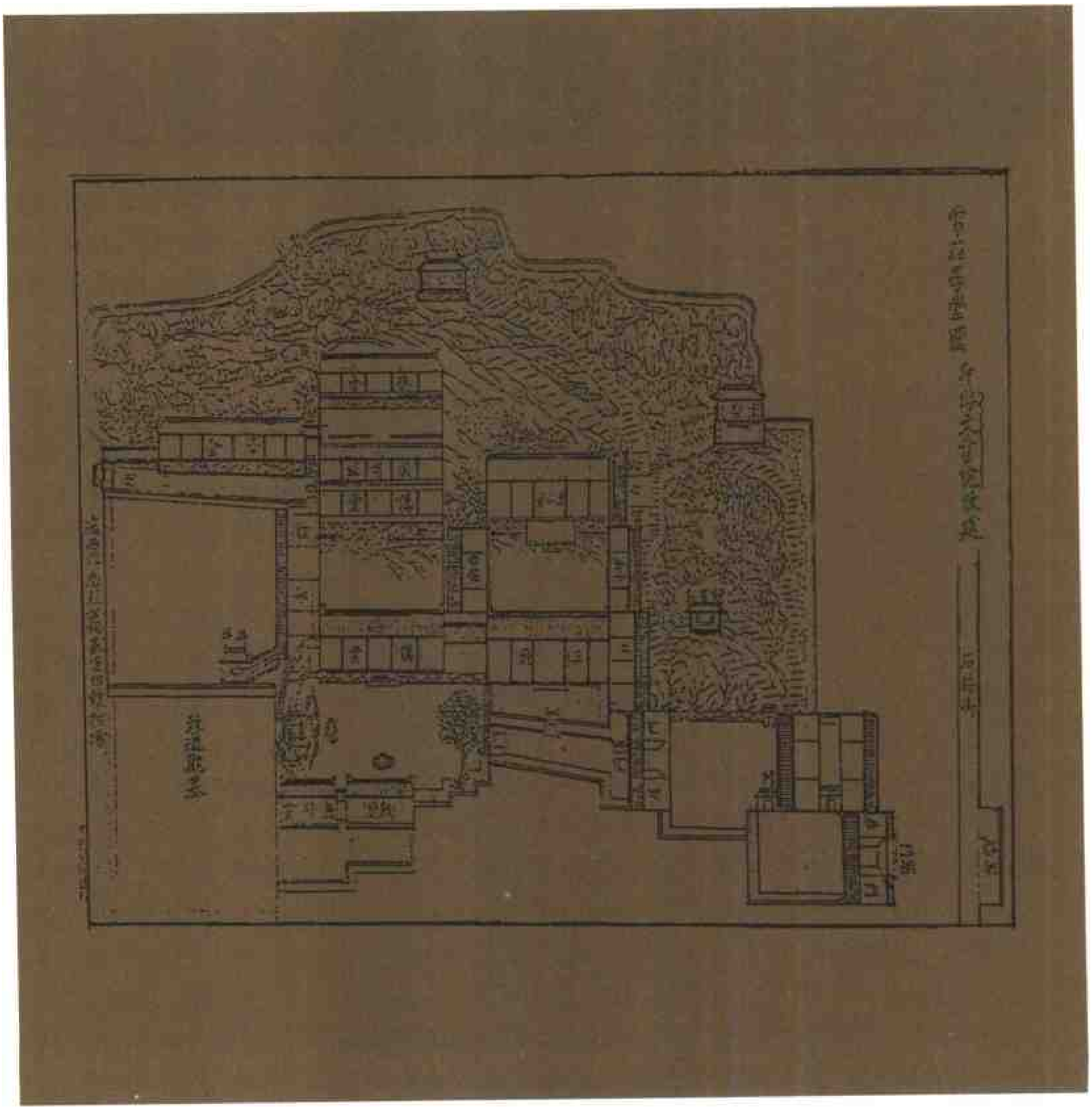


图 3－1－19　游文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常昭合志》)　在江苏常熟。清康熙末建为士子会文之所，雍正三年(1725)扩建为书院，定名"游文"。经同治时重修，清末改学堂。书院依山而建，与园林融为一体，建筑布局较为灵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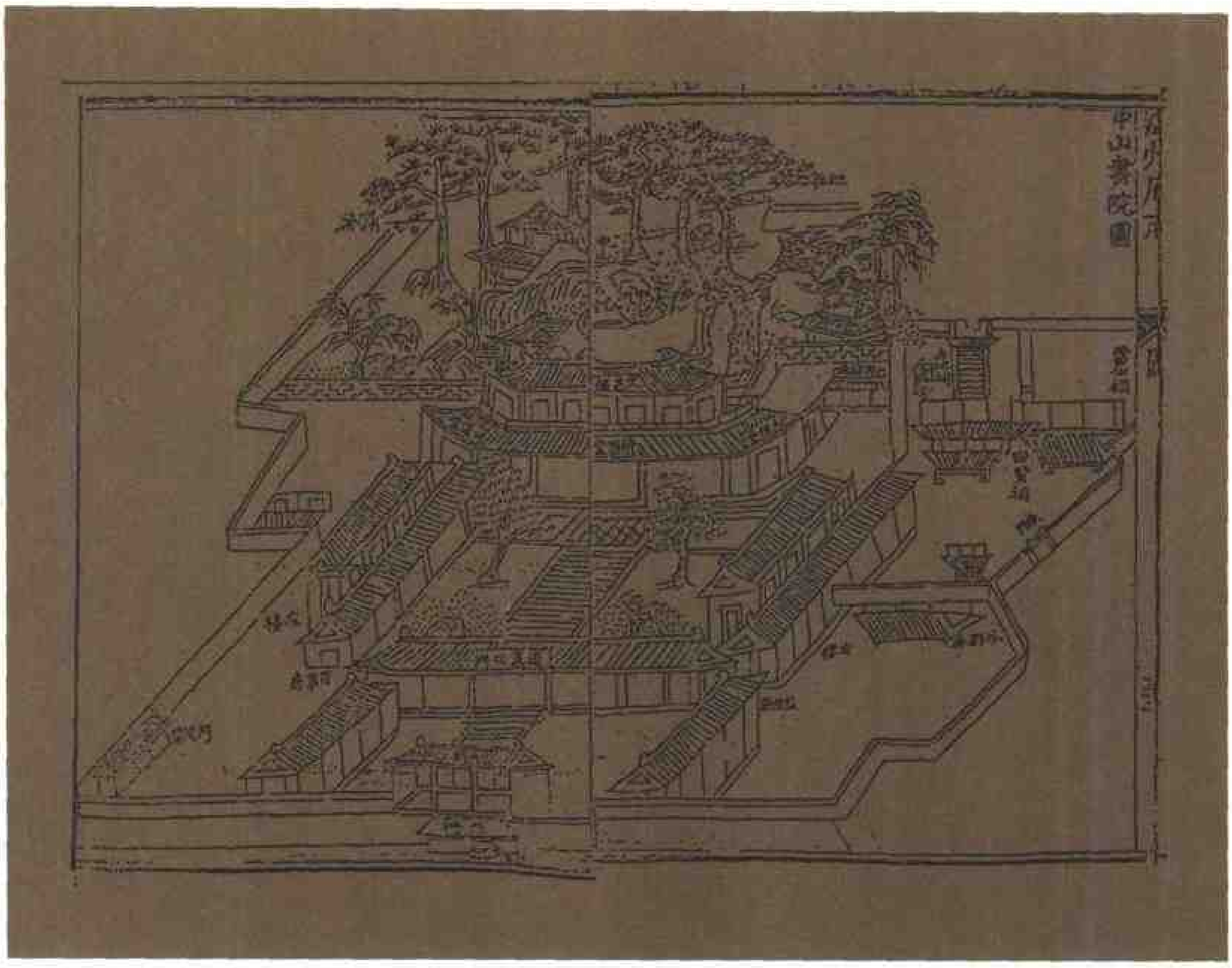


图 3－1－20　中山书院（图载清乾隆版《温州府志》）　在浙江温州。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设头门、二门、精勤堂（楼房讲堂，并祀文昌）左右修道堂、大雅堂（楼房，为生徒息宿）。共房舍60余间，并具亭池之胜，时称：“可与省城书院相媲美”。后续有修建，咸丰三年(1853)改修道堂为辟经堂，仿诂经精舍，以经义诗赋课士。清末改府学堂。



图 3－1－21　东山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攸县志》）在湖南攸县东山。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原震阳书院迁于城内，改名梅城书院。嘉庆十八年(1813)迁回原址，更名“东山”。该院虽地处城外东山，院内仍辟有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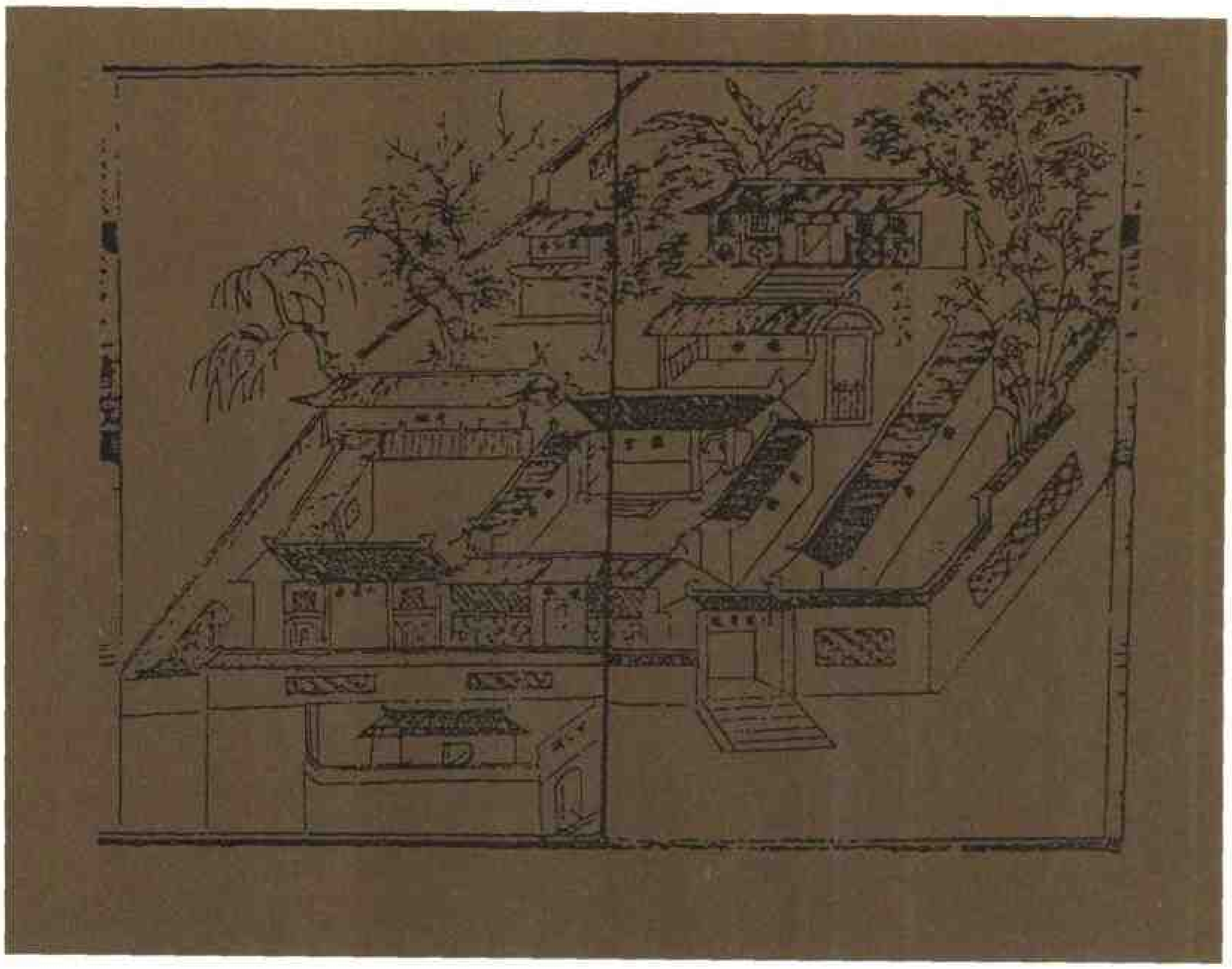


图 3-1-22 信陵书院（图载清同治版《巴东县志》） 在湖北巴东（今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清道光十八年(1838)建，巴东为古信陵地，故名。该院为该县第一所书院。有讲堂三间，左右斋室二十余间，后堂一间祀宋儒五子，堂左右经师堂、藏书室、储仓，讲堂左另建试士场。后部还建有“游观之圃”，二十年(1840)增建登云亭，题为“活泼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高等小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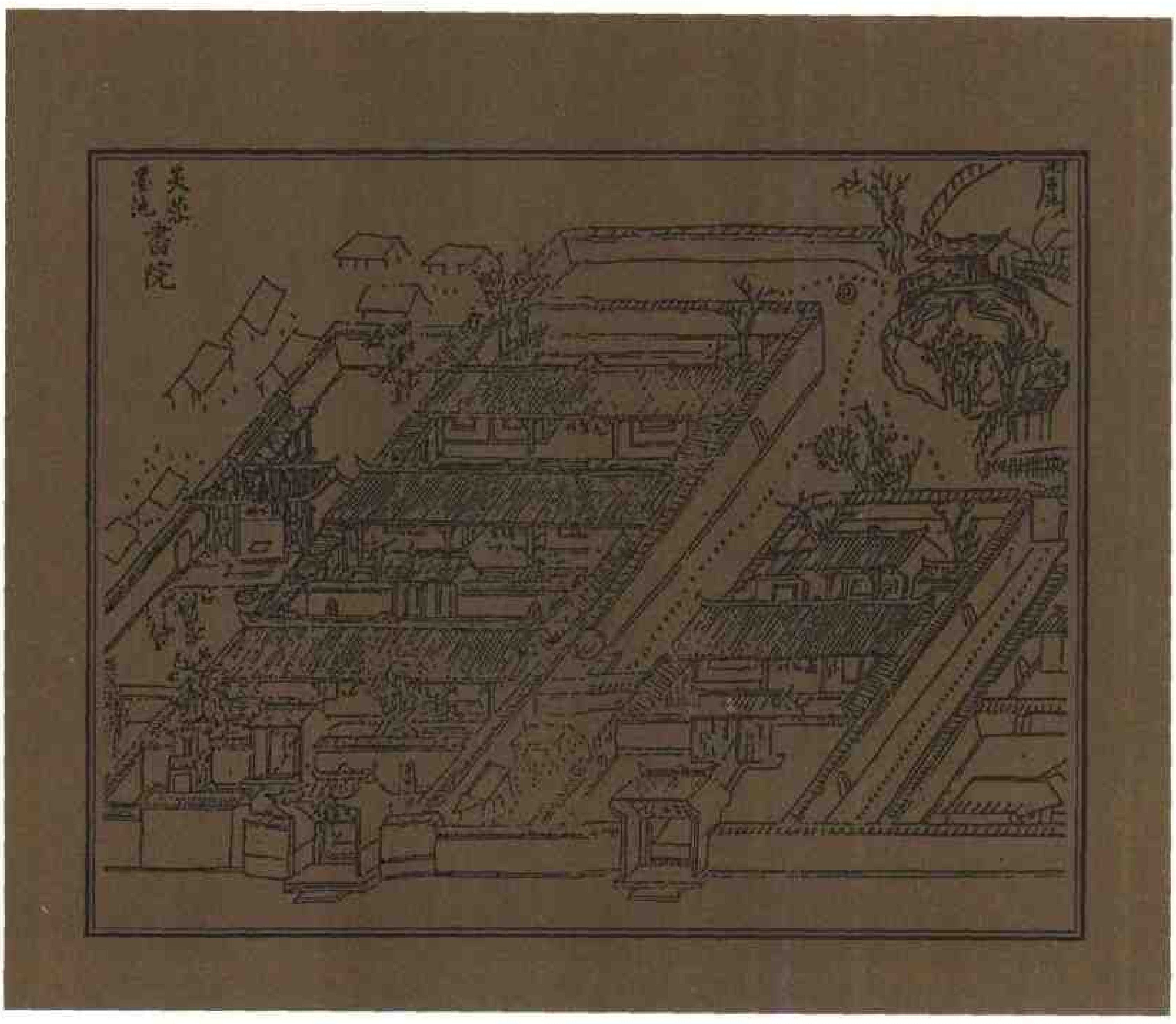


图 3-1-23 芙蓉墨池书院（图载清同治版《重修成都县志》） 在四川成都。芙蓉书院创建于清嘉庆六年(1801)，咸丰四年(1854)改建于青龙街墨池书院内，有大门、二门、讲堂、过厅、书舍、寝室、厨房等四十余间。清末废。墨池书院创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原有三个大院，中为书院，左为东园，右为濂泉精舍，共房舍200余间。后因经费困难，部分对外出租，而日渐坍塌。芙蓉书院迁入后始得修复，右为“芙蓉”，左为“墨池”，后部仍留有洗墨池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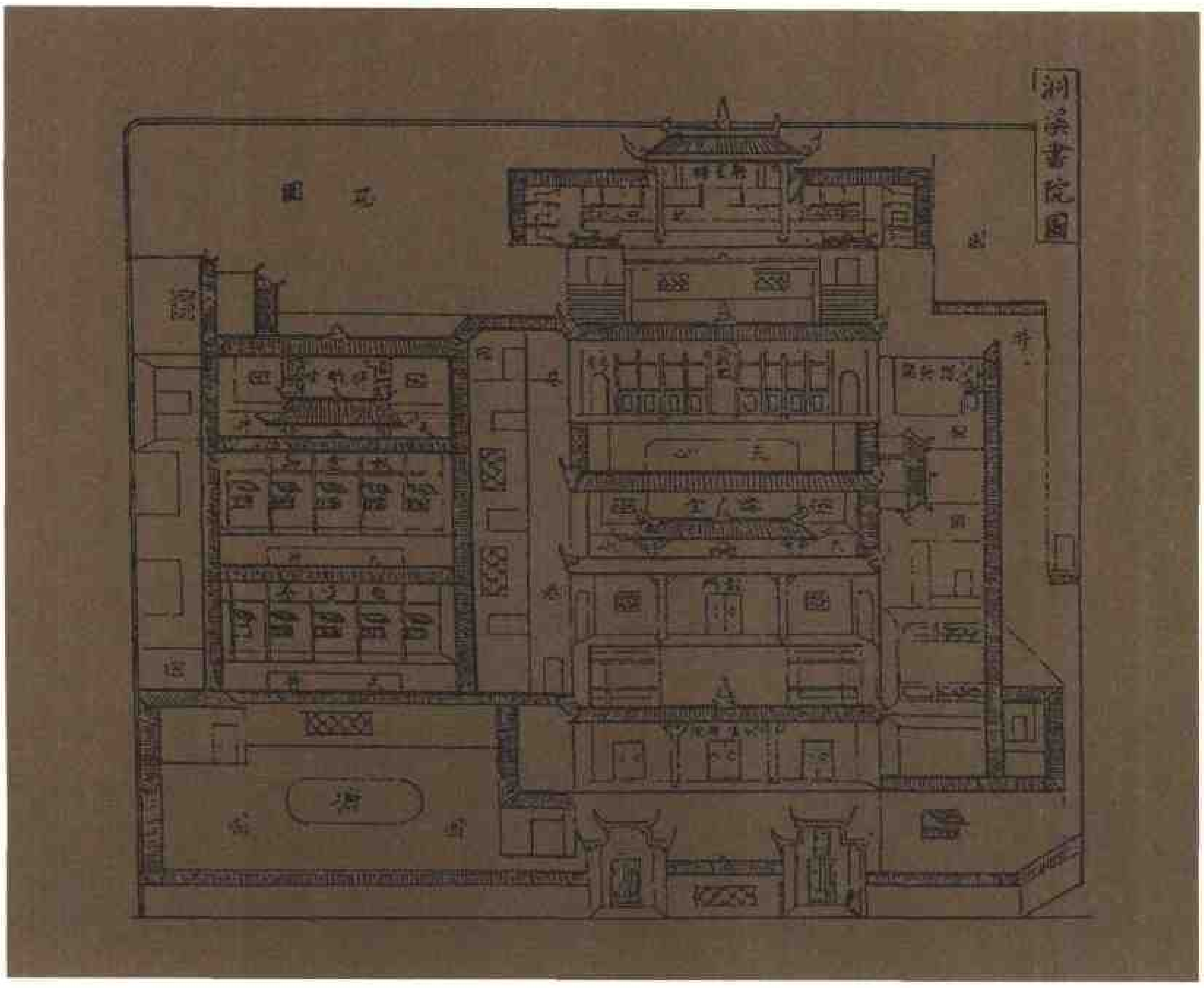


图 3-1-24　洞溪书院(图载清光绪版《浏东洞溪书院志》)　在湖南浏阳。清道光十七年(1837)贡生张良赞建义学于张家坊文昌阁；二十七年(1847)张妻遵夫遗命扩建为书院，聘名师主讲。咸丰十一年(1861)里人捐资再扩。同治六年(1867)毁于战火。八年(1869)修复，有大门、讲堂、大成殿、文昌宫、魁星楼、揽英阁、及主敬、存诚(藏书)、亦乐、斗文、敬业、诚意、志道、养心等斋、崇义祠祀张氏夫妇、惇敬堂祀有功于院者，共四进40间房屋，书院前后仍保留园圃。



图 3-1-25　洞溪形胜图(图载清光绪版《浏东洞溪书院志》)　洞溪书院曾就院周景物，题名"浏东洞溪书院八景"：官桥石碣、云峰斜阳、石洞渔歌、桃林牧笛、龙山雪霁、龟阜烟消、佛寺晨钟、仙岩夜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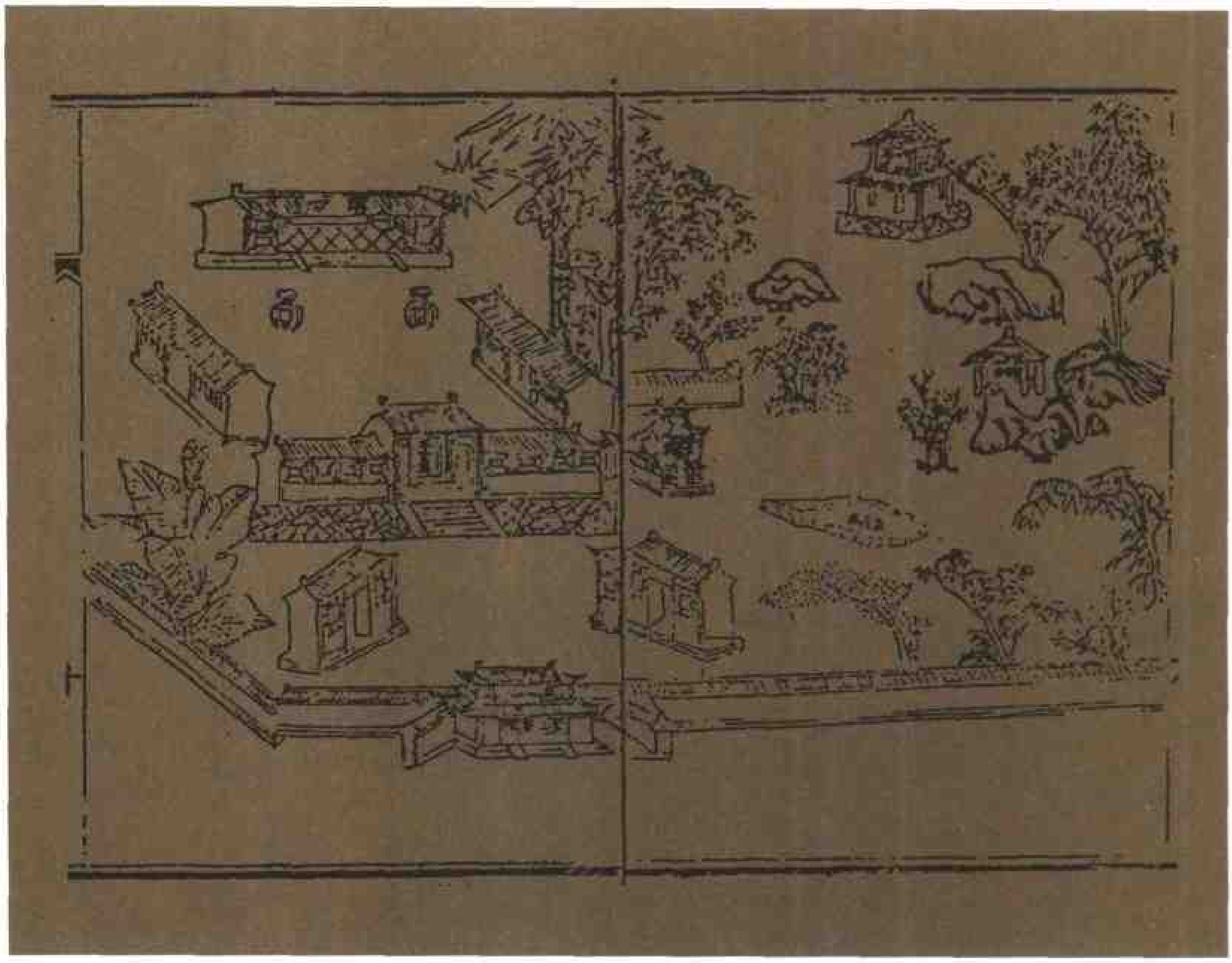


图 3－1－26　松山书院（图载清光绪版《毕节县志》）　在贵州毕节。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县建于城内永兴桥右，又名毕阳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扩建，有大门、二门、讲堂、学舍、厨房等。道光中一度迁移，同治七年（1868）仍回原址拓建，光绪十八年（1892）增修斋舍。清末改求是学堂。后改小学，办学至今。该院虽处城中，仍辟有较大园地。



图 3－1－27　玉屏书院（图载清光绪版《鹤庆州志》）　在云南石屏。清道光三十年（1850）建，有大门、二门、龙门、讲堂、上房，两侧为教习居室，中堂为山长处所，大门左为碑亭；院周开辟园池花圃，广植梅柳桂树。清末改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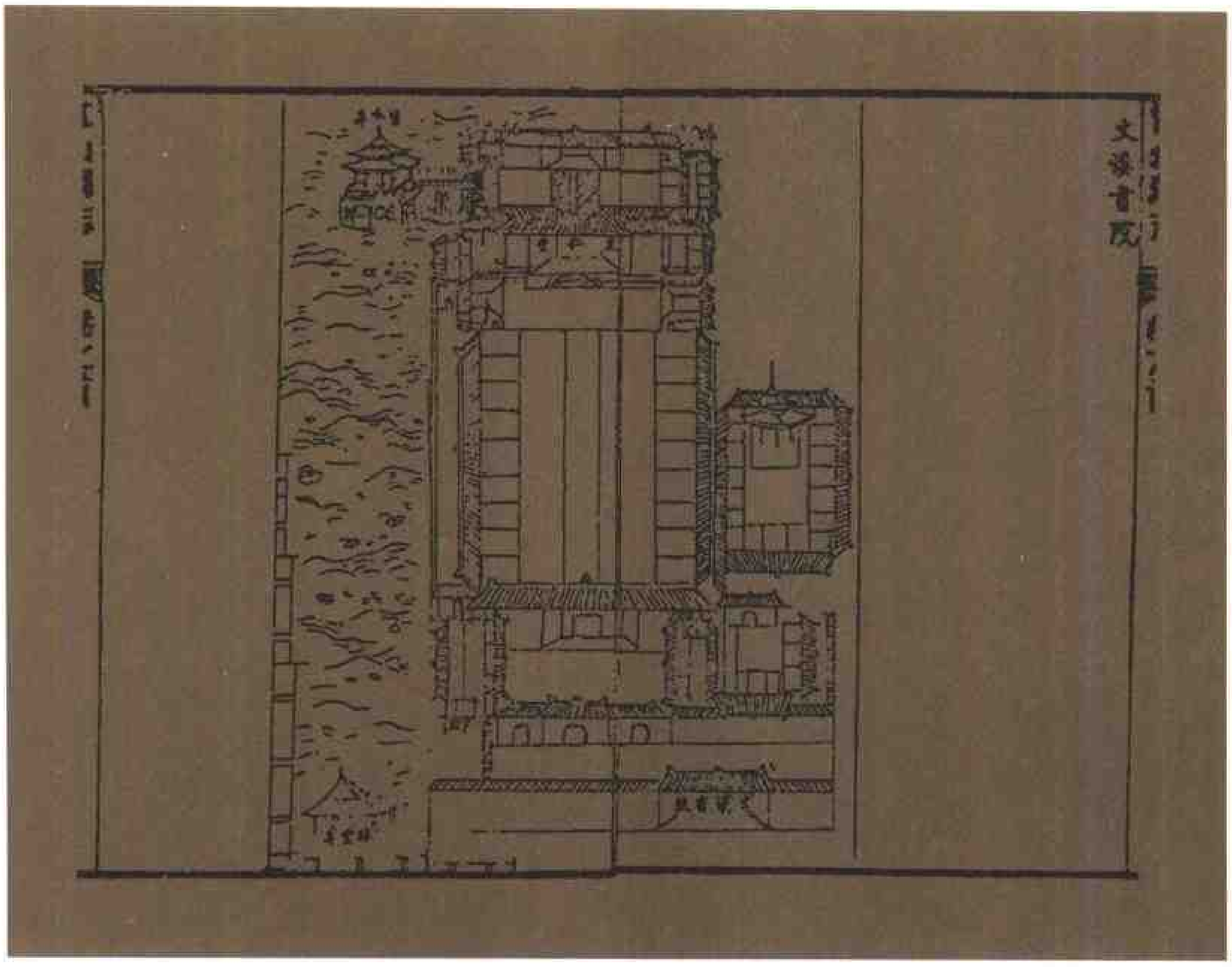


图 3-1-28　文溪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江山县志》）在浙江江山。清乾隆二年(1727)知县建于县学西，有讲堂三间、书室八间。原名涵香书院，二十八年(1753)于院西扩建为前大门、中讲堂、左山亭、右岸舫、后讲楼，前后左右书室三十二间，周为园池，改名“文溪”。后屡有修建，增设改棚，保留园池不变。



图 3-1-29　凤山书院（图载清咸丰版《顺德县志》）在广东顺德。明代知县建于城西凤凰山麓，旋废。后改为四贤祠供祀地方名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修，后改官署。乾隆二十三年(1758)，恢复书院，构堂八楹为讲堂，可坐数百人，院后有楼，祀四贤，左魁星阁。凤山下有池，环池建学舍四十余间，池旁有西厅临水。后续有修建，留有古树园池。清末改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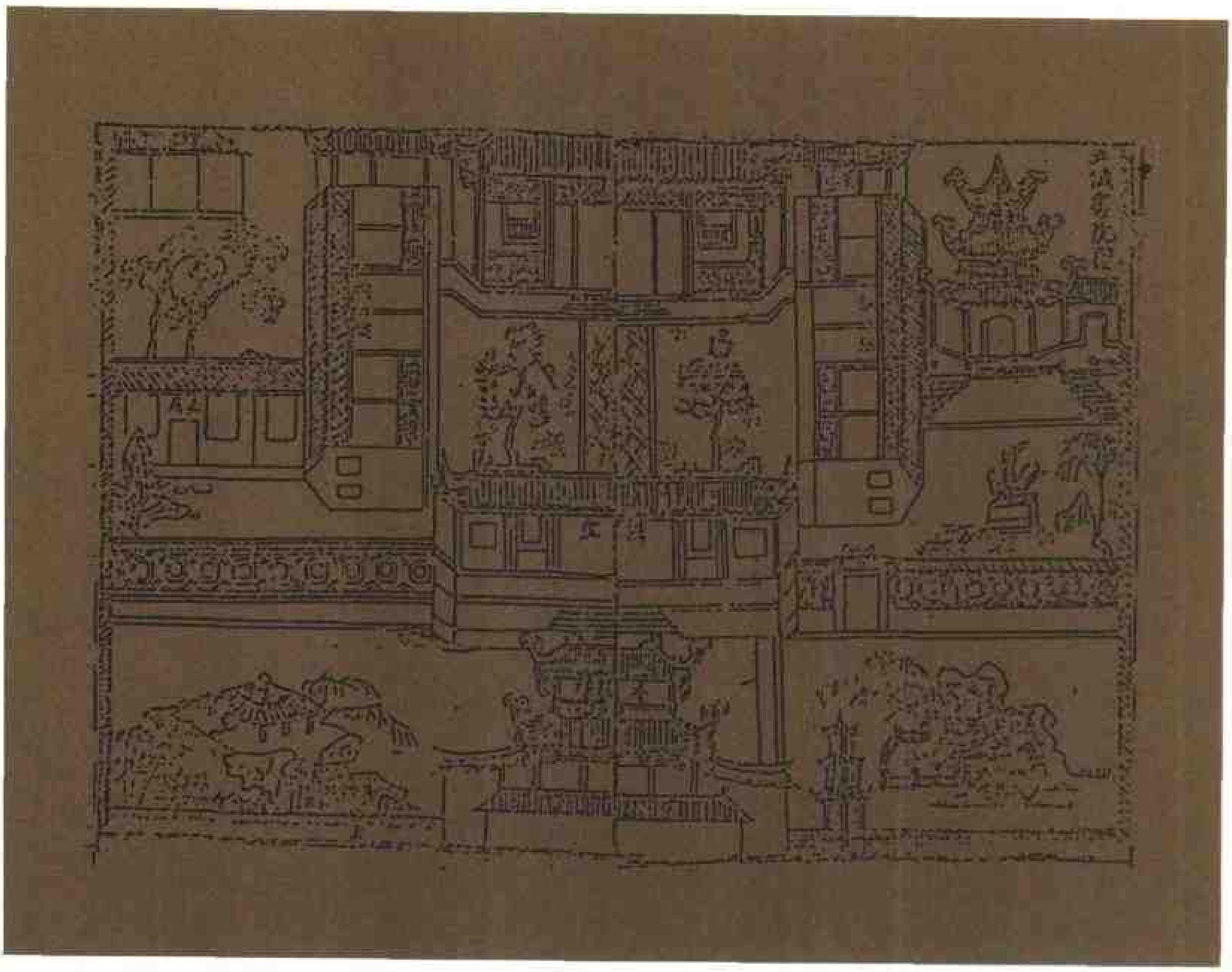


图 3-1-30 立城书院（图载清《乾州志》） 在湖南乾州（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清嘉庆十二年（1807）创建于乾州镇东门外，为湘西“苗疆书院之一，有学房十二间”。道光四年（1824）扩建，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战火，同治五年（1864）重修。院内“怪石嶙峋筑为山，宽斜二丈，高丈五尺余、左右苍筤谷、苜蓿园，树林苍翠，甚可观也”。清末改学堂。今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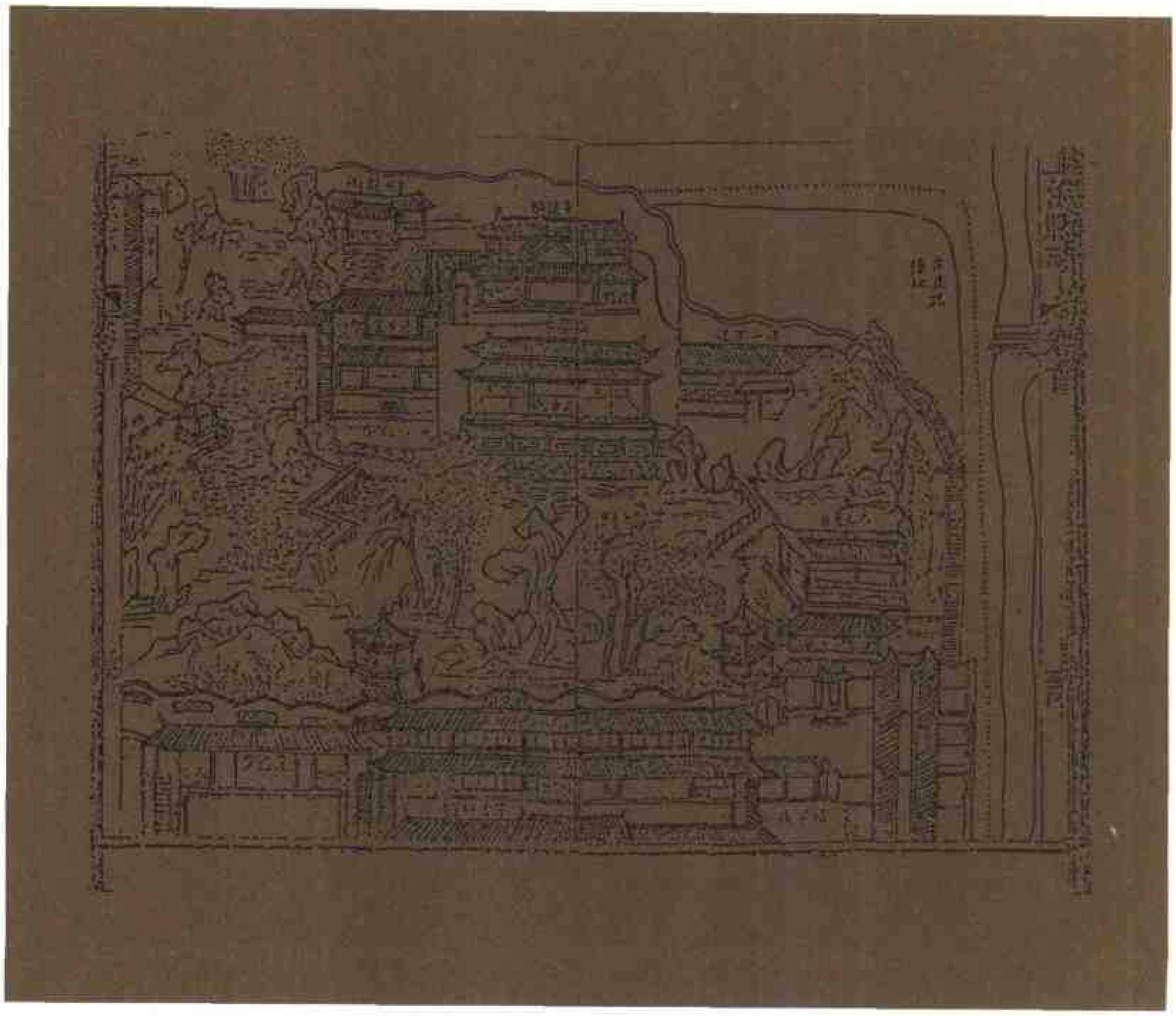


图 3-1-31 蕊珠书院（图载清《上海县志》） 在上海。清道光八年（1828）创建于蕊珠宫内园，十五年（1835）扩建阁、堂、庑等学舍于宫南，院内园林绿化、假山奇石，错落穿插其间，别具一格。咸丰十年（1860）被外国侵略军侵占，建筑多毁。后陆续修复，清末改办师范传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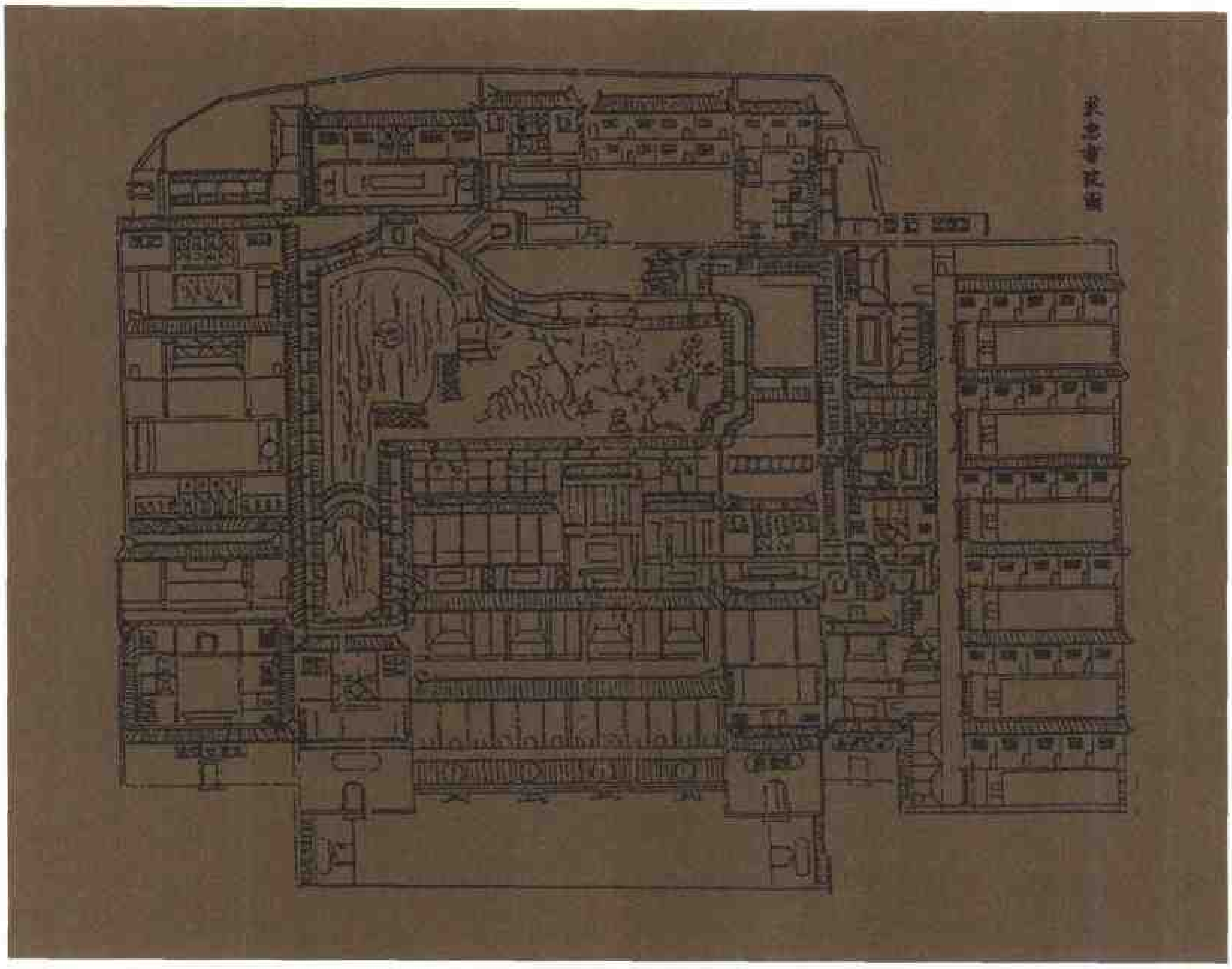


图 3-1-32　求忠书院（图载清《长沙县志》）　在湖南长沙。清咸丰四年(1854)建于城内五忠祠旁，有大门、二门、讲堂、山长室、魁星祠、近思、笃志斋等。曾与长沙的岳麓、城南并称"清末湘省三书院"。书院虽处城中，仍辟大片园地于院中，创造其幽雅环境。清末改学堂。后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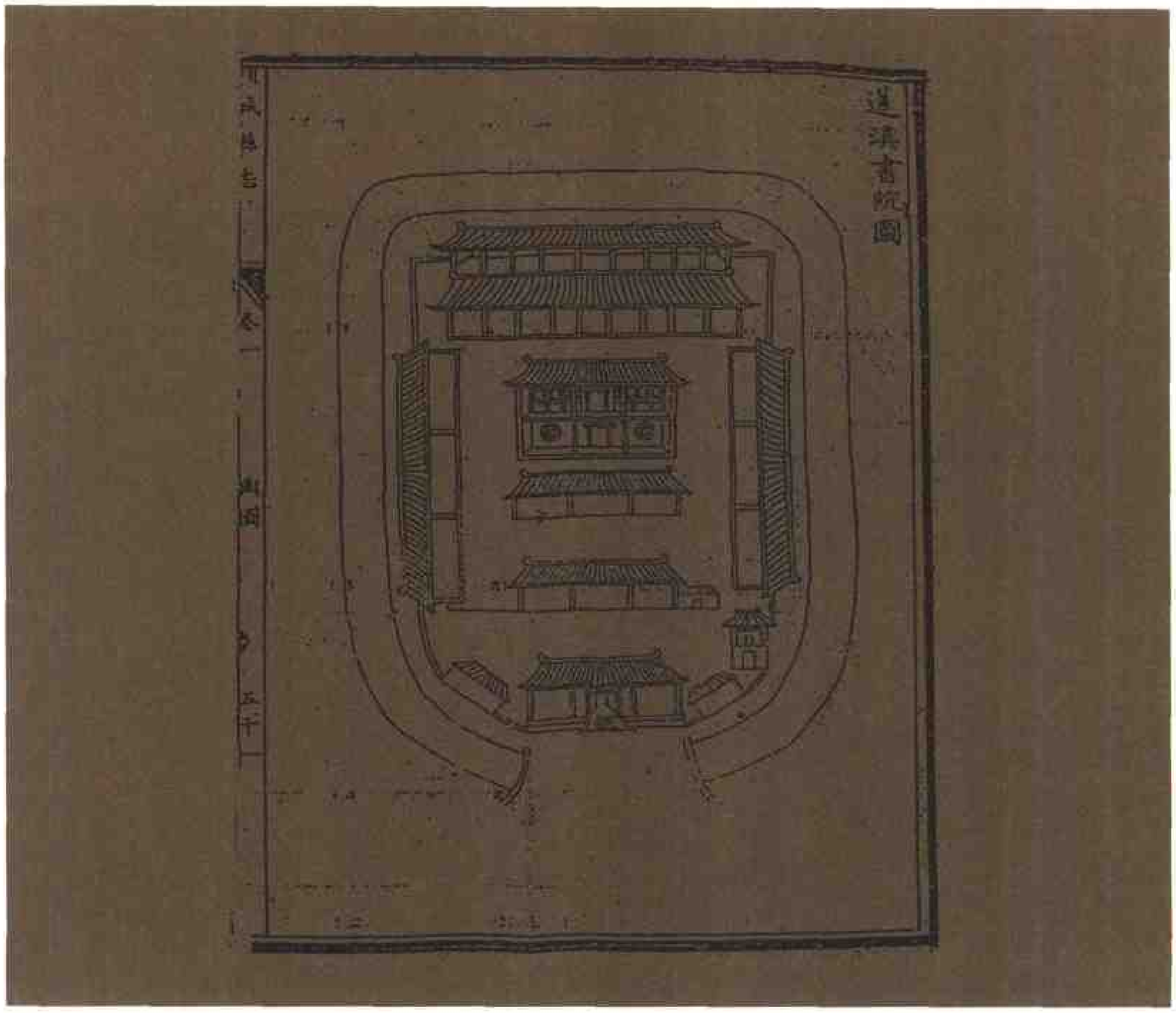


图 3-1-33　莲溪书院（图载清宣统版《项城县志》）　在河南项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虹阳书院于文昌宫西，后圮。乾隆二十五年(1760)因其地低洼狭小，迁建于县署东南准提阁旧址，建讲堂三间，旁房十余间为书院，因虹河旧有瑞莲之兆，改名"莲溪"，院周环水，别成一境。后屡有修建，曾增设文场。清末改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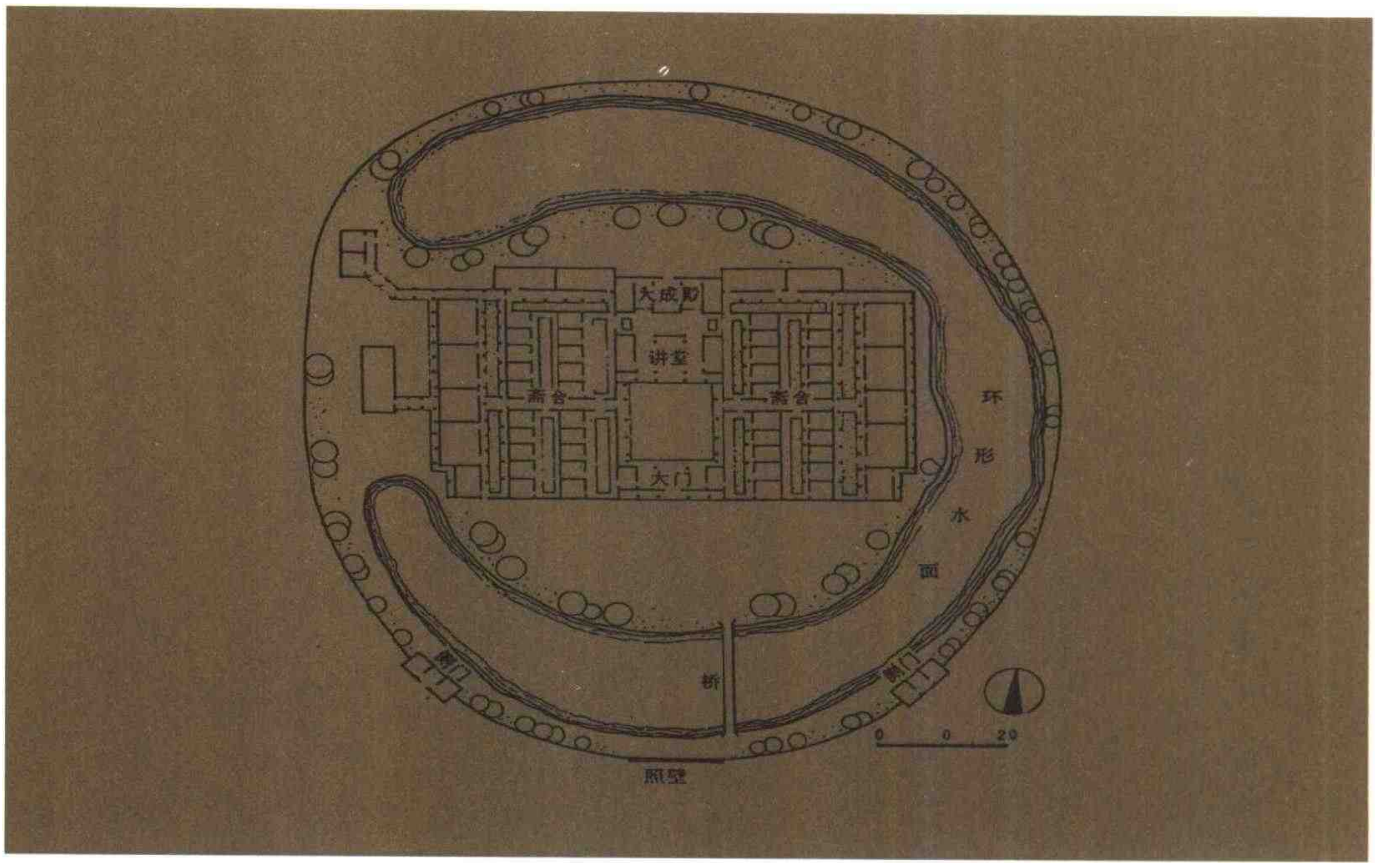


图 3-1-34　东山书院（图载《湖南传统建筑》现状实测）　在湖南湘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建于城郊东台山麓。该地有“东台起凤”、“凤凰起舞”之称。书院将原有三口水塘开拓连成便河环绕，广置树木，自成佳境。后改学校，办学至今，保存完整，1910年毛泽东曾就读于此，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书院后期，有的还设有监院，以加强行政管理；少数书院还建有射圃，用于习射练武的场地；有的也设考棚，专供考课之用。这都与官府的影响有关。

书院具有多功能综合性特点。其建筑群组合，既反映中国建筑的传统共性，也表现出地方民间建筑和书院文教性质的个性特征。北方书院建筑多为分栋式四合院落布局，南方则多毗连式庭院天井组合，各以适应其不同地方气候条件和使用功能的需要；均围以院墙，组成较为严整的建筑群体。以下图例可反映南北书院建筑的基本组合特征（图 3-1-3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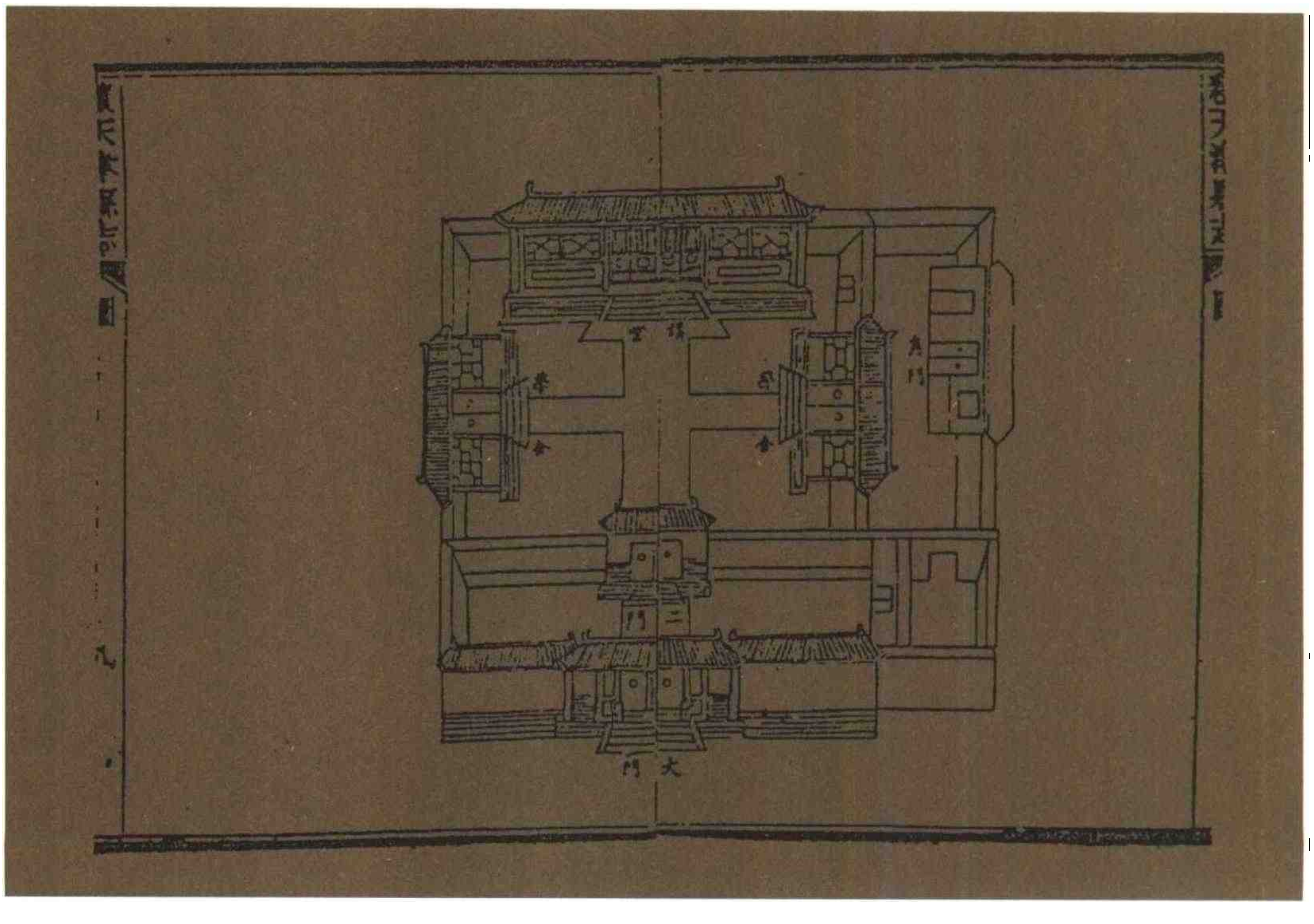


图 3-1-35　三取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续天津县志》）　在天津。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邑绅创建于三岔河口南岸，乾嘉间增修，学舍十二间。同治七年（1868）被外国侵略者所占，迁移河东盐关厅，后拓地改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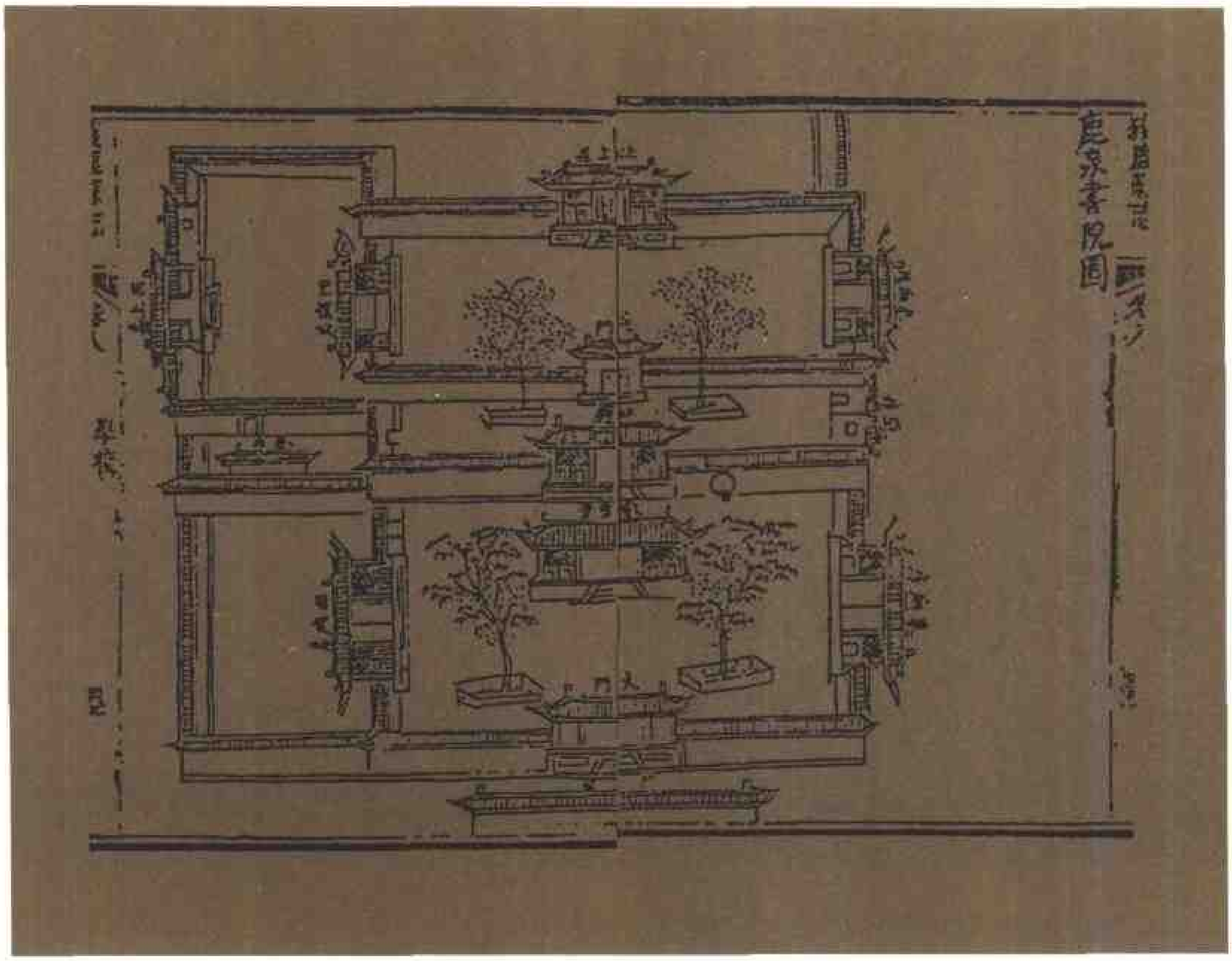


图 3－1－36　鹿泉书院（图载清光绪版《获鹿县志》）　在河北获鹿。沿革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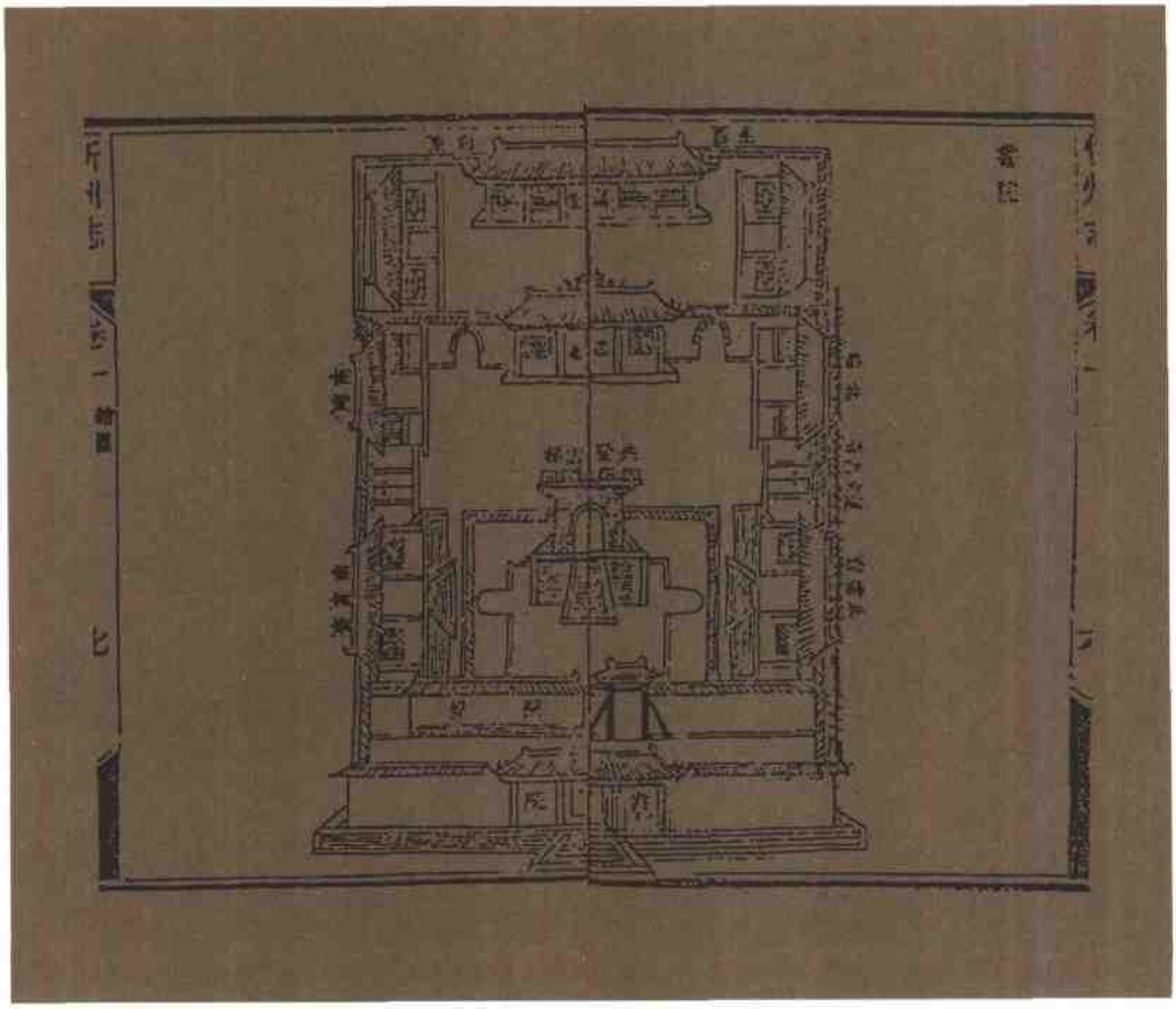


图 3－1－37　秀容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忻州志》）在山西忻州。清乾隆四十年(1775)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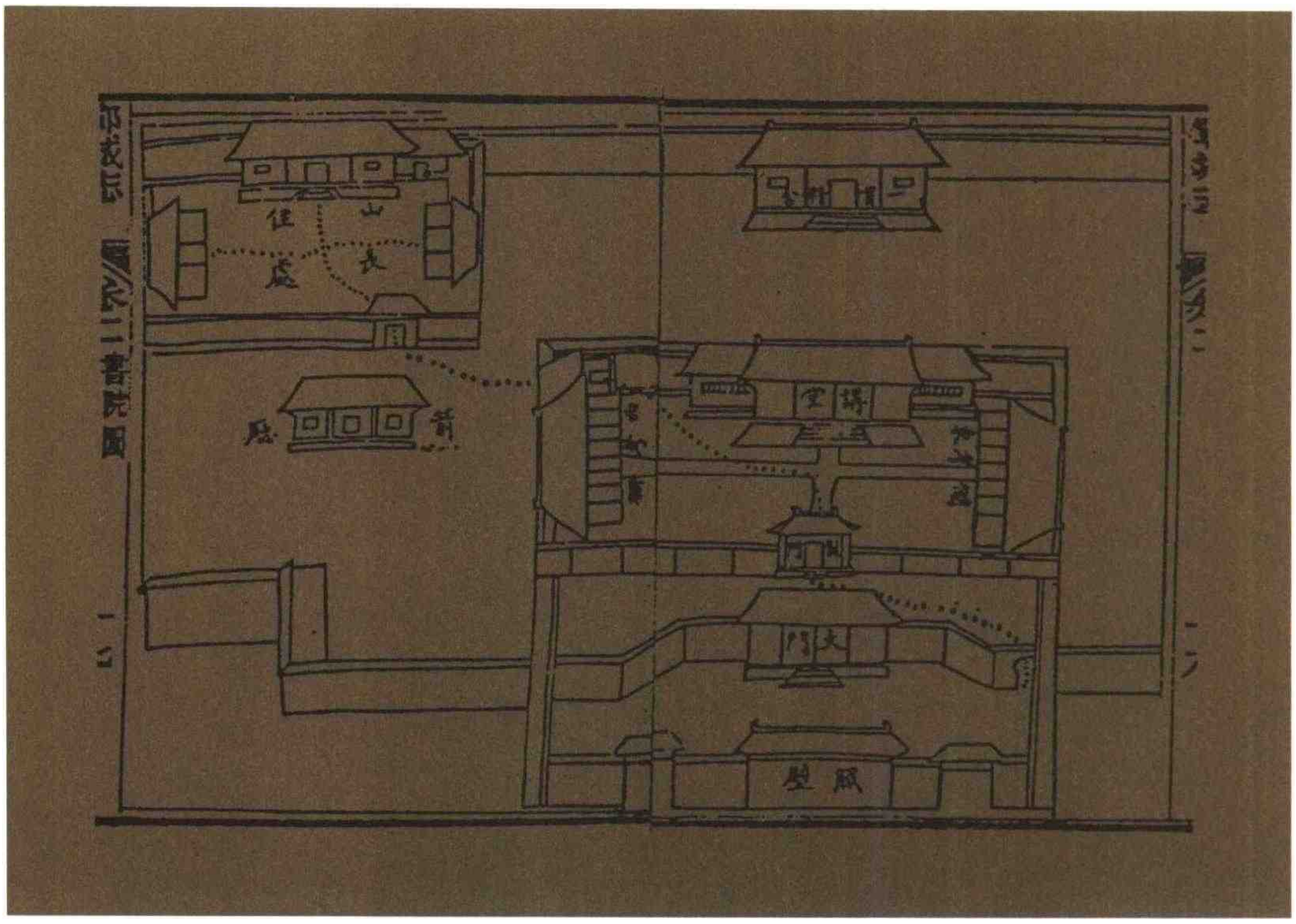


图3-1-38　宣文书院（图载清光绪版《郓城县志》）　在山东郓县。沿革不详。

以上反映北方常用的分栋式四合院落的组合形式。



图3-1-39　龙泉书院（图载清《续修安岳县志》）　在四川安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建于城南，原名岳阳书院。嘉庆二年（1797）迁建龙泉山，更名"龙泉"。清末改高等小学堂。



图 3-1-40 月湖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光绪鄞县志》） 在浙江鄞县。清顺治十年（1653）建于月湖西，初名文田书院，中有正学阁祀朱熹。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敬业堂（讲堂）、敞楼、书舍等，更名“月湖”。道光二十三年（1843）再修，咸丰中被毁，同治三年（1864）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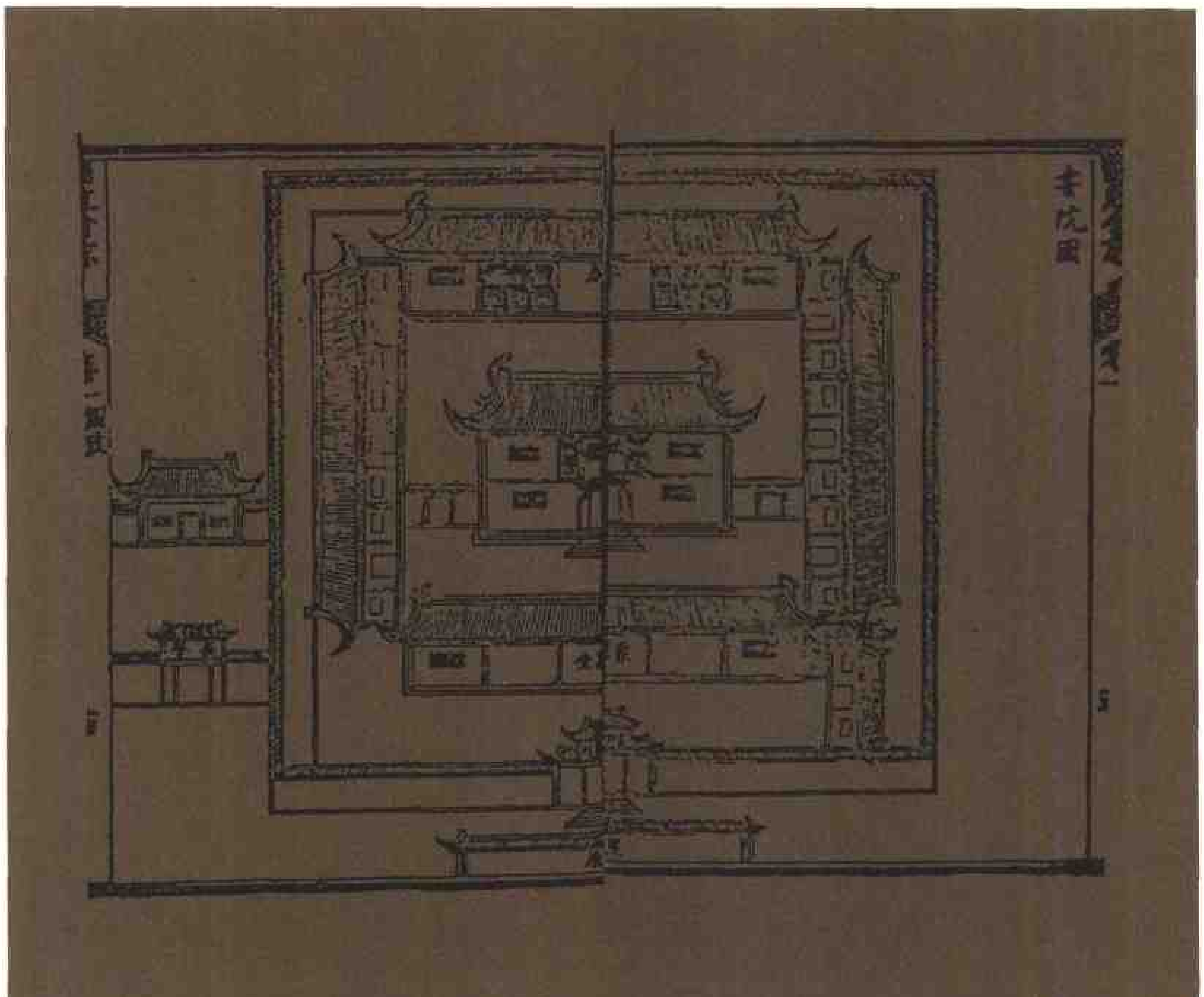


图 3-1-41 夏邱书院（图载清光绪版《泗虹合志》） 在安徽泗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创建，因“尧封禹为夏伯，始邑于此”，故名“夏邱”。内有讲堂三间，并祀禹王及孔子，后增建文昌阁、魁星阁及门楼。雍正十三年（1735）扩建斋房学舍、庖湢、门廊。乾隆三十五年（1770）再扩房舍，称为极盛。咸丰初倾圮过半，光绪十年（1884）整修。后改学堂、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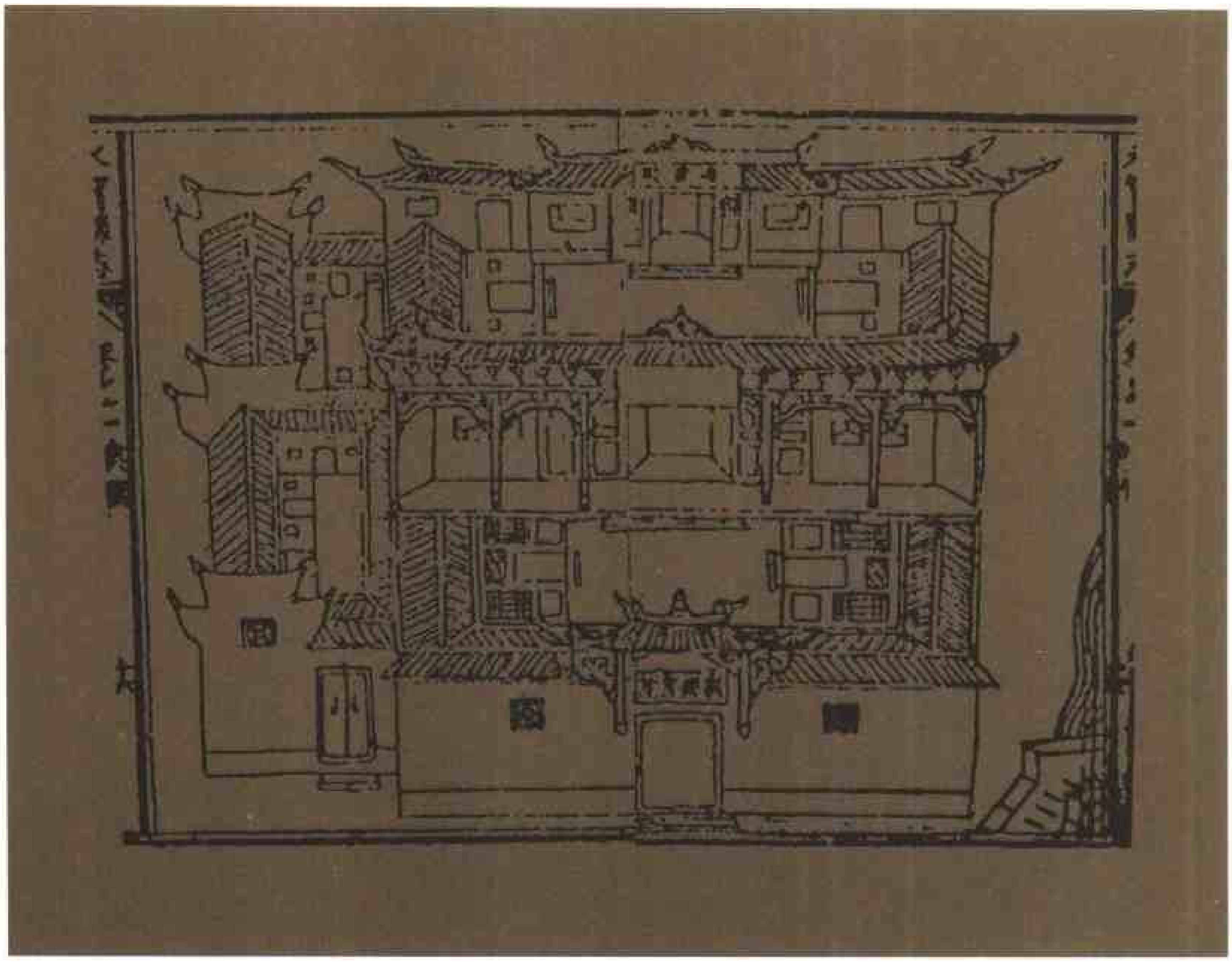


图 3－1－42　敬修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永宁县志》）在江西吉安。沿革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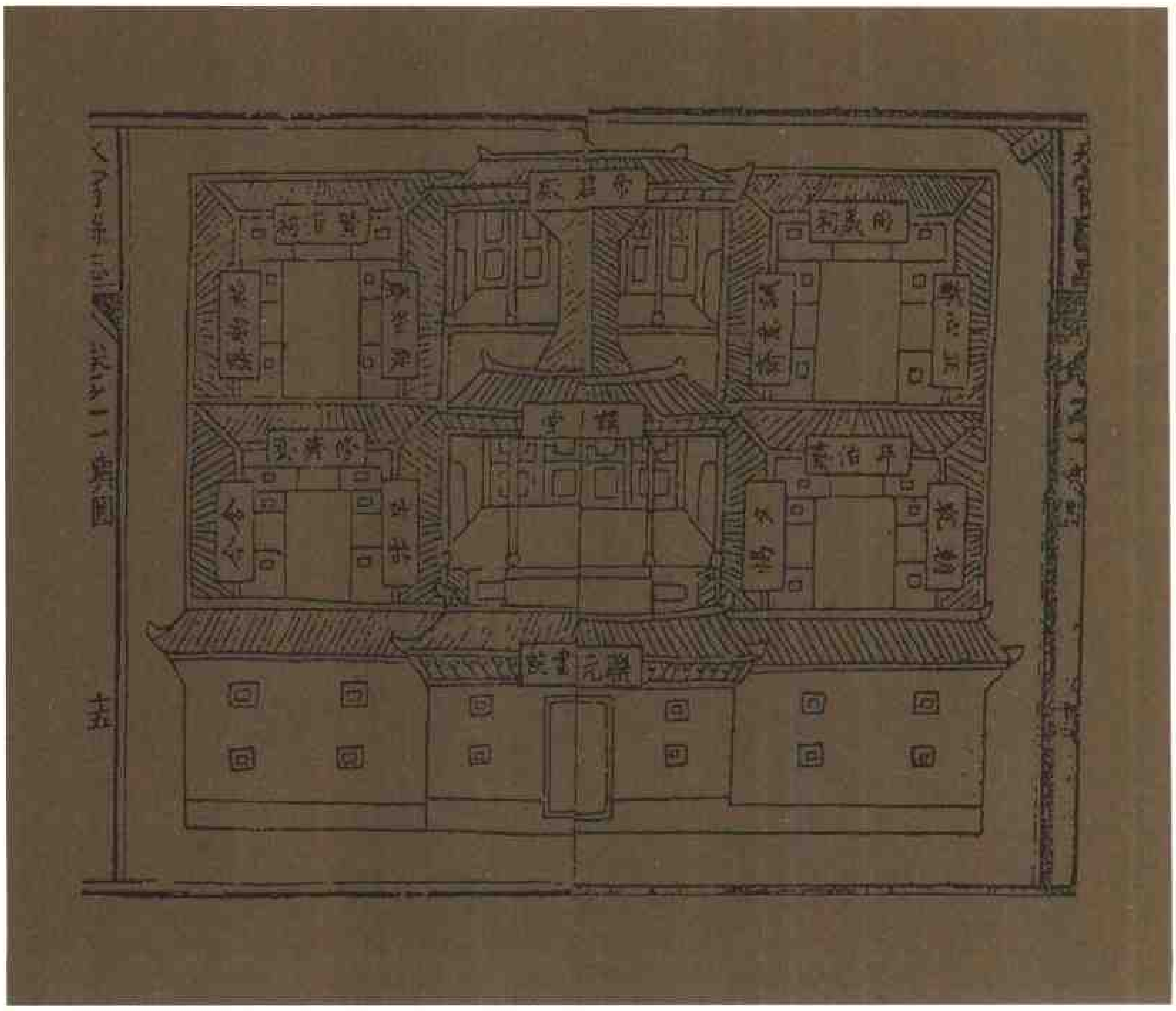


图 3－1－43　联元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永宁县志》）在江西，沿革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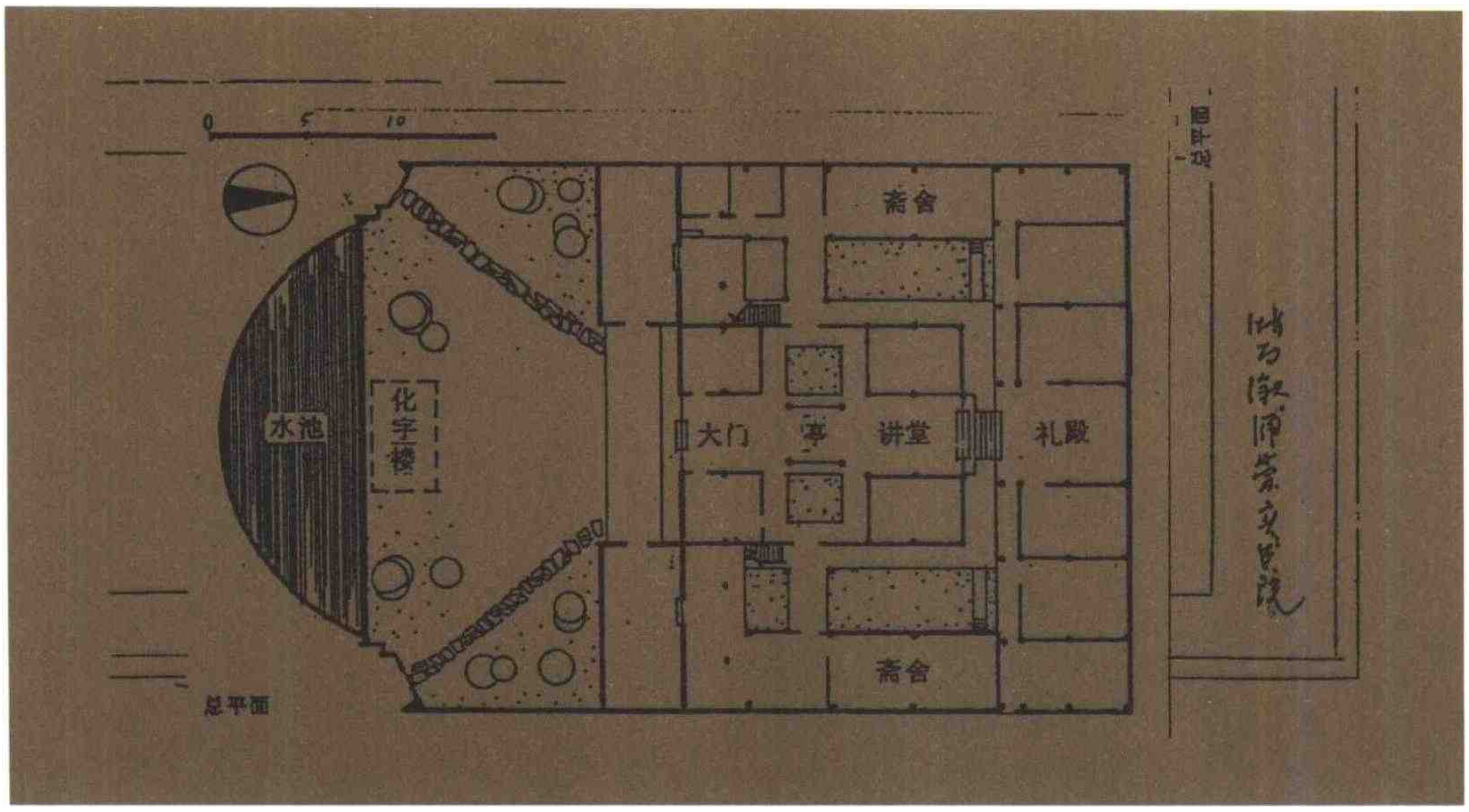


图 3－1－44　崇实书院（图载《湖南传统建筑》现状实测）在湖南溆浦。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始建，咸丰五年（1855）落成。原为吴氏家族所有。

以上反映南方所用毗连式庭院天井组合的布局特点。

地无论南北，书院大多采取中轴对称布局。中轴线上纵深布置讲堂、祭堂、书楼等主体建筑；少则二、三进，多则四、五进，甚至更多；其中除设大门之外，有设二门，甚至三门者。两侧配以斋舍及其它建筑，形成重重院落，以区分内外主次，更显示其主体的严整庄重气氛。以下图例，可反映其一般特征，也表现其地方差别（图 3－1－4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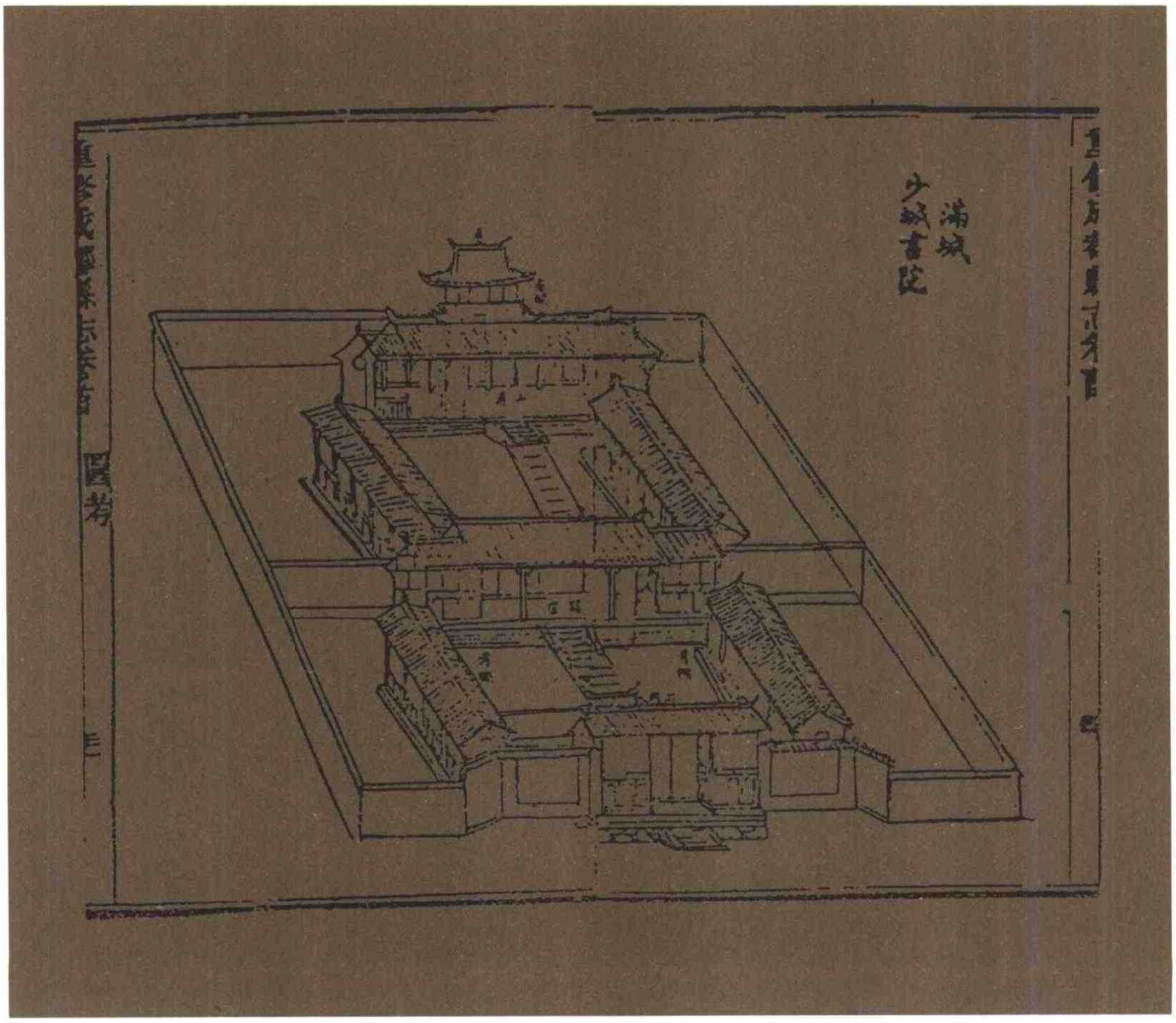


图 3－1－45　少城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成都县志》）在四川成都。清同治十年（1871）创建于成都满城内，专为驻防八旗子弟而设。清末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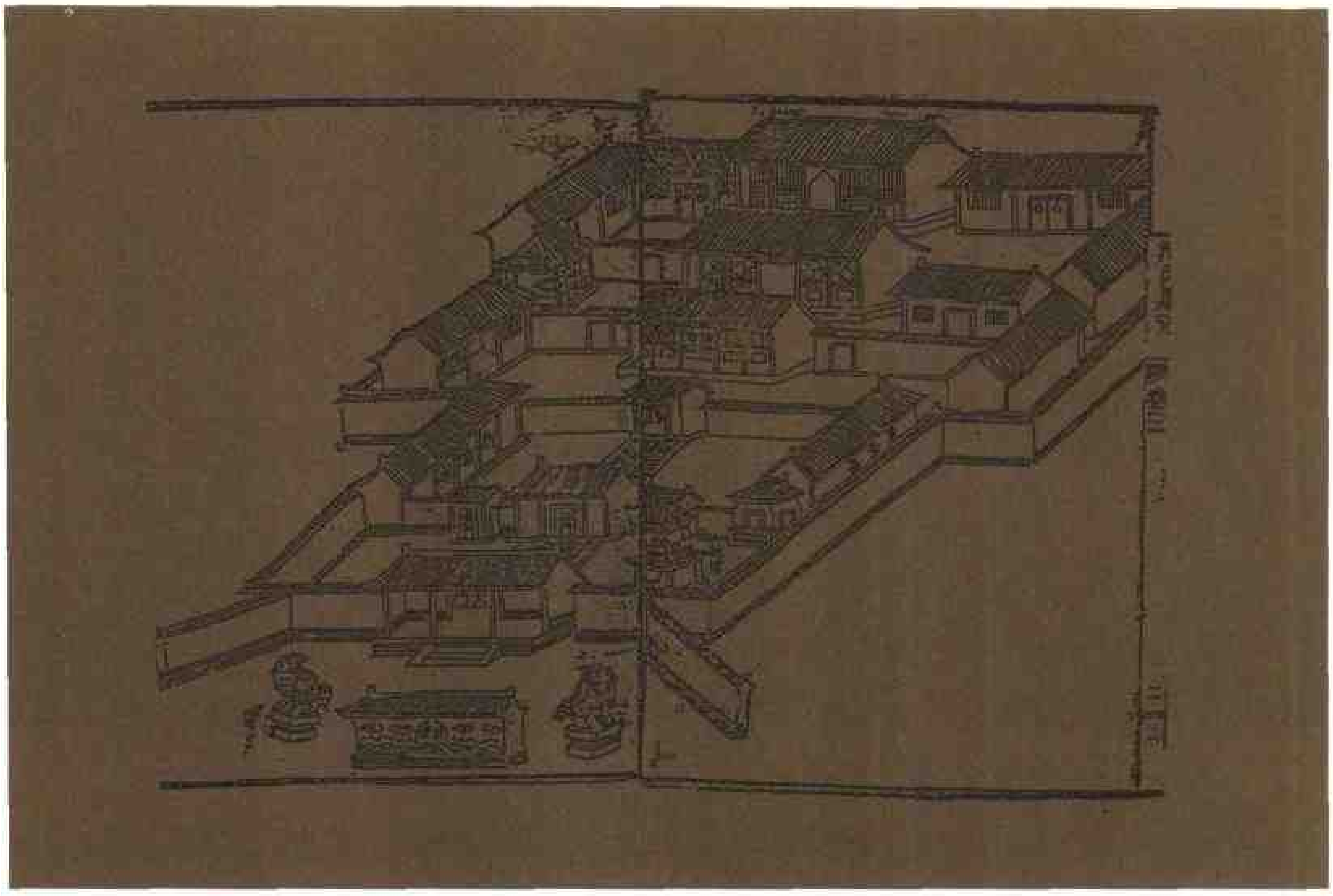


图 3-1-46　怀仁书院（图载清道光版《河内县志》）　在河南沁阳。明万历十九年（1591）就察院改建而成，其前门仍显示官署特征。至清代屡修。清末改中学堂，设有三进门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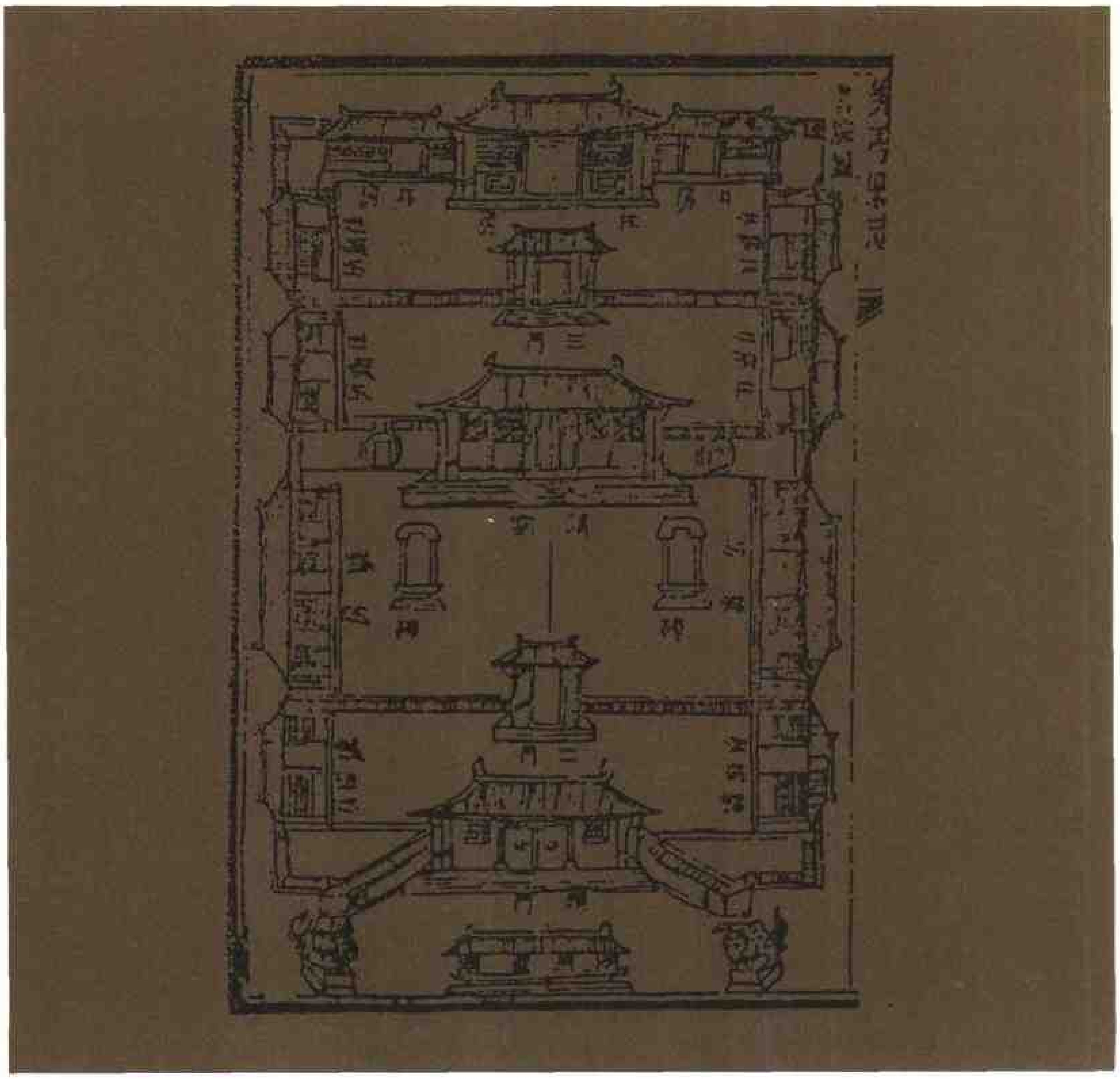


图 3-1-47　尊道书院（图载清光绪版《乐亭县志》）　在河北乐亭。沿革不详。设有三进门庐。

书院在中轴主院的一侧或两侧，或前或后，也常附有侧院，或作山长住处，或为专祠祭祀之所，或为园林游息之地，或属其它杂屋附属设施等。建筑灵活安排，不拘一格，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条件。下列图例，可见一斑(图 3－1－4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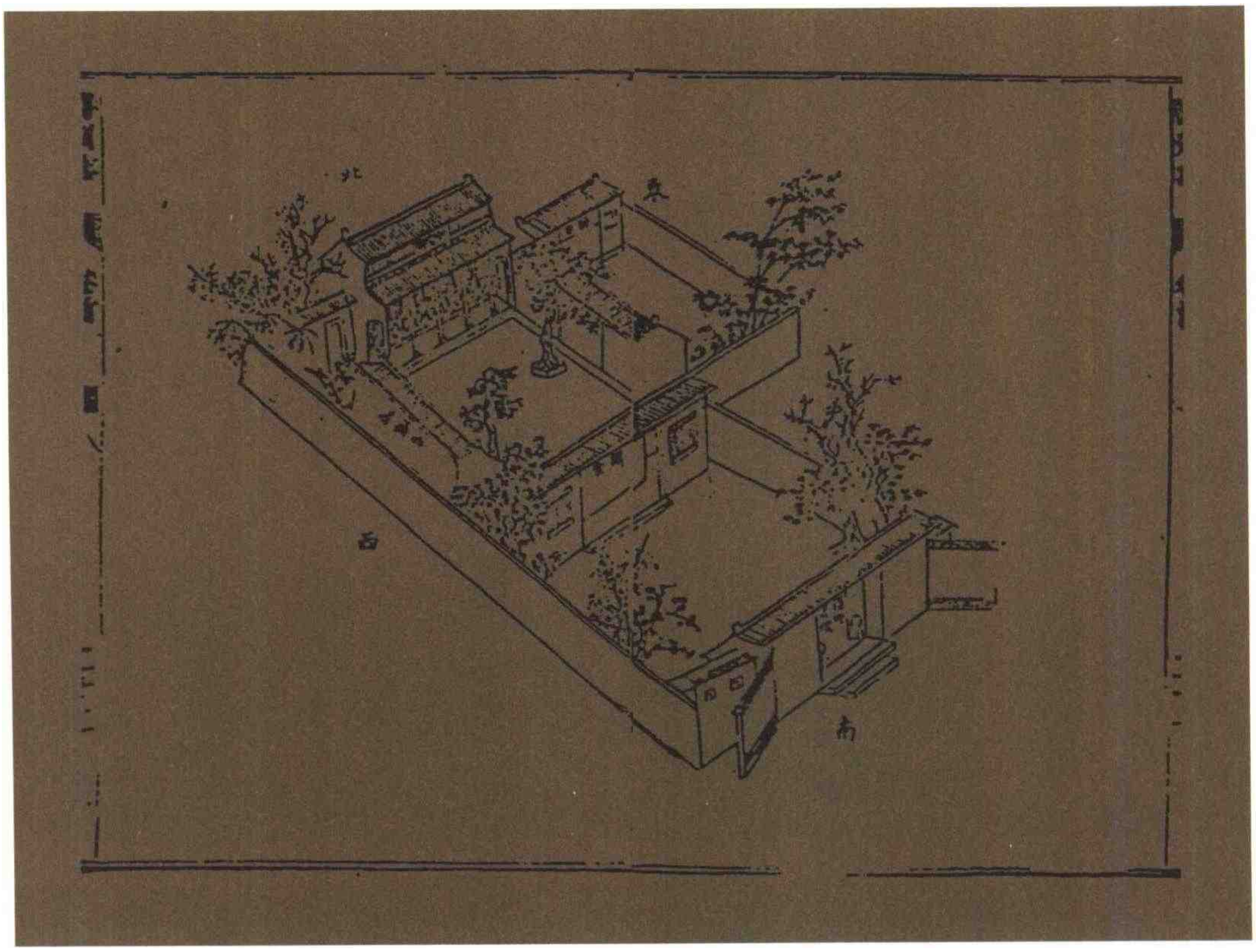


图 3－1－48　循理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寿州志》)在安徽寿县。明天启二年(1622)创建于城北春中坊大寺巷，明末毁。清乾隆二年(1737)后，陆续修复讲堂、厢房、大门等。清末改小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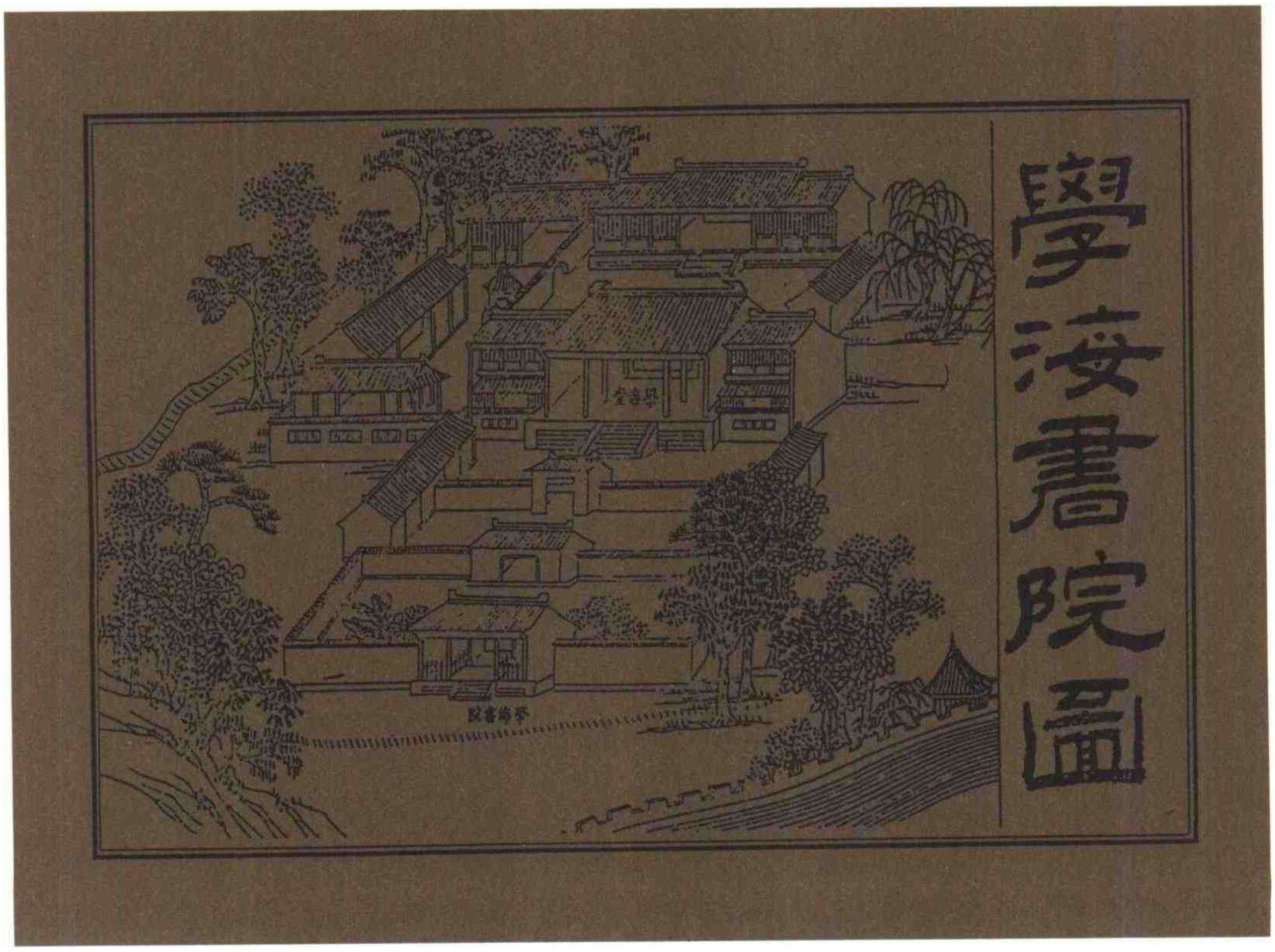


图 3－1－49　学海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宝山县志》)在上海宝山。清光绪六年(1826)知县建，后续有增修斋舍。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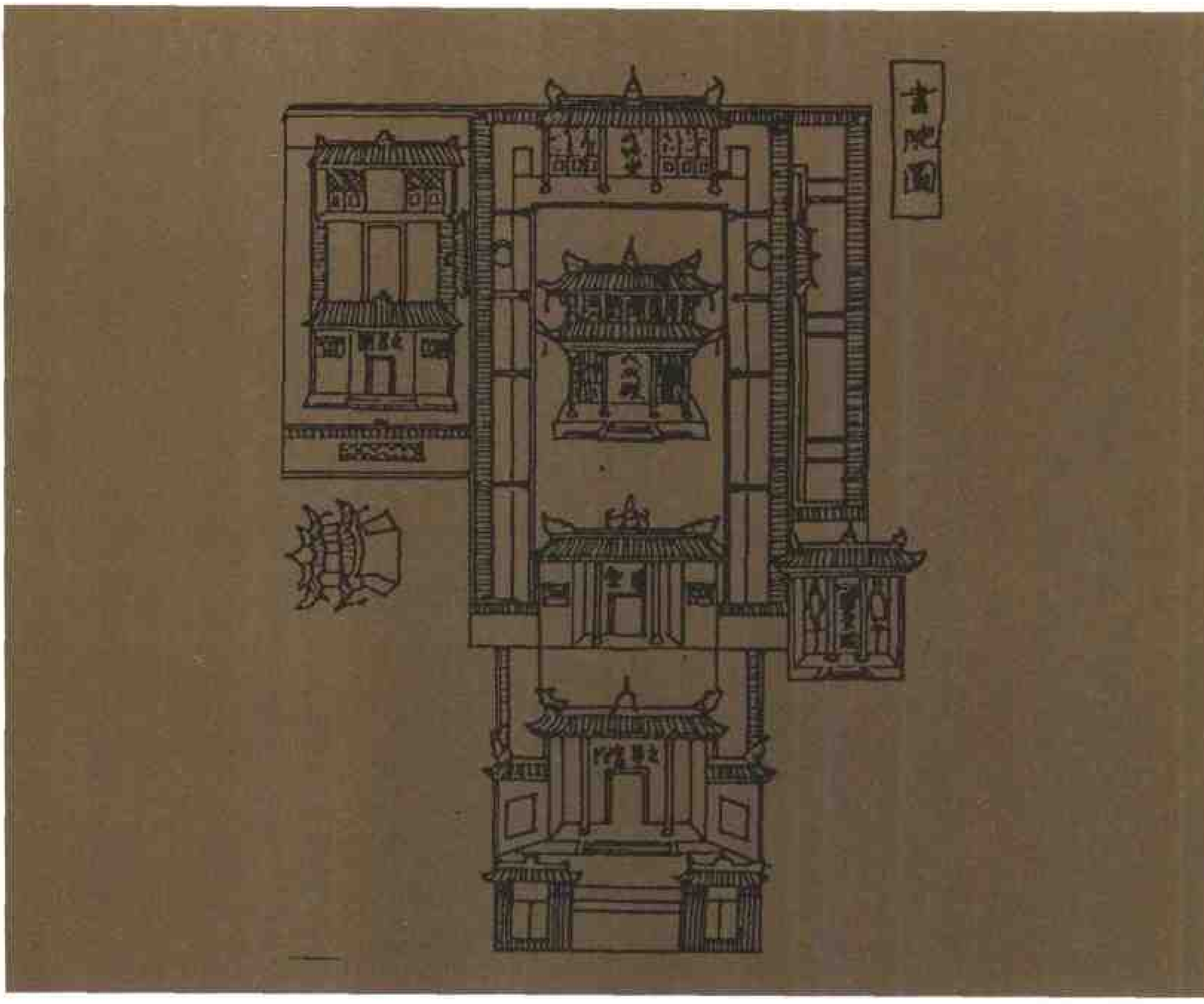


图 3-1-50 文华书院（图载清《浏阳县志》） 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文昌宫改建而成，取“文章华国”之义。咸丰、同治时增修。清末改学堂。民国改里仁学校。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集此誓师，进军井冈山。已辟为纪念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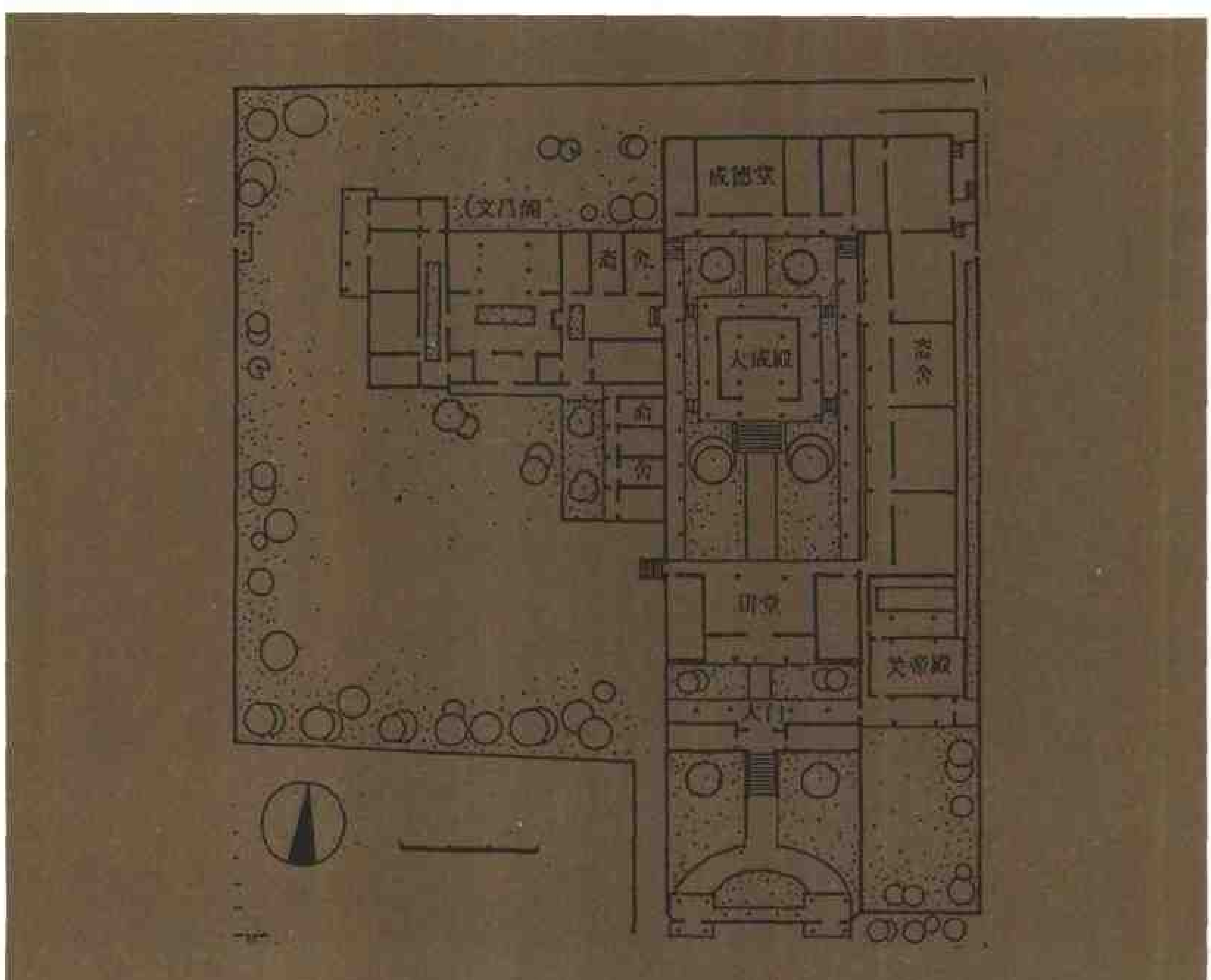


图 3-1-51 文华书院实测图（图载《湖南传统建筑》） 为书院现状。



图 3-1-52　花封书院(图载清乾隆版《孟县志》)在河南孟县。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县就明代旧城北关什方院旧址建成。后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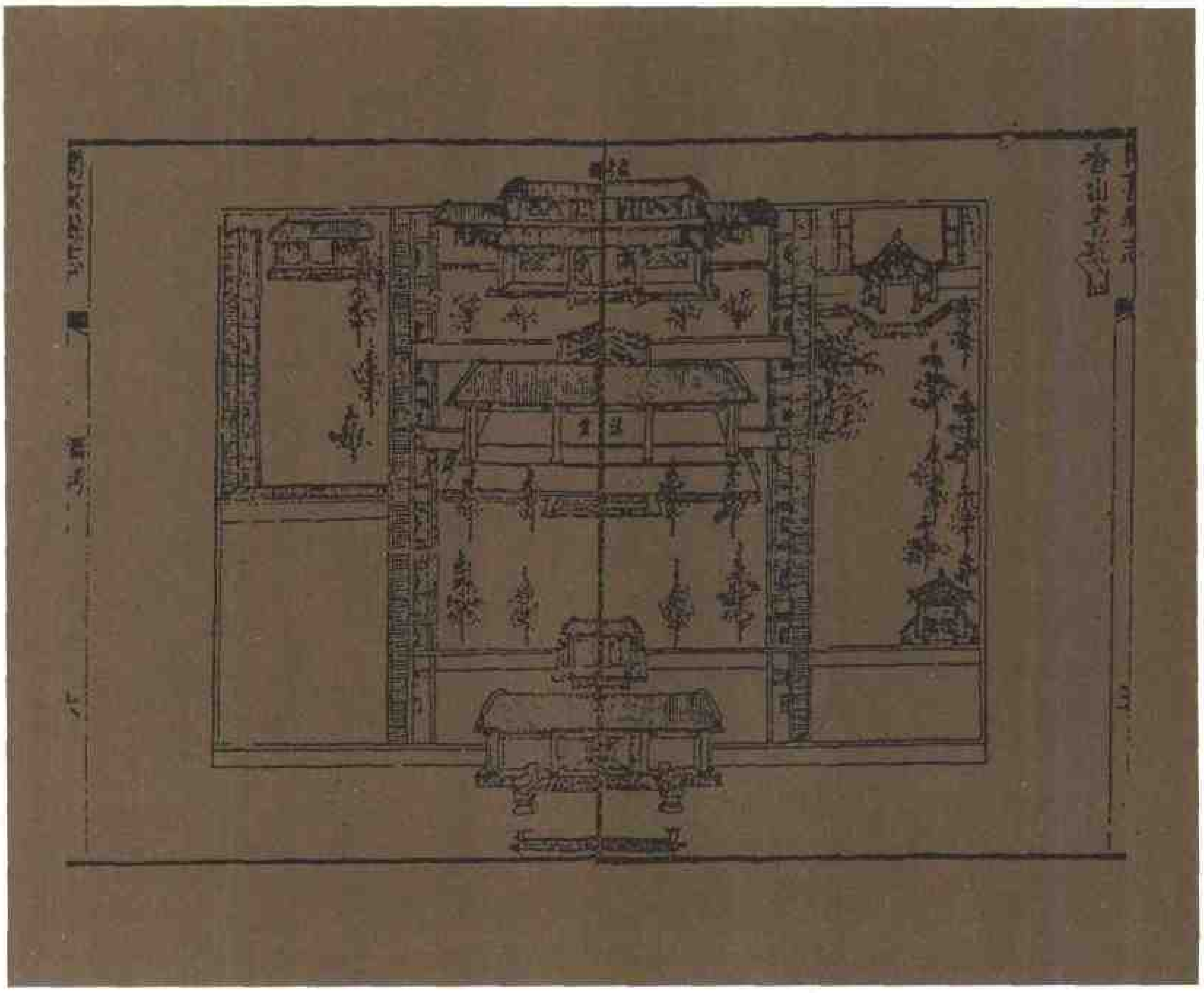


图 3-1-53　香山书院(图载清乾隆版《闻喜县志》)　在山西闻喜。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县建，有大门、二门、讲堂、主房、左右肄业堂等，并构亭凿池，为游息之所，又创文昌阁于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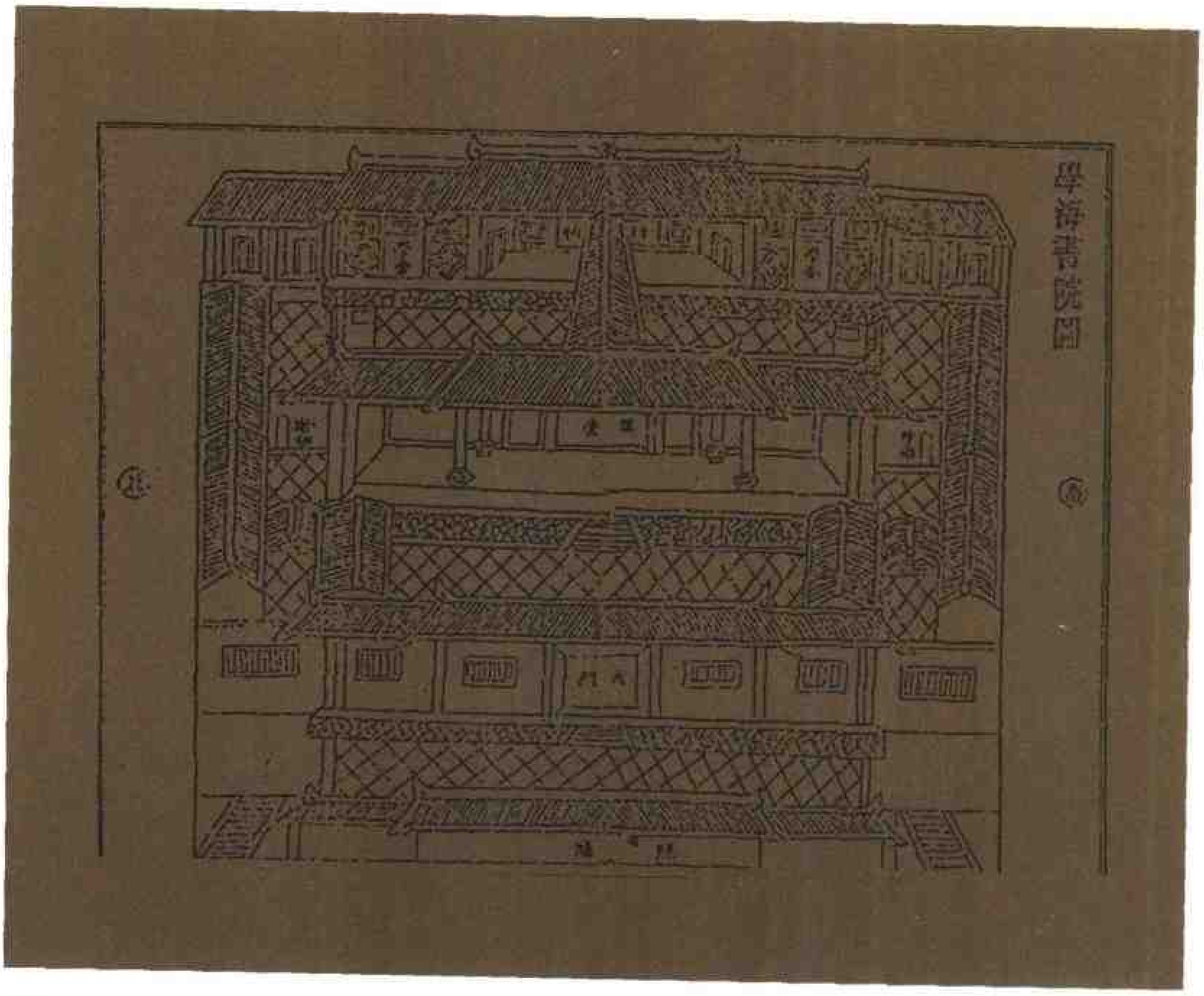


图 3－1－54　学海书院（图载《书院教育与建筑》）在台湾台北。清道光十七年（1837）建，二十三年（1843）续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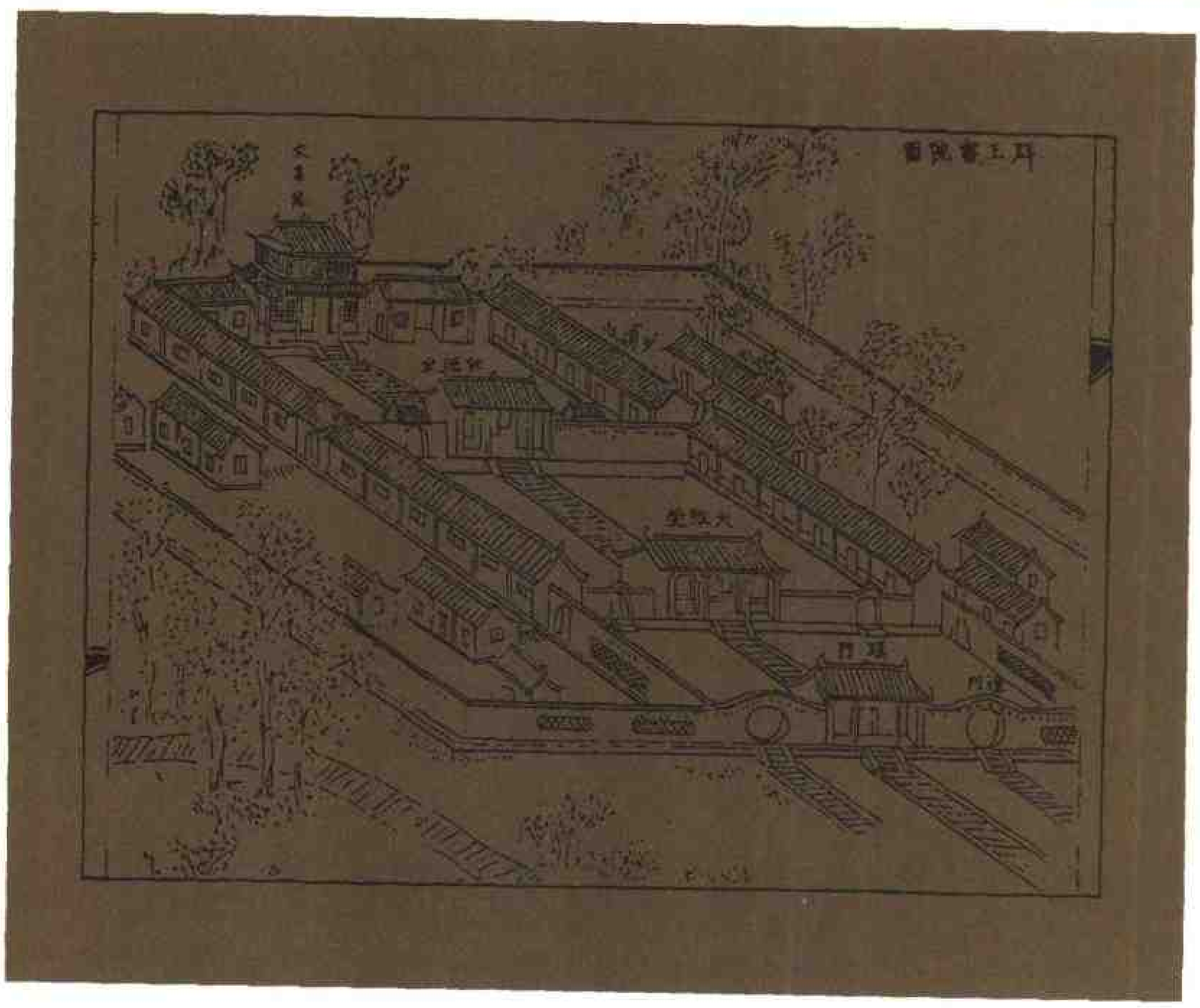


图 3－1－55　群玉书院（图载清乾隆版《群玉书院志》）在湖南永州、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建，面对群玉山，故名。有大雅、敏德、景贤诸堂、文昌阁及 24 斋。嘉庆时重修，增建香芩讲社，阮元曾讲学其中。咸丰八年（1858）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再修。清末改学堂。今址仍为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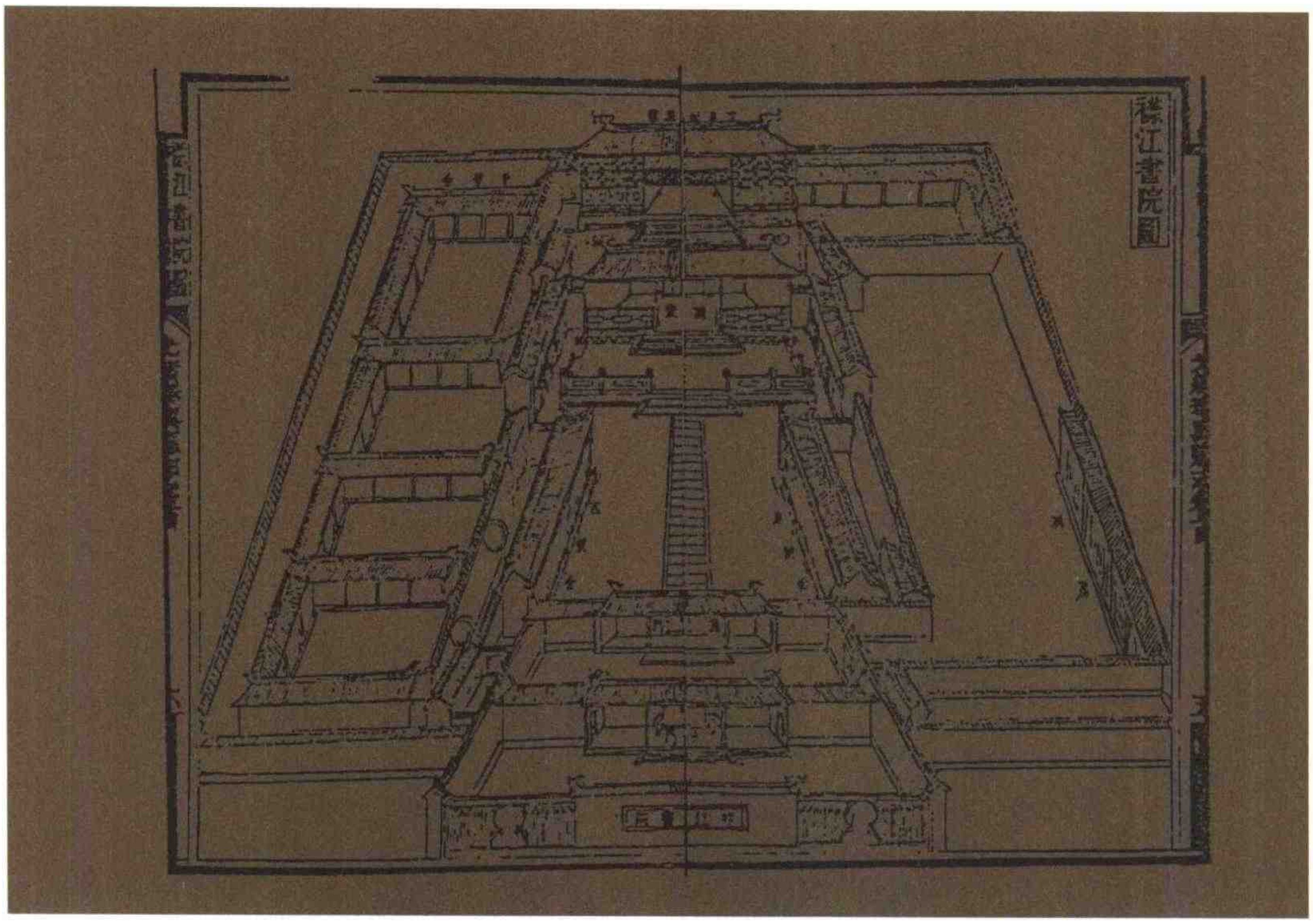


图 3－1－56 襟江书院（图载清光绪版《泰兴县志》） 在江苏泰兴。清咸丰十年（1860）知县建于学宫东，附号舍 40 椽，移县试于此。光绪间增建号舍 35椽。

书院中轴左右的斋舍安排，南方常多采用廊房横屋布置，即民间所谓的“几进几横”建筑。由于规模不同，斋舍有两列以至多列布置，各自形成廊院，既与中轴主体相隔离，又有方便联系，提供了较为紧凑、实用和安静的学习生活环境。下列图例，可见其共同特点。（图 3－1－5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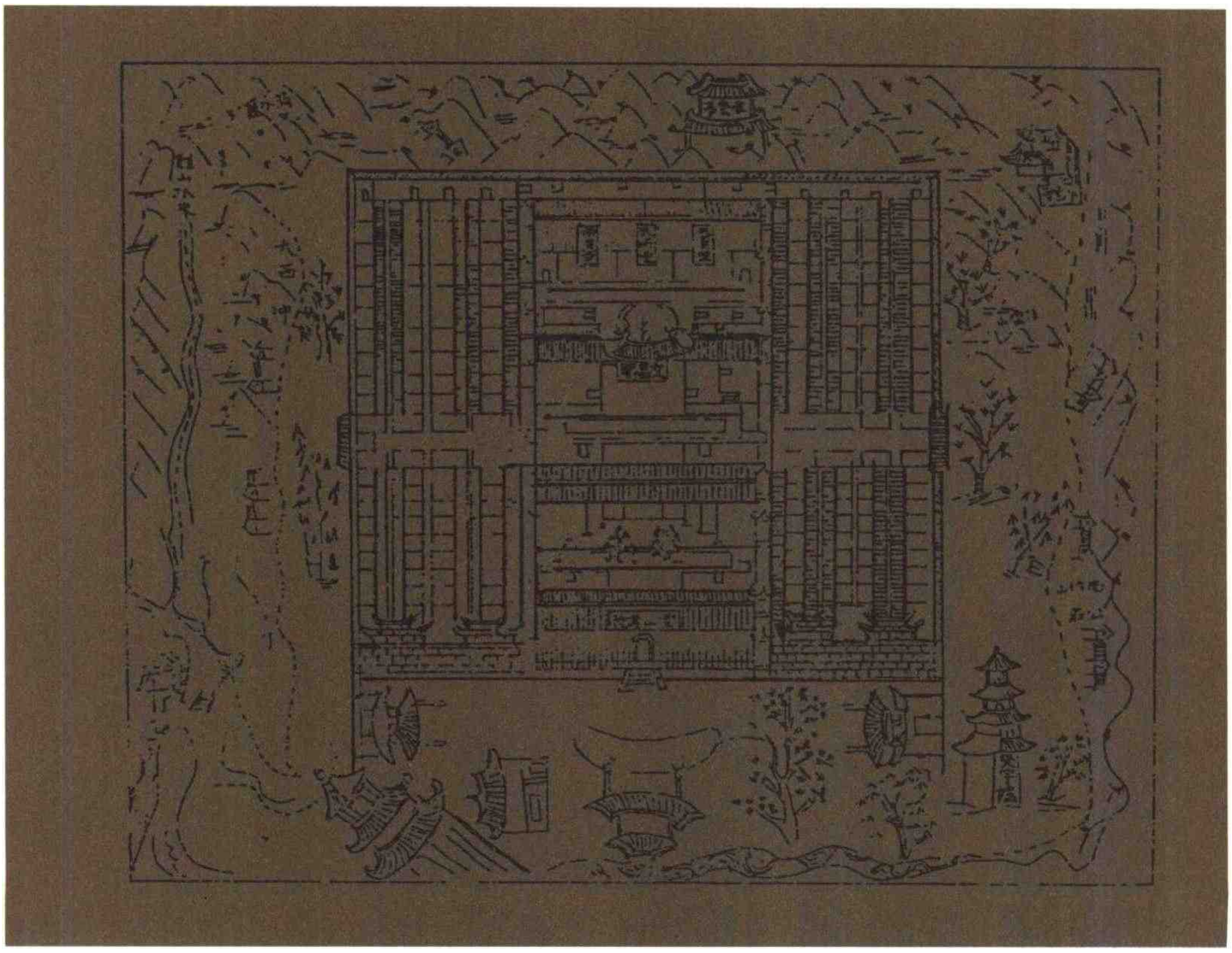


图 3－1－57 云山书院（图载清同治版《宁乡云山书院志》） 在湖南宁乡水云山。清同治四年（1865）建。后改学堂、学校，办学至今。保存完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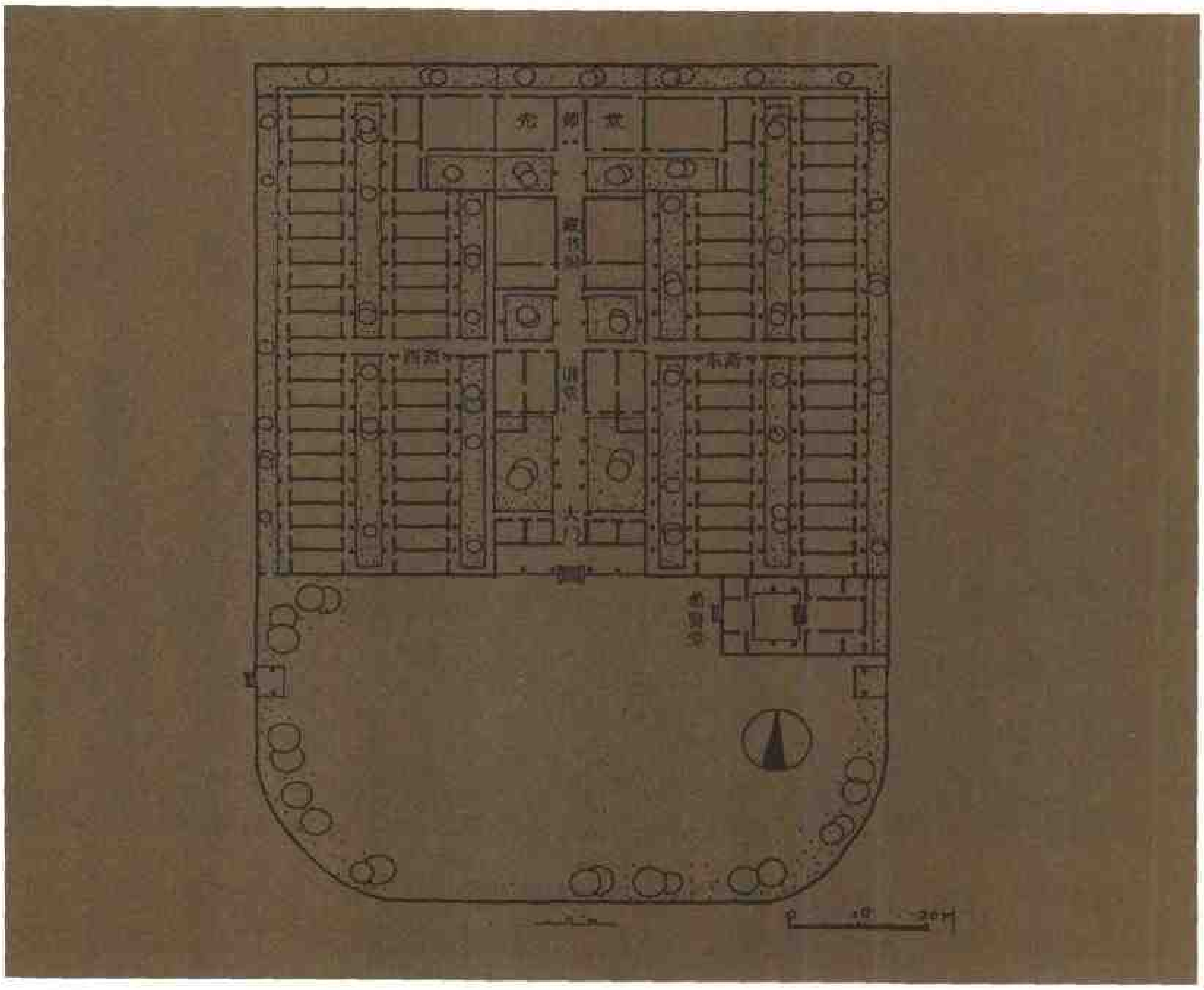


图 3－1－58　云山书院实测图(图载《湖南传统建筑》)　为书院现状。斋舍均为两层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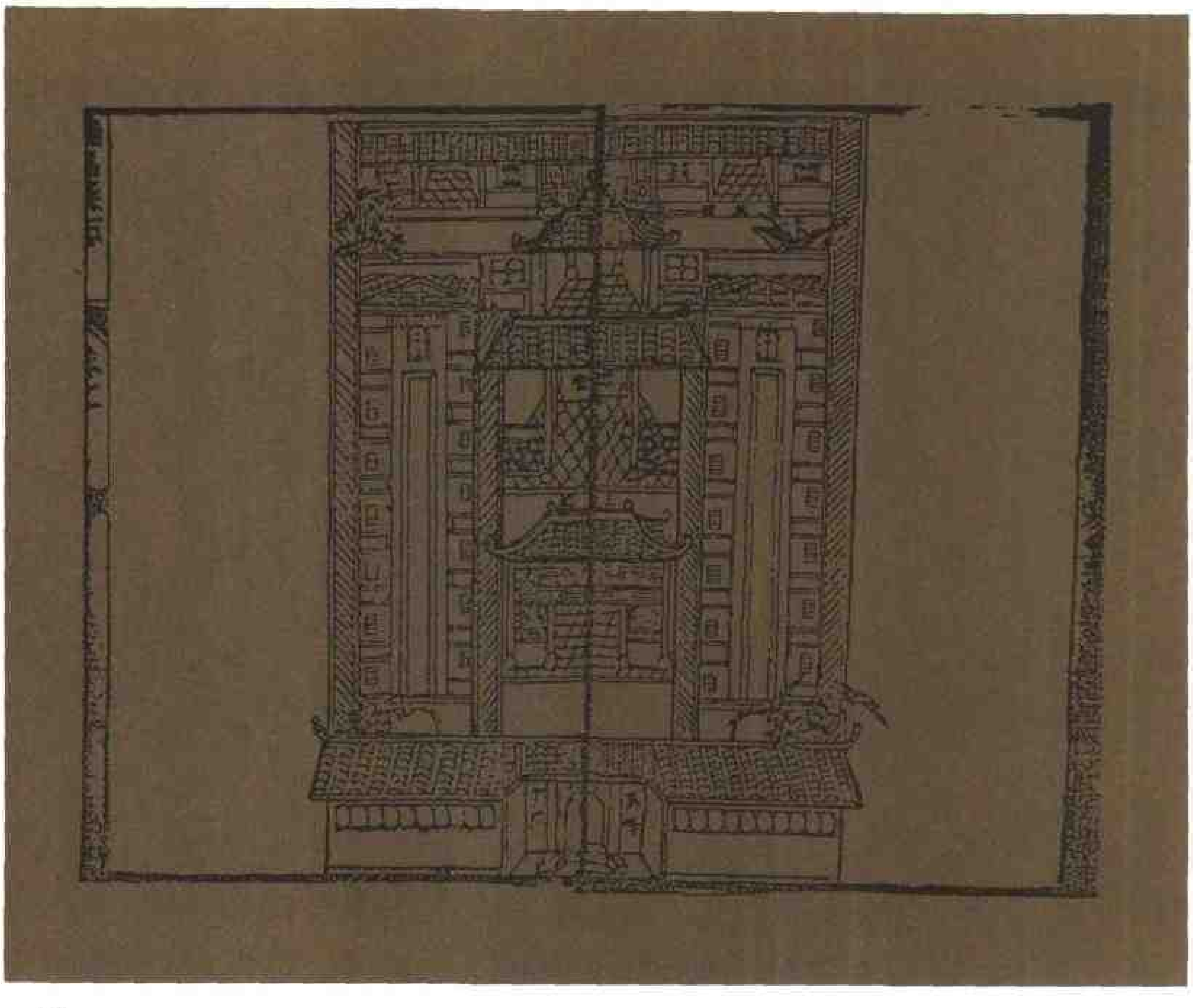


图 3－1－59　紫峰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瑞昌县志》)　在江西瑞西，清道光十五年(1835)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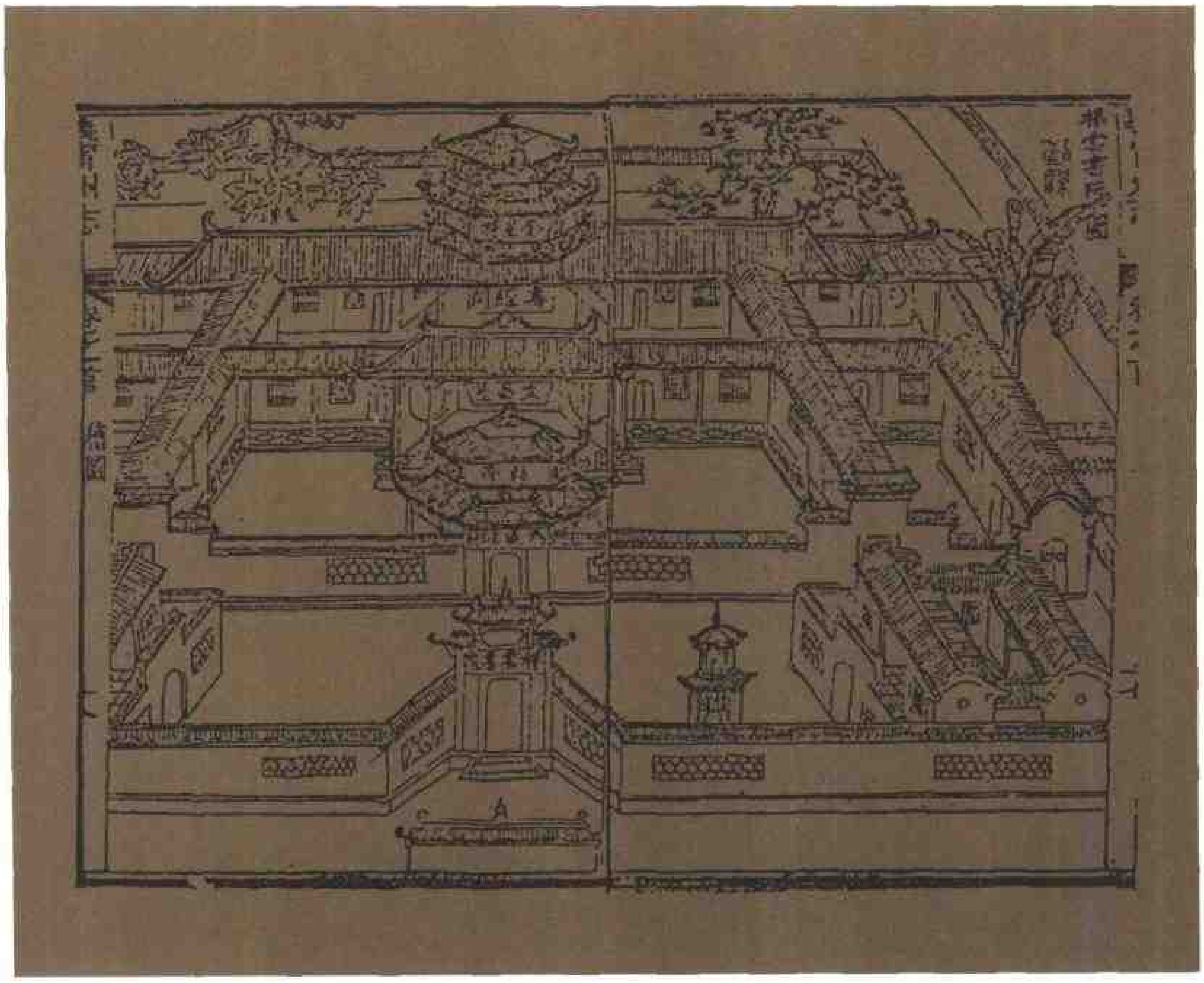


图 3－1－60　梯云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義宁州志》)　在江西修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客籍绅民捐资修建于北门铁炉巷，有讲堂、奎星楼、尊经阁、崇祀堂，及斋舍数十间。咸丰间毁，同治间修复。清末改小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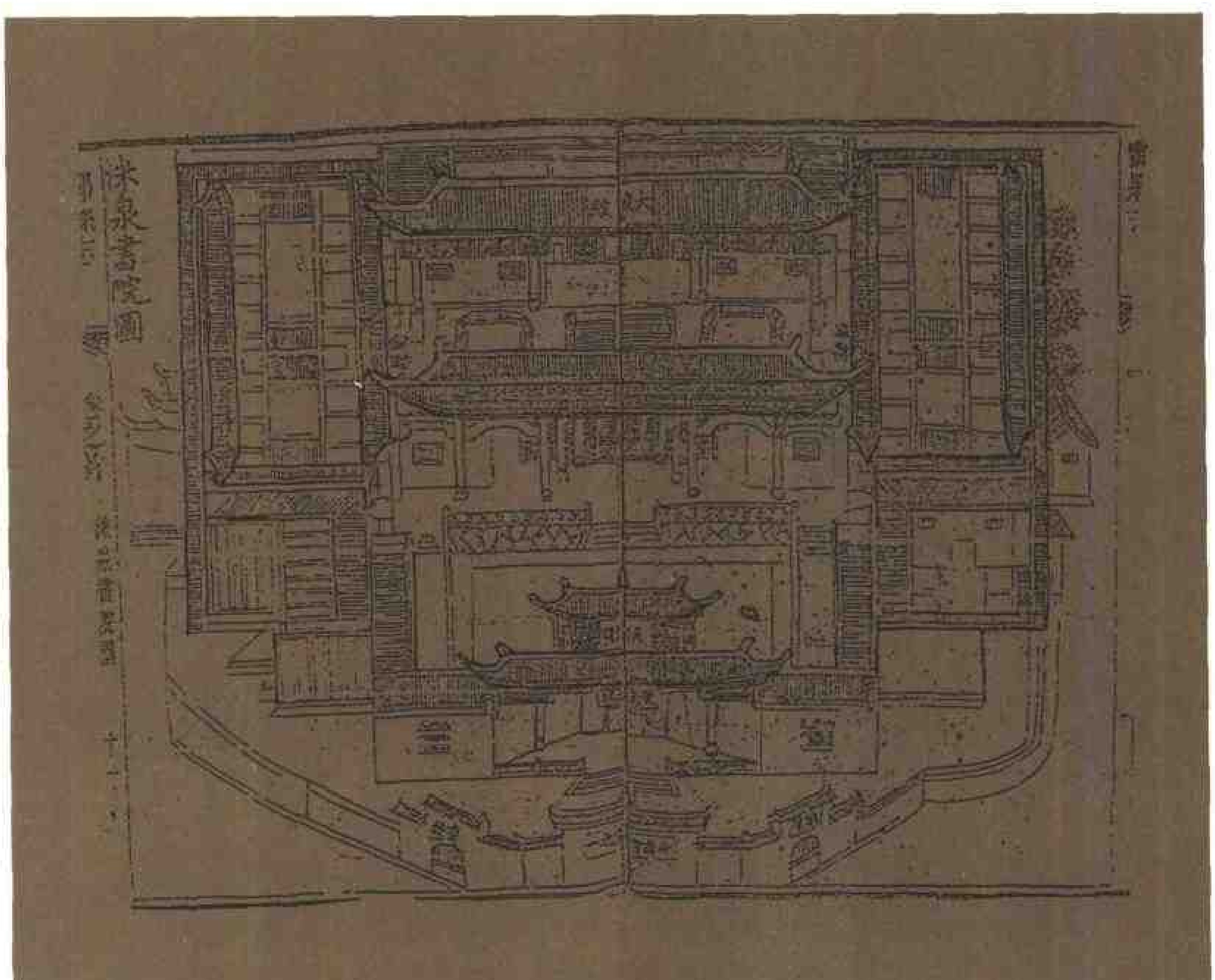


图 3－1－61　洣泉书院(图载清同治版《酃县志》)　在湖南酃县。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建于城西北，原名黄龙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改名"烈山"。嘉庆二年(1797)扩建斋舍，改名"洣泉"。道光五年(1825)迁建北门外校场坪，改名"酃湖"。同治二年(1862)迁回原址，复名"洣泉"。清末改小学堂。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驻此，是年秋被毁。后修复办学。现作为革命文物保护，并按同治时原貌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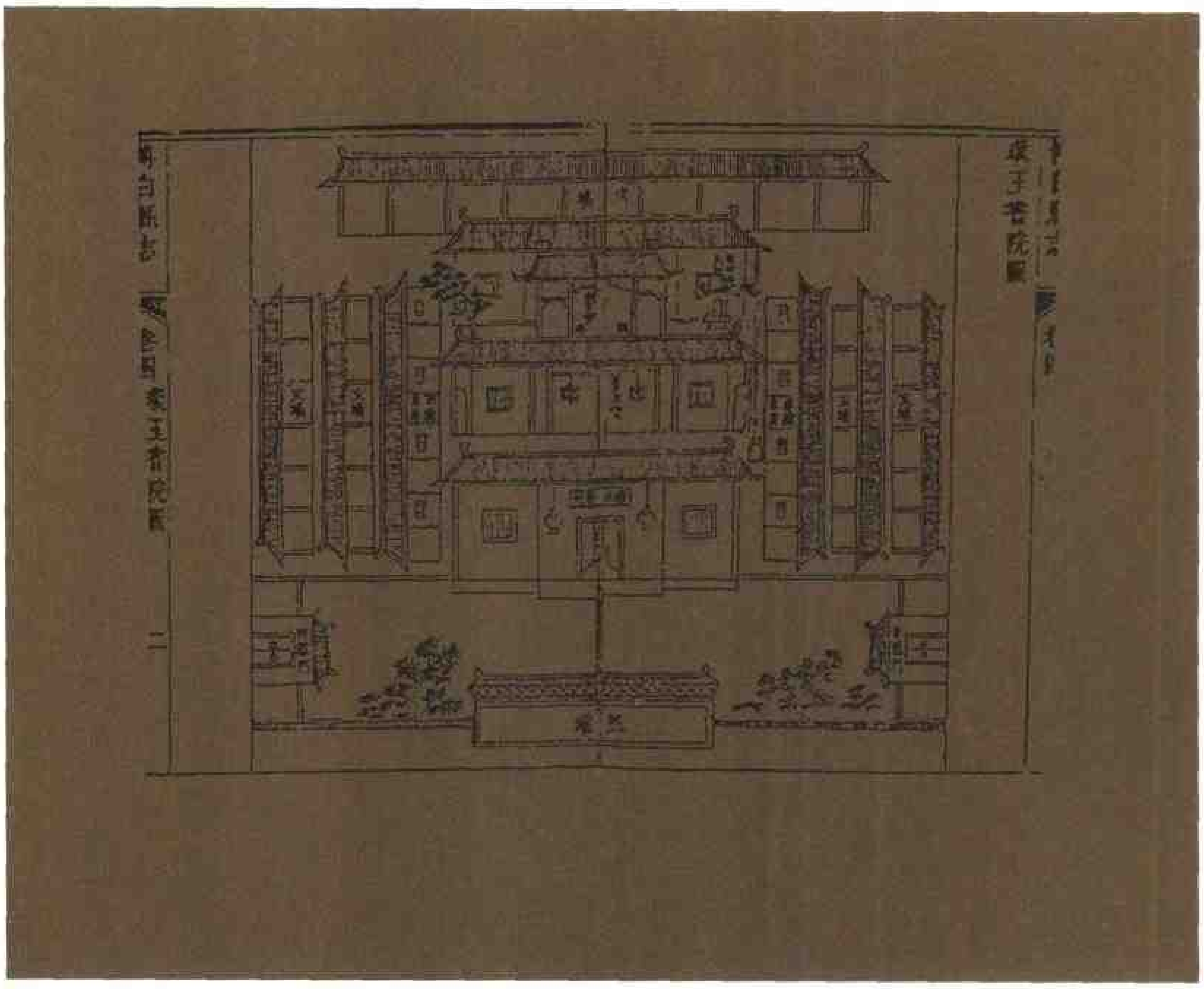


图 3-1-62 环玉书院(图载清道光版《博白县志》) 在广西博白。清乾隆十年(1745)知县建，有书堂一座，两廊轩堂5所，后圮。嘉庆八年(1803)移建城北郊，有正座、崇文堂、讲亭、养正堂、正厅、肄业房等;另旁建考棚。其址在今博白中学校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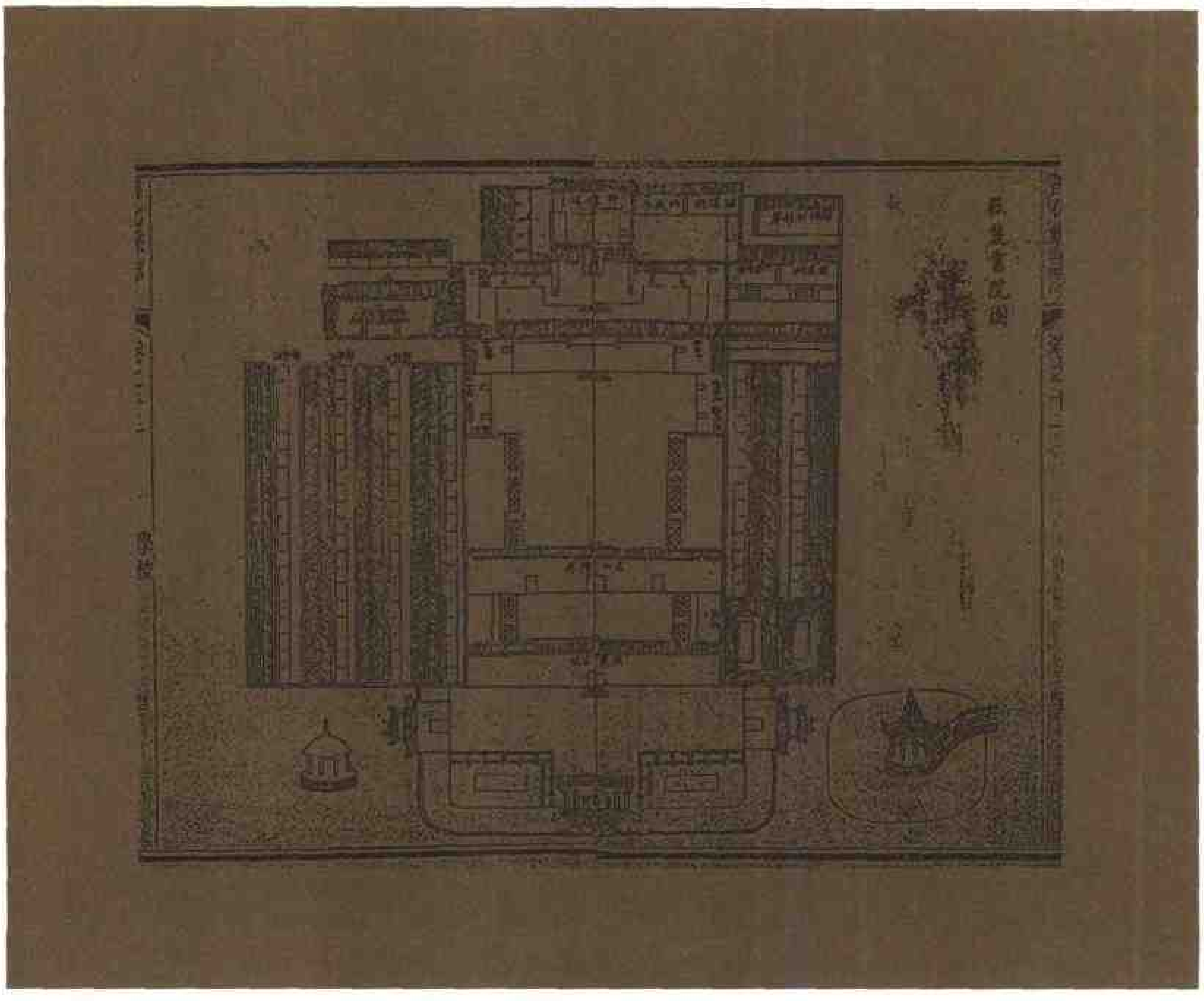


图 3-1-63 岳麓书院(图载清《善化县志》) 在湖南长沙。此图反映清同治七年(1868)扩建斋舍后状况。

书院也有因地基条件所限，不能纵深发展；或因规模过大，以及其他因素影响，采取横向拓展。从而形成双轴、三轴，甚至多轴并列布置，各成院落，以适应讲学、供祀等不同功能的需要，区别安排，各具特色。以下图例，可见一斑(图 3－1－6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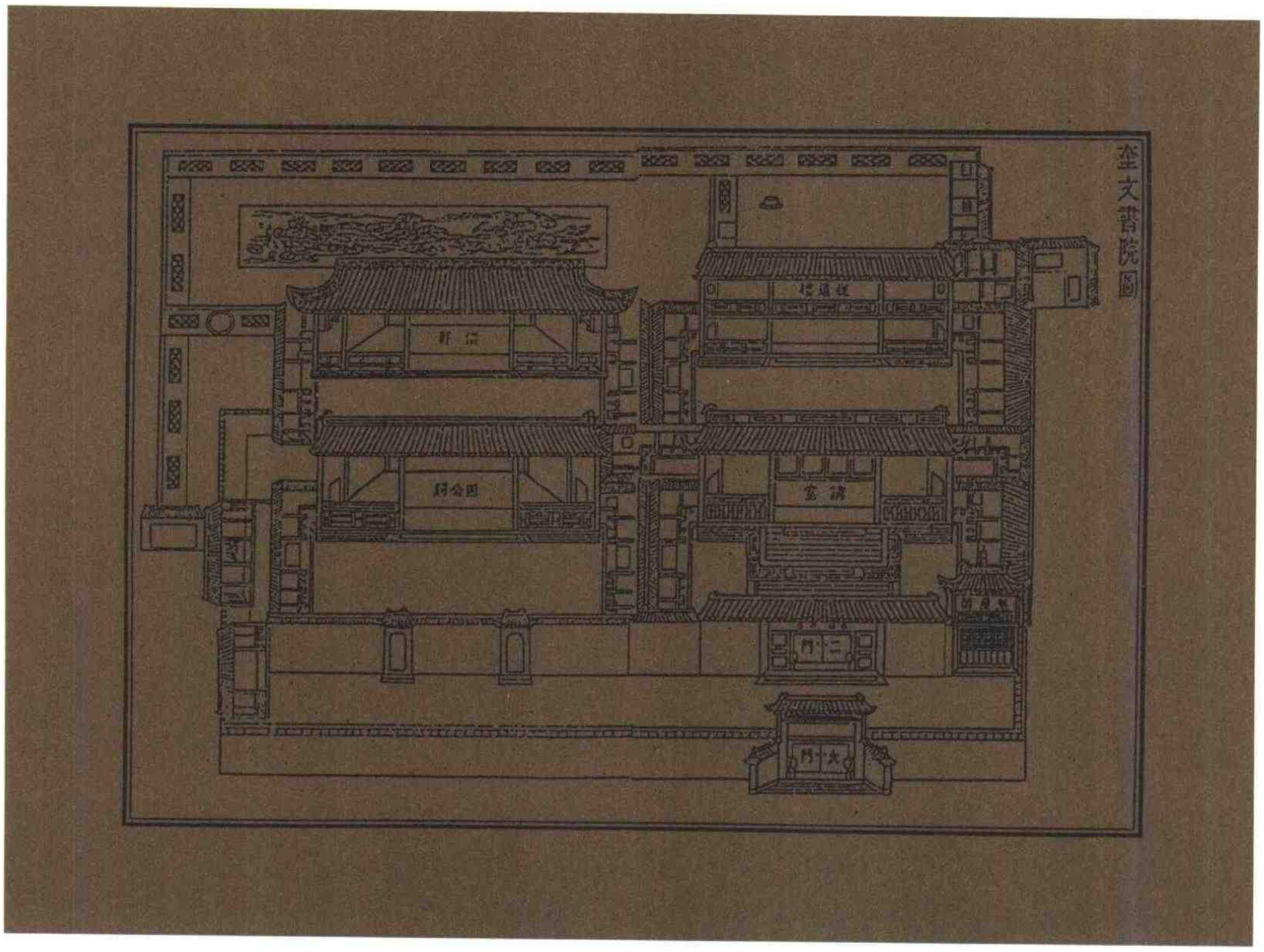


图 3－1－64　奎文书院（图载清同治版《重修山阴县志》）　在江苏淮安。明代创建于淮安联城内，初名惜阴书院。清同治初迁建于城西北隅，改名“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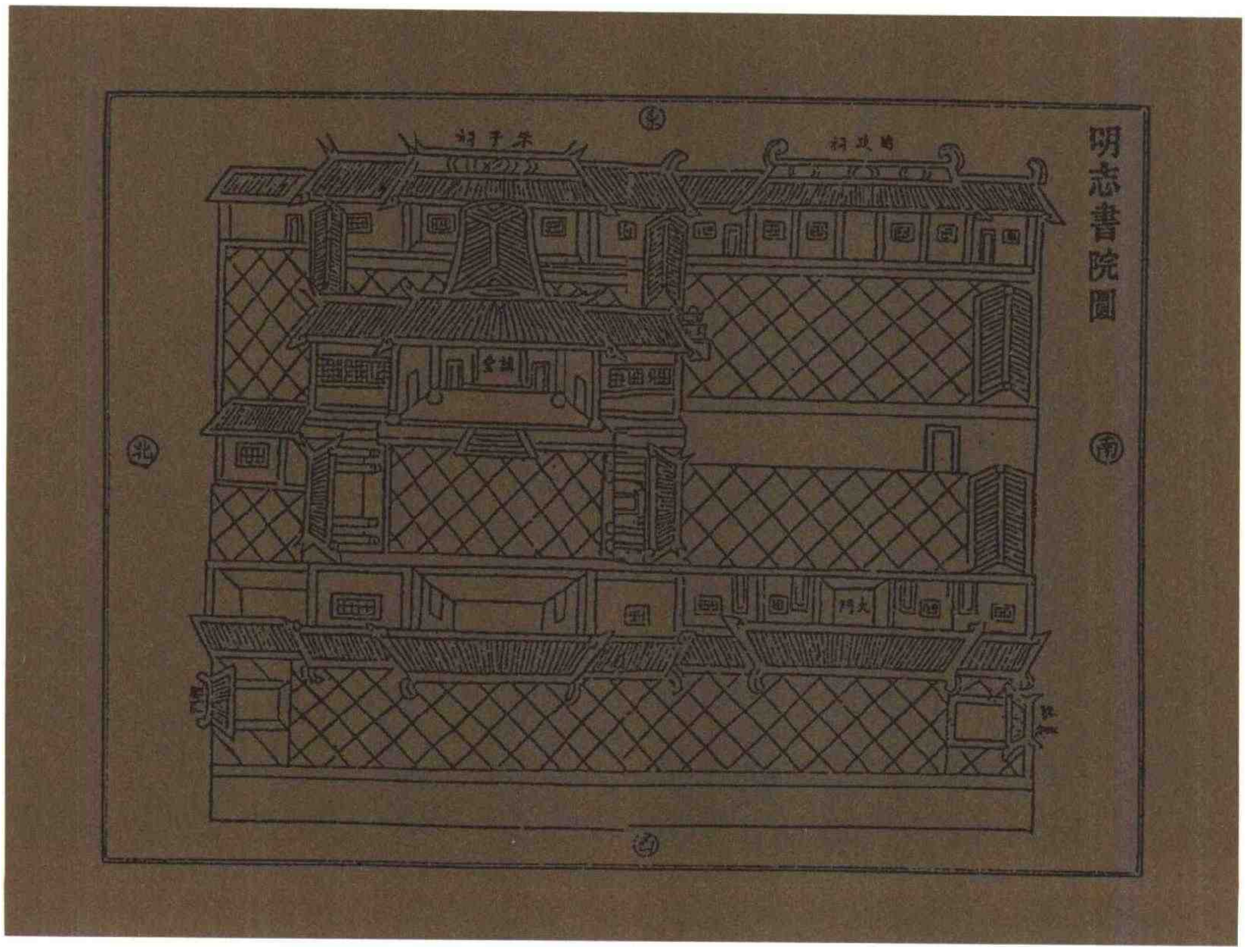


图 3－1－65　明志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淡水县志》）　在台湾新竹。清乾隆十年（1745）台北新庄胡氏以旧宅设塾，名明志义学。二十八年(1763)改为书院，经扩建可容百余人，为当时北部淡水厅第一书院。四十六年（1781）迁建于淡水厅城(今新竹)西门，有建筑三进，中为讲堂，后祀朱子，左右肄业房，左侧有敬业堂，后名德政堂。曾有“淡水文风冠全台”之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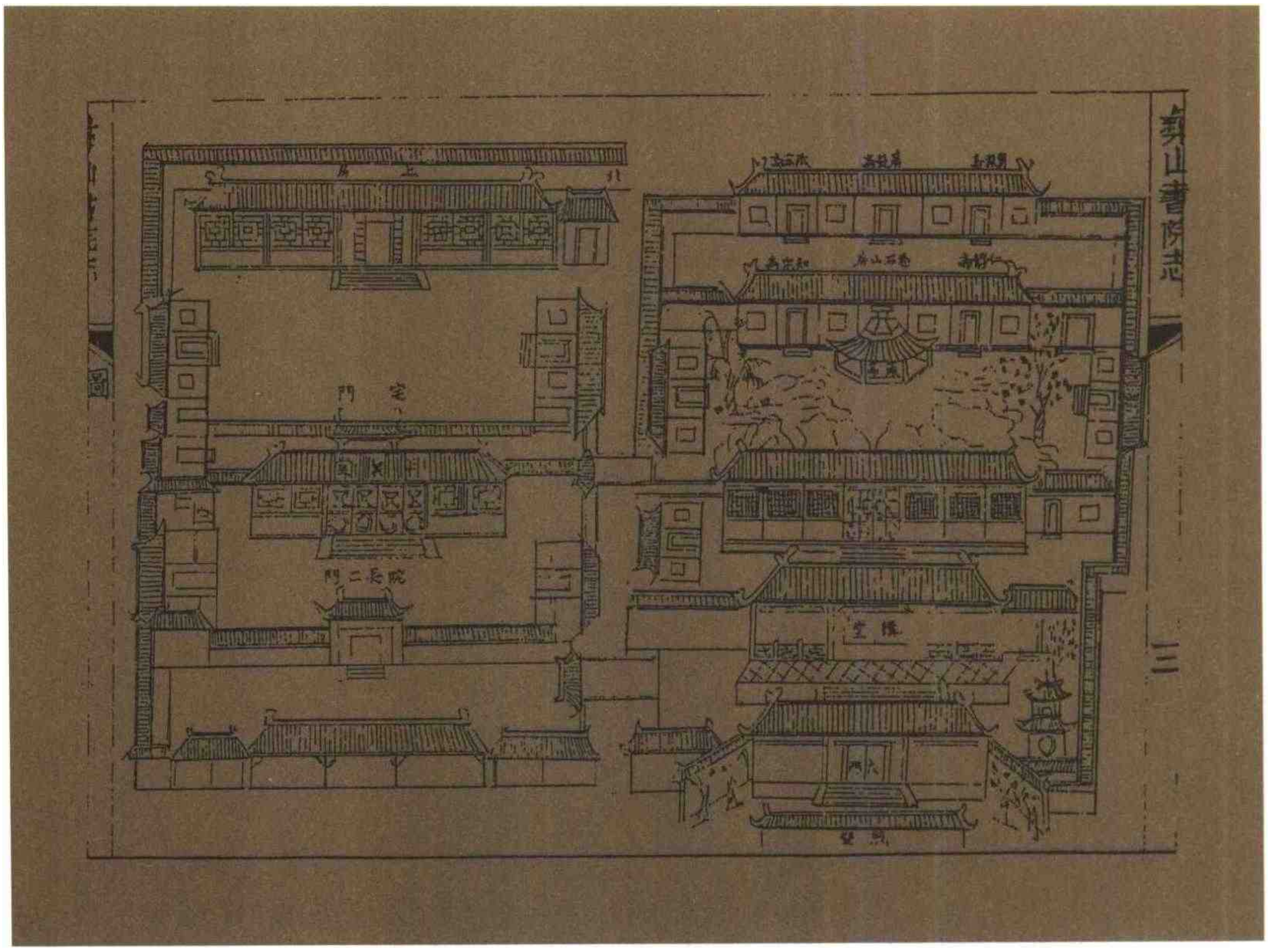


图 3-1-66　彝山书院（图载清道光版《彝山书院志》）　在河南开封。清道光八年(1828)创建。同治、光绪时一再增修。后改学堂。今址仍为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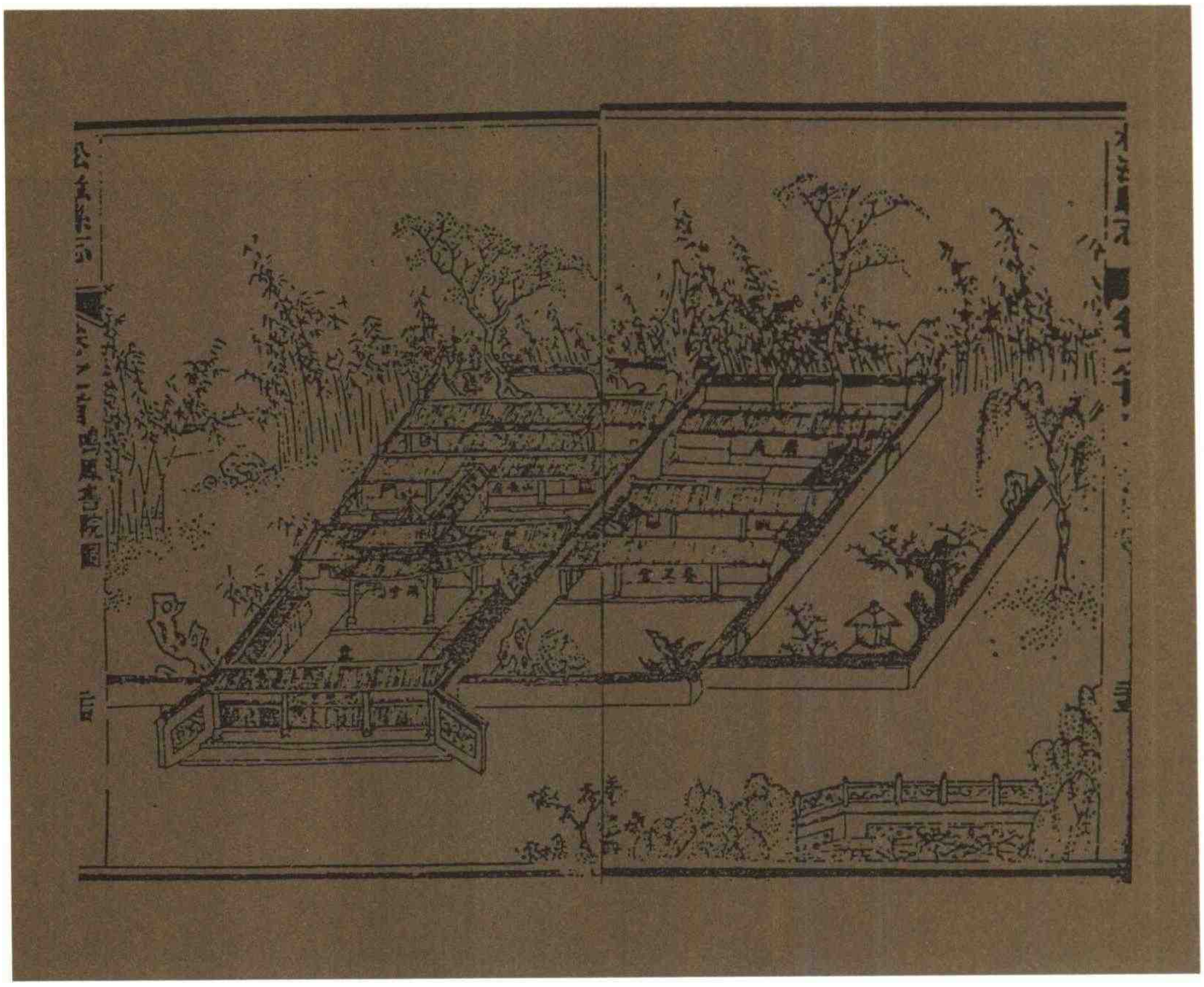


图 3-1-67　鸣凤书院（图载清同治版《松滋县志》）　在湖北松滋，又名松邑书院、山谷书院。元代创建。

以上为双轴并列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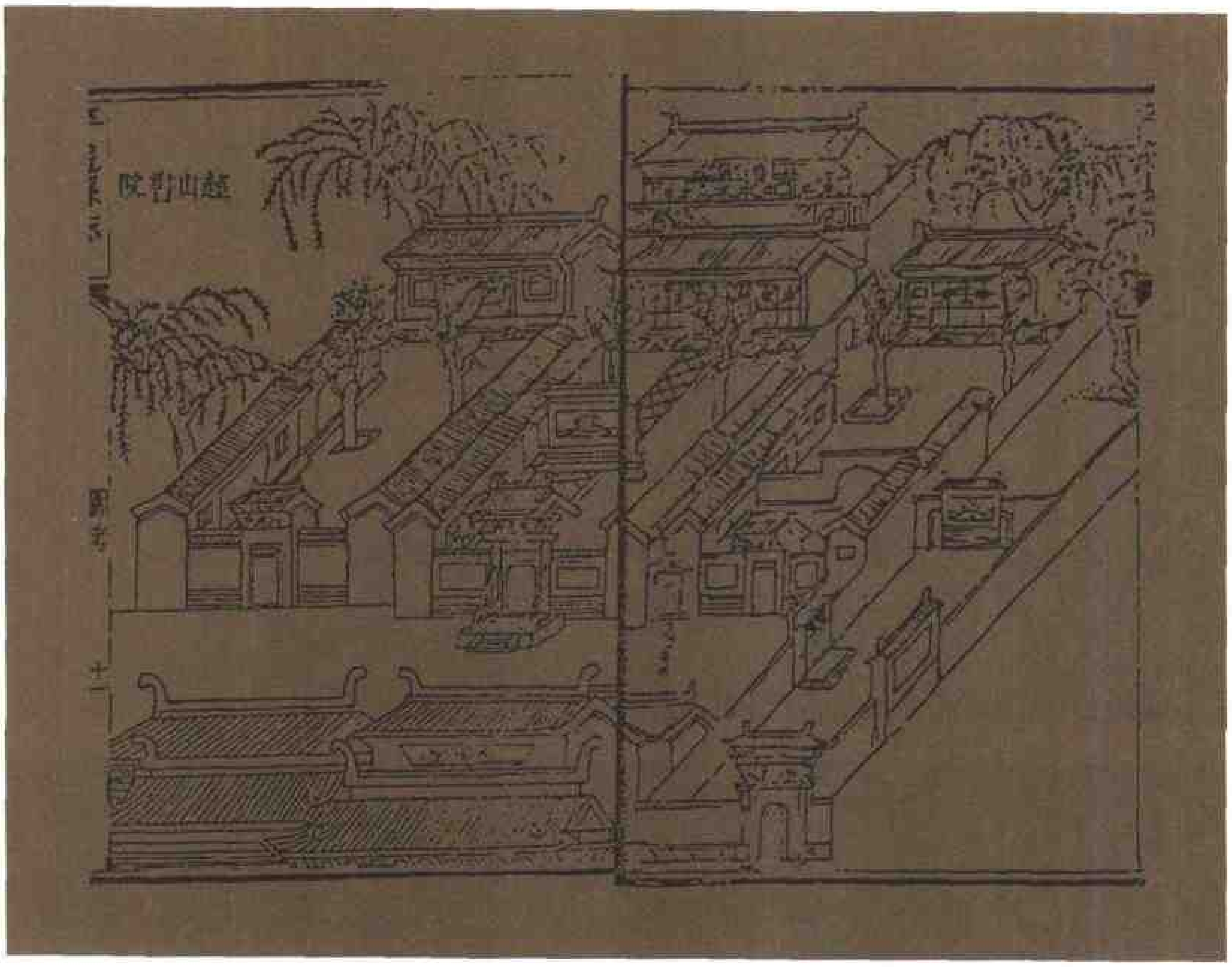


图 3-1-68 超山书院（图载清光绪版《平遥县志》）在山西平遥。清乾隆间知县创建于文庙内，经道光、咸丰时两次扩建，清末改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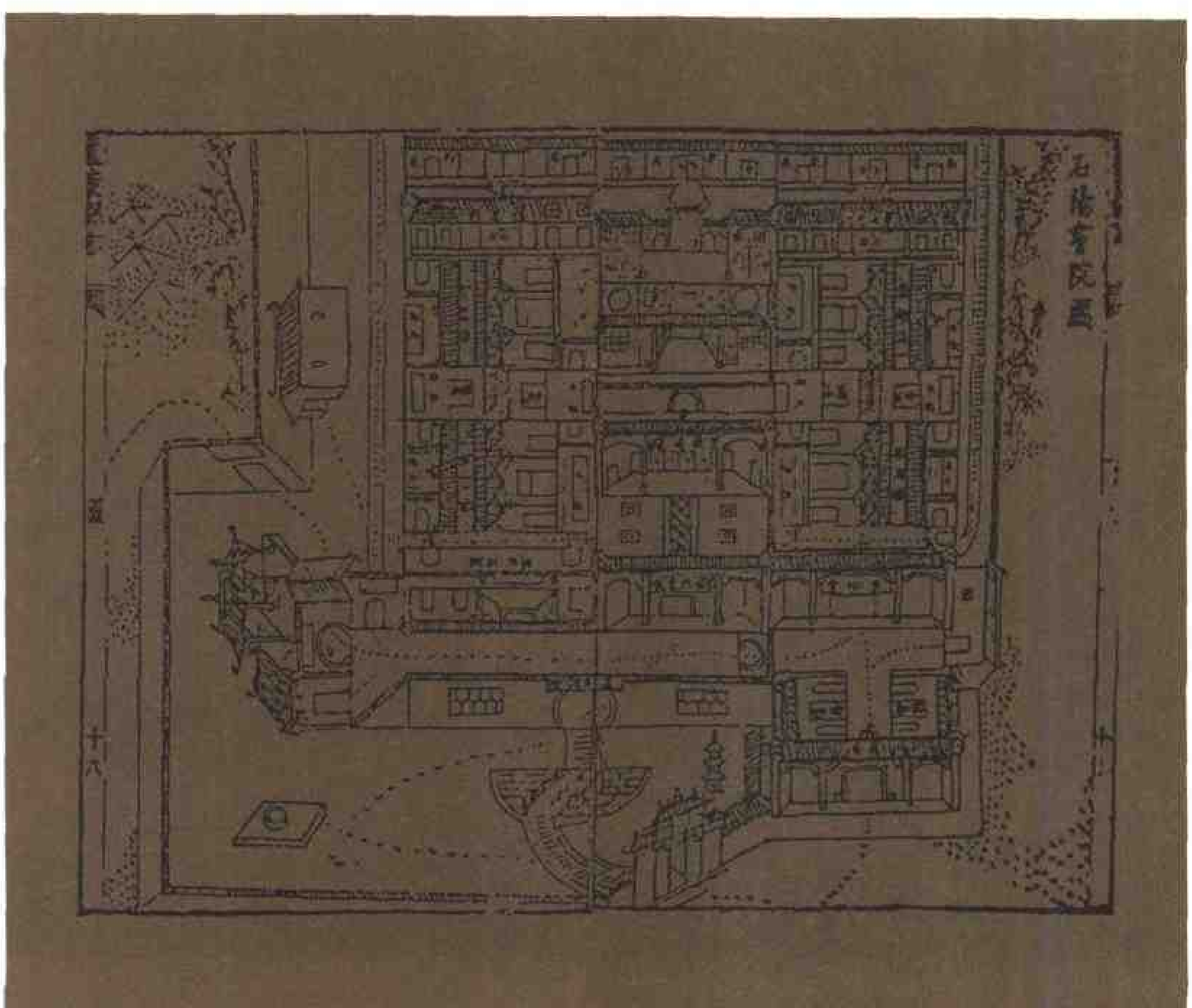


图 3-1-69 石阳书院（图载清同治版《庐陵县志》）在江西吉安，清乾隆九年(1744)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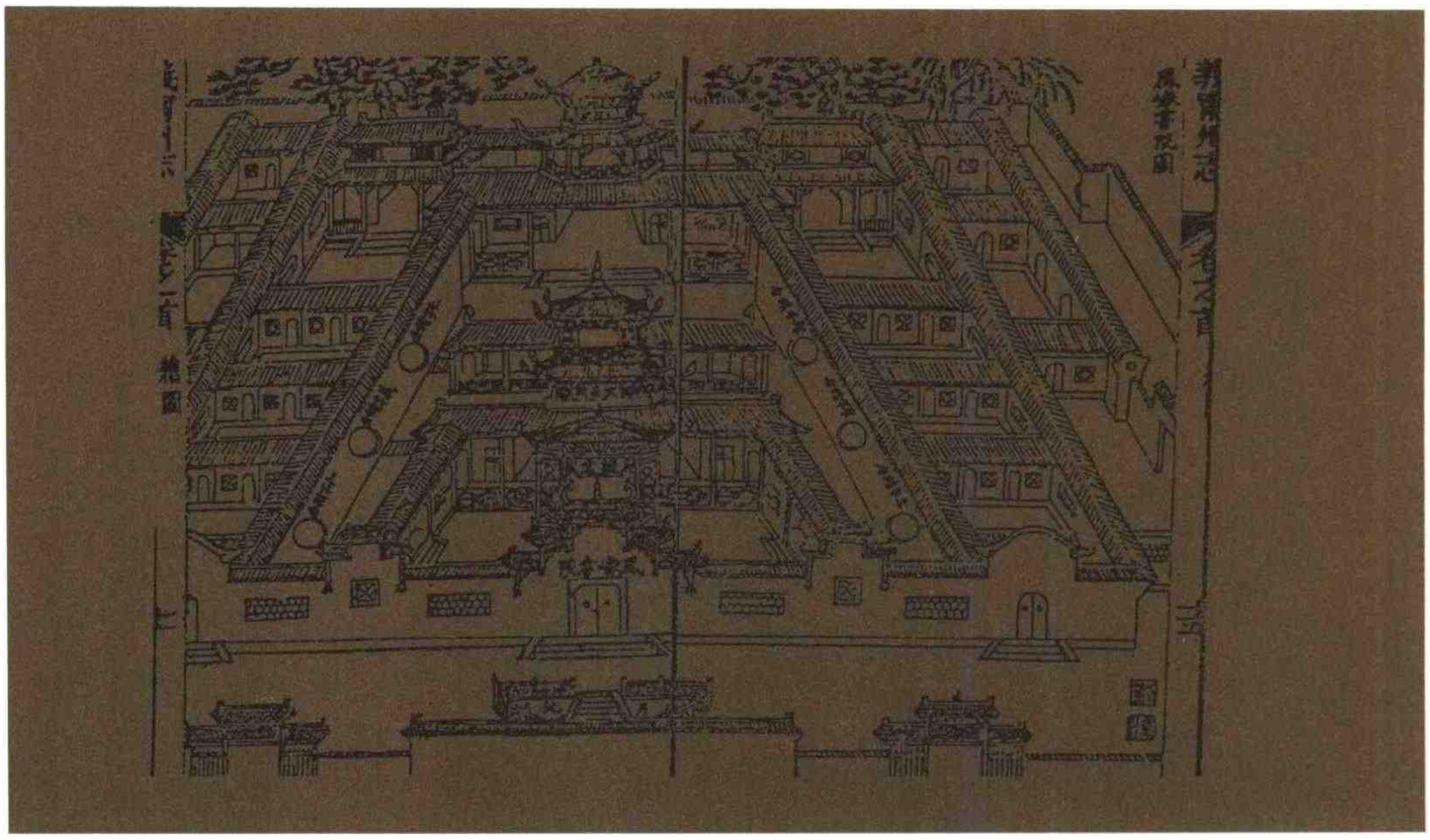


图 3-1-70　凤巘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义宁州志》）　在江西修水。清同治四年(1865)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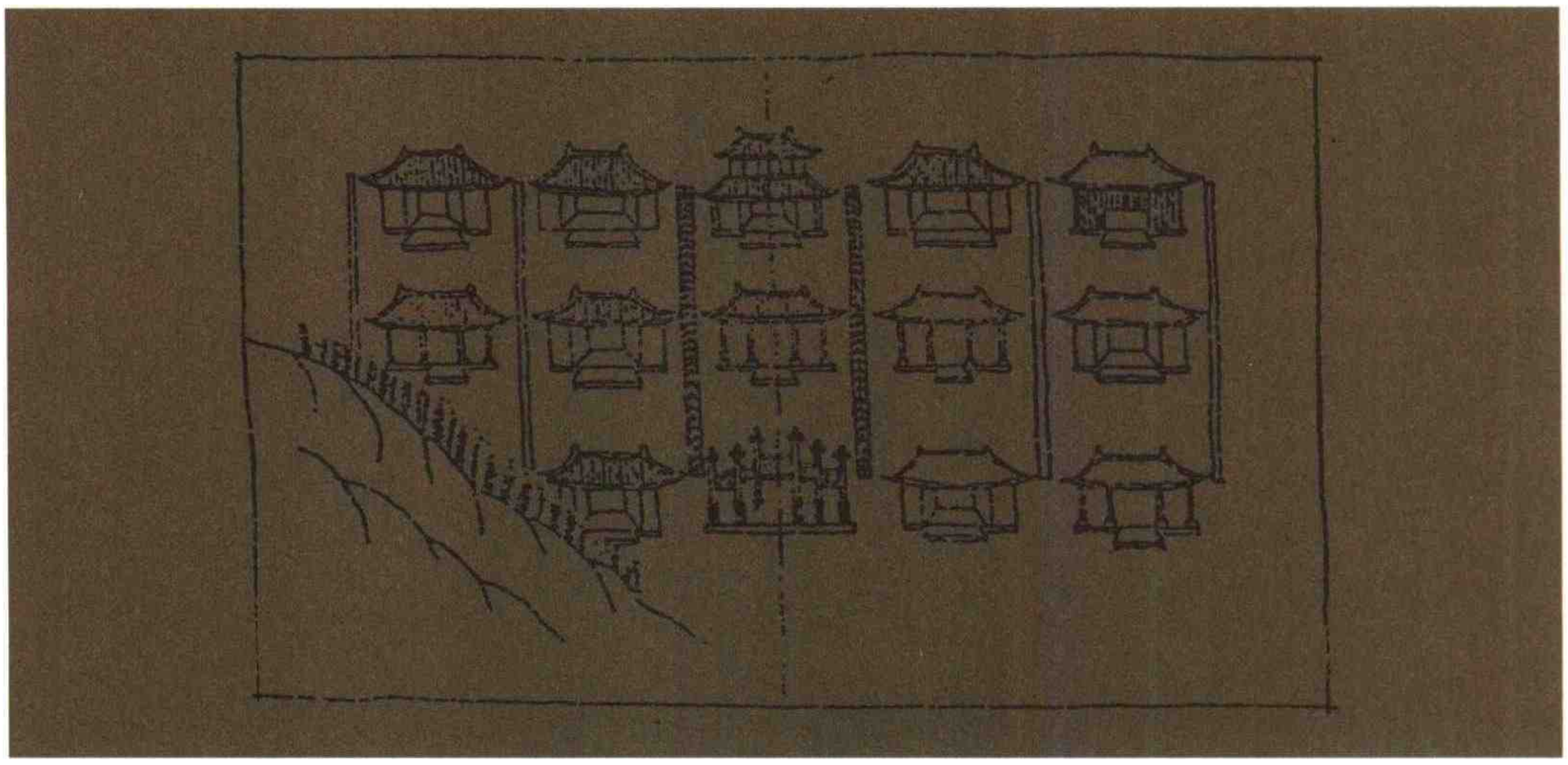


图 3-1-71　白鹿洞书院（图载清雍正版《江西通志》局部）　显示五路布局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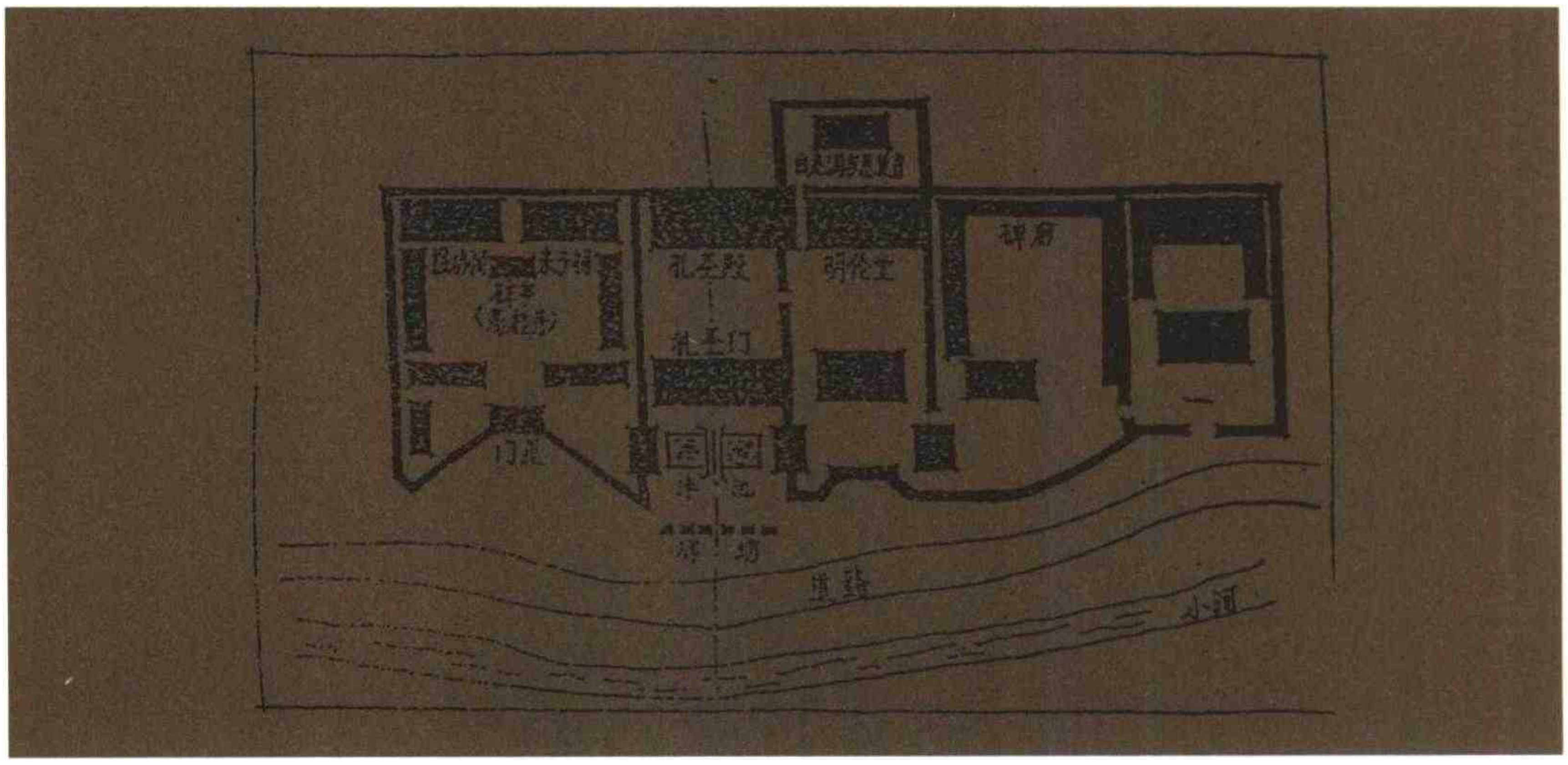


图 3-1-72　白鹿洞书院现状示意图

以上为三轴，以及多轴并列布局形式。

书院多择山林胜地，建筑依山就势，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力求与风景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尤其是南方山丘地带，地形较为复杂，因此不少书院采取局部轴线，或无明显轴线的灵活自由的布局形式，形成更加曲折多变的空间组合层次，显示出更为幽深丰富的景观面貌。如以下图例所示(图 3 - 1 - 73 ~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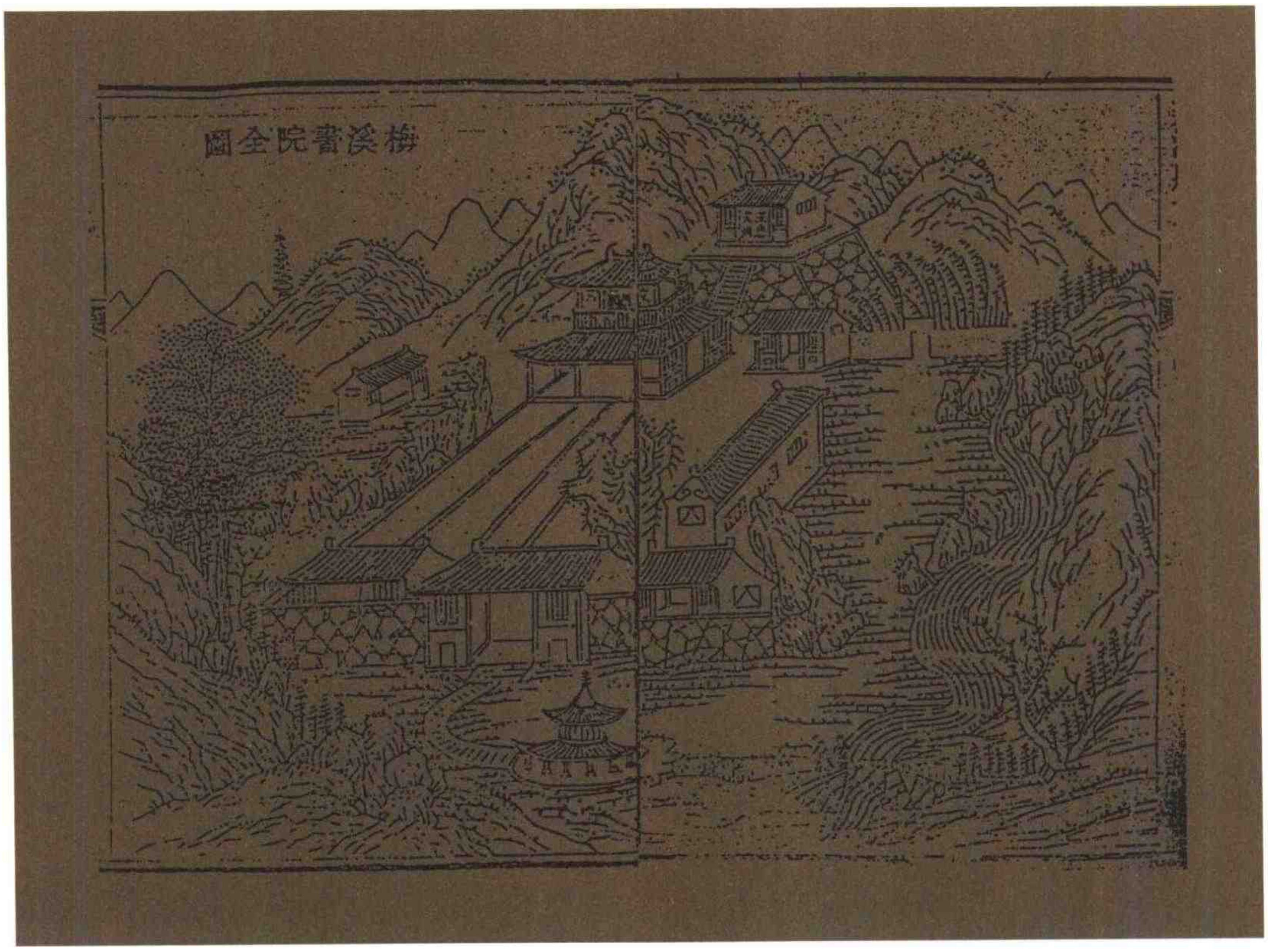


图 3 - 1 - 73　梅溪书院（图载清光绪版《乐清县志》）　在浙江乐清。宋绍兴十四年（1144）王十明建于城东隅，明隆庆间重建。清雍正六年（1728）移建于城西长春道院，正楼祀王十朋，侧建五老堂，旁为藏经阁，另有讲堂、静修斋、厨房等。后续又增建文昌阁等。同治元年(1862)被毁，三年修复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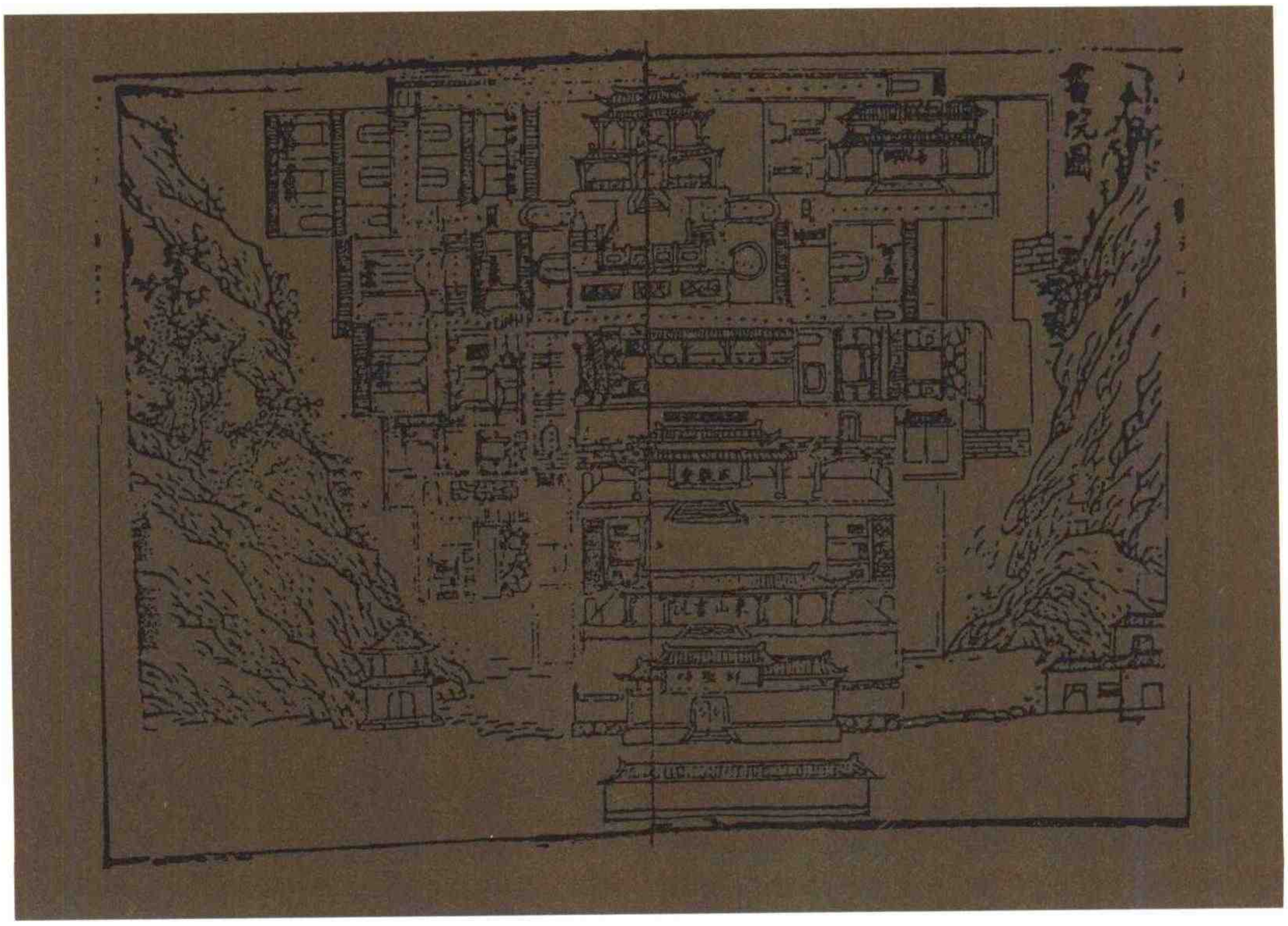


图 3 - 1 - 74　东山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祁门县志》）　在安徽祁门、明正德十六年（1521）撤东岳庙创建，有会文所、学舍、仰止亭等。后毁；嘉靖九年(1530)重建，改名“环谷”；万历四十四年（1616）扩建，复名“东山”。清咸丰初战毁，同治二年(1863)再建。后改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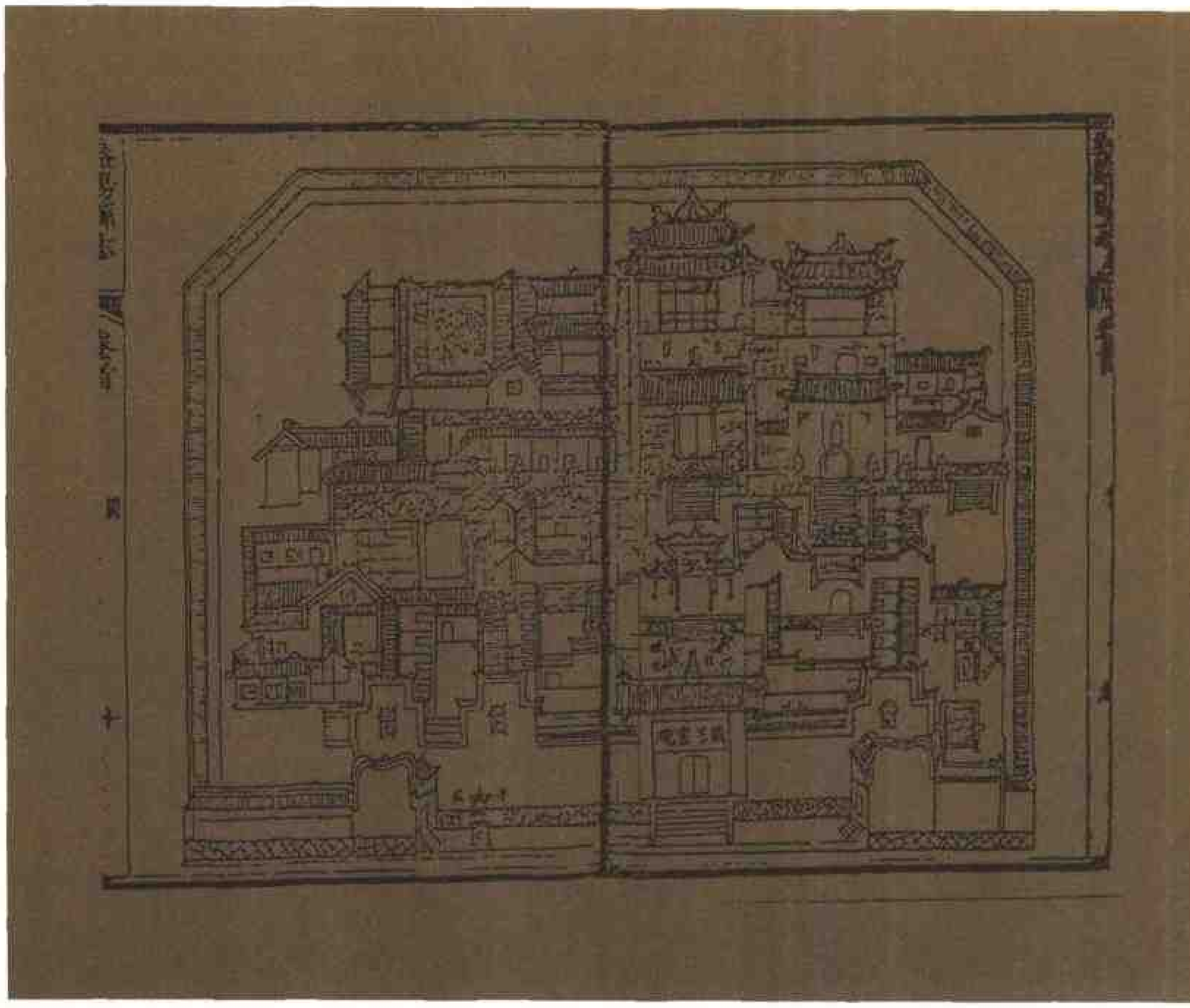


图 3－1－75　箴言书院（图载清同治版《益阳县志》）在湖南益阳，清咸丰三年(1853)胡林翼创建于瑶华山麓，因其父达源曾著《弟子箴言》，故名；至同治二年(1863)始成；有大门、先圣祠、官詹公祠（祀胡父）、大堂、书楼、半学、志道、据德、依仁诸斋，共四进96间，另辟有射圃，可容学生120人。清末改校士馆。后改学校，办学至今。尚存部分遗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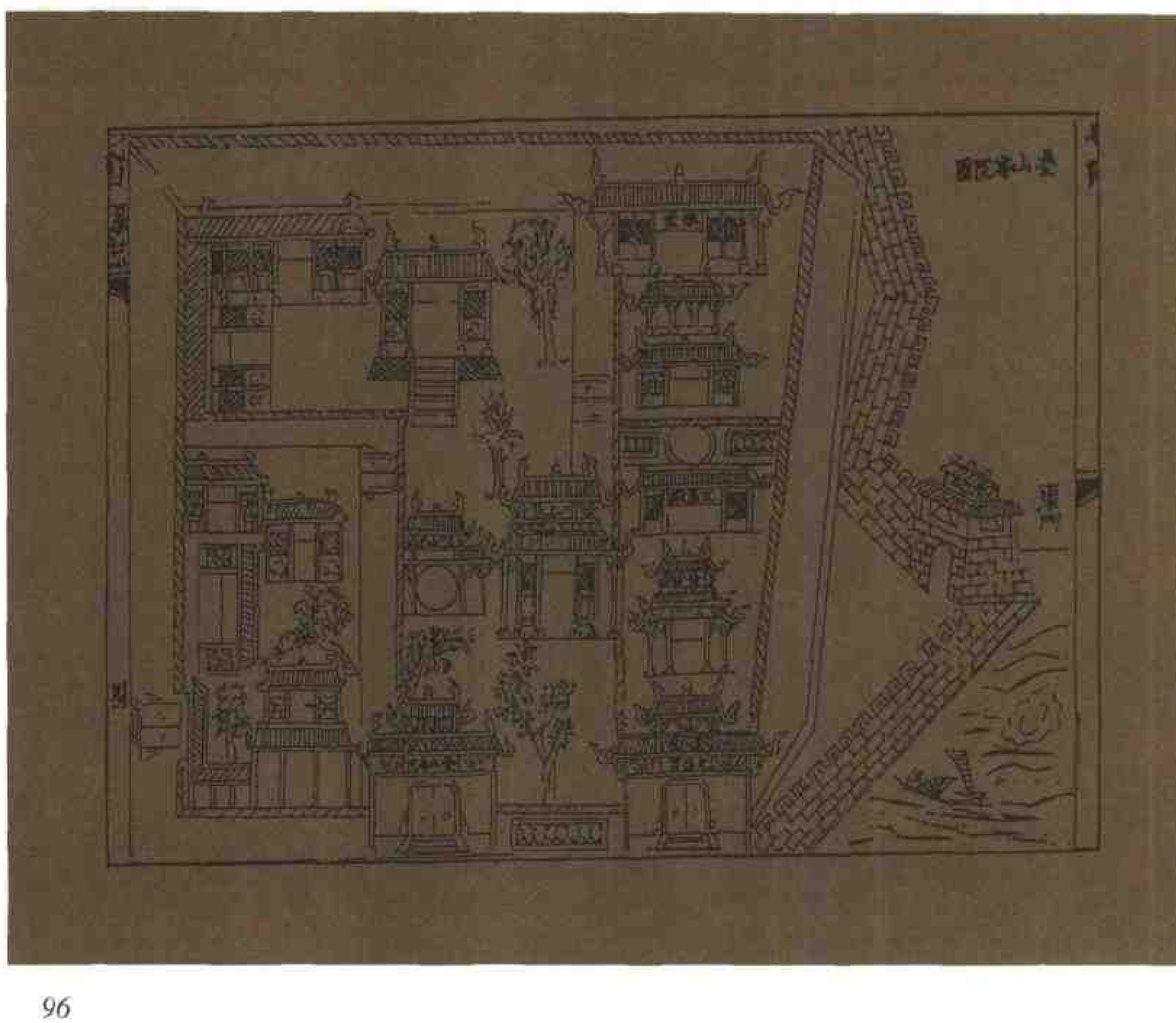


图 3－1－76　叠山书院（图载清同治版《弋阳县志》）在江西弋阳。元皇庆二年(1313)虞舜臣创建，久废。清乾隆十一年(1746)知县就皇华寺故址重建，名葛溪书院；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改万寿宫为书院，更名“叠山”，以纪念宋儒谢枋得（号叠山）；有文昌阁、魁星阁、讲堂、学舍、亭台、仓廒、公所等。咸丰初毁，同治九年(1870)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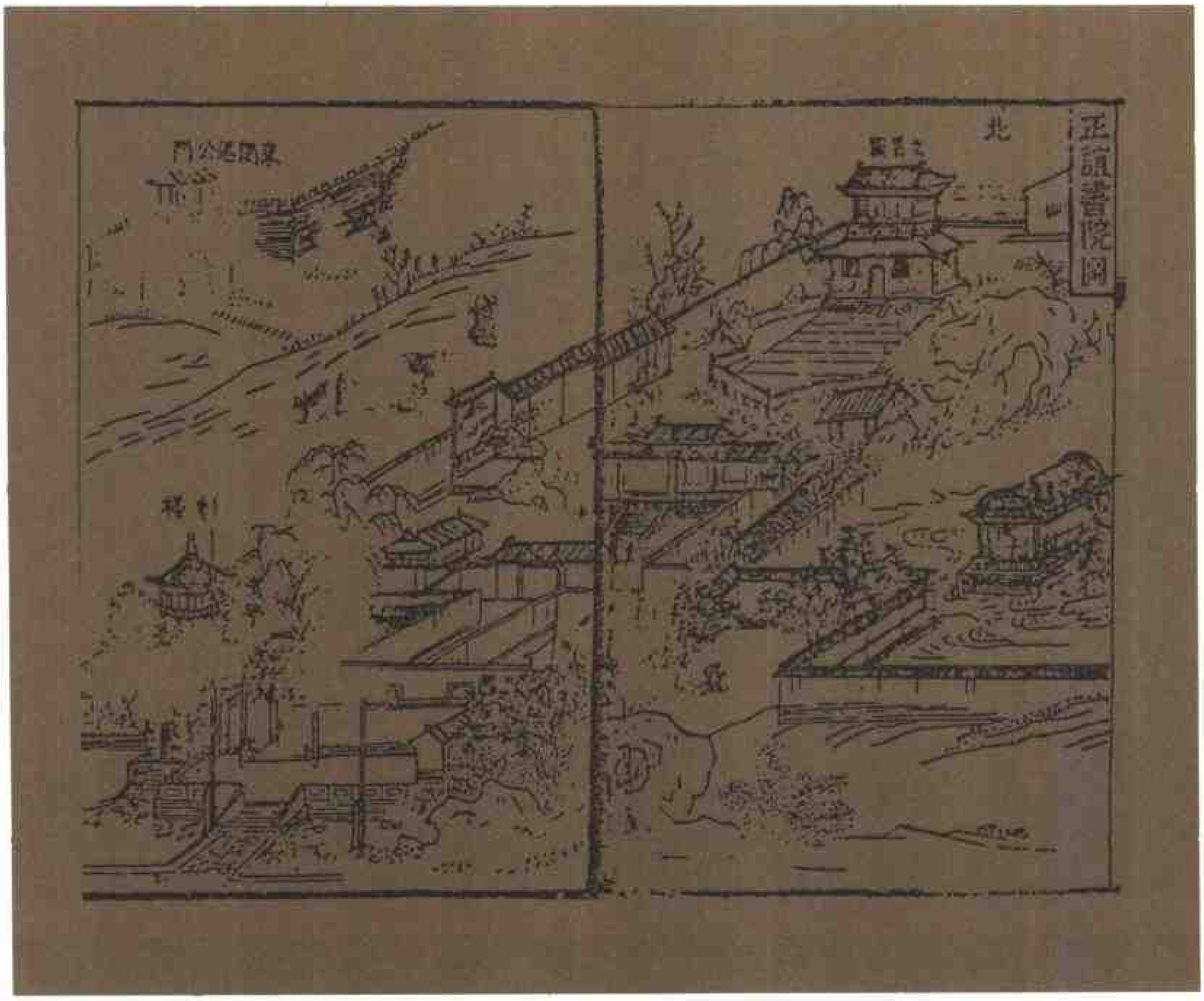


图 3-1-77 正谊书院(图载清乾隆版《临汾县志》)。 在山西临汾。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创建，又名平阳书院。



图 3-1-78 信江书院(图载清乾隆版《广信府志》) 在江西上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府创建于黄金山麓，初名曲江书院，继改名钟陵书院。乾隆八年(1743)扩建，讲堂后作楼祀朱熹，旁建学舍80余间，改名紫阳书院，四十六年(1781)再扩，有一榻轩、青云阁、中道亭、文汇轩、万锦书屋、凌云精舍、半山亭等，并广植松竹，充拓墙垣。更名“信江”。后屡有修建，曾购西偏民房为乐育堂、近思堂、建斗山阁、五星堂、蒙泉堂、青云别墅、亦乐堂、一杯亭、问月亭、夕秀亭、三希殿等。同治五年(1866)又建魁星阁、钟灵台、日新书屋、课艺草堂等。今址为上饶师范，尚存钟灵台等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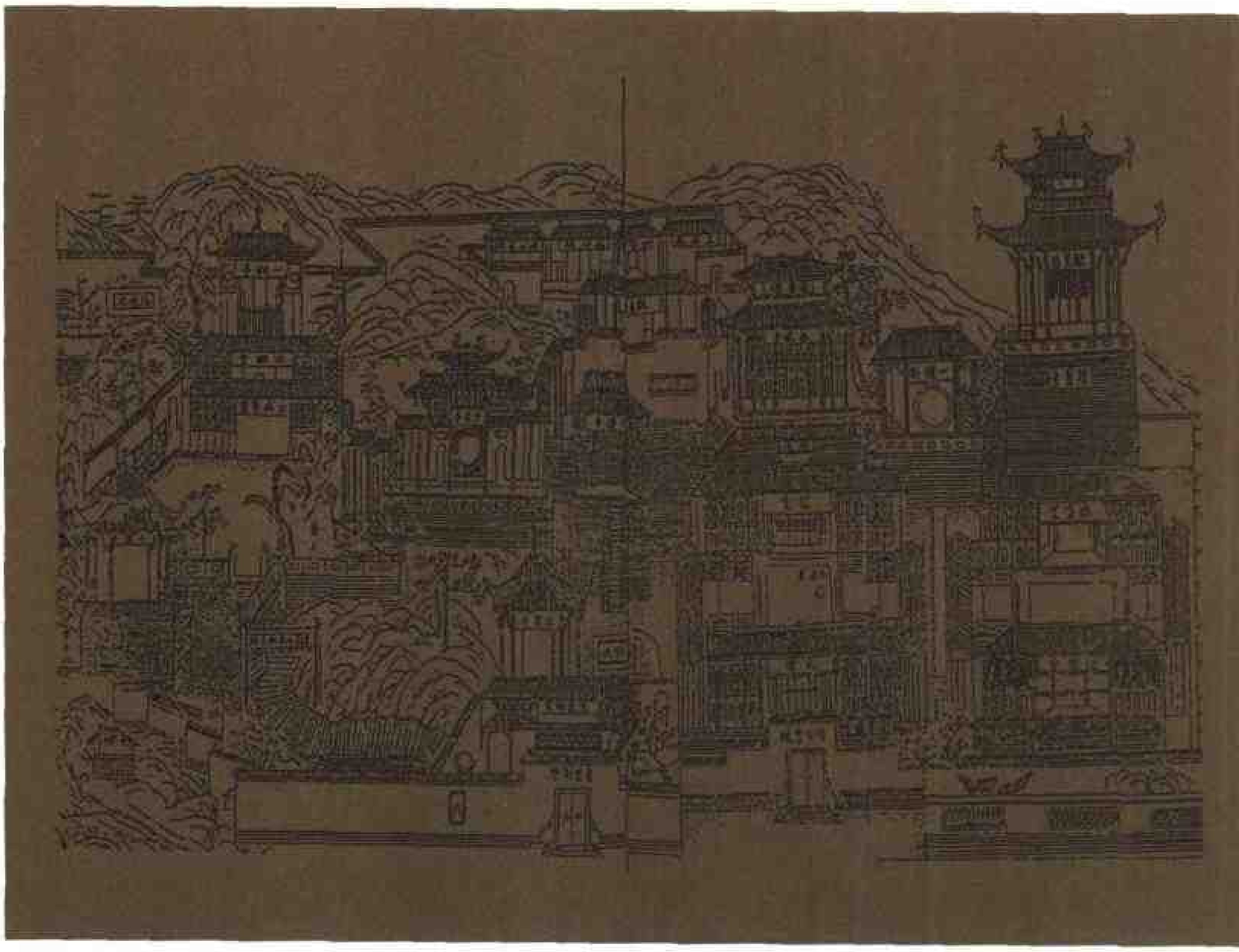


图 3－1－79　信江书院（图载清同治版《上饶县志》）反映同治时扩大后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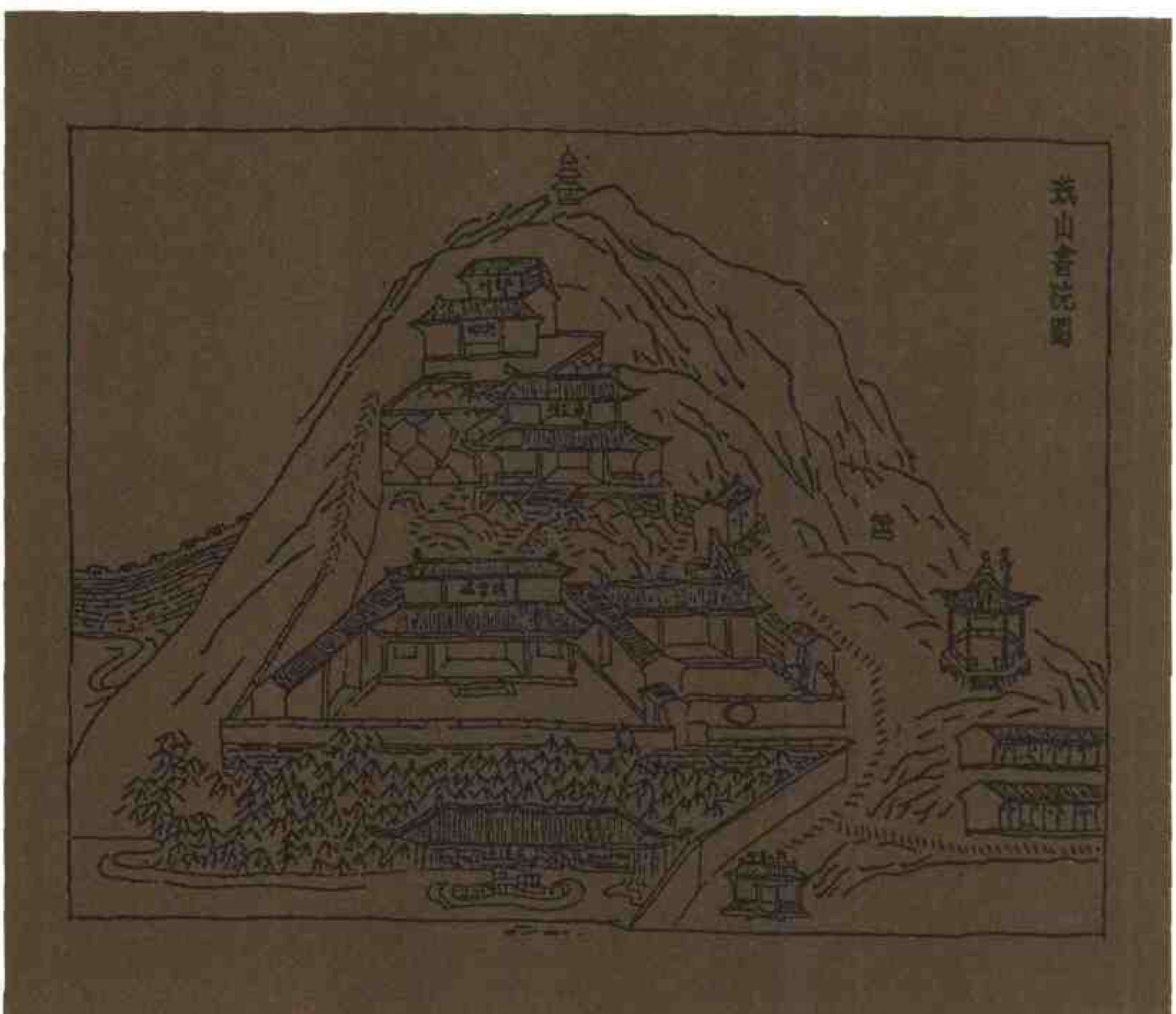


图 3－1－80　蕺山书院（图载清乾隆版《绍兴府志》）在浙江山阴（今属绍兴）。明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在蕺山戒珠寺建院讲学，原名蕺里书院。后为优人据为老朗庙。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重建书院，修旧宇为后堂，增建前堂、外轩、两庑共十四楹。南临街，有头门、左右耳房，沿山径曲折而上，改名“蕺山”。乾隆五十年（1785）增建生童读书之所，兼竹亭、二门、刘念台先生讲堂、证人讲舍、清晖楼、来英阁等。

书院建筑还利用其外部自然条件，形成幽深曲折的人院通道，更加引人入胜，增加了人们的虔诚敬意。这种手法或许也是从宗教的“香道”中得到启示，如岳麓书院就是利用原有的香道改建而成。如图例所示。(图 3－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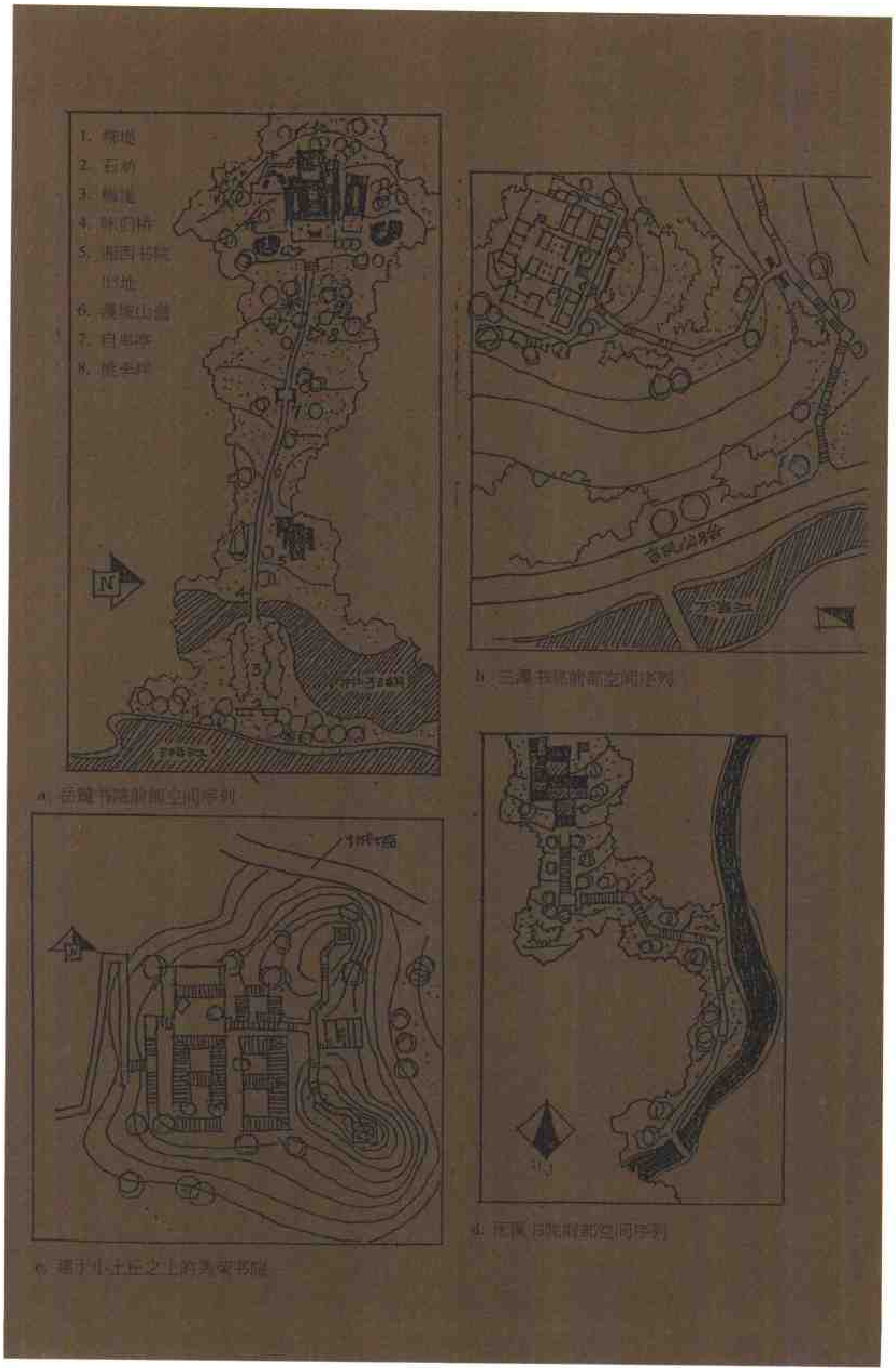


图 3－1－81　书院入院通道示意图（图录自汤羽扬、童峰的调查资料）

书院建筑的群体组合，通过大小不同的庭院、天井安排，形成丰富多变的空间层次序列；并利用局部轴线的转折，更增加空间层次的错落变化，给人意外的动感。如图例所示（图 3－1－82）。

书院建筑还运用亭、廊、桥、坊、洞门、花窗，以及庭院绿化等，进行分隔和联系，更增添了空间变化的幽深情趣。

书院建筑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并表现其材质特色和地方工艺技术。一般书院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山区则多以木构为主，西北地区也有采用石构锢窑的，如山西冠山书院（图 3－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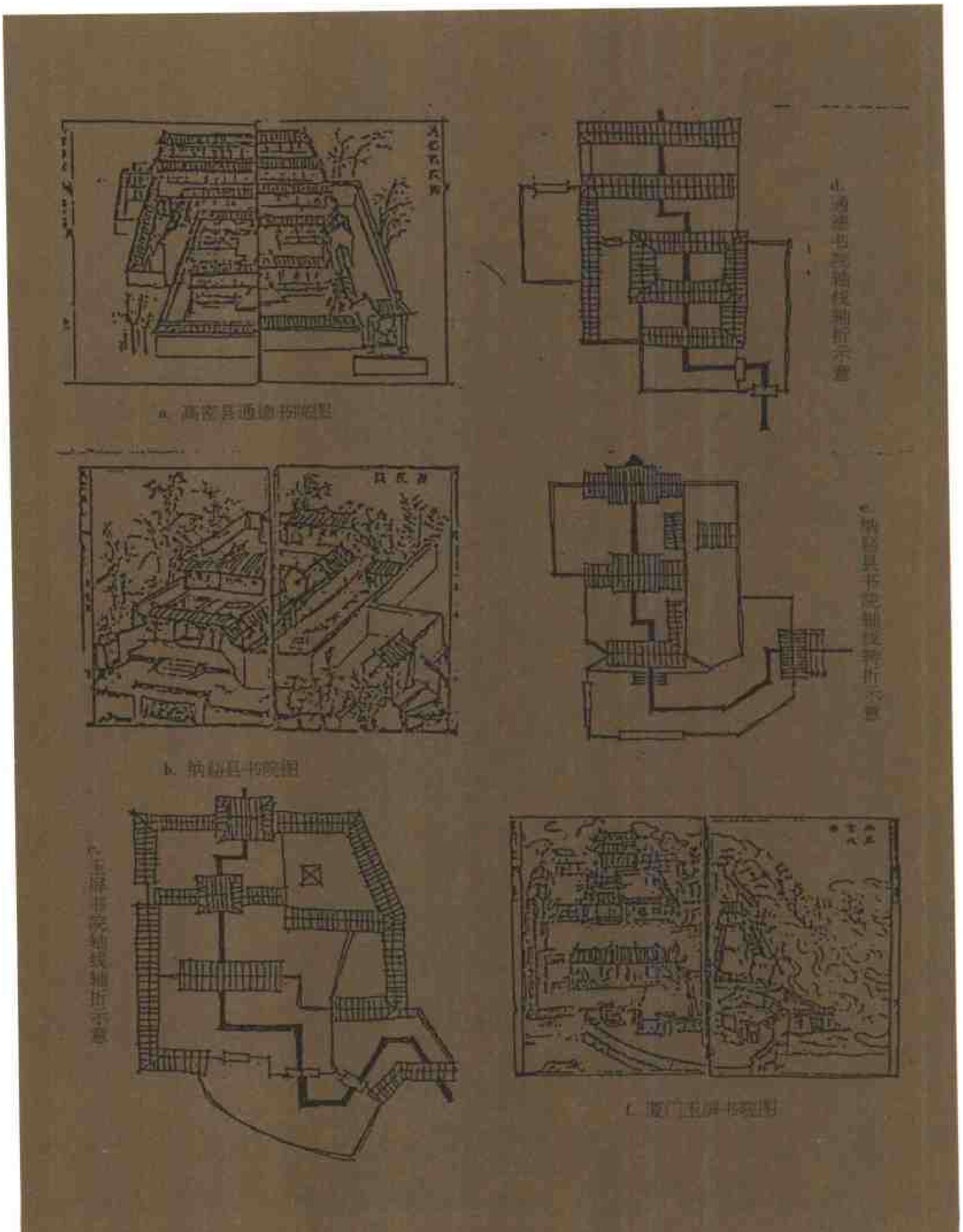


图 3－1－82　书院轴线变化示意图（图录自汤羽扬、童峰的调查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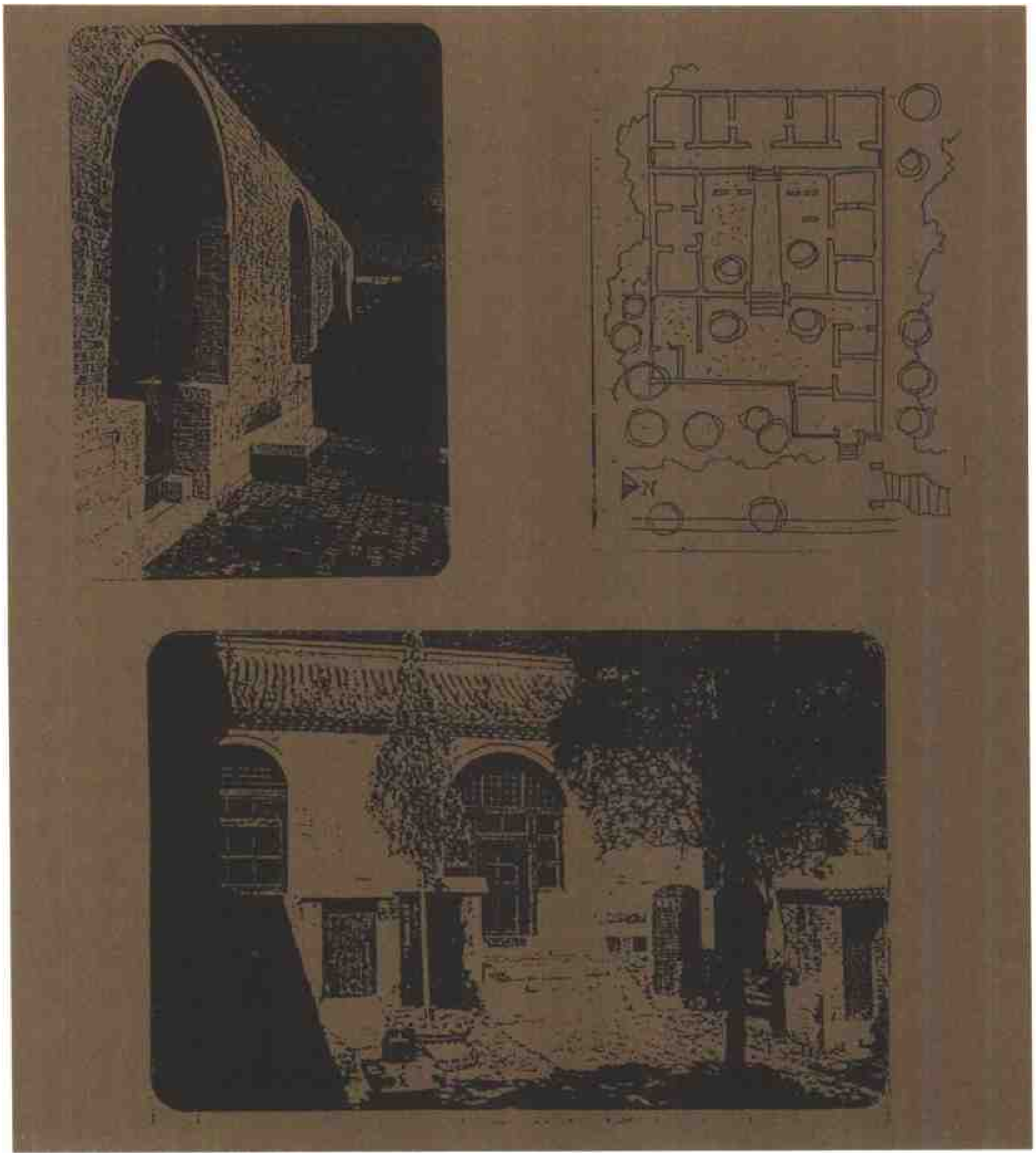


图 3-1-83　冠山书院（图录自汤羽扬、童峰的调查资料）　在山西平定冠山。初名冠山精舍、崇古书院、吕公书院。创建年代不详，据《平定州志》载，宋已存在，于冠山山腰，依崖傍谷，坐西向东。元至正间曾赐额"冠山书院"及经书万卷。建燕居殿，设宣圣像，配祀颜曾。后虽历经战乱，但不断修建。至今仍存遗构前后两进，均石构券顶锢窑式建筑，俗称"无梁房"。

书院建筑不尚华丽装饰，力求朴实简洁，并通过嵌碑立石、命名题额、匾联书法等，创造其斯文典雅的境界；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发挥其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第二节　书院意境与风格

书院的优美环境建设和幽雅的意境营造，体现出人与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反映其"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成为书院的突出特色。

书院选择山林胜地，求得自然与人文之胜，正是其理想境界。如岳麓书院之于岳麓山，白鹿洞之于庐山，嵩阳书院之于嵩山，武夷书院之于武夷山等等。随着书院的发展普

及，书院也多择城镇郊区风景优美之处，形成地方的重要景观特色，成为地方的"八景"、"十景"之一。如湖南衡阳的"石鼓江山"、祁阳的"书院歌声"、沅陵的"虎溪云树"、临湘的"莼湖夜月"、安仁的"五峰琴韵"、资兴的"程乡绿水"等等，皆因有书院的所在，而成著名景区。同时书院重风景环境建设，极力开拓景点的营造，或因或借，取其精华，构成佳境，显示其文化特色。如湖南长沙的城南书院曾筑成"十景"、岳麓书院有"八景"、宁乡玉潭书院有"六景"、浏阳文华书院有"十景"、衡阳清献书院有"十景"、永兴金陵书院有"八景"等等，充分利用其环境特点，突出其景观特色，构筑其文化氛围。

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中，无论讲"天命"、"天道"、"天性"、"天理"，莫不以"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周易·说卦》称："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章"。以此探求宇宙万物法则，建立一种天地人的统一体系。《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天人合一"更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把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统一起来，渗透到各个方面、各学科领域。"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极阴阳之理也"(朱熹《语录》)。同时在建筑环境的选择和建设中，因此也形成一种神秘的堪舆风水之说。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郭璞《葬经》)。建筑经营则讲求"气"、"势"，以择凶吉；"山北为阴，水北为阳"，建筑选址则"居阳背阴，谓之大吉"。把建造活动与阴阳调和，五行生克联系起来，以附会种种迷信禁忌，使之神秘化；但其中确也包含有环境科学、环境心理学和环境美学等诸多合理因素，也值得研究。古代文人并不都信风水，如[北宋]张载就认为其"全无义理，不足取"(《表记》)；明计成在《园冶》也称："选向非拘宅相"，"构图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书院的建设也非全凭风水，但深受其影响，朱熹就颇信风水。随着世俗化发展，书院文献中也渐多堪舆风水的记载。尤其书院后期出现所谓"文风塔"，亦因"阴阳五行家又谓其耸拔如文笔状，置之得地，可以助形胜，培文风"(《浏阳县志》)，如湖南祁县的文昌塔、双峰的双峰塔、桂阳的东塔等，莫不与书院建设有关联。

书院的择胜，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唐代士人寄寓山寺读书之风；唐末五代动乱，名士隐居山林，聚徒讲学；以及儒释道的文化交流融合，而又相互争夺等等。究其根本，还在其教育思想、培育人才、藏修息游的需要。所谓"通天地人之谓才"，追求"变化气质"的理想环境。尤其理学家讲求心性修养，超脱世俗，清心寡欲，"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士子足不出户庭，面山高水清，举目与会，含纳万象，游心千仞，灵淑之气，必有所钟"(《巴陵金鹗书院记》)。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曾作诗云："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说明书院的择胜，以求得其"净心"、"悦性"、"深源"、"妙用"的天人结合境界。陈锴在《陈氏书堂记》称："稽合同异，辨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冶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所以"一重人故觅师，一重地故择胜"，成为建院的两个最主要条件。

书院后期，由于官学化的影响加深，官府为了加强控制和便于考课，曾将有些书院兴建或改建于城市之中，但又往往因环境恶劣，"城市嚣尘，不足以精学业"，而一再迁移。长沙的城南书院，在清廷定为省城书院之后，曾设于城内一旧署之中；也因"近市嚣尘"，后又迁往城外妙高峰宋代原址重建。认为如此才能"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于是藏修息游，砥砺文行，湖南士风更蒸蔚可观，此兴化善俗之本计也"。所以重自然环境的"清幽之胜"，重人文环境的"名贤之迹"，是为"藏修息游、砥砺文行"、善

化土风的根本。虞集在《大门书院记》称："奇异幽谷，往往有昔贤人遗迹，足以风动其人，而其人亦乐道之，故其俗为易化者矣。""山川呈奇，得人文而显"，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结合，确能给人以更深刻地教育影响作用。所以，选址是书院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受到士人极大关注，往往反复踏勘比较。张之洞在创建广雅书院时，曾亲自踏勘选址，前后八易其地，最终选定认为"山水幽胜，去省亦不甚远，在不喧不寂之间"的最佳环境。

书院不仅重在择胜，更重环境的建设经营，为人所用，使环境与人有更好的协调影响作用。"天下郡县书院，堂庑斋舍之外，必有池亭苑囿，以为登眺游息之所。……而山川之胜，贤达之风，每足以兴起感仪其志，其为有益于人也"（《云山书院仰极台池》）。营建书院"必有池亭苑囿"，原因正在于"感仪其志"，"有益于人"。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到院之初，就创辟"书院八景"，即因"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山歌，徜徉亭台池沼之间。……先生随触使为指示"，实际成为书院的第二课堂。把环境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正是书院的突出特色。书院内外，多有亭池的建置，这不仅可使自然景色与书院建筑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对书院教育环境的积极开拓。

建筑与环境，人工与自然，往往不易相和，"大都自然胜者，穷于点缀；人工极者，损其天趣，故野逸之与浓丽往往不能相兼"。只有做到"骨色相和，神彩互发，清不槁，丽不俗"（袁中道《游太和记》），才能达到最佳境界，也就是计成所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书院虽是一组较为庞大严整的建筑群，由于重视地形环境的利用，依山就势，前卑后高，层层叠进，错落有致；加以庭院穿插，林木绿化衬托，山墙飞檐起伏变化，色彩清淡朴实，构成生动幽雅的景象，与自然环境取得有机联系结合，一般多能达到"骨色相和，神彩互发"的效果。

书院在建设风景环境时，颇重亭的设置。亭既起到组景、点景、观景的观赏效果；又可有护碑、护井、憩息等实用作用；同时也是"以少胜多"、"以小取大"的最经济灵活的建设手段，为开拓风景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书院中莫不有亭。白鹿洞书院曾在院内外先后建亭达二十多处，岳麓书院也有十多处，可见对亭的作用的重视。书院建筑群虽较严谨封闭，但其周边环境的开拓，则十分广阔开敞，两者相互映发，构成有机联系，也反映书院教育的特点，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表现。

人与自然、风景与文化、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仍是当代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当今环境科学的"生态论"，现代建筑的"有机论"，行为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环境论"，日益受到重视。而中国古代书院环境的建设经验，确有其研究借鉴价值，尚有待发掘整理。对其受到封建礼法思想的约束、阴阳五行观念的局限，以及超脱的田园生活追求的消极保守的环境观念等，则有待批判分析。

书院严谨而又和谐的建筑群体，是社会群体意识的表现，反映其"礼乐相成"的文化思想，构成书院建筑又一重要特点。

书院以讲堂为中心，大多采取中轴对称，或多轴并列，较为规整的格局。其讲学、藏书、供祀等主体建筑占据主要地位；住宿斋舍、游息园池，及辅助设施则因地制宜，灵活安排。因此书院总体布局主次分明、区划清晰、井然有序，又联系紧密、使用方便，构成有机整体；同时不同建筑体量、大小院落天井空间，以庭院绿化设施等组合，极富变化情趣，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正是其"礼乐相成"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

自周公制礼作乐，经孔子的发挥，"齐之以礼"，以至形成传统文化整套严密的典章制

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由此建立的严格社会等级秩序，视为治国育人之本，列为“六艺”之首，“衣、食、住、行”也莫不受到“礼”的约束。宫室建筑被视为“礼之具”，所以历代都有严格等级标准的规定。

《礼记·乐记》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统同，礼辨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理学家程颐强调“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所以两者“如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遗书》卷十八伊川语四）。礼——序与乐——和，也正是一对矛盾的统一。建筑的中轴对称序列与庭院、天井的和合，正可谓“相须而为用”。“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中正无邪，礼之质也”。所以从城市到建筑，莫不以居中为尊，力求中轴对称的理想布局。通过轴线层次序列，以别尊卑、上下、主次、内外，达到序——敬的目的；同时通过不同特点的庭院天井的空间组合，又达到和——亲的要求。院落中又以“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因此又形成和中有序，序中有和，和序渗透的统一和谐整体。

书院建筑布局与一般较具规模的其他类型传统建筑，也可说是大同小异，具有鲜明的共性，也正反映受礼乐思想的共同约束。但宫廷官式建筑更重于“礼”，更突出地体现其威严的等级秩序；而民间世俗建筑则更重于乐，力求切合世俗生活的需要。书院建筑则较为全面地体现其“礼乐相成”的特点，以发挥其教育功能作用，显示其传统文化思想。

书院建筑群体中，虚实空间的多样变化，颇具匠心。其走廊、隔扇、敞厅、花墙、洞门等沟通联系，各具情趣，体现出人与建筑、环境的“亲”、“和”关系。这也正如书画艺术中的“白”，并非素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华琳《南宗决秘》）。梁启超称：“向来写字的人，最主要的一句话，‘将白当黑’。写字的时候，先计算白的地方，然后把黑的笔画嵌上去，一方面从白的地方看美，一方面从黑的地方看美”。并联系到房间家具的布置，“桌子椅子，横七竖八地凑在一起，就不美了，因为线的排列不好。真的美，一部分线要妥帖，全部分的线亦要妥帖”（《书法指导》）。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艺术有其相通之处，书院建筑的内外空间艺术中，以虚当实，虚实结合，尤多创造，它与现代西方建筑的空间艺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乐记·乐情》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阮籍《乐论》亦称：“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所以礼乐相成，亦即理性与感情的统一。这一点仍是现代建筑艺术的现实问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所谓理性，是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根本，所谓“乐者，德之体也”。理学家视“礼乐之大用”，就在“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朱熹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不仅抑制个性感情的发展，更束缚了人类理性的进步。所以思想的僵化，与建筑的程式化也有其必然联系。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而城市建设与建筑都有所突破，高台建筑得以发展。魏晋玄学及佛教艺术的传播，对于建筑艺术发展，也有所促进。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因较少礼法的约束，而更加丰富多彩。李渔曾指出“夫礼乐制自圣人，后进莫敢窜易。而殷礼，尚有损益于其间。……予亦不必大肆更张，但有效前人之损益可耳”（《一家言·居室》）。也反映了其中的矛盾，无所突破就难以创造前进。

所以这种礼乐思想，既创造了中国建筑的独有格局和特色，但也带来建筑发展的严重束缚和障碍，还有待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而其序和统一，理性感情的统一，仍可视为其“合理内核”，也值得吸取借鉴。

书院建筑的做法造型，吸取了民间建筑的经验特点，追求其朴实自然之美，反映“善

美同意"的思想，成为书院的共同特征。

现存书院建筑，多为清代遗构，但多继承旧有规制发展，保存其一定的传统特色。它不同官学的官式建筑做法，表现所谓"贤关"、"圣域"、"官墙万仞"的壮丽神圣气氛；而是吸取了地方民间建筑特色，表现出较为朴实庄重、典雅大方的格调，"凡务坚朴经久"（《湘乡东山书院记》），反映"百年树人"的要求。书院建筑一般采用砖木结构为主，多数单层，少数二层，硬山檩檩，突出个别殿堂楼阁，歇山飞檐，使整体造型既简洁统一，又富有起伏参差变化；讲求材质、色调、体量、虚实的对比表现，较少雕饰彩绘，重点点缀素雅，显示其朴实自然之美，体现文人的建筑思想。

古代文人历来反对土木之奢，提倡俭朴之风，强调社会实用功能，以善为根本，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说文解字》所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国语·楚语》称："夫善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者，故曰美"。《墨子》则称："圣王作宫室，便于生，不以为欢乐也。"（《过辞》）"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久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佚文》）《庄子》则称："朴素而天下莫能之争美"。都莫不强调朴素实用美。理学家更强调"善"与"道"为根本。朱熹认为"善者美之实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去"。陆九渊则认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立于道则欲消，艺亦可进；立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这也是与他们的礼乐思想相一致的。李渔在《一家言·居室部》也提出："土木之事，最忌奢侈，匪特庶民之家，当从朴俭，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熳。"他们的美学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反对建筑的奢糜，崇尚朴实则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书院建筑中有明显的体现，与官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首先表现在其合理适用的尺度比例，以适应其学习活动的需要。正可谓"便于生"，便于人的生活需要。合理的尺度标杆，在我国传统建筑中，早已受到重视。《考工记·匠人》记载："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的规定，反映以适用原则为依据。唐宋以来更形成"材契"、"斗口"等用料标准，严密的尺度比例；《鲁班经》所谓"大屋大料，小屋小料"，均求其用料的相称合理。但是官式建筑以此定出等级标准，以显示尊卑地位差别，使之神圣化、政治化；而民间建筑则将其经验尺度比例神秘化、迷信化，所谓"造屋以标准为主，论高低阔狭，悉尊洛书五行尺长，要相生不可相克"，"凡遇起造经营，开门高低，长短量度，……须当凑对鲁班尺八寸吉凶相度"（《鲁班经》）。这些规定都为建筑创作设下了种种障碍，造成不利影响，而陷于僵化。李渔在《一家言·居室部》则指出："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房舍与人，欲其相称"。并对比"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因"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大中见小，与人不称，而不切适用之故。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还反映在忠实于材料技术的表现，而不求雕饰之华。它既无官式建筑画栋雕梁之丽，也少民间建筑堆塑造作之俗，而给人自然淡雅的感受。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素为文士所恶。《韩非子·解老》称："君子取情去貌，好质而恶饰。"《淮南子·谬称训》也称："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淡雅出于自然，清新来自简洁，不好富丽堂皇，繁琐装饰，正是文人所追求的建筑艺术格调。《一家言·居室部》称："凡人只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凡事物之理，简则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园冶·墙垣》也指出："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以为巧制。不第林园之不佳，而宅堂前之何可也。雀巢可憎，积草如萝，去之不尽，扣之则废，无可奈何者，市俗村愚之所为也，高明者慎之。"反映出他们对于当时官式和民间建筑中，日益发展的繁琐装饰之风的批判。

书院建筑讲求的合理的空间组合、实用的尺度比例，以及材料技术美的表现，也是现代建筑所应重视的问题。书院朴实自然之美，仍是值得发扬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礼乐思想的束缚，过分强调重质轻文，重善轻美的主张，则不利于建筑创造性的发挥。

书院建筑的意境创造，反映出一派斯文气息。典雅的情调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其"情景交融"艺术思想的追求。

书院不仅重视自然环境之美，尤重人文环境之胜；不仅重视自然景观的培植，尤重文化古迹的保护。书院建筑力求文化与风景有机结合、融成一体，"景借文传"，突出其文化特色。自古书院特别重视其学术渊源，通过专祠设供纪念学派宗师、建院功臣、地方名人，"地以人重"，以显示其地方文化传统；还特别重视命名题额，凡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等，莫不要求出自经典，以显示其学规箴言、教化内容、修身之道、为学之方，并以其优美的书法艺术，增强其文化氛围和感染力。其它如亭池配置、庭院绿化、装饰图案等，也力求有所寓意。书院的刻意经营，就在于创造一种"如入芝兰之室"，潜移默化的境界，给人以深刻地文化熏陶。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祝允明《送蔡子华还吴中序》），所谓触景生情。王夫之强调"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地灵人杰，地以人重，书院之设，突出人物的纪念，以祭本师，正学派，宗道统，在于创造一种尊贤尚德，尊师重道的教育环境。吴澄称岳麓之设，"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杨茂元在岳麓书院嵌刻《紫阳遗迹》碑于后楼，图绘朱熹在湘事迹，欲登览者"兴起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学。"胡文定公书院的《祭礼题本》也称："履其地，则思其人，思其人则学其学，学其学则斯文不泯，士风益振。"说明书院的人物纪念，意在创造其"斯文不泯，士风益振"的学习育人环境。

传统的书画艺术强调"意"的重要，所谓"意在笔先"、"贵得笔意"、"意先笔后者胜"，都说明以构思意境为首要。王羲之称："须得笔意，精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为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晋王右军自论书》）。建筑艺术也类此，皆在其构思意境之妙。《园冶·借景》称："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也"。贵在构思之精，才得描写尽致之效。所以袁枚也称："唯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好学深思之余"（《随园后记》）。郑板桥也认为，"昔萧何造未央宫，先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然后以别殿、内殿、宫室、左右廊庑、东西水巷经纬之，使尔千门万户。总是先立其大，则其小者易易耳。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如何也耳"（《郑板桥集·补遗》）。所以，大小难易，仍在其意境如何。

苏轼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宝绘堂记》）凡"物皆有可观，如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净因院画记》）。书院不尚怪奇伟丽，而重寓意，所以命名题额，必出经典；庭园绿化，多松竹梅之类；以寓意岁寒不凋的品德；辟池植莲，意在体现周敦颐的《爱莲说》："如此莲花，在泥不染，譬如法界，在世不为世所污"，以象征德性的高洁。片山多致，寸石生情，郑板桥称其"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不多，其费亦不多也。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画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郑板桥集·题画》）。正反映出其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意境。

《一家言·居室部》曾指出："造物鬼神之技，亦有工拙雅俗之分，以主人的取舍为取舍。主人雅而喜工，则工雅者至矣；主人俗而容拙，则拙而俗者至矣"。《园冶》也指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而"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这里所讲的"能主之人"，就是主持设计者。设计的构思意境如何，决定其雅俗工拙之所在。《一家言·居室部》还比喻："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

一致也。譬如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生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也"。设计如同作文，抄袭决非创作，只有"自出手眼"，立意创新，才是高明者所追求的目标。

所谓"情趣"、"意境"、"构思"、"创新"，正是文士们锐意追求的目标，也是书院建筑中值得深入发掘的可贵之处。当然它必然受到历史时代和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局限，也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将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所以它仍然是当今建筑创作中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

传统文化中包容着丰富深刻的建筑文化思想，尤其作为士文化一部分的书院建筑文化思想，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合理内核，颇值得重视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万物"的一统观念，旨在探求事物的矛盾统一的辩证发展关系；但又为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因此建筑文化思想在其制约束缚下，精华与糟粕交织，科学与迷信混杂。这些都有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工作，以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忽视文化思想内涵，单纯从形式着眼，片面追求"形"、"神"、"符号"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第三节　书院规制与传统

书院历经千年，虽屡有毁兴，但后继者力求承其学术传统，复其建筑规制，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沿袭、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同时，由于不同学派的交融发展，不同层次文化的渗透吸取，以及随着官学化、世俗化，甚至宗教化的影响，书院又表现其兼收并蓄的文化面貌，反映出较大的兼容性。

现以岳麓书院为例，对其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兼容特点作一具体分析，可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文化发展和建筑面貌。岳麓书院的千年历史，基本上与我国书院兴衰发展的历史同步。它与白鹿洞书院同尊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曾成为各地书院建设的楷模和典范，影响深远，因此具有深刻的典型代表意义(图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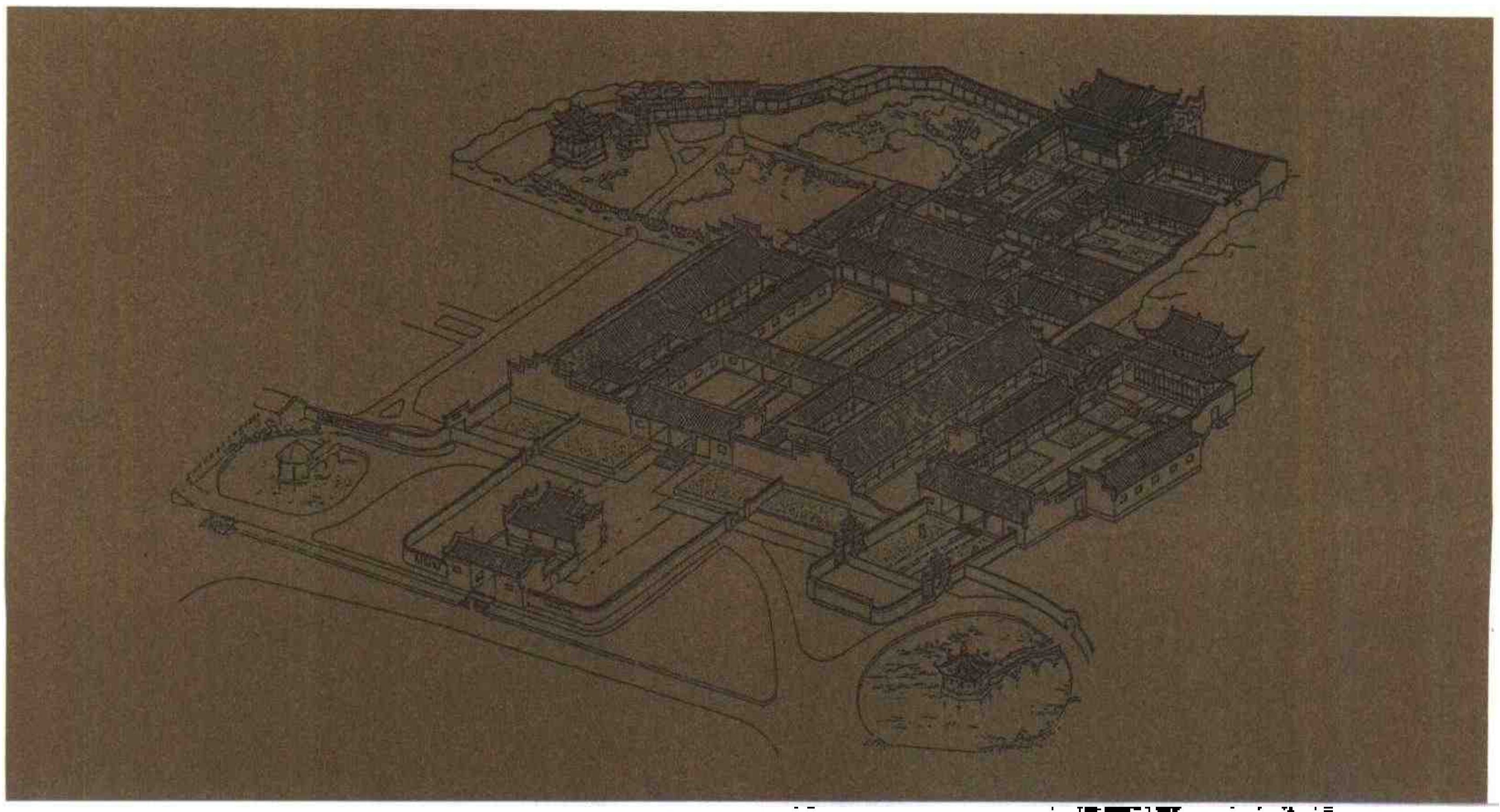


图 3－3－1　岳麓书院鸟瞰图　修复后面貌。



图 3-3-2 岳麓书院百泉轩园林一景 园林创于宋，至清末渐废，今修复重建。



图 3-3-3 百泉轩园林中碑廊 据历史碑文补刻，嵌于园林曲廊内。

书院择胜，视为“藏修息游，砥砺文行”的首要条件和理想境界。岳麓山“诸峰叠秀，灵泉盘绕”，早为道佛开拓，同时文人荟萃，开庐结舍，且近市而不喧，幽深而开阔，实为建院的理想环境。“山川奇异，与人文互相映发”，院以山名，山因院盛，由此千年旋歌不辍，名迹保存至今，而决非偶然。张栻初到岳麓，即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而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的最佳处所。张栻因而在此开创了湖湘学派的基地。正如朱熹之于白鹿洞，赞其“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而着力经营开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也都酷爱岳麓书院的百泉轩园林，在朱张会讲岳麓时，“昼而燕坐，夜而栖宿”，“不舍昼夜”于此。吴澄称其“盖非止于玩物适情而已”，“岂凡儒俗士之所得阐哉”。张栻曾有诗云：“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道出了其水声与书声的共鸣，自然韵律与文士心灵的和谐统一的意境；也正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时有诗称：“深源定自闻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反映其“深源”、“妙用”之意，“心”与“山”的交融，也正体现他们的“天人合一”理想追求(图 3-3-2~3)。

他们不仅关注自然山水之胜，尤重文化景观的建设。在岳麓山上，他们曾多处建亭、筑台、命名、题额，进行开拓，且由后世所继承，因而留下道中庸亭、极高明亭、翠薇亭、赫曦台、道乡台等诸多遗迹。文因景成、景借文传，山林虽奇，得人文而显；文化与风景结合，赋予自然景物以文化特色，正是书院建筑的突出表现。

“山以人重，人以道传”，为书院又一传统特色。岳麓山自书院开创，由以宗教的“神重”，转变以书院的“人重”；由以“湘西二寺”——麓山寺与道林寺著称，而为“湘西二院”——岳麓书院与湘西书院所取代，产生了历史性变化，故有称：“岳麓非前之岳麓矣！”书院以人重，专师门，崇道统，纪念学统宗师、建院功臣、地方名人，成为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三大事业”之一。岳麓先后在院内外设祀，有礼殿，后改文庙，祀孔子、四配、七十二贤；有诸先生祠，后改诸贤祠、六君子堂，祀建院功臣；又有尊道祠，祀朱张，四箴亭祀二程，濂溪祠祀周敦颐，道乡祠祀邹道乡，三闾大夫祠祀屈原，贾太傅祠祀贾谊，以及李中丞祠、罗典祠、欧阳厚均祠、船山祠等十数处。一切供祀，既体现其道统源流，学有所宗；又反映其悠久历史传统和地方人物特色。其中朱张之学，视为岳麓正统：张栻开创了湖湘学派基地，奠定了岳麓办学宗旨；朱熹首开讲会，亲订院训学规，成为岳麓的传统。宋元时已将朱张列祀于诸先生祠(诸贤祠)；明代创建崇道祠，亦名朱张祠，专祀朱张，匾以“正脉”，仍

存遗构；同时将朱熹在湘事迹，绘图文八方，刻石书楼，以“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图 3－3－4)。



图 3－3－4 岳麓书院崇道祠 专祀朱熹、张栻，创于明代。现存清代遗构。

书院重视碑刻艺术的表现和保存，也在于体现其“重人”、“传道”的目的。“文以载道”，力求以此创造出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境界。至今岳麓尚存旧碑 80 余方，讲堂仍保存原嵌大小碑刻 10 多方，既记载、传承其办学宗旨、修身之道、为学之方，也构成其建筑艺术表现的特色，显示出一派斯文气息，令人肃然起敬。以岳麓为典范，各地书院莫不重视嵌存碑刻；白鹿洞书院至今仍存碑刻百余方之多 (图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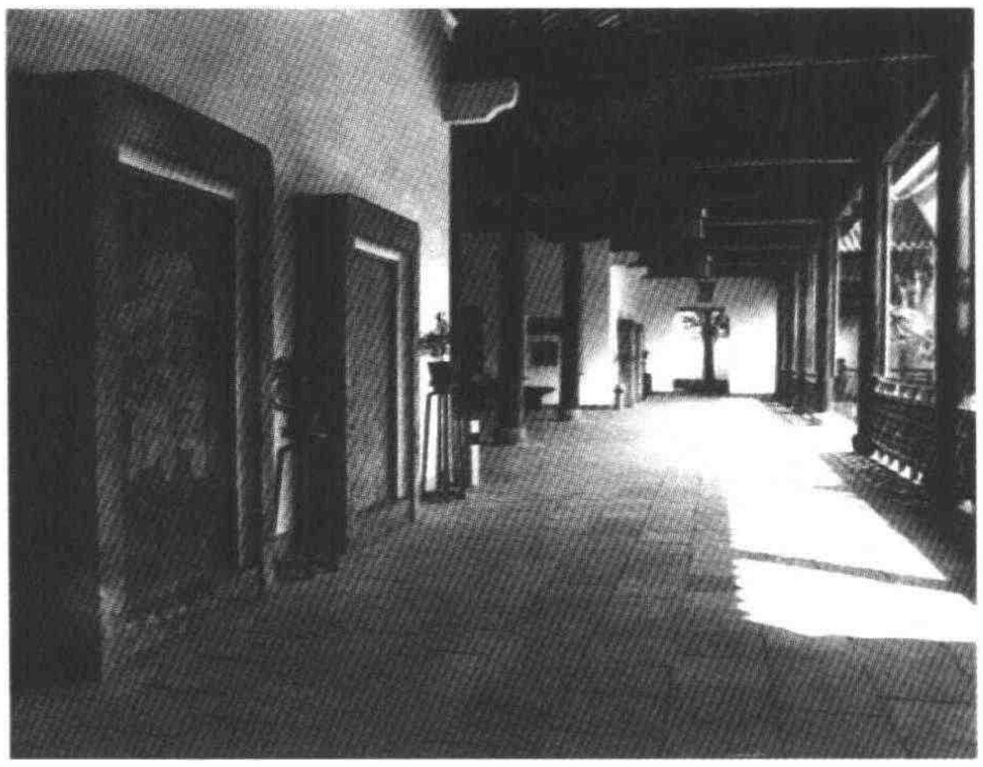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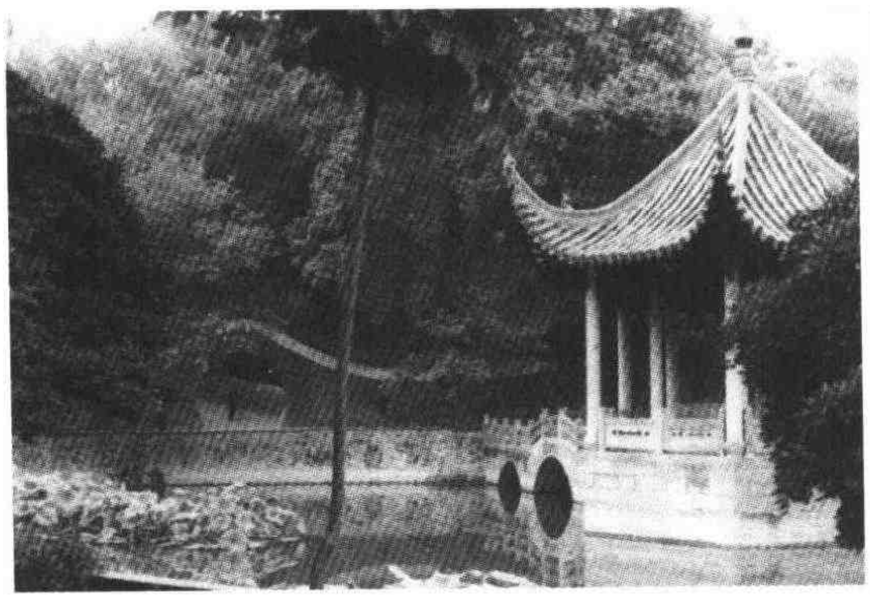
图 3－3－5 岳麓书院讲堂敞廊 建于清乾隆年间讲堂前，内立“整齐严肃”四块大碑，为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所书立的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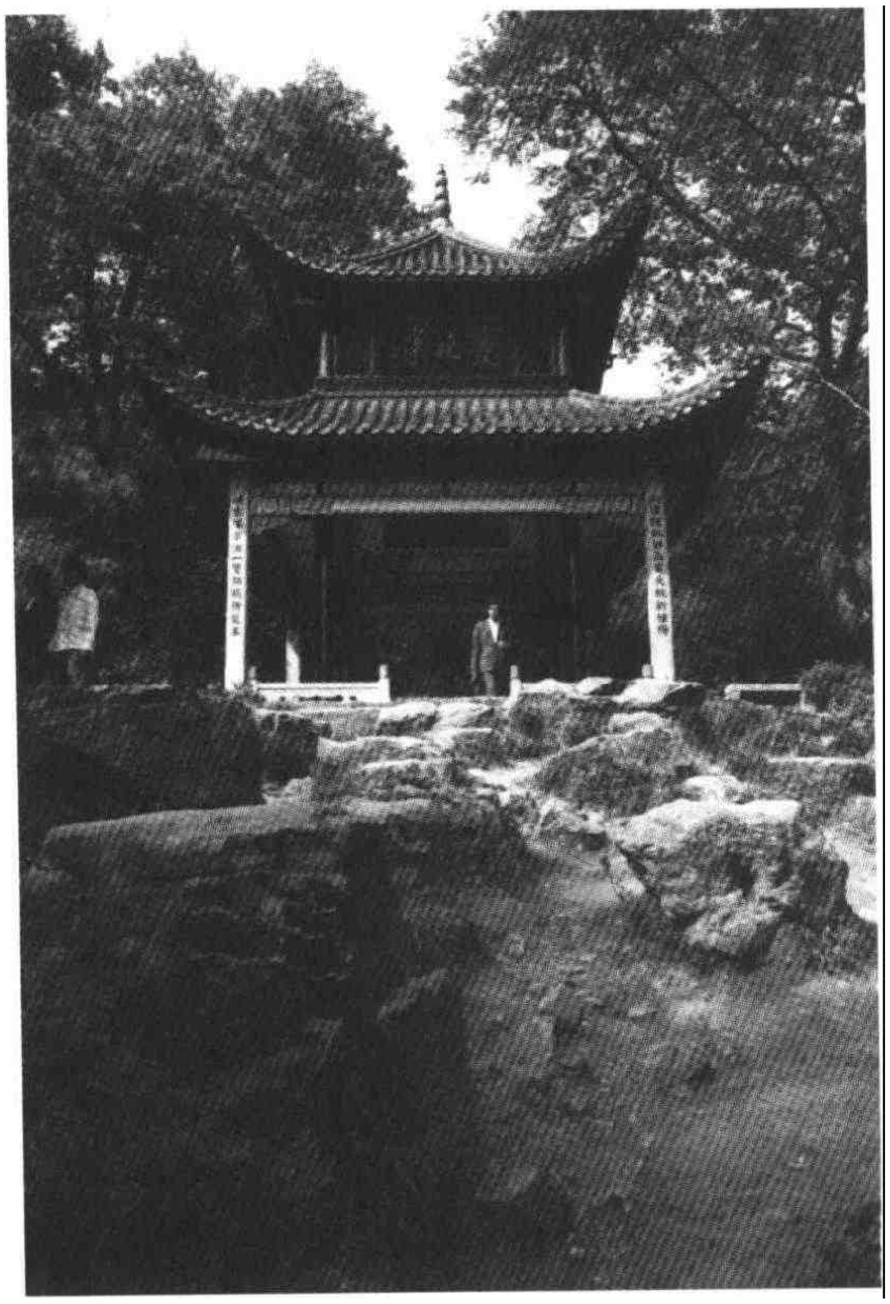
礼的崇隆，乐的和谐，为书院又一重要特征。岳麓“堂事之严”，早为张栻所称道。自朱熹首立院训、学规，明世宗又颁程氏《视、听、言、动四箴》及其《敬一箴》，皆莫不约之以礼。至清代又先后制订《学约》、《学规》、《学箴》、《戒条》等达十数种。这些箴言、约条旨在规范其培养目标，以及修身养性、治学处事、待人接物等行为准则，其数量之多，要求之严，颇为罕见。岳麓祠祀之多，祭礼之隆，亦不多见，供祀成为书院的基本内容，实为其礼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岳麓书院庞大的建筑群，安排有序，井然一体，并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浑然成趣，既呈现其主次内外、上下尊卑的“礼之序”；又以灵活多样的空间组合与庭院绿化、园林风景的交融渗透，体现其“乐之和”，成为其“礼乐相成”，理性与感情和谐统一的表现特征。师生升堂讲说，端坐辩难于内；寻幽探胜，相互切磋于外，创造了书院教学的特有环境，这也是书院教育所普遍重视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以院为家，师生共建，亲密的师承关系，得以形成其坚实的学术群体。开创学派基地，发展传统学风特色，也正是岳麓千年不绝，文物流传不废的重要原因。首任山长周式，虽曾荣获宋真宗召见，欲留在国子监任教，但仍坚辞归院，固守其开拓的岳麓基业。张栻、朱熹都曾两度来院讲学，并极力关注书院建设，发展湖湘之学，从而奠定岳麓学术基础，形成传统学风特色。宋末兵兴，元军围城，岳麓诸生仍不废业，坚持学习，直至参加战斗，“乘城共守，死者无算”，故史称“南轩之教身后不衰”。明末山长吴道行，因明亡誓“以岳麓为生死”，以致绝食而终于岳麓，其墓仍留存岳麓山上。

山长中亦多有长期任教岳麓，奉献不止，并竭尽全力于书院建设者。清代罗典主院 27 年，终于岳麓，其所得薪俸尽用于书院修建，创树颇多；所辟“书院八景”，曾与诸生共同命


图 3-3-6　岳麓书院吹香亭　书院"八景"之一，"风荷晚香"，在书院文庙东侧，亭处黉门池中，池内置荷。


图 3-3-7　爱晚亭　在院后岳麓山清风峡中。

名唱和，并汇成诗集刊行；所创爱晚亭，至今成为麓山著名景点（图 3-3-6～7）。罗典的学生欧阳厚均，亦曾主院 27 年，效仿其师，不遗余力捐资修建书院；常与诸生"寻幽探密、选胜探奇"，先后修建工程 23 项，恢复古迹 17 处；并带领诸生系统收集整理岳麓历史文献，刊成《岳麓文抄》28 卷、《岳麓诗抄》35 卷、《词抄》1 卷、《赋抄》3 卷，为岳麓留下可贵的系统史料。丁善庆也曾主院 22 年，中遇太平军之役，书院毁半，图籍无存，赖其带头和发动师生及社会人士捐助，得以及时抢修恢复。岳麓师生热心书院建设，捐资共建、充实图书、增置学田、修志编书、刻石立碑等等，屡多记载，不胜枚举。所以，书院留下的诸多文物史迹，莫不凝结着师生的心血和智慧，体现了可贵的岳麓精神。岳麓名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也是清代山长袁岘冈所出上联，由学生张中阶和成的"点眼"之作。以此作为大门楹联，它不仅突出了岳麓的历史贡献，更体现了师生合作的办学精神。

以上种种表现，也都反映了书院建筑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优秀传统精神的传承性特点。

岳麓千年历史过程中，与官学、世俗、宗教在文化上渗透交融，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关系，因此书院又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

官学历史悠久，早自夏商，已"学在官府"，建立官学，成官府的组成部分；至唐代普及州县，学皆有庙，形成以祀孔的文庙为主体的庙学结合形式，故称学宫、学庙。它属官府的统制，有严格的门第等级和地域名额限制，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日益成为科举的附庸。当时州县各设一学，形成统一规制的官式建筑，多处城中显要位置，成为所谓"贤关"、"圣域"、"文武官员经此下马"的神圣之地，充分反映其官文化特点。

自春秋战国，"竹帛下庶人"，民间私学发展，但因师、因时、因地而异，规模不一、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体系。至唐宋民间书院的兴起，所谓"乡党之学"，"前规后随"，则形成社会集资办学的制度化体系。它多由名师主持，讲学自由，较为灵活，择师选生，面向社会，较少限制；以居学为重，自学为主，读书与修养并重，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少形成学派基地；又多处山林胜地，与自然风景结合，表现地方文化景观特色。书院发展普及全国，数量远超官学，以致清代取代官学地位，成为近代学堂、学校的基础。

书院与官学并行发展，又形成相互消长之势。官学兴盛，书院常受到官府的抑制，甚至遭到禁毁；官学衰落，则书院兴盛，并得到官府的鼓励、支持和利用。由此可见，书院受

到官府两方面的制约。书院虽力求保持其独立的传统特色，但难免受到影响，被不同程度地渗透。岳麓千年历程，正反映出这种复杂影响关系。

岳麓山作为宗教基地，虽早有“名贤寄寓”，“开庐结舍”，成为文士荟萃之区，但东晋陶侃曾在此植杉结庵，未能久存；唐代马燧又在此创建道林精舍，已开书院之先河，但又被僧人所据，成为道林寺的组成部分。宋人感叹：“此是前朝古书院，而今创作梵王家；我来登眺不胜慨，独倚东风数落花。”由此前人得出经验：“结构不经公府，类聚不专师门，是以有传弗传耳。”岳麓之所以能从智璿和尚办学的基础上接管创建书院，实赖地方官府的力量，守道朱洞主持的结果。自后每当改朝换代战乱之中，书院屡遭严重破坏，又多为“僧卒势家所据”，也都依靠官府的支持，进行清理重建。也有人因此认为岳麓属于官办性质。其实，岳麓的延续办学，虽受官府较大影响，但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力量集资经营，故能始终处于官学系统之外，保持其一定的独立体制和传统特色。

岳麓由于办学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地位，而受到官府的密切关注和支持，在书院官学化的过程中，就难免受到较大影响，与官学之间产生复杂的联系。早在宋初，官学未兴，岳麓于初创之时即已成就突出，因而其山长周式得到宋真宗召见，并颁书赐额的礼遇，从而誉称“潇湘洙泗”，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宋代官学兴起之后，不少书院被改为官学，而岳麓仍得以保存；当州县官学推行“三舍法”时，潭州官府则采取变通办法，将岳麓、湘西两院，与州学纳入“三舍”序列之中。时称“潭州三学”，处于州学之上，使岳麓成为地方最高学府。这也是岳麓与官学产生的最早联系，但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仍保持了它的独立体制特点。其后朱张之学得以在此发展，建立基地，形成传统。

明初大力提倡官学，致使书院沉寂百年之久。岳麓亦被毁成墟，后陆续修复，则有所变化发展；最突出是仿州县官学形制，兴建文庙，创辟射圃，形成类似官学的院庙并列格局。华丽隆重的官式文庙建筑与原有书院建筑风格迥异，形成鲜明对比，为他院少见。（图3－3－8）随后，岳麓又得嘉靖明世宗颁发各地官学的《敬一箴》，及所注《程氏四箴》，因而增建敬一箴亭于文庙，显然是受到官学化的影响，或也借此巩固其特殊地位，得以延续发展。但它仍与官学有别，保持了以书院为主体的原有基本规制和传统教学特色，所以又有王学、东林学的传播。

清代对书院采取了控制与利用兼施的政策，以致书院取代了官学的地位，成为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因此官学化的影响日益加深。雍正时在全国选定二十余所省城书院，作为重点，树立楷模，岳麓即为其中之一。在此前后，岳麓还得到康熙和乾隆的赐额、颁书和拨款修建；并设置监院，派地方官员监督管理；实行严密的考课制度，追求科举目标。书院内增建文昌阁，供祀文昌帝君神像；凡科举中试者，题名阁内，以鼓励宣扬。同时将书楼尊经阁改名御书楼，以突出皇帝的赐书。这些都显示出浓厚的官文化色彩，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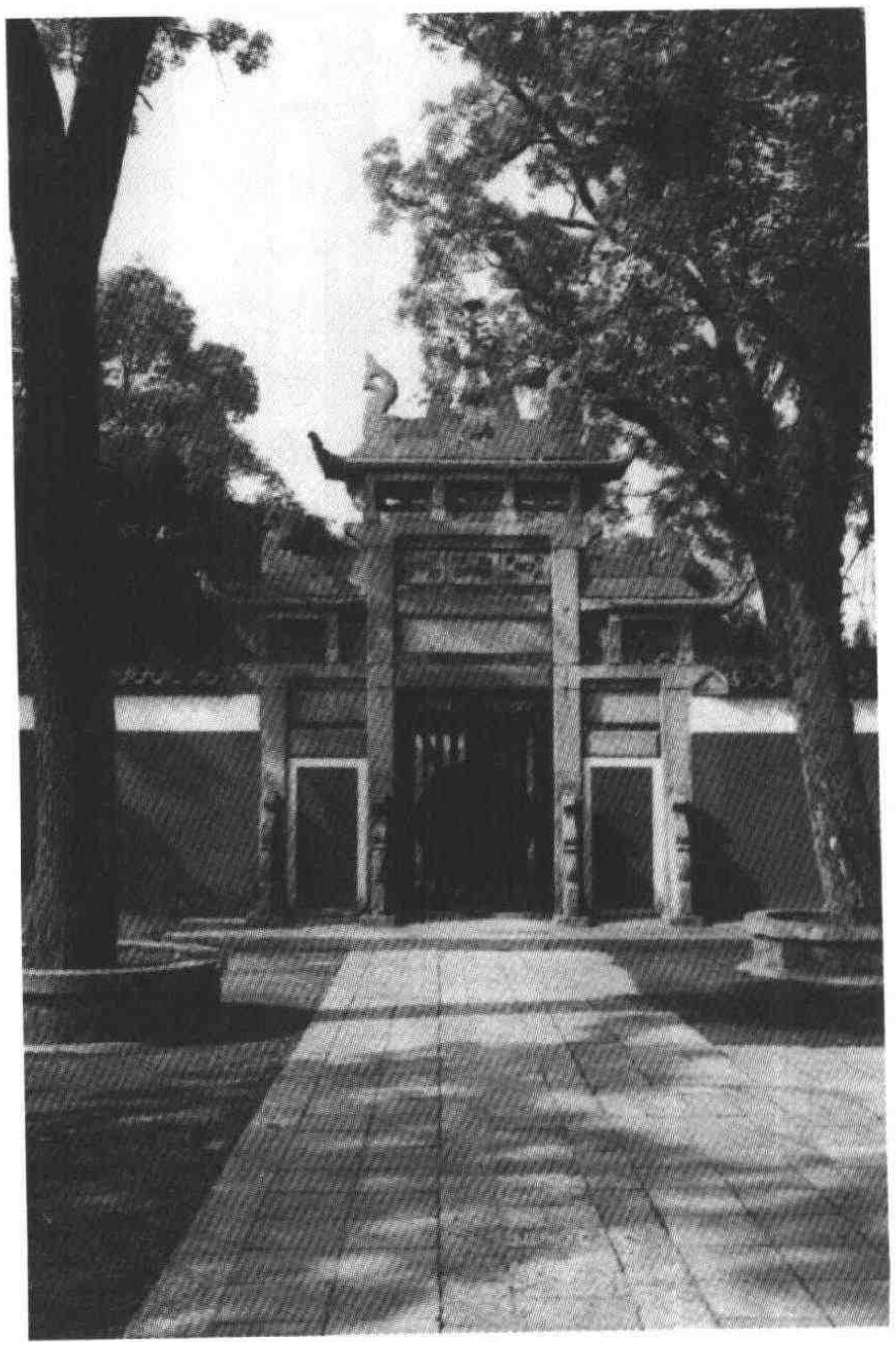


图3－3－8　岳麓书院文庙前碑楼　为清代遗构。坊前原有“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碑。

映官学化影响的加深，与书院原旨有悖(图 3-3-9)。岳麓由于仍多名儒主院，发扬传统学风，保护文物史迹，多有建树；尤经学的传播，湘水校经堂之设，不课时文，专攻经史，讲求实学，有所改革，因此湖湘之学仍有发展。岳麓成就人才甚众，而闻名于世；兼之文物史迹保存较为完整，更显示其历史渊源和特色，皆为一般书院所不及。



图 3-3-9 岳麓书院御书楼 创于宋，屡有毁兴。初名藏经楼，后名尊经阁，清名御书楼，清代遗构毁于抗战。今已重建。

书院文化与世俗文化存在雅俗之别，因此书院建筑与一般民间建筑，如民间的祠堂、会馆、寺庙等公共性建筑，有着明显差别。书院体现的朴实、典雅、幽静的格调，与民间追求的华丽、欢庆、喧闹的表现，反映了不同文化趣味的差别。但在书院建设发展过程中，两者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和兼容表现。

书院起于民间，又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而普及；同时书院的建造，都出自民间匠人之手。因此，书院建筑基本上是吸取民间建筑做法，和地方风格特点；但又有所提炼、取舍，以满足书院的教学规制要求，表现文士们的寓意精神和情趣爱好——来自民间而又超脱世俗的追求。随着历史进程，世俗文化的不断渗透，书院建筑世俗化影响也日益加深，岳麓也有突出表现。

风水的世俗观念，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择地、选向、营造中祈福避祸的重要约制因素。书院建设中难免受其影响，且有日益加深之势。文人中对于风水向来看法不一，颇多争议。岳麓早期文献中亦较少涉及于此，只张栻在《答朱元晦书》中，称岳麓"书院相对案山，颇有形胜，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披棘往来，四方环绕；大江在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以风雩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已透露其风水观念。朱熹是颇相信风水的，他曾关注岳麓的建设，在整顿扩建书院时，就有"更建于爽垲之地"和调整朝向之说，这是最早涉及风水的记载。明清时风水影响更为突出。明代正德初年守道吴世忠主持重修扩建书院时，以为"风水背戾，所以屡兴屡废"，特请风水先生进行勘舆，重新确定朝向，并改迁道路，"随山道萦绕而出"，作了全盘调整规划。清代山长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中还记有："戊子年当事以术士祸福之言，忽改书院头门偏对麓右，白虎高昂千尺，院中灾病大作，几致撤散；幸德公能庵来抚，予为先后详述其事，德公按视之曰：'此如人面然，移

咀居右耳之旁，尚复成人面乎？'立命有司唤匠作即行折改，刻期观成。门复旧制，院中渐次安堵如故"。可见当时影响之深，已颇为离奇。另外乾隆间，因院前有一土阜，被视为所谓"蛇过麓"的风水宝地，因此兴建魁星楼，以为"可以发甲"。为了科举发达而寄托于风水神灵，成了书院的一处祭祀重地。明清时，在其它书院历史文献中，还可发现多有风水的记载，甚至还有风水"文塔"的修建，以祈求科举功名。

戏台原是随着世俗文化的戏曲活动发展而兴起，普遍建于民间祠堂、会馆和寺庙中，用于祭祖、娱神和群众娱乐活动的附属设施。书院原无此类设置。清乾隆时岳麓山长罗典于院前建前亭，或称前台，供师生游息之用，却采取了民间戏台形式，颇为特殊，为他院所未见。该台也确曾表演过戏曲，如为山长祝寿等活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修复中，还从墙壁底层发现当年戏班书写的残留字迹；同时建筑的原有墙垛堆塑装饰，也采用了民间神话、戏曲等题材；尤其台内墙上保留的"福"、"寿"两个大字，更传为"仙迹"，都充分表现出世俗文化的特点，原是书院建筑中少有的。不过究其形制，岳麓书院的前台即前亭仍与祠堂、会馆的戏台有所差别，它既无厢楼的配置，又较开敞，孤立于院前。两侧曾辟有荷池，主要在适应游息活动，并增添院前的景观特色；后改名赫曦台，以纪念朱张曾在山上建台观日，命名题额"赫曦台"，久废，后发现该台碑刻，从而以此改名，更增添了它的历史文化意义。所以它既反映世俗文化的渗透，又表现出书院利用吸取世俗文化，而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图 3 - 3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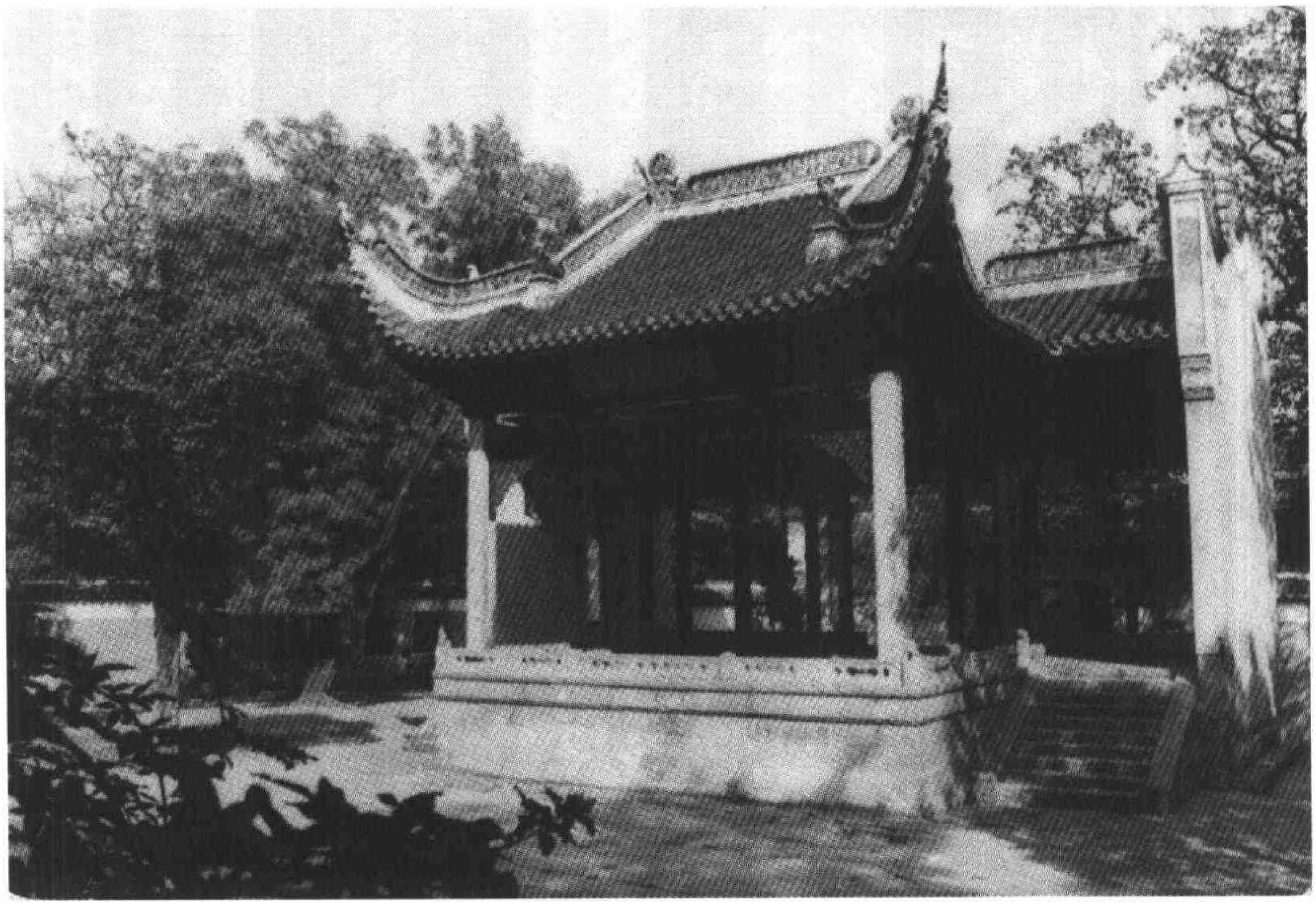


图 3 - 3 - 10　岳麓书院赫曦台　清代原构。

清代岳麓书院还增建了文昌阁、魁星楼，甚至岳神庙等，说明世俗文化的影响加深，使书院的供祀，又由"重人"回到了祀神。书院走向神坛，祈求神灵，显然是官学化、世俗化影响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书院开始衰落、庸俗的表现。

书院与宗教，存在着入世、重人与去世、尊神的根本区别，因此而反映出求实进取和神秘消极的不同表现。但是儒释道三家在长期争夺中渗透、交融，又形成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所谓"三家合流"的文化现象。这在书院文化中，有其明显体现，岳麓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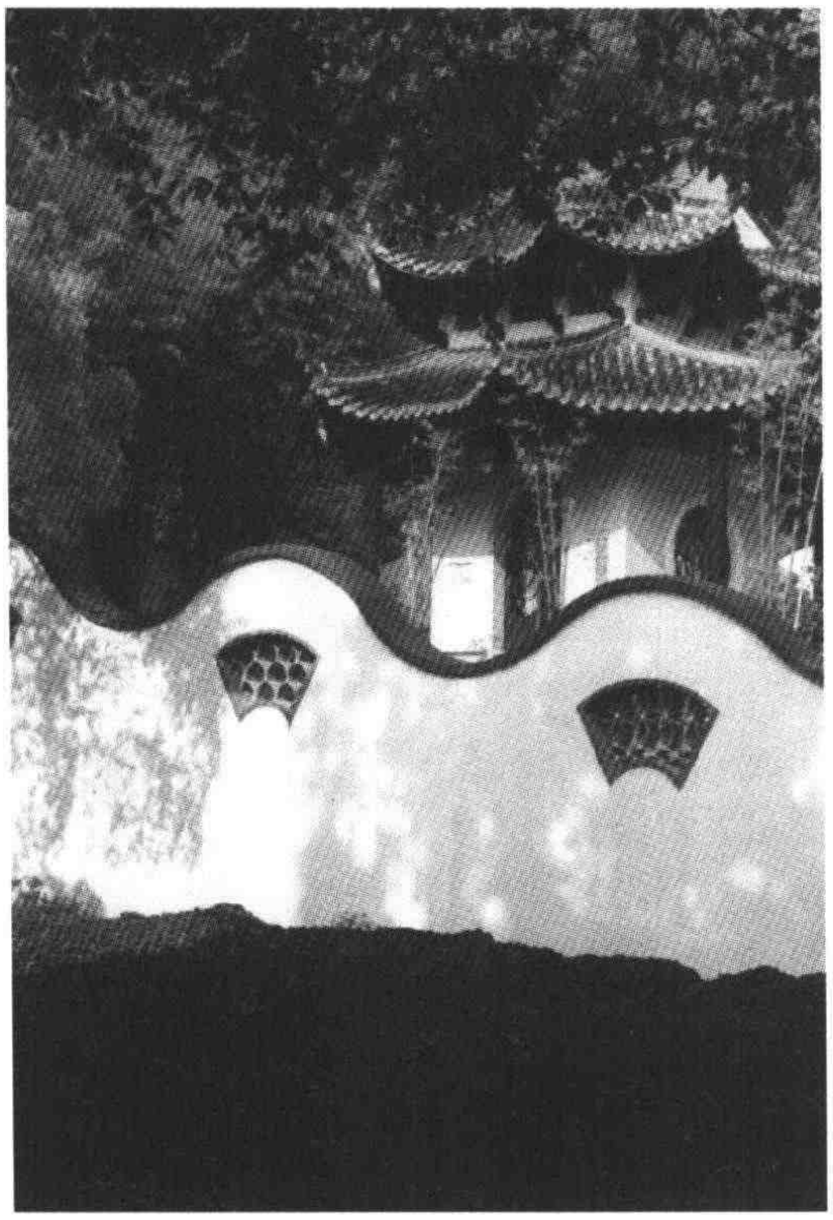


图 3-3-11　麓山寺碑亭　内藏麓山寺碑，为唐代书法家李邕所书原碑，故又名北海碑，大体保存完整，有局部损坏。地处岳麓书院百泉轩园林之内，也说明书院原属寺地的历史渊源。

岳麓书院创立于寺庵林立的宗教基地，延续千年，且成为麓山的主体，与宗教之间必然产生复杂的斗争和联系。前已述及，早在建院之前，麓山虽有"文人荟萃"、"开庐结舍"，以及陶侃的"杉庵"，都未能久存而湮没无闻；马燧的道林精舍，更据为寺有，可见曾为宗教势力所垄断。唐末僧人割地建屋办学，至宋初始被接管，正式创建书院，才得以突破宗教，形成儒家据点。(图 3-3-11) 可是这一段历史，史志无载，碑记未传，仅有南宋欧阳守道一文的记述曾见其碑，但当时就有人以为"此碑不足存"，只因"独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所以其后不传，显然是有意回避这一历史渊源，也反映佛儒之间的矛盾斗争。此后岳麓屡有院毁僧据发生，甚至毁碑灭迹，侵占房屋田地；多依赖官府出面清理恢复，也说明关系之紧张，斗争之激烈。以致明正德初年，拆毁著名的道林古寺，取其旧材扩建书院，足见佛儒势力的消长，书院已处于主体地位。各地书院历史中，与宗教之间的反复争夺，也屡见不鲜，反映了斗争的普遍性。

书院与宗教，既有争夺斗争，又有渗透交融。斗争中融合，正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书院发展的历史特点。唐末五代动乱，"士病无以学"，多寄寓山寺读书，已成风尚；而僧人智璿能"思见儒者之道"，创造条件，使"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由此形成书院，正可谓相互渗透的结果，文化交融的产物。

岳麓初期，形成其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采取中开礼殿、讲堂、书楼，左右序列斋舍及专祠、山长居处等布置格局。书院这种布局与佛寺中以佛殿、法堂、经楼为主体，左右斋堂、禅堂及祖堂、方丈等颇为类似，也决非偶然现象。这不仅因为智璿办学时，"凡所营度，多出其手"，而朱洞的创院与随后的扩建，也是以此为基础，"因袭增拓"而成，这就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其深层的文化交融影响。一方面，佛教文化传入后，已逐步走向中国化、世俗化道路，寺庙建筑已完全采取我国传统建筑形制，如岳麓山的麓山寺，就曾由早期的"塔庙"形式，至唐已改变为传统的院落布局；另一方面，儒家吸取佛道文化思想，和丛林制度经验，复兴儒学，以书院为基地，发展新儒学，因此有其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书院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订立学规、采用语录讲义、会讲、讲会，以及升堂讲说、质疑问难、供奉祖师等等，也都莫不受到丛林经验的启示，有所借鉴发展。书院择山林胜地，重视环境建设，故有不甘佛老所据，自有其争夺阵地的目的，同时也借鉴吸取了寺庙丛林园林风景建设的经验，加以利用、改造发展，以适应其藏修息游，超脱世俗、修养心性、潜心学术的需求，从而体现出另一种文化内涵和精神面貌。所以，书院与寺院建筑形制虽基本相类，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格调氛围。岳麓院外的通道，虽是利用原有的宗教香道改造而成，但进行了加工。沿路栽梅植柳，建牌楼、濯缨池、咏归桥、自卑亭，以及拓展园林、开创"八景"，并与山上所建的道中庸亭、极高明亭、禹碑亭相与贯通，构成以书院为中心的麓山新的中轴线。这一轴线建设呈现出以书院为主体新的文化景观特色，也可说是两种文化斗争中交融的新发展。

岳麓书院发展到后期，清代先后增建了文昌阁、魁星楼，又将原为纪念建院功臣的六君子堂改作了岳神庙等，并请进神像，烧香祈福，甚至道乡祠、屈子祠等纪念专祠，也请来僧道代管香火，则是人神不分，合二而一的宗教化表现，已非书院原有特色。

书院由于官学化、世俗化，以至宗教化影响，重科举、求功名、乞神灵，显与原旨悖离，走向了反面，陷入僵化庸俗境地。虽有识之士力求有所改革发展，终未能摆脱社会的制约。

岳麓的文物史迹，是书院文化悠久历史的见证，反映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书院作为古代文士聚居讲习的场所，主要体现其士文化的特有气质：既有传承，坚持其传统规制特点和寓意精神；又有兼容，渗透了不同文化因素成分和表现特征，其中有内在的交融，也有外部的强制；有借鉴，也有移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交织联系。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士所处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终不可能超脱于世俗之上，更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之下，社会框架的约制之中，书院规制文化的传承陷入僵化，兼容而流于庸俗，因而丧失活力和特色，走向了反面，也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不能形式化，限于表面的模式；也不能概念化，流于空洞的教条，只有具体地、历史地、深入地综合分析，从而了解其历史源流、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和精华特色。这不仅为古建的保护和修复所必需，以掌握确切的历史依据；更重要的是从中发掘出历史的规律，取得历史经验的借鉴。

当今处于巨大历史变革的新时代，高速发展，日新月异，面临着广阔领域的文化交流、挑战和冲击，无疑建筑的革新创造是时代的主旋律，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建筑发展中的传承与兼容。没有传承，就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兼容就不能发展，应该说正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更高层次的传承与兼容。传承而不抱残守缺，封闭排他，陷于僵化；兼容而不随波逐流，盲目抄袭，流于庸俗。在传承与兼容的复杂矛盾的交融中，实现质的飞跃，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新之路，正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期待。



第四章

研究与保护

第一节　书院与地方文化

书院延续千年，遍及全国，以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这对中国古代普及教育，开拓地方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教育打破了官学的种种限制，面向社会，深入民间，资助贫寒子弟入学；改变了官学“只课不教”，成为科举附庸的局面。书院内师生共处，言传身教，感情融洽，为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提高民族素质，创造了较好条件。不少书院形成优秀的人才群体，发展学派、成为地方的学术中心，如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婺学、关学，以及王学各地方派系等等，无不促进了当地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祭祀纪念学派宗师、地方历史名人及建院功臣等，设置专祠，树立楷模，作为书院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对于弘扬地方文化传统，进行乡土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作用。藏书作为书院重要标志、主要功能之一，不仅创造了较好的教学研究条件，同时也起到了为地方文化服务的作用。不少书院编辑出版图书，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史料，出版书院专志、地方史志、历史文集和教学成果等，为地方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书院的会讲、讲会、文会、诗会等活动，面向社会，提供了地方文士结集活动的场所，形成地方文化活动中心，拓展了书院文化教育的影响。

书院建设，择名山形胜之地，选风景优美之区，甚至构成地方的“八景”、“十景”之一，更开拓、增添了地方的文化景观特色。尤其是佛道盘踞，供祀神灵的地方，建此儒家据点，突出其“山以人重”的精神，显示其士文化景观建设面貌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地方文化特点，少数书院虽建于城内，也多开园辟池，颇重视环境的建设，不但表现了书院的文化特色，也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景观。

书院建筑，都出自民间匠人之手，充分吸取了地方建筑特色；但由文士们主持修建，构思经营，倾注其文化思想，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空间组合群体。所以来自民间，又高于民间，更显示其斯文典雅的格调。书院前规后随，历代相承发展，有其深刻的文化历史渊源和内涵，因此，历来受到士人和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每次修建，都要著文作记，述其始末和特点；同时地方史志也多有记载，并刊印图样，视为地方的特色；在一些文集、游记中，也多有记述文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史料。

遗存至今的书院从多方面、深层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见证。因此认真研究和精心保护书院建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研究地方历史，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业，都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书院的研究

丰富的书院文献史料和众多的书院文物史迹，为书院及其建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地方志中，无论"省志"、"府志"、"县志"，莫不将书院列为重要内容，且多刊印图样。不少书院还编有专志，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曾先后编志七次之多。据初步调查，已发现尚存书院专志百多种。清代学者王昶曾据方志史料，编成《天下书院总志》一书。自宋以来，历代学者的文集中，也多收有关于书院的论述文献。岳麓书院清代山长欧阳厚均曾收集整理有关岳麓文献，编成《岳麓诗文钞》30 多卷。这些都说明古代学人对于书院史料的保存和研究，备加关注。

自清末改制学堂、学校之后，在"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声中，书院被否定冷落。直到 20 世纪的 20 年代，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杂志 1 卷 1 期 1923.1)，提出"书院与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欲取两者之长，创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文中还特别肯定了书院"师生的感情甚笃"、"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等优点；并称，"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等等。此说引起学界的关注，随后胡适、盛朗西、陈东源等相继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周传儒则出版专著《书院制度考》(1929)。20 世纪 30 年代书院研究有所发展，报刊发表论文约 40 篇，出版专著有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1936)、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1939)。但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40 年间，书院的研究处于低潮，仅有论文 50 多篇。在此期间，港台地区，研究有所开展，也曾发表论文 30 多篇，专著 4 种。20 年代以后，书院的研究，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首先是日本，先后发表了不少成果，二战后美国、韩国、东德等国学者相继有所研究。

80 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书院研究也形成了高潮，先后发表论文达 400 多篇，专著、文集 18 种，呈现空前繁荣景象(以上参见《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研究文献索引》)。在岳麓书院的修复过程中，1982 年建立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 年改为文化研究所，并创刊《岳麓书院通讯》；1986 年创建湖南书院研究会，开展了书院文化的研究和交流活动，曾出刊文集、专著多种。与此同时，江西也曾先后建立书院研究室和地区研究会；在北京也曾一度建立书院研究所，促进了书院研究活动的发展。

书院的研究，早期多侧重于制度方面，其中虽也有涉及书院建筑制度问题，但较为简略，因此未能引起建筑学界的重视。在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偶有触及，也极简略，更未进行专题研究。70 年代以后，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活动多方位、多层次的进行，书院建筑渐成热点课题。较早的有王镇华发表的《台湾的书院建筑》一文(台湾《建筑师》1978 年 4 卷 6、7、8 期)，后又出版了《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一书(1986)，对台湾地区的书院建筑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我本人从 1979 年开始主持岳麓书院的修复，同时开展了书院建筑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曾先后发表了《关于修复岳麓书院的探讨》(1980)、《岳麓书院源流与展望》(1982)、《岳麓书院与岳麓山》(1983)、《岳麓书院的建设特点》(1986)、《书院建筑与传统文化思想——试论文人建筑》(1990)、《岳麓书院建筑文化散论——建筑文化的传承性与兼容性》等文，进行了典型解

剖分析。同时研究生汤羽杨、童峰、张卫等先后进行了有关书院建筑文化的专题研究，完成其硕士论文。1993年出版的《湖南传统建筑》一书中，对湖南的书院建筑，作了专门分析介绍。此外在一些报刊中，还散见有关书院建筑研究的文献报导。目前在湖南、北京、上海等处的出版社还正在组编出版有关书院建筑的专著和图册。书院建筑已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书院建筑文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丰富的文献史料，尚有待深入发掘整理；大量的文物史迹，尚有待深入调查研究；不同地区的书院，需要结合地方文化和民间建筑综合研究其地方建筑文化特色；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书院，更需深入解剖其建设历史演变和多层次文化的渗透影响，探讨其建筑文化发展；同时，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院，也有待进行比较研究。总之需要从宏观到微观，广泛而深层次地研究其历史发展规律和个性特征，以吸取其历史经验和启示，弘扬和开创地方建筑文化特色，并切实提高文物保护的认识和水平。

第三节　书院的保护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书院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约7000多所，历经千年沧桑变化，早期遗构已绝少留存，现存多属明清遗物。但书院建设，前规后随，继承发展，演变有序；且累代修建，多存有《记》，述其形制变化，提供了考证依据。自清末改制学堂、学校，不少书院原址延续办学至今，因而遗存不少遗迹。尤较偏僻地区，尚存较为完整的遗物。书院石刻碑记之类文物，更多散布各地。据报导江西一省，“现存书院建筑及遗址多达1071处，仅乐安流坑村就有书院28所”(《独具特色的书院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7.1)。据《书院教育与建筑》所录，台湾原有书院64所，其中尚存建筑遗物的有19所，约近一半尚较完整。《湖南传统建筑》所录书院12所，均较完整，实际遗存更多。云南省原已定为省、县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关书院遗构也有10多处(见《云南文物古绩大全》1992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国20世纪50年代因实行文物保护政策，已有书院列为地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则因曾为革命活动场所，被列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修复保存，但为数不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和学校的扩建，特别是十年动乱，书院遗物被视为“四旧”，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拆毁。拨乱反正以后，80年代以来，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得以修复、开放，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标志着书院文物保护的新进展；同时带动各地也加强了书院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增加了地方文化保护单位。有的地方利用书院建成为纪念馆、博物馆等，继续发挥其文化功能。

书院的保护，尚未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保护水平还亟待提高。一些名胜风景地区，因对书院文化缺少了解研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往往热衷于修建寺庙、游乐设施，甚至塑造妖魔鬼怪之类，不惜破坏历史文化景观，以招揽游客；而对于具有深刻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教育意义的书院遗迹，却较少顾及，任其荒废湮没无闻。遗存在一些学校的书院史迹，也因对其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缺乏重视和研究，而使用不当，任意改建，甚至拆毁。对于散存的书院碑刻等文物，更未能及时收藏整理和切实保护，使之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在书院的修复工作中，有的也因对其历史形制、地方建筑和传统缺少研究，或者对文

物建筑的保护要求缺乏了解，以致面貌改变，丧失原有文化特色。对于书院的环境特色的保护，更有所忽视，且难以控制协调。现在也有完全重建旧有书院的，借以表现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如南京的崇实书院、太原的晋溪书院、岳阳的金鹗书院等，必然有其新的意图和要求，已不同于以上的文物保护性质。无论是保护原址，还是重建新院，到底应如何体现其历史渊源和特色，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岳麓书院修复的经验，保护工作应与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以取得可靠历史依据，切实提高保护质量；在保护工作中，不断加强研究工作，发掘深层文化内涵，以充实提高其文化特色。从纵的方面，应对其建设发展历史，编出详细的历史年表，以研究其演变过程和规律；从横的方面，应对现存建筑文物，分别研究其历史变迁和做法特征，深入掌握其历史与现状、总体与局部的历史特点和特征，以便区别对待，采取切实有效保护措施，保护书院与其他重要文物保护一样，可进行必要的调整配置，但应尽量保存原构，恢复原貌，突出精华，力避任意拆改变更，丧失其原有历史信息和特征。

有效的保护，还有赖于合理的使用。例如，使书院发挥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作用：有的经修复开放，陈列其历史资料，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有的则已建成有关革命和历史纪念馆，起到重要的教育作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其实还可以选择适当书院，建成地方文教博物馆，或有关地方文化名人纪念馆，展示和研究地方文教历史和有关人物，对于提高民族文化意识，发扬地方文化特色，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由书院演变，至今办学的学校，更应重视对其书院史迹的研究和保护，用以教育师生，提高文化素养。尤其一些名山胜地，曾是书院活动的阵地，留下诸多遗迹，有其深刻的文化历史意义，对其遗址史迹，应该加以清理保护。有条件的可进行恢复，展示其历史，或者，凭借名胜开拓文化风景；至少也应树碑标示，以存纪念，供人考察。

结 语

任何一种建筑现象的发生、发展，必然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材料技术、功能要求、生活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某些因素的影响较为突出，但总体而言，仍是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无论从古代六大发明的建筑的辉煌，中世纪的三大宗教的建筑的神奇，还是从近现代工业化建筑的威力及其现代化发展，都莫不明显地看到其中文化影响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对建筑的研究，不能孤立片面地局限于功能、形式、技术等；还必须发掘其深层文化内涵，揭示其文化特色，从中探讨其发展的机制与轨迹。

书院建筑不同于传统的官式建筑和一般民间建筑的特点，也在于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层次性差别。

官式建筑，如宫殿、学宫等，追求其雄伟壮丽，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无论在规模、体量、色彩、装饰等，都要表现出森严等级，神圣权威；显示其与众不同，惟我独尊的特殊地位。这正如宫廷绘画，讲求其五彩工笔、金碧辉煌的格调。宋代官府所订《营造法式》、清代工部颁行《工程做法》，都规定了官式建筑严格的等级标准和具体做法要求，集中反映出官文化的特点。民间建筑，如民居、祠堂、会馆等，则追求安乐吉利，所谓“家若安，即家代为盛”，安居乐业，兴旺发达，表现出实用的、多样的生活习俗需要。它也有着如同民间年画所讲求的吉祥、欢乐、生动的乡土气息。明代的《营造正式》，及其后流行民间的《鲁班经》，记载了工匠们的实践经验，以及诸多吉凶福祸的禁忌，反映其俗文化特点。书院建筑，以及文人园林、文人活动场所，则可称之为文人建筑。它追求幽静典雅，所谓安身立命，修养心性，表现出朴实、淡雅、自然、含蓄的特色，一如文人画的水墨写意，呈现清新明快的格调。明代的《园冶》，清代的《一家言·居室部》，阐述了文人的生活情趣、建筑观点和设计思想，反映其士文化的特点。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建筑往往表现出个性格调的差别，即使相同性质类型的建筑，如书院之与官学，文人园林之与皇家园林、富豪的园林，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有其官民之分和雅俗之别。虽然官文化占有统治地位，同时不同文化层次之间也存在渗透、交融，但书院作为文人建筑，也像祠堂作为民间建筑一样，仍不失其各自的主导思想和表现特征。

中国古代文人——“士”，素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担负着文化思想的承传与创新的主要使命。宋代儒家复兴，“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一代士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传道济民，发展学派，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精神。儒士们以继承道统和尊经、崇圣、法古强化了礼制思想；同时以超脱世俗，修养心性，又颇受道佛的影响；尤其失意退隐之士，不满现实，以淡泊清高自居，寄情山水，潜心学术。书院的建设和建筑正是受其影响，表现其文化思想气质和其生息共戴的地方历史文化特色。

人类的建筑文化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既有社会、民族、地域、时代的区别，又有文化层次的差异；显示各自的文化特色。今天，人类面临伟大历史变革的新时代。空前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冲击要求我们，应更善于传承，敢于兼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品位的新建筑，为世界建筑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因此，对于中外古今建筑，都应深入研究其文化历史渊源和表现特色，从中吸取有益经验，为我所用。这也是中国书院建筑文化研究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2.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 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长沙：岳麓书社，1986
5. 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6.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7. 杨慎初等．湖南传统建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8. 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
——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台北：台湾故乡出版社，1986
9. 季啸风等．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10. 陈同滨等．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11. 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毛礼锐等．中国教育史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13.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14. 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5. 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16. 有关各地方志

后　记

本书的完成，承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高介华同志的支持和督促，并得到邓洪波同志提供部分历史图片、吴立东同志提供彩照，在此一并致以诚挚感谢。

杨慎初
2000年3月